

Studies in Asian and Afric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

《亚非地理语言学研究》单刊 第一

中国语言地理研究论文集

**Papers on Geo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2020-2022 “Studies in Asian and African Geolinguistic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tudies in Asian and Afric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

Papers on Geolinguistic Studie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Report of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2020–2022
“STUDIES IN ASIAN AND AFRICAN GEOLINGUISTICS”

First published 2021

Edited by Hiroyuki SUZUKI & Mitsuaki ENDO

Copyright © 2021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ISBN 978-4-86337-352-5

This is an electronic publication in PDF format.
This publication is offer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International License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Published b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11-1, Asahi-cho, Fuchu-shi,
183-8534, Tokyo, JAPAN
<https://publication.aa-ken.jp/>

Acknowledgements

This volume is a part of the results of ILCAA joint research project “Studies in Asian and African Geolinguistics” 2020-2022. This research also comes from JSPS KAKENHI JP18H00670 and JP18H05510. The volume is based on articles from the “Forum on Geolinguistic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6 December 2020) and other relevant Chinese articles.

本刊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共同研究项目“亚非地理语言学研究”(2020-2022)的成果之一，亦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项目 JP18H00670 和 JP18H05510 的阶段性成果。本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在“中国语言地理比较研究论坛”(2020年12月6日召开)上发表的会议论文，也收录了以中文撰写的其他相关论文。

目 录

罗自群：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及地理分布	1
石德富、杨潇潇：从地理语言学看黔东南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	11
铃木博之：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看云南藏语/l/及/j/的历史发展	21
次林央珍、铃木博之：东旺藏语语言地图及其与周边的土话的关系	39
鄢卓：壮语“山”的语言地图及解释	60
高天俊：从地名看民族语言的分布	73
杨晓霞：以语言地理类型视野再审视白语的方言分区	79
曾晓渝：天津方言单字调与连字调地理分布研究	87
元海峰：日照方言尖团音的地理语言学调查	107
刘欣：山东青州方言“日”字读音的地理分布及历史层次	112
刘婧涵：辽宁方言日母日系字读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125
黄河：从地理语言学的视角看文白读音的势力消长	152
八木坚二：er 音的分布——以中西部方言为主	167
曾智超：闽南方言“肉”义词的分布与演变	185
铃木史己：汉语方言中的反义形容词比较研究——以“高/矮”为例	210
日高知惠实：徐州方言母语者所使用的亲属称谓“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由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而产生的词汇变异	218

Table of contents

Ziqun Luo, <i>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animal, and plant classifier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clud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i>	1
Defu Shi and Xiaoxiao Yang, <i>The reversal of the Yin (nonnasal coda) and Yang (nasal coda) rhymes in Hmub</i>	11
Hiroyuki Suzuki, <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 and /j/ sounds in Yunnan Tibetan from a geolinguistic context</i>	21
Tshering Yangdron and Hiroyuki Suzuki, <i>Linguistic maps of gTorwangrong Tibet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varieties</i>	39
Zhuo Yan, <i>Linguistic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mountain” in Zhuang</i>	60
Tianjun Gao, <i>Vie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names</i>	73
Xiaoxia Yang, <i>Re-exam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Bai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typology</i>	79
Xiaoyu Zeng, <i>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nosyllabic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Tianjin Dialect</i>	87
Haifeng Qi, <i>A geolinguistic survey of ‘Jianyin’ and ‘Tuanyin’ in Rizhao dialect of Chinese</i> ..	107
Xin Liu, <i>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stratu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Ri” in Qingzhou Dialect</i>	112
Jinghan Liu, <i>The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Ri-consonant system in Liaoning dialect</i>	125
He Huang, <i>A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 competing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i>	152
Kenji Yagi, <i>Distribution of “er”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middle west dialects</i>	167
Zhichao Zeng, <i>Southern Min words for “flesh”: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i>	185
Fumiki Suzuki, <i>Comparative study on antonymous adjectives in Sinitic: The case of “tall/short”</i>	210
Chiemi Hidaka, <i>Terms of address for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used by Xuzhou dialect speakers: Lexical variation by area and age</i>	218

中国语言地理比较研究论坛

Forum on Geolinguistic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Languages in China

主办：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费基盘研究（B）JP18H00670 “基于高精度广域地图的中国与毗邻多语言区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日本文部科学省科研费新学术领域研究 JP18H05510 “由日语与相关语言比较解析解明扶桑人历史”、青山学院大学综合研究所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心

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周日）北京时间 9 点至 18 点

地点：线上会议

9: 00-10: 30 主持人：远藤光晓（青山学院大学）

邓晓华、范志泉、王传超（厦门大学），语言与基因演变相关性研究——以三亚回族及其语言为例

高天俊（华中科技大学），从地名看民族语言的分布——以白语、傈僳语和彝语为例

杨晓霞（大理大学），以语言地理类型视野再审视白语的方言分区

10: 45-11: 45 主持人：田口善久（千叶大学）

石德富、杨潇潇（中央民族大学），从地理语言学看黔东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

罗自群（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及地理分布

13: 00-14: 30 主持人：曾晓渝（南开大学）

远藤光晓（青山学院大学），侗台语数词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铃木博之（复旦大学），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云南藏语的历史发展

崔桂荣（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朝鲜语方言 ‘ㅁ[p]’ 不规则活用现象及其地理分布特征考察——以 “돕다[topd̥a]” “부럽다[purəpd̥a]” “무섭다[musəpd̥a]” 为例

14: 45-16: 15 主持人：罗自群（中央民族大学）

八木坚二（国士馆大学），er 音的分布和演变——以中西部方言为主

铃木史己（南山大学），汉语方言中的反义形容词比较研究——以 “高/矮” 为例

黄河（复旦大学），语法化区域与微观地理类型分析：以宜兴方言指示词为例

16: 30-18: 00 主持人：岩田礼（小松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天津方言单字调与连字调地理分布研究

邢向东（陕西师范大学），“扔” 的白读音与 “赎身” “曲连馍” 分布地域之比较——西北地区方言与民俗相关现象的关联性考察

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北方话 “今天” 的说法看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一种方式

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及地理分布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表示人、动物、植物的这三类名词在汉藏语系（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语言中相应的类别成分（个体量词或词缀）及其三者之间的分合关系在地理分布上的表现。通过比较，发现与这三类名词相关的类别成分在汉藏语系语言内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同一个语族内部亦如此。其类别成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与无生命的混用到表人、动物、植物三分的逐步产生、发展的过程，由此也反映了汉藏语系这些语言的亲疏关系。

对一个语言而言，量词不是必须有的，之所以有的语言产生了量词，有了名量词，并且有的发展得越来越精细，说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对不同事物的认识和划分，在语言上通过名量词或类别成分体现出来了。

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一语三族（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有很多语言是有名量词的，也有不少是有表示类别的词素的。考虑到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本文的类别成分，是指对名词有指别、分类作用的成分，包括表示类别的个体量词和表示类别的位于词头或词尾的词素。

我们认为，类别成分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通过考察不同语言的类别成分和名词的搭配关系，可以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对客观事物是如何分类的，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将可能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借助地理分布的特点，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

根据生命度，可以把客观事物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有生命的，一般包括人和动物、植物等。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定义，“人”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人是高等动物，和一般动物不同。动物又和植物相对，动物和植物都有生命，但是，“动物”是“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物多以有机物为食料，有神经，有感觉，能运动”，“植物”是“生物的一大类，这一类生物的细胞多具有细胞壁。一般有叶绿素，多以无机物为养料，没有神经，没有感觉”。“生物”是“自然界中所有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物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动物、植物、真菌、细菌、病毒等都是生物”。本文考察的是肉眼可见的生物——人、动物、植物三类名词在汉藏语系语言中相应的类别成分及其三者之间的分合关系在地理分布上的表现。

据我们现在的认知，人、动物、植物这三者是不同的，现代汉语也通过量词对这三者加以区别，比如：说人是“一个人”“一位同志”“一条好汉”，说动物是“一只鸡”“一头

牛”“一匹马”“一条鱼”，说植物是“一棵树”“一根草”……这样看来，汉语里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量词，是三分的，但也有少量重合，比如“个”“条”。

那么，汉藏语系语言的情况如何呢？根据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个体量词是分还是合，有以下4种可能性¹：

- A.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三分。
- B.表人名词和动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植物名词的单用。
- C.动物名词和植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表人名词的单用。
- D.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三者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

本文以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中国的语言》（2007）等正式出版的论著为语料来源，对汉藏语系一些语言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是否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的情况进行梳理，并从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一番解释。

一、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

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语言，除了汉语之外，根据已收集到的语料，将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的一些语言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分为3种情况：1）以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三分为主；2）表人名词和动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3）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混用。

（一）以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三分为主

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

（武鸣）壮语²：pou⁴个（人）；tu²只（水牛）；ko¹棵（树）

布依语³：pu⁴个（人）；tu⁶-只，匹（水牛、鹰等）；ko¹棵（树、草）

傣语⁴：phu³位、人；ko⁴个（人）；to⁶只、匹（动物）；mai⁴树木类、tun³/ton³棵/株

（车江乡）侗语⁵：mun⁴位、个（用于人）；tu²只（用于动物）；on¹棵（用于植物）

（罗城）仫佬语⁶：mu⁶位（指人）；tɔ²只（指动物）、lak⁷只（水牛）；tɔŋ⁶棵（指植物）

佯僂语⁷：ai¹是指人的量词；to²是指动物的量词；pje²棵（树）

（金秀）拉珈语⁸：lak⁸个（人）；tu⁴只（家禽家畜）；kan¹棵（树）

¹ 从一般常识来判断，不会出现一个语言表人名词和植物名词共用一个类别成分、动物单用另一个类别词的情况，首先排除这种可能性。

² 《中国的语言》，1104-1105页。

³ 蒋颖《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317页；《中国的语言》，1133页。

⁴ 《中国的语言》，58页，1146页。

⁵ 《中国的语言》，1201页。

⁶ 《中国的语言》，1243页，1247页。

⁷ 薄文泽《佯僂语》，73页。

壮侗语族仡央语支的：

仡佬语⁹：xen³³ 位（指人）；san³³ 只（指动物）；mp¹³ 棵（树）

木佬语¹⁰：pau³¹ 表人，个；biə³³ 表动物，头、只；tsuŋ⁵⁵ 表植物，棵

壮侗语族黎语支的：

村语¹¹：kuan⁵：个（只用于人）；lət⁵：只（猪、马、狗等），tsem⁵：只（野猪），ham⁵：头（黄牛）；vaːu³-：棵（树）

壮侗语族语支待定的：

蔡家话¹²：ŋje³³ 个（人）；tsɿ⁵⁵ 只（鸟）、ko³¹ 匹（马）；dzuo³¹ 株（树木）、ma³³ 棵（庄稼）

苗瑶语族畲语支的：

畲语¹³：nan¹ 个、nan² 位（指人）；thaŋ⁴ 头（指动物）；ka²² “棵”（指植物）

藏缅语族缅语支的：

载瓦语¹⁴：ju²¹ 位、个；tu²¹ 只、头、匹；kam⁵¹ 棵

浪速语¹⁵：jauk³¹ 个、位（用于人）；tau³⁵ 只（用于动物）；kɛ̃³¹ 棵，个（用于植物）

仙岛语¹⁶：ju⁵⁵ 个（用于人）；tu³¹ 只（用于动物）；tɕuŋ⁵⁵ 棵（用于树木类植物名词¹⁷）

波拉语¹⁸：jau³¹ 个（用于人）；tɔ³¹ 只、匹、头、条（用于禽兽虫鱼等类的动物）；kɛ̃³⁵ 棵（用于植物）

勒期语¹⁹：ju³¹ 个，用于人；tu³³ 只，用于动物；kam³¹ 棵，用于成棵的植物

阿昌语²⁰：zu⁵⁵ 个（用于人）；tu³¹ 头，只（用于动物）；tseŋ⁵⁵ 棵（用于植物）

藏缅语族彝语支的：

拉祜语²¹：ɣa⁵³ 个（用于人）；khe³³ 支、匹、头、条（用于动物）；tɕe³¹ 棵（用于植物）

纳西语²²：kv⁵⁵ 个（指人）；phu⁵⁵ 头、条、只（指牛、虎、手、脚），me³³ 只（指鸡、鸭、猪、马）；dzə²¹ 棵（一~树）

⁸ 《中国的语言》，1314~1317 页。

⁹ 《中国的语言》，1382~1383 页。

¹⁰ 《中国的语言》，1444 页。

¹¹ 《中国的语言》，1360 页，1365 页，1370 页。

¹² 《中国的语言》，1471 页。

¹³ 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49 页。

¹⁴ 《中国的语言》，762 页。

¹⁵ 《中国的语言》，782 页。

¹⁶ 《中国的语言》，799 页。

¹⁷ 蒋颖，201 页。

¹⁸ 《中国的语言》，815 页。

¹⁹ 《中国的语言》，835 页。

²⁰ 《中国的语言》，746 页。

²¹ 《中国的语言》，297 页。

²² 《中国的语言》，356 页；蒋颖，337 页。

毕苏语²³: fu³³、saŋ⁵⁵ “个、位”用于人; maŋ⁵⁵ “只、头、匹”等, 专用于给动物计量; tsuŋ⁵⁵ 棵(树)、捆/把(草)

卡卓语²⁴: ju²⁴ (专门表示人的量词); ma²⁴ 个、只、匹(鸟、马、猪); tsɿ³²³ 棵(一~树)

基诺语²⁵: xjo³¹/li⁵⁴ 用于人; mɿ⁴⁴ 表“只、头、匹、条”等, 用于所有的动物; tsu⁴⁴ 表“棵、根”

怒苏语²⁶: ʔi⁵³ 个(指人); gɿ³⁵ 只、头、条、匹(指大牲畜和野兽); dzɿ⁴³⁵ 棵(指植物)

西摩洛语²⁷: kɿ³¹ “个”用于与人有关的名词上; mo⁵⁵ “只、头、匹、条”不分家禽野兽, 不分大小外形, 可以通用于所有的动物名词上; po⁵⁵ “棵”用于树木类的事物名词上
藏缅语族景颇语支的:

格曼语²⁸: nau⁵⁵ 个(人); nau⁵⁵ 头、条、只(常用于动物的量), thal⁵⁵ 匹(马); ɕu³¹na⁵⁵ 棵(一~树)

达让语²⁹: khu⁵⁵ 个(人); tiuŋ³⁵ 匹、只、头(主要用于动物); bɿu⁵³khu⁵⁵ 棵(一~树)

阿依语³⁰: io⁵⁵ 个(人); qu³¹ 只(一~鸡); dzuŋ⁵⁵ 棵(一~树)

藏缅语族羌语支的:

羌语³¹: ʔe (一~人); ʔedze (用于山羊、绵羊)、ʔez (用于马、牦牛、猪), ʔow (用于鸟、狗、猫); ʔoqu 棵(一~树)

尔龚语³²: ɿa 个(人); zgja^u 只(山羊); qha 棵(树)

表人、动物、植物的类别成分三分的, 和现代汉语一样的, 以上这 30 种语言, 包括 11 种壮侗语族语言、1 种苗瑶语族语言和 18 种藏缅语族语言, 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等省区。语种多, 地理分布广。

除了表人、植物、动物名词的类别成分三分之外, 这些语言还有可能存在一个通用量词, 可以和不同类别的名词搭配。比如: 布依语的 dan³⁵ “个”应用范围很广, 除了人、动物、植物之外, 其他事物大都能用它计量, 而且还能用于抽象事物的计量³³。仡佬语还

²³ 徐世璇《毕苏语》, 104 页~107 页。

²⁴ 《中国的语言》, 433 页; 蒋颖, 337 页。

²⁵ 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 “mɿ⁴⁴ 量词现在已经转为专指动物的类别量词了。这些结构提供了基诺语指人量词和指动物量词的历史演变线索。”78 页。

²⁶ 《中国的语言》, 476 页。

²⁷ 蒋颖, 219 页, 220 页。

²⁸ 蒋颖, 316 页, 336 页; 《中国的语言》, 590 页。

²⁹ 《中国的语言》, 590 页; 蒋颖, 316 页, 336 页。

³⁰ 蒋颖, 316 页, 336 页; 孙宏开、刘光坤《阿依语研究》, 243 页。

³¹ 黄布凡、周发成著《羌语研究》, 102 页。

³² 《中国的语言》, 937 页。

³³ 蒋颖, 46 页。

有一个 *nen*³³ 相当于汉语的“个”；载瓦语有一个通用量词 *lum*²¹ 个，“它使用范围广，适应性强，几乎可同所有可计数的名词组合。”毕苏语的 *lum*³¹ “个”适用范围很广，可以用于除人和动物外其他事物的计量，包括具体的物体和抽象的事物³⁴。

（二）表人名词和动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

黎语支的黎语³⁵：*lanj*⁵³ 个，只用于人、鬼神和动物；*pan*⁵³ 只（只用于水牛），*khur:ŋ*² 棵

壮傣语支的（环江县）毛南语³⁶：*ai*¹ 个，位（人的量词）；*ts*² 只（动物的量词也用于小孩）；*zɔŋ*² 株（植物）

临高语³⁷：*na*³ 位（指人），*hu*² 只（指动物或人）；*tsu*⁴ 株（指植物）

仡央语支的普标语³⁸：*qa*³³-瑶族、男人、姑娘、浪子、跳蚤、老虎、鹰；*ta*³³-人、熊、蛆、龙；*diau*³³ 个（人）、位（客）；*liak*⁴⁵ 只（鸟）、个（人）；*ba*³³ 头（牛）、只（狗）；*linj*⁵¹ 根（扁担）、支（笔）、棵（树）

虽然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有三分的情况，但是，普标语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有几个类别成分可以被表人、表动物的共用。

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³⁹：“人”一般不带量词，但是有时也用量词 *tunj*⁴（主要用作动物的量词）；*kunj*³ 棵（树），“*lunj*¹ 朵”

布努语的这几个类别词都有相同的韵母 *unj*——这是否暗示着表人、动物、植物的三类名词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类别成分？

另外，彝语支桑孔语⁴⁰的“单一量可用 *tim*³¹（一般事物）或 *teanj*³⁵（人或动物表示）”。羌语支纳木义语⁴¹的“*gu*⁵³ 个”，“可以修饰动物名词、指人名词搭配”。藏语支白马语⁴²的“*ŋge*⁵³”（人）个（一）、（牛）头（一）。

（三）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混用

这里说的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混用，不仅仅是指它们三者之间的混用（三者共用或两两共用），而且还包括它们这三类有生命的名词和表无生命的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也混用了。比如：

³⁴ 蒋颖，85 页。

³⁵ 文明英、文京编著《黎语长篇话语材料集》，21 页；《中国的语言》，1348 页；蒋颖，337 页。

³⁶ 《中国的语言》，1262 页。

³⁷ 《中国的语言》，1161 页，1163 页。

³⁸ 《中国的语言》，1417 页，1421 页。

³⁹ 《中国的语言》，1515~1516 页。

⁴⁰ 《中国的语言》，397 页。

⁴¹ 《中国的语言》，978 页。

⁴²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白马语研究》，66~67 页。

壮傣语支的标话⁴³：tsu² 个（人）、只（动物）、颗、粒、个、座、张（谷米、石头、山、桌子、帽子等）。lak⁸-做表人词头时，不分性别和长幼，此外还可以做动物、植物或身体部位的词头。

仡央语支的布央语⁴⁴：kon³³ 个（人）；pa³³-：多做名词前缀，出现范围广，包括关于人、动物或抽象事物等的词，也做动词、形容词前缀。ta⁵⁵-/ta³³-/ta⁰-：名词前缀，出现范围较广，偶尔也用于其他词类。例如：兔子。dɔ³²² 个（物体）：个体名量词 dɔ³²² “个”使用范围最广，可指称、搭配的名词包括器皿、物件、衣服、桥、建筑物、动物等，也指“元”（货币单位）。ma⁵⁵-/ma³³-/ma⁰-：名词前缀，用于植物、身体部位及方位名称。还有 mai⁴⁵ 棵（树）、tɛp³³ 根（草）等。

布干语⁴⁵：pau³¹：表人，个。biə³³：表动物，头、只。tsun⁵⁵ 表植物，棵。te⁵⁵-：部分动植物、物件和气候现象的前缀。mu³³-：植物和部分雌性动物前缀。tə⁵⁵-：身体部位、方位名词和动物名称前缀，可念轻声。tse⁰-：一些飞禽和物件的前缀。

补充一点儿，上文表人、动物、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三分的（车江乡）侗语还有一个 hoi⁵ 个（碗，果子）、畲语表示圆形或粒状物体的量词和表示人的量词一样，用 nan¹ 个、村语由 ki²-构成的词多属小动物的名称和某些事物名词。

苗语支的巴那语⁴⁶：le³¹³ 个（人）。la⁴⁴-可以出现在“狗、猫、老鼠、老鹰、猴子、天、太阳、月亮、房子、瓶子、痣”等词的前面。

巴哼语⁴⁷：单音节名词词根大多数带前缀。其中出现得更多的是 a 和 qa，似乎各种名词都有，没有限制。

景颇语支的苏龙语⁴⁸：通用个体量词 ǎ³¹ (jǎ³¹)，这个量词可以表示名量，结合面非常宽，相当于汉语的“个”“头”“只”“句（话）”等。

彝语支的哈尼语⁴⁹：物量词如 mo⁵⁵ “个、头、只、条”……mo⁵⁵ 的用法很广，它几乎是所有个体的量词，动物、植物、矿物以及一般物品，均可用它计量。

羌语支的羌语：个体量词 ʔe “个”使用得最广泛，最常用于指人名词，也可用于修饰动物名词如“猪”“马”等和无生命事物名词如“树”、“房子”等。

以上几种语言的表现，不仅把人、动物、植物之间的界限打乱了，还打破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界限。这种现象在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语言中都有。在这些语言中，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和前面两种情况相比，这种最复杂。

⁴³ 《中国的语言》，1180 页。

⁴⁴ 《中国的语言》，1398 页，1401~1402 页。

⁴⁵ 《中国的语言》，1442 页，1444 页。

⁴⁶ 《中国的语言》，160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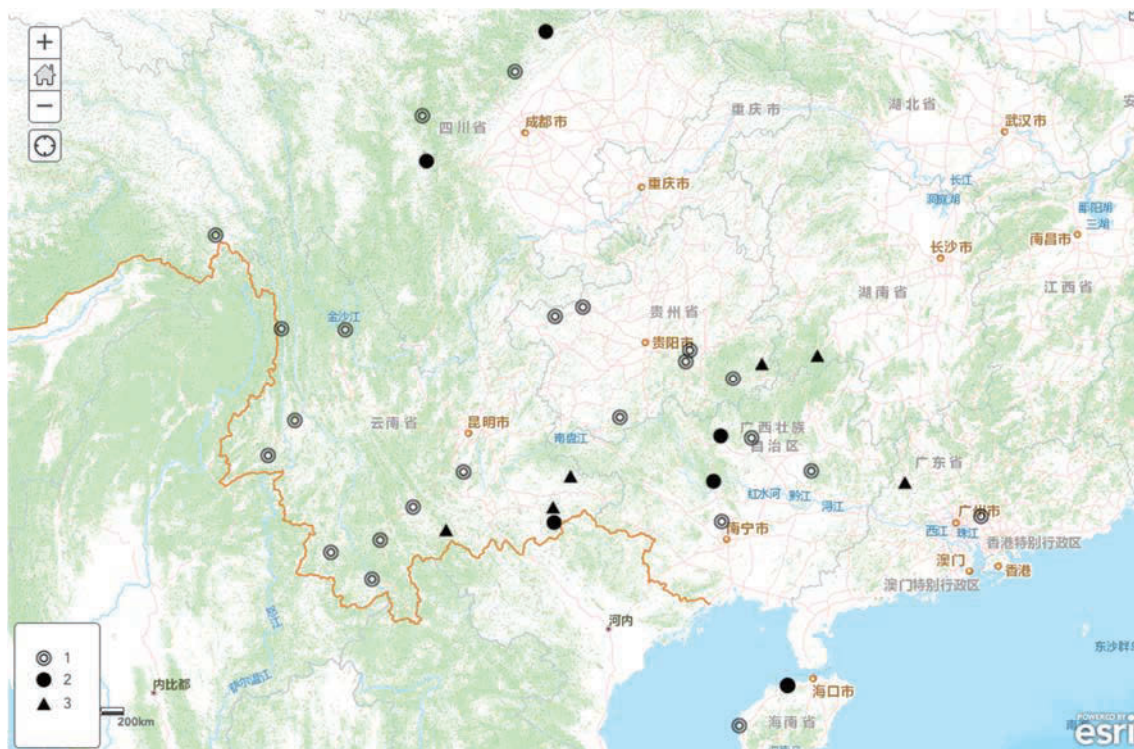
⁴⁷ 《中国的语言》，1530 页，1539~1540 页。

⁴⁸ 《中国的语言》，689~690 页。

⁴⁹ 《中国的语言》，315 页。

二、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地理分布特点

上文涉及到的三种情况，从地理分布上看，如图⁵⁰：



从语种上看，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语言，和汉语一样，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三者三分、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的 A 类，分布的范围比较广，呈现出一个发展势态。其次，表人名词和动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的 B 类，它们更多的是从属于 A 类。在一个语言中，A 类、B 类并存。这两种情况，以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语言为主。动物名词和植物名词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的 C 类，只发现一例（如黔东南苗语⁵¹），而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三者共用一个类别成分的 D 类也比较少见（如标话的 lak⁸-）。第三种是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的类别成分混用，这种打破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界限、共用一个类别成分的情况，虽然是零星分布，但是，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三个语族都有。

三、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发展轨迹

本文上图所展示的实际情况，比我们之前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就与表人、动物、植物

⁵⁰ 有的语言，地理分布范围广，但也只选择一个地点表示。

⁵¹ 《中国的语言》，te¹¹ 用于有生命的事物，包括动物和植物；le³³ 用于无生命的事物。1482 页。

的类别成分来看，汉藏语系语言内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仅仅就同一个语族内部，也是不平衡的。藏缅语族内部的差异比较大，有一些语言，数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名量词，如：藏语支的藏语个体量词很少，一般情况下，名词直接和数词搭配，不用个体量词。景颇语支的“景颇语⁵²的量词不发达。可数名词一般不用量词而直接受数词的修饰。”义都语⁵³的量词很不丰富，“多数情况下是数词可以直接限制名词的量而不需加量词。”“崩如语基本上不存在个体量词，仅有的一个来源不明的 $\eta o\eta$ ⁵⁴‘（一）个’”⁵⁴，“珞巴语⁵⁵有一定数量的量词，但使用频率不高。数词不用量词就可以直接跟名词结合。因此，量词就显得可有可无。”普米语已有个体量词 $ts\eta$ ⁵⁵“个（人）”、 $vbəu\eta$ ³¹“棵”，“不是所有个体名词称量时都要使用个体量词”“个体植物名词称量时都要用量词，而绝大部分动物名词与部分用具、工具类名词称量时不用量词。”⁵⁶。通用量词 $m\Lambda$ ⁵⁵“个”，适用范围很广，除人物、动物之外的许多名词都可以用它来称量。

如果说藏缅语族一些语言还处在类别成分从 0 到 1 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话，那么，苗瑶语族语言类别成分则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客观外界的划分标准是多元的，甚至是混沌的，从而才有打破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界限、共用同一个类别成分的情况。当然，包括汉语“个”在内的一些语言中的通用量词也是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和表无生命的事物名词共用。

所以，将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名词和无生命的名词分别用不同的类别成分表示，是类别成分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性的转折点。之后，有的语言是把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看做是有生命的，表人、动物和植物的共用一个类别成分（D 类），反映了对有生命的事物的一种最初的、最原始的分类思维？后来发现，人和动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者和植物不同，有的语言就把人和动物归为一类的，植物单列（B 类）；当然，人毕竟是高等动物，和动物有很多不同，所以，又根据动物的形状、体型、生活习性等不同，给动物分类，给予不同的类别成分（如柔若语等）……也有的语言把动物和植物看做是和人相对的生物而归为一类使用同一个类别成分（C 类）。

和藏缅语族、苗瑶语族相比，壮侗语族语言，虽然内部也有不少差异，但是，不少语言类别成分比较丰富，表人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三者三分，不共用一个类别成分（A 类），处于类别成分发展的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

汉语的类别成分比较丰富，但是，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细致。比如：壮语有的量词还能表示人或动物的大小或性别⁵⁷；黎语“一个人”的“个”，男性用 pha^3 ，女性用 $tsu:n^1$ ，男孩用 lau^3 ，女孩用 hau^3 ；黔东南苗语有性别量词和褒贬量词。

⁵² 《中国的语言》，556 页。

⁵³ 《中国的语言》，658 页。

⁵⁴ 《中国的语言》，713 页。

⁵⁵ 《中国的语言》，667 页。

⁵⁶ 蒋颖，185 页，193 页。

⁵⁷ 《中国的语言》，1105 页。

至于一些语言既有表示类别的个体量词，还有表示类别的词缀（词头或词尾），体现了类别成分的不同发展阶段，词缀应该是早期形式。

所以，可以说，汉藏语系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清晰、细化的过程，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可能有以下几个不同阶段：

没有名量词→→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混用→→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两分→→人、动物、植物三者共用→→人和动物共用/动物和植物共用→→人、动物、植物三分

当然，这几个发展阶段有叠加的情况，就具体一个语言而言，也有叠加的情况。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族，表现方式不尽相同。

总的来看，基于生命度这个角度的考察，藏缅语族语言的类别成分和壮侗语族语言的类别成分的产生、发展的模式是有差别的，前者相对要迟缓一些？而地于云贵高原的藏缅语族语言要比地处青藏高原的发展要快一些？至于苗瑶语族语言的类别成分尚处在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之间的一种发展状态？

作为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成员——汉语，发展至今，虽然表人、动物、植物的类别成分三分，但是，有一个名量词“条”，它可以用于人、动物、植物；还有一个通用量词“个”，和一些语言的通用量词一样，可以用于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所以说，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类别成分的发展一脉相承。

鉴于类别成分属于基本词汇，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名词）的分类，而与人、动物、植物有关的类别成分的分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藏语系这些语言的亲疏关系。

附记：本研究得到中国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立项《历史语言学视野下的怒苏语真实文本语料研究》（批准号：19VJX081）资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薄文泽 1997《佯僐语》上海远东出版社
黄布凡、周发成 2006《羌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蒋光友 2010《基诺语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蒋颖著、戴庆厦审定 2009《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
毛宗武、蒙朝吉 1986《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孙宏开、刘光坤 2005《阿依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白马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文明英、文京编著 2009《黎语长篇话语材料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徐世璇 1998《毕苏语》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animal, and plant classifier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clud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LUO Ziqu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classifying constituents (individual classifiers or lexical affixes) of three categories of nouns, namely, human, animal, and plant,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Sinitic, Tibeto-Burman, Kam-Sui, and Hmong-Mien) and their differentiat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comparison reveals that the classifying constituents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of nouns with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developed in an unbalanced manner. The imbalance is found even in a single language subfamily. The classifying constituents went through a progressive course of generating from nothing to developing from animate and inanimate objects to the tripartite type of human, animal, and plant. Therefore, the process also reflects the closeness of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with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从地理语言学看黔东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

石德富 杨潇潇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田野调查材料，通过历史比较研究和语言接触考察，探讨黔东苗语韵母阴阳对转现象，并结合地理语言学的分析，认为产生阴阳对转的条件是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

一、前言

阴声韵和阳声韵，首先由清儒戴震和孔广森师徒提出，前者指以元音结尾的韵母，后者指以鼻音结尾的韵母（陈复华 2008:4）。韵母发生“阳转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苗语（陈其光 1988；王辅世 1981，1994）。“阴阳对转”也时有发生，张琨（1995）通过与瑶语比较发现，由于同化和异化的作用，以鼻音为声母的词韵母在一些苗语中发生了阴阳对转。又如，仡佬语（韦名应 2009，2010），湘江流域的汉语方言（李永新 2011），但是，针对黔东苗语内部的韵母阴阳对转问题尚未有专题研究的报告发表。

调查发现，黔东苗语中，某些韵类在一些土语的反映形式是带鼻音的阳声韵而在另一些土语里却是阴声韵。从逻辑上来讲，有两种可能：（1）这些韵类原本是没有鼻音的阴声韵，后来在一些土语中变成了带鼻音的阳声韵；（2）这些韵类原本是带鼻音的阳声韵，后来在一些土语中变成了没有鼻音的阴声韵。关键的问题是，原始黔东苗语的形式是什么？如果是阳声韵，则该韵类经历了阳转阴的过程（即鼻音韵尾的消失）；如果是阴声韵，则该韵类经历了阴转阳的过程（鼻音韵尾的增生）。但是苗语是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语言，我们怎样才知道这些韵类的原始形式呢？

因此，本文则基于苗语各方言土语的调查资料¹，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寻找黔东苗语韵母阴阳对转的条件和规律²。由于苗语没有历史文献，所以我们首先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韵类的原始形式（1）苗语方言内部比较（2）黔东苗语内部的土语比较（3）汉语借词的形式或汉语记录苗语的形式。（1）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尝试拟测其原始形式，再经过（2）和（3）加以论证，如果三者一致，我们就认为所构拟的原始形式比较可靠。其次，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绘制语图，对（1）（2）（3）的比较分析得出的推论提供旁证。

¹ 养蒿、谷陇、舟溪、台拱、下搞咬、爱和、凉伞、寨头、五一、巫亮、摆贝的语料来自潘胜春（2013）；台盘、革东、阳芳、洋浪、凯棠、铜鼓、岜沙、湾水、西山、翠里、翻仰、高雅、重安、翁项、李子来自笔者 2018 至 2019 年的调查。

² 需要说明的是黔东苗语中没有 n 和 ŋ 或者 m 的对立。

二、新韵和果韵的对转

2.1 新韵的鼻音韵尾消失

2.1.1 苗语各方言比较

新韵是王辅世（1994:55）模仿汉语音韵学对古苗语一种韵类的命名。它在各个苗语点的对应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新韵在苗语各方言点的对应情况

词项	阳声韵					阴声韵			
	腊乙坪	摆托	绞坨	野鸡坡	枫香	大南山	石门坎	甲定	养蒿*
锅	wɛn ³³ ₍₄₎	zen ³² ₍₄₎	zein ¹¹ ₍₄₎	wen ⁵⁵ _(B)	ven ¹³ ₍₄₎	za ²¹ ₍₄₎	zie ³³ ₍₄₎	ve ³¹ ₍₄₎	vi ¹¹ ₍₄₎
肝	ʂɛn ³⁵ ₍₁₎	---	zæin ²² _(1b)	sen ³¹ _(A)	hen ³³ ₍₁₎	ʂa ⁴³ ₍₁₎	sie ⁵⁵ ₍₁₎	ʂhe ²⁴ ₍₁₎	xhi ³³ ₍₁₎
田	---	len ⁵⁴ ₍₂₎	læin ⁵³ ₍₂₎	len ³¹ _(A)	len ²⁴ ₍₂₎	la ³¹ ₍₂₎	lɰie ³⁵ ₍₂₎	le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高	ʂɛn ³⁵ ₍₁₎	fen ⁵⁵ ₍₁₎	zæin ²² _(1b)	sen ³¹ _(A)	---	ʂa ⁴³ ₍₁₎	sie ⁵⁵ ₍₁₎	ʂhe ²⁴ ₍₁₎	xhi ³³ ₍₁₎
牙齿	ɛɛn ⁴⁴ ₍₃₎	mjen ¹³ ₍₃₎	mi ²³² _(3b)	mjen ⁵⁵ _(B)	mhen ⁵³ ₍₃₎	ɳa ⁵⁵ ₍₃₎	ɳie ⁵⁵ ₍₃₎	mhe ¹³ ₍₃₎	mhi ³⁵ ₍₃₎
银	—	ɳen ⁵⁴ ₍₂₎	ɳi ⁵³ ₍₂₎	ɳen ³¹ _(A)	ɳi ²⁴ ₍₂₎	ɳa ³¹ ₍₂₎	ɳhie ³⁵	ɳe ⁵⁵ ₍₂₎	ɳi ⁵⁵ ₍₂₎

*养蒿的 xhi³³₍₁₎为“心肠”义（见石德富 2014）。

表 1 各点的反映形式可以分成两类：带鼻音韵尾（腊乙坪、摆托、野鸡坡、枫香）和不带鼻音韵尾（养蒿、大南山、石门坎、甲定、绞坨）。因此，新韵的原始形式有两种可能：（1）原始形式是不带鼻音的阴声韵，腊乙坪、枫香等地的苗语后来发生了阴阳对转变成了阳声韵；（2）原始形式是带鼻音的阳声韵，大南山和养蒿等地的苗语后来发生了阳转阴，变成了没有鼻音的阴声韵。王先生显然选择了前者，其主要依据可能是汉语借词“银”。“银”属于疑母真韵三平开口韵，其中古音形式各家都以前鼻音结尾：郭锡良*ɳiēn（郭锡良 1986:234），高本汉*ɳiēn，潘悟云*in（潘悟云 2000:87）。现在的问题是，养蒿变成阴声韵，是否继承自原始苗语？也就是说，原始黔东南的新韵是阴声韵还是阳声韵。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2.1.2 黔东南方言内部土语的比较

以养蒿为代表的北部土语的表现形式都是 i，南部土语，如岫沙、翠里和西山则是带鼻音的韵。（见表 2）

表 2: 新韵在北部和南部土语的反映形式

词项	北部							南部		
	养蒿	凯棠	铜鼓	台盘	湾水	革东	伍旗	岜沙	西山	翠里
锅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i ²² ₍₄₎	van ²² ₍₄₎	van ²² ₍₄₎	van ²² ₍₄₎
心肠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k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an ⁴⁴ ₍₁₎	xhan ⁴⁴ ₍₁₎	xhan ⁴⁴ ₍₁₎
田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an ⁵³ ₍₂₎	lan ⁵³ ₍₂₎	lan ⁵³ ₍₂₎
牙齿	mhi ³⁵ ₍₃₎	mhi ³⁵ ₍₃₎	mhi ⁴⁴ ₍₃₎	mhi ⁴⁴ ₍₃₎	mhi ⁴⁴ ₍₃₎	mhi ⁴⁴ ₍₃₎	mhi ⁴⁴ ₍₃₎	mhan ⁴⁴ ₍₃₎	mhan ⁴⁴ ₍₃₎	mhan ⁴⁴ ₍₃₎
新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i ³³ ₍₁₎	xhan ³³ ₍₁₎	xhan ³³ ₍₁₎	xhan ³³ ₍₁₎

表 1 和表 2 的对比给我们这样的启迪:原始黔东南苗语新韵很可能是以鼻音结尾的韵类,下面我们将从汉语借词的角度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

2.1.3 汉语借词或汉语记录苗语的比较

苗语的汉语借词“银”,属于疑母真韵三平开口韵,其中古音形式各家都以前鼻音结尾。郭锡良拟: *ŋiēn (郭锡良 1986:234); 高本汉拟: *iēn, 潘悟云拟: *in。(潘悟云 2000:87) 另外一个借词“量”³,它在苗语里的意思是“量(米)和测量”(张永祥、许世仁 1990:298) 声母和声调都与汉语的“量”对应,但是韵母差异很大。(见表 3)

表 3 “量(测量)”和“秧”在北部土语的反映形式

词项	洋浪	湾水	台盘	革东	伍旗	养蒿	谷陇
量(测量)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秧	vi ³³ ₍₁₎	zi ³³ ₍₁₎	zi ³³ ₍₁₎	zi ³³ ₍₁₎	zi ³³ ₍₁₎	zi ³³ ₍₁₎	zi ³³ ₍₁₎

“量”(liáng)属于来母阳韵三等,开口韵(郭锡良 1986:259)。由于与养蒿等地的形式差别很大;但是在养蒿等地的苗语中,“田”和“量”是同音词。查看一下表 1 中“田”在岜沙、翠里和西山的反应形式就发现,它与汉语“量”的语音形式多么相似!这说明,汉语的“量”正以 lan⁵³形式进入原始黔东南苗语的,黔东南语的北部土语如今演变成了阴声韵。

此外,还有,湾水、台盘、革东、伍旗、养蒿和谷陇等地苗语把黄平县城叫 ei³³₍₁₎ lon⁵⁵₍₂₎,黄平县城在明朝时在此地设置“兴隆卫”,苗语的 ei³³₍₁₎ lon⁵⁵₍₂₎显然来自汉语的“兴隆”。“兴”的韵母是带鼻音的阳韵,苗语却读成不带鼻音的阴声韵,这足以证明“阳转阴”的变化。

³ 关于判定借词的标准和方法详见石德富《汉借词与苗语固有词的语义变化》(2003)。

2.2 果韵的鼻音韵尾增生

2.2.1 苗语各方言比较

除了养蒿的反映形式是带鼻音的阳声韵以外，果韵在个方言点的反映形式都是阴声韵，见表 4（王辅世 1994:42）。

表 4 果韵在苗语各个方言点的反映形式

词项	腊乙坪	摆托	绞坨	大南山	枫香	石门坎	野鸡坡	甲定	养蒿
果子	pji ⁴⁴ ₍₃₎	pji ¹³ ₍₃₎	pei ⁴² _(3a)	tsi ⁵⁵ ₍₃₎	tsi ⁵³ ₍₃₎	tsi ⁵⁵ ₍₃₎	pze ⁵⁵ _(B)	pi ¹³ ₍₃₎	tsen ³⁵ ₍₃₎
茶	ci ³³ ₍₄₎	ki ³² ₍₄₎	tei ¹¹ ₍₄₎	---	ki ¹³ ₍₄₎	---	zi ⁵⁵ _(B)	ki ³¹ ₍₄₎	teen ¹¹ ₍₄₎
燃	—	tei ²¹ ₍₆₎	tei ¹³ ₍₆₎	tei ¹³ ₍₆₎	tsi ³¹ ₍₆₎	dzi ³¹ ₍₆₎	ze ⁵⁵ _(B)	tei ²² ₍₆₎	teen ¹³ ₍₆₎
苦胆	tei ³⁵ ₍₁₎	tse ⁵⁵ ₍₁₎	sei ³² _(1a)	tʂi ⁴³ ₍₁₎	si ³³ ₍₁₎	tʂi ⁵⁵ ₍₁₎	tse ³¹ _(A)	sin ²⁴ ₍₁₎	een ³³ ₍₁₎

以上的这种情况说明，正如王先生所构拟的那样，原始苗语果韵很可能是阴声韵*i。

2.2.2 黔东南方言内部土语的比较

在黔东南苗语的各个语言点中，有的反映形式为阴声韵，有的语言点的反映形式为阳声韵。（见表 5）

表 5 果韵在黔东南方言的反映形式

词项	阴声韵						阳声韵					
	台盘	台拱	爱和	伍旗	岜沙	革东	养蒿	寨头	巫亮	舟溪	湾水	谷陇
果	tse ³⁵ ₍₃₎	tsai ⁴⁴ ₍₃₎	sei ⁴⁴ ₍₃₎	tei ⁴⁴ ₍₃₎	tsi ⁴⁴ ₍₃₎	sẽ ⁴⁴ ₍₃₎	tsen ³⁵ ₍₃₎	een ⁴⁴ ₍₃₎	sen ⁴⁴ ₍₃₎	tsen ⁴⁴ ₍₃₎	tsen ⁴⁴ ₍₃₎	tsen ⁴⁴ ₍₃₎
茶	tei ¹¹ ₍₄₎	tei ¹¹ ₍₄₎	tei ¹¹ ₍₄₎	tei ²² ₍₄₎	tei ¹¹ ₍₄₎	tei ¹¹ ₍₄₎	teen ¹¹ ₍₄₎	teen ¹¹ ₍₄₎	teen ¹¹ ₍₄₎	teen ²² ₍₄₎	tsen ²² ₍₄₎	tsen ²² ₍₄₎
燃	tei ²⁴ ₍₆₎	tei ²⁴ ₍₆₎	tei ²² ₍₆₎	tei ⁴² ₍₆₎	tei ²² ₍₆₎	tei ¹³ ₍₆₎	teen ¹³ ₍₆₎	teen ¹³ ₍₆₎	teen ¹¹ ₍₆₎	teen ²² ₍₆₎	tsen ¹³ ₍₆₎	tsen ²¹ ₍₆₎
胆	ei ³³ ₍₁₎	ei ³³ ₍₁₎	ei ³³ ₍₁₎	ei ³³ ₍₁₎	ei ³³ ₍₁₎	ei ³³ ₍₁₎	een ³³ ₍₁₎	tsen ³³ ₍₁₎	ei ³³ ₍₁₎	een ³³ ₍₁₎	tsen ³³ ₍₁₎	tsen ³³ ₍₁₎

通过上表的对比，如果接受王辅世的构拟，那么原始苗语的韵母*i 在黔东南的一些语言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阴声韵变成阳声韵：i>in>en/en>aŋ；（2）高元音低化：i>e>a。下面我们从汉语借词和汉语记录苗语的角度来分析，其变化过程更加清晰。

2.2.3 汉语借词或汉语记录苗语的比较

黔东南苗语北部土语向汉语借了一些词。（见表 6）这些词在汉语中都是阴声韵，在台盘、革东、伍旗和小江等地也都是阴声韵 i，但是在养蒿就变成阳声韵-in/-en，在白午和翁项变成-en，在湾水等地变成-aŋ。

表6 “气”（生气）、“利”（利息）、“启”（开始）在北部土语的反映形式

词项	台盘	革东	伍旗	小江	养蒿	白午	翁项	湾水	重安	谷陇
气（生气）	tehi ⁴⁴ ₍₅₎	tehi ⁴⁴ ₍₅₎	tehi ²¹ ₍₅₎	tehi ⁴⁴ ₍₅₎	tehi ⁴⁴ ₍₅₎	tehen ¹¹ ₍₅₎	tehen ¹¹ ₍₅₎	tehan ¹¹ ₍₅₎	tehan ¹¹ ₍₅₎	tehan ¹¹ ₍₅₎
利（利息）	li ³¹ ₍₈₎	li ³¹ ₍₈₎	li ⁵³ ₍₈₎	li ³¹ ₍₈₎	lin ³¹ ₍₈₎	len ⁵³ ₍₈₎	len ⁵³ ₍₈₎	lan ⁵³ ₍₈₎	lan ⁵³ ₍₈₎	lan ⁵³ ₍₈₎
启（开始）	tehi ³⁵ ₍₃₎	tehi ³⁵ ₍₃₎	tehi ⁴⁴ ₍₃₎	tehi ³⁵ ₍₃₎	tehen ³⁵ ₍₃₎	tehen ⁴⁴ ₍₃₎	tehen ⁴⁴ ₍₃₎	tehan ⁴⁴ ₍₃₎	tehan ⁴⁴ ₍₃₎	tehan ⁴⁴ ₍₃₎

根据《凯里市志》（1998:2）记载，凯里，在元朝的文献中记录为“凯离或凯黎”，到明朝，文献中记作“凯里”。不管是“离”、“黎”还是“里”都是没有鼻音结尾的阴声韵，但是在一些苗语里，却变成了阳声韵。（见表7）

表7：凯里的“里”在北部土语中的读音

词项	阴声韵				阳声韵					
	台盘	革东	伍旗	小江	养蒿	白午	翁项	湾水	重安	谷陇
里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 ⁵⁵ ₍₂₎	lin ⁵⁵ ₍₂₎	len ⁵⁵ ₍₂₎	len ⁵⁵ ₍₂₎	lan ⁵⁵ ₍₂₎	lan ⁵⁵ ₍₂₎	lan ⁵⁵ ₍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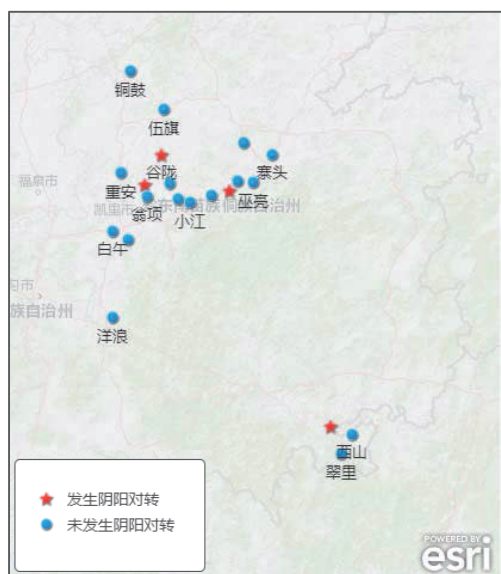
“里”的变化方式和汉语借词的方式一致：台盘、革东、伍旗、小江都为阴声韵，养蒿、白午、翁项、湾水、重安、谷陇都为阳声韵。

通过以上的讨论，从苗语内部方言比较、汉借词或汉记苗音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果韵的原始形式为阴声韵**i*，但是，在黔东南苗语中的一些土语演变成了带鼻音的阳声韵⁴。

2.3 新韵与果韵对转的地理语言学考察

黔东南苗语中新韵和果韵阴阳对转情况的地理分布见图1，可以看到养蒿、谷陇、岷沙、湾水发生了阴阳对转的现象。

图1 新韵与果韵对转的地理分布



⁴ 根据汉语记录苗语的“里”推测，果韵由阴声韵变成阳声韵的上限时间是明代成化年间。

三、u 和 uŋ 的对转

3.1 毛韵和烧韵的阳化

古苗语的毛韵和烧韵在苗语的各个方言点都是阴声韵（王辅世 1994:51、55）养蒿的反映形式为-u，也是阴声韵，但是北部土语的一些语言点如湾水、重安和谷陇等地，如果声母是双唇音、舌面前音或舌根音，其反映形式为-uŋ（见表 8），我们认为是阴声韵转化为阳声韵的结果。湘西苗语也出现这种情况，如：“丈夫”在吉卫和中心读 po⁴⁴，但是在阳孟读 poŋ⁴⁴（杨再彪 2004:262）。

表 8 毛韵和烧韵在黔东方言的反映形式

词项	阴声韵				阳声韵					
	台盘	革东	翻仰	高雅	湾水	重安	谷陇	白午	翁项	李子
腹部	tɛhu ³³ ₍₁₎	tɛhu ³³ ₍₁₎	tɛhu ³³ ₍₁₎	tɛhəu ³³ ₍₁₎	tɛhuŋ ³³ ₍₁₎	tɛhuŋ ³³ ₍₁₎	tɛhaŋ ³³ ₍₁₎	tɛheŋ ³³ ₍₁₎	tɛheŋ ³³ ₍₁₎	tɛheŋ ³³ ₍₁₎
毛	lu ³³ ₍₁₎	lu ³³ ₍₁₎	lu ³³ ₍₁₎	ləu ³³ ₍₁₎	luŋ ³³ ₍₁₎	luŋ ³³ ₍₁₎	la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梦	pu ⁴⁴ ₍₅₎	pau ⁴⁴ ₍₅₎	pau ⁴⁴ ₍₅₎	pu ⁴⁴ ₍₅₎	paŋ ¹¹ ₍₅₎	paŋ ¹¹ ₍₅₎	paŋ ¹¹ ₍₅₎	peŋ ¹¹ ₍₅₎	peŋ ¹¹ ₍₅₎	pen ⁴⁴ ₍₅₎
灰烬	ɛhu ³⁵ ₍₃₎	ɛhu ³⁵ ₍₃₎	ɛhu ³⁵ ₍₃₎	ɛhəu ³⁵ ₍₃₎	ɛhuŋ ⁴⁴ ₍₃₎	ɛhuŋ ⁴⁴ ₍₃₎	ɛhaŋ ⁴⁴ ₍₃₎	ɛheŋ ⁴⁴ ₍₃₎	ɛheŋ ⁴⁴ ₍₃₎	ɛheŋ ³⁵ ₍₃₎
知道	pu ³³ ₍₁₎	pau ³³ ₍₁₎	pau ³³ ₍₁₎	pu ³³ ₍₁₎	puŋ ³³ ₍₁₎	paŋ ³³ ₍₁₎	paŋ ³³ ₍₁₎	peŋ ³³ ₍₁₎	peŋ ³³ ₍₁₎	pen ³³ ₍₁₎
倒(水)	lu ³³ ₍₁₎	lu ³³ ₍₁₎	lu ³³ ₍₁₎	lu ³³ ₍₁₎	luŋ ³³ ₍₁₎	luŋ ³³ ₍₁₎	la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leŋ ³³ ₍₁₎

3.2 桶韵的阴化

3.2.1 苗语各方言比较

古苗语的桶韵在各个方言代表点的反映形式如下（王辅世 1994:63）：

表 9：桶韵在苗语各个方言点的反映形式

词项	阴声韵			阳声韵					
	腊乙坪	养蒿	石门坎	大南山	摆托	甲定	绞坨	野鸡坡	枫香
裹腿	ŋtɕhu ³⁵ ₍₁₎	tɕhu ³³ ₍₁₎	ŋtɕhau ⁵⁵ ₍₁₎	ŋtɕhon ⁴³ ₍₁₎	ŋtɕhen ⁵⁵ ₍₁₎	ŋhon ²⁴ ₍₁₎	ŋtaŋ ²² _(1b)	ŋʔtɕshon ³¹ _(A)	ŋtɕhon ³³ ₍₁₎
针	teu ³⁵ ₍₁₎	teu ³³ ₍₁₎	kau ⁵⁵ ₍₁₎	kon ⁴³ ₍₁₎	ken ⁵⁵ ₍₁₎	kon ²⁴ ₍₁₎	kaŋ ³² _(1a)	kon ³¹ _(A)	kon ³³ ₍₁₎
门	tɕu ³¹ ₍₂₎	tɕu ⁵⁵ ₍₂₎	dlɕhau ³⁵ ₍₂₎	tɕon ³¹ ₍₂₎	tɕen ⁵⁴ ₍₂₎	tɕon ⁵⁵ ₍₂₎	ɕaŋ ⁵³ ₍₂₎	zɕon ³¹ _(A)	tɕon ²⁴ ₍₂₎
好	zu ⁵³ ₍₅₎	yɕu ⁴⁴ ₍₅₎	zau ³³ ₍₅₎	zɕon ⁴⁴ ₍₅₎	ven ⁴³ ₍₅₎	zɕon ⁴³ ₍₅₎	zɕaŋ ⁵⁵ _(5a)	ʔwjon ²⁴ _(C)	yɕon ⁵⁵ ₍₅₎
戴	ntu ⁵³ ₍₅₎	tɕə ⁴⁴ ₍₅₎	ntau ³³ ₍₅₎	nton ⁴⁴ ₍₅₎	nten ⁴³ ₍₅₎	nton ⁴³ ₍₅₎	ntaŋ ⁵⁵ _(5a)	nʔton ²⁴ _(C)	nton ⁵⁵ ₍₅₎

由上表可知，桶韵在苗语各方言中以阳声韵的分布占主导，王辅世先生将桶韵构拟为 * uŋ，即假设原始苗语的桶韵为阳声韵，下面，我们将从黔东方言内部土语的比较来继续探讨。

3.2.2 黔东南方言内部土语的比较

黔东南各个调查点中，桶韵的反映形式以阴声韵为主，只有台拱和下搞咬两地的反映形式为阳声韵。（见表 10、续表 10）

表 10 桶韵在黔东南方言的反映形式

词项	岜沙	五一	舟溪	台盘	台拱	下搞咬	李子
门	t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au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on ₍₂₎ ⁵³	teon ₍₂₎ ⁵³	t ₍₂₎ ⁵⁵
树	t ₍₅₎ ³⁵	tau ₍₅₎ ³¹	tau ₍₅₎ ³¹	tau ₍₅₎ ⁴⁴	ton ₍₅₎ ³⁵	ton ₍₅₎ ³⁵	tau ₍₅₎ ³⁵

续表 10 桶韵在黔东南方言的反映形式

词项	爱和	巫亮	凉伞	谷陇	寨头	摆贝
门	teu ₍₂₎ ⁵³	teu ₍₂₎ ⁵³	t ₍₂₎ ⁵³	t ₍₂₎ ⁵⁵	t ₍₂₎ ⁵³	teu ₍₂₎ ⁵⁵
树	teu ₍₅₎ ³⁵	teu ₍₅₎ ⁴⁴	teu ₍₅₎ ³⁵	teu ₍₅₎ ¹¹	teu ₍₅₎ ⁴⁵	teu ₍₅₎ ³⁵

由上表可知，黔东南方言的桶韵很可能发生阳转阴的变化：on>u，u>əu>au。

3.2.3 汉语借词或汉语记录苗语的比较

表 11：汉语借词“桐”和“笼”在北部土语的读音

词项	台盘	革东	伍旗	台拱	洋浪	李子	养蒿	谷陇	湾水
桐	t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eu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teu ₍₂₎ ⁵⁵	t ₍₂₎ ⁵⁵
笼	ŋə ₍₂₎ ⁵⁵	ɣu ₍₂₎ ⁵⁵	ɣəu ₍₂₎ ⁵⁵	ɣu ₍₂₎ ⁵³	ɣəu ₍₂₎ ⁵⁵	ŋuə ₍₂₎ ⁵⁵	ɣu ₍₂₎ ⁵⁵	ɣə ₍₂₎ ⁵⁵	ɣu ₍₂₎ ⁵³

从汉借词“桐”和“笼”来看，中古的“桐”为定母东韵一等，合口韵，拟为：*duŋ（郭锡良 1986:288）；中古的“笼”为来母东韵一等，合口韵，拟为：*luŋ（郭锡良 1986:289），因此，不论是“桐”还是“笼”在中古时均为阳声韵，从表 11 可看出，北部土语均为阴声韵的反映形式，这说明，汉借词“桐”和“笼”在黔东南苗语中已经发生了阴声化演变。

表 12：苗语地名带ʔə₍₁₎³³“水”语素的汉语记音

词项	台盘	革东	伍旗	李子
翁开村	ʔau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ə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au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au ₍₁₎ ³³ kha ₍₁₎ ³³
翁密河	ʔau ₍₁₎ ³³ mi ₍₈₎ ³¹	ʔə ₍₁₎ ³³ mi ₍₈₎ ³¹	ʔau ₍₁₎ ³³ mi ₍₈₎ ³¹	ʔau ₍₁₎ ³³ mi ₍₈₎ ³¹

续表 12

词项	舟溪	洋浪	养蒿	谷陇
翁开村	ʔə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au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ə ₍₁₎ ³³ kha ₍₁₎ ³³	ʔə ₍₁₎ ³³ kha ₍₁₎ ³³
翁密河	ʔə ₍₁₎ ³³ mi ₍₈₎ ³¹	ʔau ₍₁₎ ³³ mi ₍₈₎ ³¹	ʔə ₍₁₎ ³³ mi ₍₈₎ ³¹	ʔə ₍₁₎ ³³ mi ₍₈₎ ³¹

中古的“翁”为影母东韵一等，合口韵，拟为：*uŋ（郭锡良 1986:282），但从表 12 和续表 12 中可以看出：在黔东南各地，“翁”已经演变为阴声韵，可见，表 10、续 10 中台拱、下搞咬的阳声韵是较为存古的形式，而岜沙、五一等地则是发生了阴声化的演变。

3.3 u 和 uŋ 对转的地理语言学考察

黔东苗语中 u 和 uŋ 阴阳对转情况的地理分布见图 2，可以看到谷陇和李子两个调查点发生了阴阳对转。

图 2 u 和 uŋ 对转的地理分布



四、结语

古苗语的阳声韵母*in 在现代的黔东苗语中基本上已经发生了鼻音韵尾的脱落，转化为阴声韵。前高元音韵母*i 在现代的黔东苗语中已经出现了“阴转阳”的变化，同时伴有元音低化和复元音化。古苗语毛韵*oi、烧韵*ou 在黔东苗语里有阴声韵和阳声韵两种反映形式，其中-u 和-uŋ 为合口韵，-uŋ 与桶韵*uŋ 的语音形式相同。桶韵在黔东苗语北部土语的反映形式与古苗语毛韵、烧韵在黔东苗语的阴声合口韵形成互补。可见，在黔东苗语内部，新韵和果韵发生了阴阳对转，-u 和-uŋ 也发生了对转，发生阴阳对转的语音条件为前高展唇元音和后高圆唇元音。根据汉借词和汉记苗音以及黔东苗语内部比等综合情况，我们可以断定：以上的阴阳对转是发生在三大方言分开以后，于黔东苗语内部产生，时间上限为明朝中后期。

此外，古苗语的阳声韵母*in 的鼻音韵尾脱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鼻音韵尾区别意义的功能减弱，声母、主要元音和声调起主要作用，而有无鼻音韵尾不太会影响听话人理解词义；二是受发音的经济原则影响，发元音结尾的词比发鼻音韵尾结尾的词更省力、简洁。而当这些改变得到充分的扩散，就会使语言使用者习以为常。其次，对于那些还保留鼻音韵尾的调查点，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受到鼻音声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音变扩散不充分，没有受到变化条件的严格制约。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前高元音韵母产生了鼻音韵尾？我们认为，元音舌位的高低是发生“阴转阳”变化的内在因素，前高元音的舌位的舌位高，口鼻耦合大，易产生鼻音

韵尾,前半高元音的舌位比前高元音的低,前高元音基本上已经完成阴转阳的演变,而前半高元音的韵尾在增生的过程中还不充分,在革东一带表现为鼻化特征,是阴声韵向阳声韵转变的过渡阶段。此外,本文主要基于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探讨了黔东南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现象,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期待日后能有实验语音学的进一步论证。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贵州清水江流域苗语调查研究(16 BYY172)”的成果之一。笔者《黔东南苗语韵母的阴阳对转》一文于2020年6月发表在《民族语文》第3期,本文与其使用的是同样的田野调查材料,文章结构基本一致,行文表述略微不同,并且新增了两张地图。

参考文献

- 陈其光.1988.《苗瑶语鼻音韵尾的演变》,《民族语文》第6期.
- 陈复华.2008.《汉语音韵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贵州省凯里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1998.《凯里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郭锡良.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金理新.2007.《苗瑶语的阴声韵母系统》,《语言研究》第3期.
- 李连进.2009.《扶绥城厢平话鱼虞两韵的音变》,《民族语文》第2期.
- 李永新.2011.《湘江流域汉语方言中古阳声韵今读同阴声韵现象》,《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潘胜春.2013.《苗语黔东南方言的韵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潘悟云.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石德富.2003.《汉借词与苗语固有词的语义变化》,《民族语文》第5期.
- 石德富.2010.《苗瑶语“母亲”源流考》,《民族语文》第4期.
- 石德富.2014.《苗语身体部位词的本义褪变与词汇链变》,《民族语文》第4期.
- 王辅世.1981.《谈谈在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中的几点体会》,《语言研究》第0期.
- 王辅世.1994.《苗语古音构拟》,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王艳红.2016.《从汉借词看几组黔东南苗语韵母的构拟》,《嘉兴学院学报》第5期.
- 韦名应.2009.《仡佬语鼻音韵尾增生》,《民族语文》第1期.
- 韦名应.2010.《汉藏语“阴转阳”条件试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杨再彪.2004.《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琨.1995.《古苗瑶语鼻音声母字在现代苗语方言中的演变》,《民族语文》第4期.
- 张永祥、许士仁.1990.《苗汉词典(黔东南方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The Reversal of the Yin (Nonnasal Coda) and Yang (Nasal Coda) Rhymes in Hmub

Defu Shi and Xiaoxiao Yang

School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work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of nonnasal and nasal coda reversal and its phonetic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language contact combined with geolinguistic analysis. The phenomenon of nonnasal and nasal coda reversal is conditioned by high-front unrounded vowels and back-high rounded vowels.

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看云南藏语/l/和/j/的历史发展

铃木博之

复旦大学

内容摘要：学界对于云南藏区藏语土话的多样性已有基本的了解，大致可区分出三个方言群：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本文通过呈现语音特征的语言地图查看各个方言群之间是否有“缓冲地带”，即兼具两个方言群特征的一系列土话的地理分布，并对其进行历史语言学解释。本文主要针对/l/音与/j/音进行探讨，其结果显示香格里拉方言群与乡城方言群之间（香格里拉市北部）有缓冲地带，其他方言群交界区不出现明显的混合情况，而可以用同言线隔开。

一、前言

分布在云南省内藏文化圈（下面简称“云南藏区”）的藏语属于康巴藏语。近期研究（Suzuki 2018）指出云南藏区大致有三个方言群：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这些方言群的语音和词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语音特征的差异较大，可以按语音的共同创新分为几种土话组。图 1 为云南藏区各方言群的地点分布（1a-1e：香格里拉方言群；2a-2e：得荣德钦方言群；3a：乡城方言群¹）。

语言是依据语音演变共同创新来划分的，而并不是按照类型学标准来划分的。根据笔者做过的研究，云南藏语中能作为语音方面共同创新的参照标准可以分为两种大类（铃木博之 2018a）：

一、藏文声母 L-Y 类语音对应

二、藏文介音 R-Y 类语音对应

其中，第一类适用于方言群级别的划分，第二类适用于土话组级别的划分。此级别差异仅对云南藏语有效：依据第一类的分类大致分成三大方言群（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第二类主要适用于香格里拉方言群中的土话分类²。

¹ 乡城方言群的主要分布地区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在云南藏区，该方言群分布在香格里拉市东旺乡。参见次林央珍、铃木博之（2021）。

² 其他地区的藏语支语言可以考虑这两大类，但级别的有无因各个语言区而不同，云南藏语也如此（Suzuki 2017b）。第二类是藏语言学中最受关注的语音对应关系，参见张济川（1991, 2009）、江荻（2004）等各种以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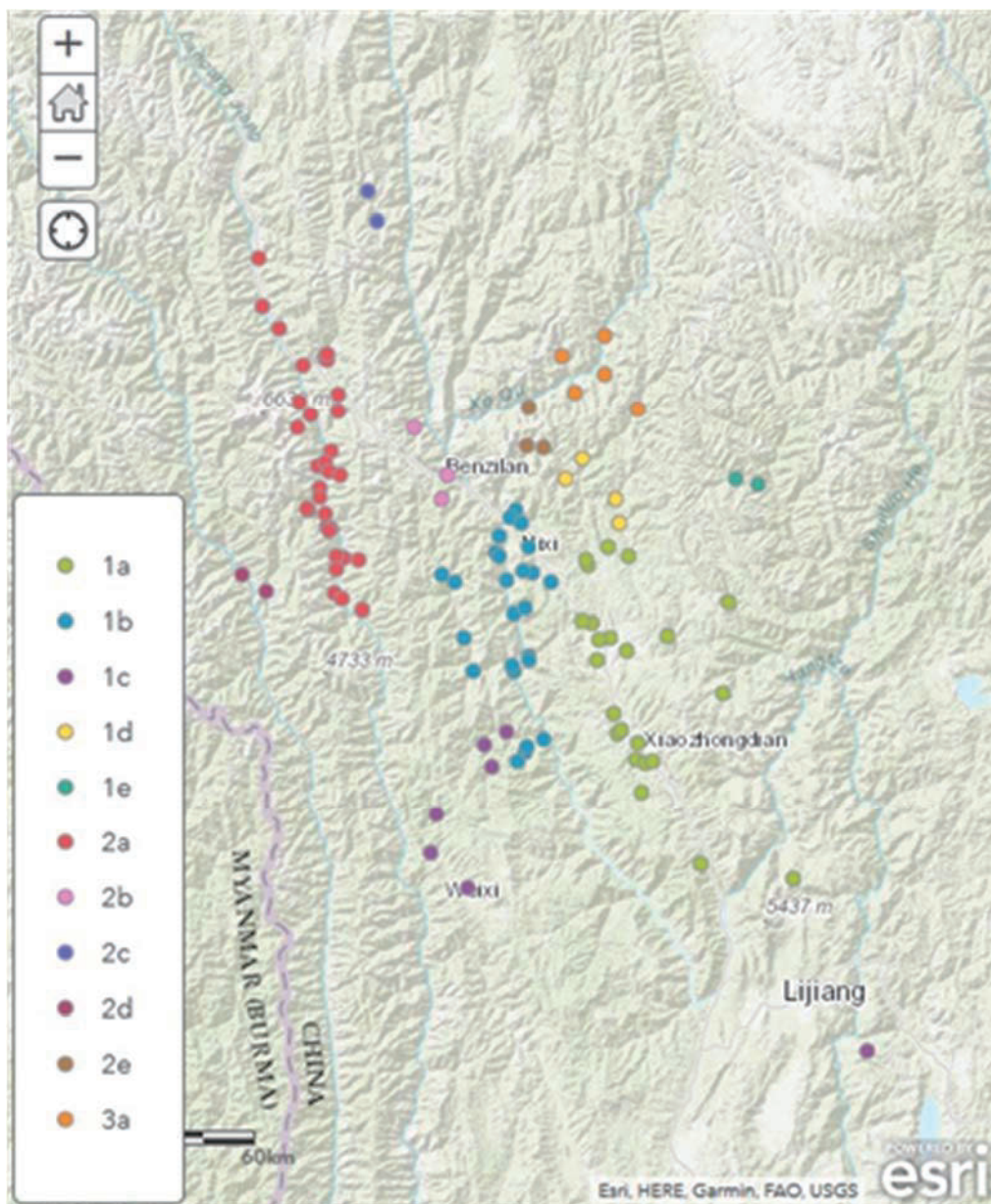


图 1：云南省内各方言群的地点分布与其群组分类（Suzuki 2018:14）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用上面第一类的标准区分出来的方言群的搭界区域，当地土话在潜在接触环境下，如何表现其语音特征，以及研究者应如何判断其方言群的所属。处于方言群接触地域内的土话的发展模式会与云南藏语总体的历史发展有关³。就图 1 而言⁴，香格里拉市北部和德钦县南部是本文的重点讨论对象。各类内容可以细分，但从本文的讨论目的来看，关键现象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的讨论仅关注第一类；对于第二类的特征，参

³ 因此，本文的前提观点是，云南藏语是已经由几个方言群构成的复合体，换言之，本文将讨论的是成了不同的方言群以后的历史发展。

⁴ 笔者的近期研究（Suzuki 2020）提出图 1 的一部分可以修改其分类（德钦县南部一带），但还没得到确证。因此，本文仍基于图 1 的分类进行讨论。

见笔者发表过的相关研究。

一、藏文声母 L-Y 类语音对应

a. 藏文声母 L 类语音对应（第二节）

b. 藏文声母 Y 类语音对应（第三节）

二、藏文介音 R-Y 类语音对应（参见铃木博之 2013b, 2018ab、Suzuki 2018, 2020）

本文使用的土话资料范围限定于笔者田野调查所得，这是为了保证所有地点的资料具有统一的语音描写框架。详细情况参见 Suzuki (2016, 2018)。所有地图均为笔者用 ArcGIS online 绘制。

二、藏文声母 L 类语音对应

云南藏语中声母 L 类的语音对应差异的部分情况在以往研究中有过报道，比如，Zhang (1997) 探讨白马语的时候提到了德钦升平话有类似的语音对应。笔者专门讨论过云南藏语中声母 L 类语音对应的复杂性（Suzuki 2008）。本文关注的是如下现象：藏文声母 L 类在藏语支语言中大致和 /l/ 声母对应，但在有些土话中和 /j/ 声母对应。藏文形式反映着一定程度的藏语古音（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其中 la 字为基字的（即成为主声母的字的）例词与 /l/ 对应。因此，作为前提，我们认为在某一段时间发生过 /l/ > /j/ 这样的音变⁵。

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笔者主要考虑以下三种案例：

一、藏文中基字为 l 的单声母：以 lag (pa) “手” 为例

二、藏文中下加字为 l 的复合声母（除 zl 外）：以 rlung (ma/dmar) “风” 为例

三、藏文 zl 声母：以 zla (ba/dkar) “月亮” 为例

依据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看这些案例是需要考虑词形的，但是本文主要关注其语音表现，因此，地图上突出显示其关键语音特征。下面图例反映的是主声母的语音，即仅有 /l/（L 类）、/j/（J 类）、/d/（D 类）、/n/（N 类）、/ɲ/（H 类）等五种。如果 /ɲl/、/ɲj/、/ɲd/ 等有前置声母的形式，就分别归纳为 L 类、J 类、D 类。

⁵ 藏缅语族语言中，*l > /j/ 的演变在布木塘 (Bumthang) 语群核心语言中也存在 (Donohue 2020: 13-14; 也可以参考 Ikeda 2021)。不过，此类音变在类型学中比较少见。在印欧语系罗曼语支中，西班牙语、法语等语言在从拉丁语发展过来的过程中会体现出 [l] > [ʎ] > [j] > [j] 等音变。l 声母的脱落在韩语汉字音中亦常见。一方面，藏缅语中存在一些同源词可体现出 /l/ 与 /ɲ/、/z/ 的互相关系，比如数词“四”（藏缅语构拟为 *b-ləy; Matisoff 2003, 2015），赞拉嘉绒语（日隆话）/kə pli/、新龙木雅语（甲拉西话）/ɲɛ/、革什扎语（甲居话）/wza/、拉莱语（军拥话）/ɲ/ 等等（各形式均来源于笔者的资料，列举时省略了超音段标记）。需要注意的是，下一节将提到 /j/ 与 /z/ 有对应关系（参见脚注 6）。Donohue (2020:13) 将 *l > /j/ 的音变称为“弱化 (lenition)”，但此音变实际上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弱化，音变过程中可能包含边音的摩擦化，如 /l/ > /ɲ/ > /z/ > /j/。

2.1 藏文 lag (pa) “手” 的语言地图

有关名词“手”词形，Suzuki (2018:86-87)已有讨论，相关描写注重词形，特别是第二音节的形态，但是对于第一音节的声母部分，并没有描写。下面图2是仅呈现该词声母部分的语言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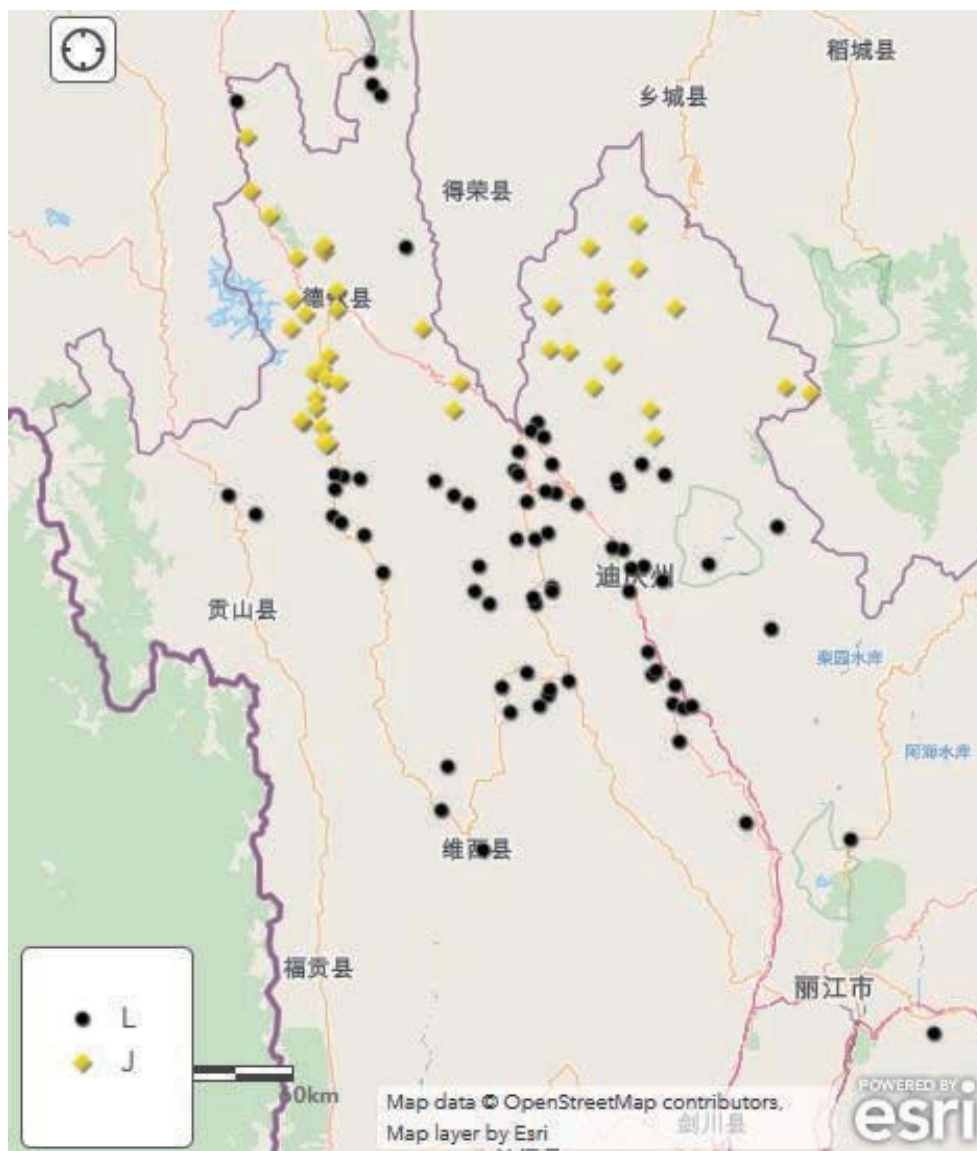


图2：“手”的声母的语音对应

通过图2可以看出藏文l基字的语音对应。地理分布上，L类和J类有明显的分布差异：地图中部以及西北端有分界线。其中，J类作为藏语支语言中显著的特征而贯穿于L类分布地区。云南藏区之外，J类分布也出现在与迪庆东北部相邻的四川省甘孜州得荣、乡城、稻城等县（属于乡城方言群及崩波岗方言群的土话；参见铃木博之 2009, 2016a, 2018cd, 李春梅、铃木博之 2020）。

2.2 藏文 *rlung* (ma/dmar) “风” 的语言地图

有关名词“风”的词形，Suzuki (2017a)已有讨论，相关描写注重词形，基于特殊的语音对应而划出独立的分类。云南藏语中，名词“风”的词形分为三类，分别是藏文 *rlung*、*rlung ma*、*rlung dmar*⁶，都有词根 *rlung*。下面图 3 是仅按照 *rlung* 的声母部分的语音对应而绘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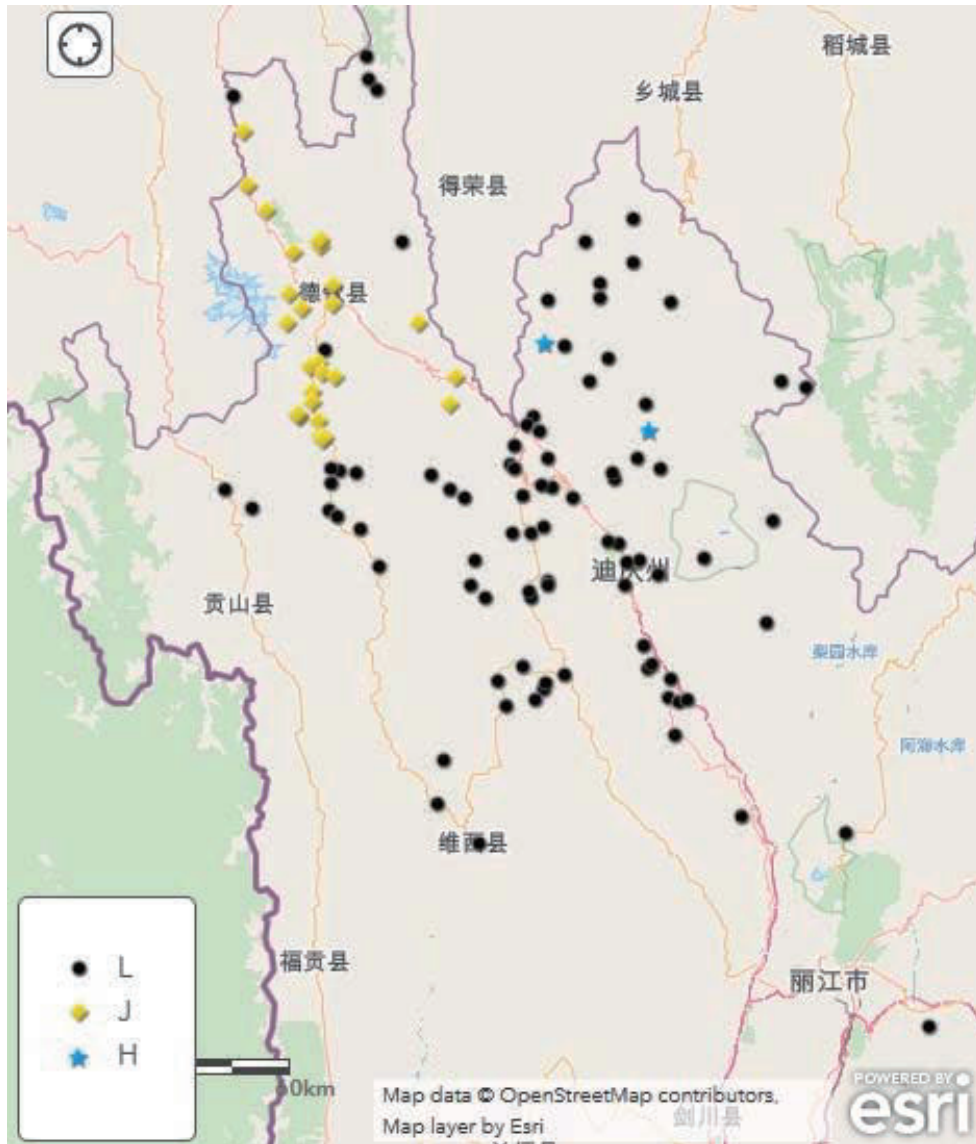


图 3：“风”的声母的语音对应

从图 3 可了解到，除了例外的 H 类之外，“风”的声母与“手”一样，也可区分出 L 类和 J 类。但是，其分布地域不同，“风”的 L 类比“手”分布得更广，特别是地图的东

⁶ 藏文 *rlung dmar* 的书面语词义为“暴风”。

北部（香格里拉市北部）都是 L 类分布的区域。J 类的分布限于德钦县城及其南北端与奔子栏镇一带。其中，德钦县城南边有一个地点使用 L 类很有可能不反映着当地口音，而反映着书面语读音或文读，其细节待考。

H 类的语音形式为 /ɰ/，可以说是属于 L 类的例外语音（J 类的不带声语音有 /ç/ 或 /j/）。目前有两个地点使用 H 类，地理分布以及方言分类都有差距。因此，两者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语音形式，而不是共同创新。

2.3 藏文 *zla* (*ba/dkar*) “月亮”的语言地图

名词“月亮”或藏文 *zl* 的语音对应已在江荻（2002:525-529; 2004:245-246）等相关研究已提到。Suzuki (2018:114-115) 也讨论了名词“月亮”的词形，相关描写注重词形以及语音，按词形分为五个大类。其中地理分布较广的形式有两种，即藏文 *zla ba* 对应形式及藏文 *zla dkar* 对应形式。其他三种形式也包含了词根 *zla*。其次，按词根 *zla* 的声母部分的语音特征再作细分。因此，Suzuki (2018:114-115) 的描写反映出一定的语音差异，但这种分类对于简要宏观地了解地理分布不太方便。下面图 4 是按照 *zla* 的声母部分的语音对应所绘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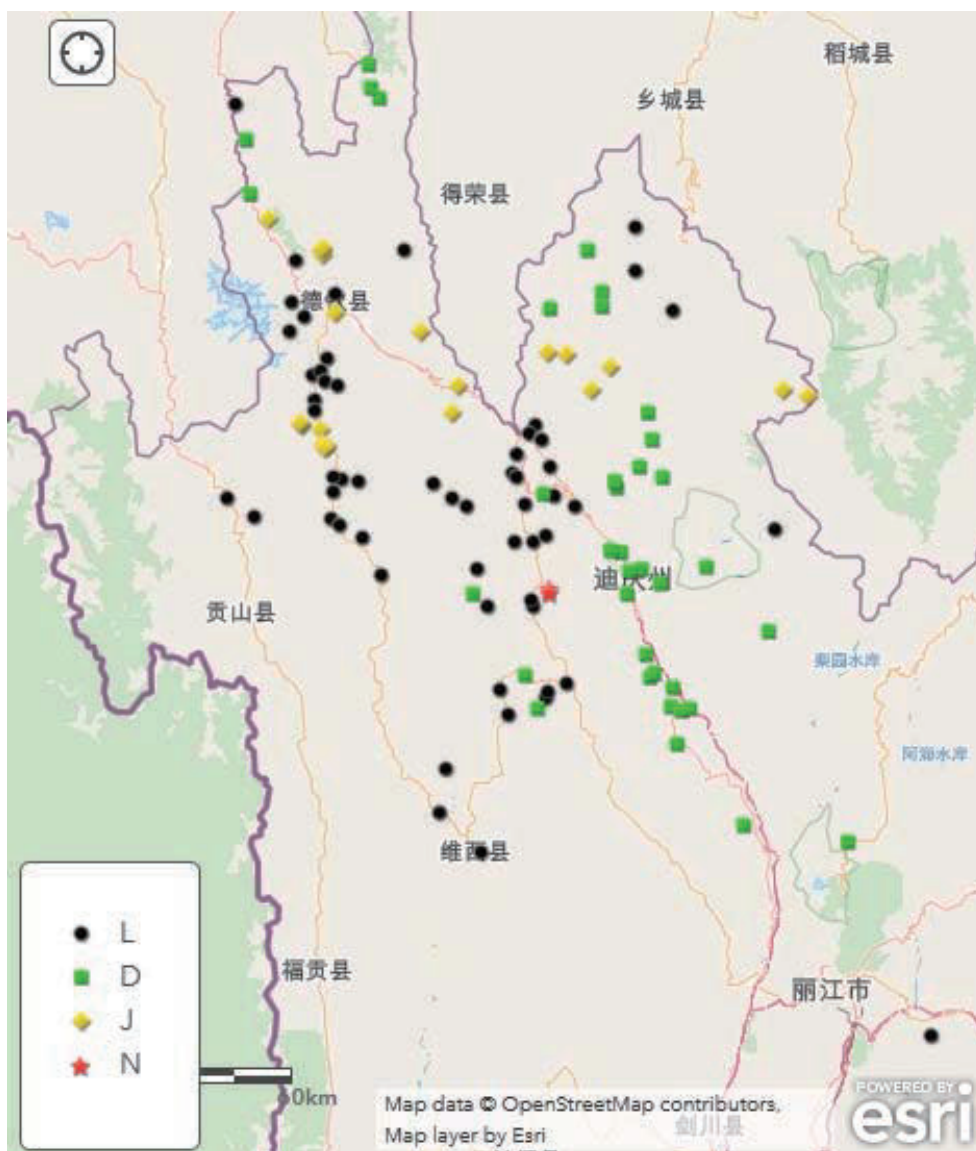


图4：“月亮”的声母语音对应

图4显示出四种类型。其中，L类和J类在“手”“风”等例词中也有，但还出现了D类及N类。D类在藏语支语言中分布的范围较大，而L类则占少数⁷。不过，L类、D类及N类之间存在历史联系，L类和D类的大部分会带鼻冠音，即分别实现为^hl/和^hd/。因此，N类（/n/声母）的出现有通过L类或D类音变而成的可能性，即鼻冠音发生顺向同化，主声母演变为鼻音。相关讨论可参考铃木博之（2016a）。

2.4 小结

图5为将前文图2, 3, 4所示语音对应整合后得出的综合分析图。

⁷ TDTF (1899:874)特意提到藏文 zla 的念法有 la 或 da。此词典一定程度反映着云南藏语的某种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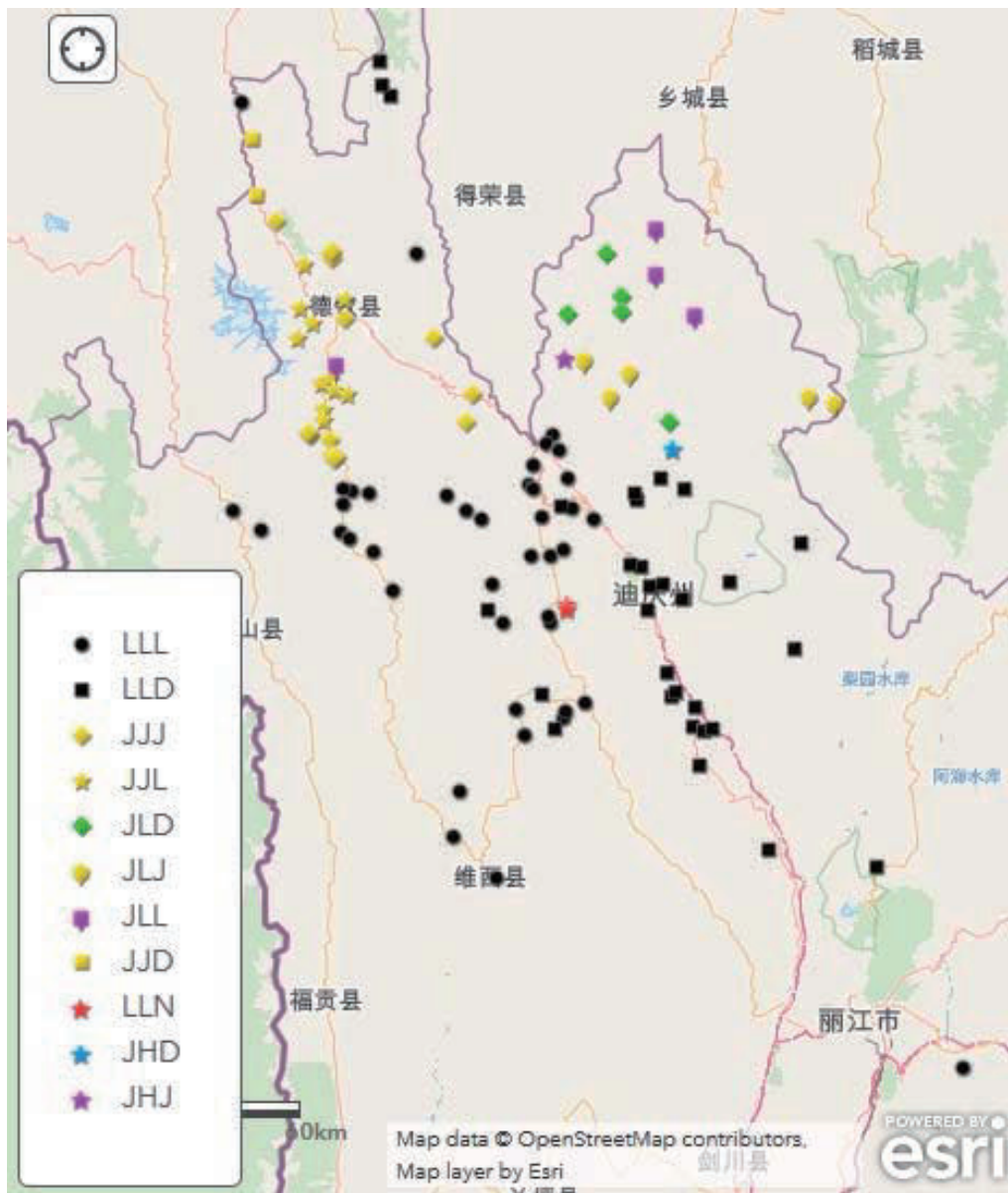


图 5：藏文声母 L 类语音对应综合地图

上述三个词的语音形式在同一个方言中的组合方式理论上一共有 24 类 ($2 \times 3 \times 4$)。但是，图 5 表示的组合仅有 11 种。其中分布地点较多的组合为 LLL, LLD, JJJ, JJJ 等四种形式；换言之，藏文声母 L 的语音对应较为稳定，较为普遍的情况是，三个词表现为同一个语音（LLL 及 JJJ），或者仅藏文 *zl* 的对应形式才有不同的语音对应（LLD 及 JJJ）。另外各种组合发现在地图东北部（香格里拉市北部）该地区为香格里拉方言群和乡城方言群的交界地带，也可以说是两个方言群的缓冲地带。因此，那里的藏文对应呈现不稳定的语音对应关系。

三、藏文声母 Y 类语音对应

藏文声母 Y 类在藏语支语言中大致和 /j/ 声母对应, 但有在一些土话中也和各种带声擦音 (如 /z/、/zʰ/) 声母对应。在大部分的藏语支语言中, 藏文 ya 字为基字的 (即成为主声母的字的) 例词与 /j/ 对应。因此, 作为前提, 我们认为在某一段时间内发生过 /j/ > /z, zʰ/ 这样的音变^{8,9}。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笔者主要考虑以下两种案例:

一、藏文中基字为 y 的单声母; 以 yi ge “文字、信” 为例¹⁰

二、藏文中基字为 y 的复合声母; 以 g.yer ma “花椒” 为例

下面图例反映的是主声母的语音, 即仅有 /j/ (J 类)、/z/ (z 类)、/zʰ/ (Z 类)、/zʱ/ (zʱ 类)、/?/ (? 类) 等五种。若有前置声母, 如 /ʰj/、/ʰz/、/ʰzʰ/, 就分别归纳为 J 类、z 类、Z 类。

3.1 藏文 yi ge “文字、信” 的语言地图

下面图 6 基于首音节的声母部分而绘制。

⁸ 对于此类音变, 需要考虑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擦化后会发生清化, 即 *j > /z/ > /tʃ/。这个案例发生在康巴藏语崩波岗方言群雅砻江组及稻城组 (铃木博之 2018c; 李春梅、铃木博之 2020)。另一种是藏文 zh 的语音对应的多样性。藏文 zh 的古音为 /z/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 在大部分云南藏语中实现为 /ʃ/ (藏文单声母时) 或 /zʃ/ (藏文复合声母时) (铃木博之 2018a; Suzuki 2018)。但是, 在其他藏语支语言中也存在藏文 zh 与 /j/、/y/、/ɣ/ (以及与其调音部位相对应的清音) 等各种语音对应 (张济川 2009; 铃木博之 2010, 2018c; Suzuki et al. 2019)。因此, 可以构拟为调音部位靠后的音变过程 *z > /j/ > /ɣ/ > /y/。

⁹ *j > /z, zʰ/ 中的 /z/ 和 /zʰ/ 之间的关系尚未清楚。在此音变中, /z/ 和 /zʰ/ 之间既可能有关, 也可能互相独立。如在下面 3.3 讨论中, /z/ 和 /zʰ/ 之间相关的情况会存在的, 但在不具备相关语音环境条件的情况下, 几乎看不到 /z/ 和 /zʰ/ 之间的关系。

¹⁰ 这个词的词素为 yig, 在复合词中出现, 如 yig skad “书面语”、bod yig “藏文” 等。但 yi ge 和这些词中同 yi(g) 对应的发音是否有共同尚存疑问。因此, 本文仅考虑和 yi ge 对应的词形的语音形式 (首位声母)。其词义由各个土话而不同, 具有 “文字” “书信” “书本” “经文” 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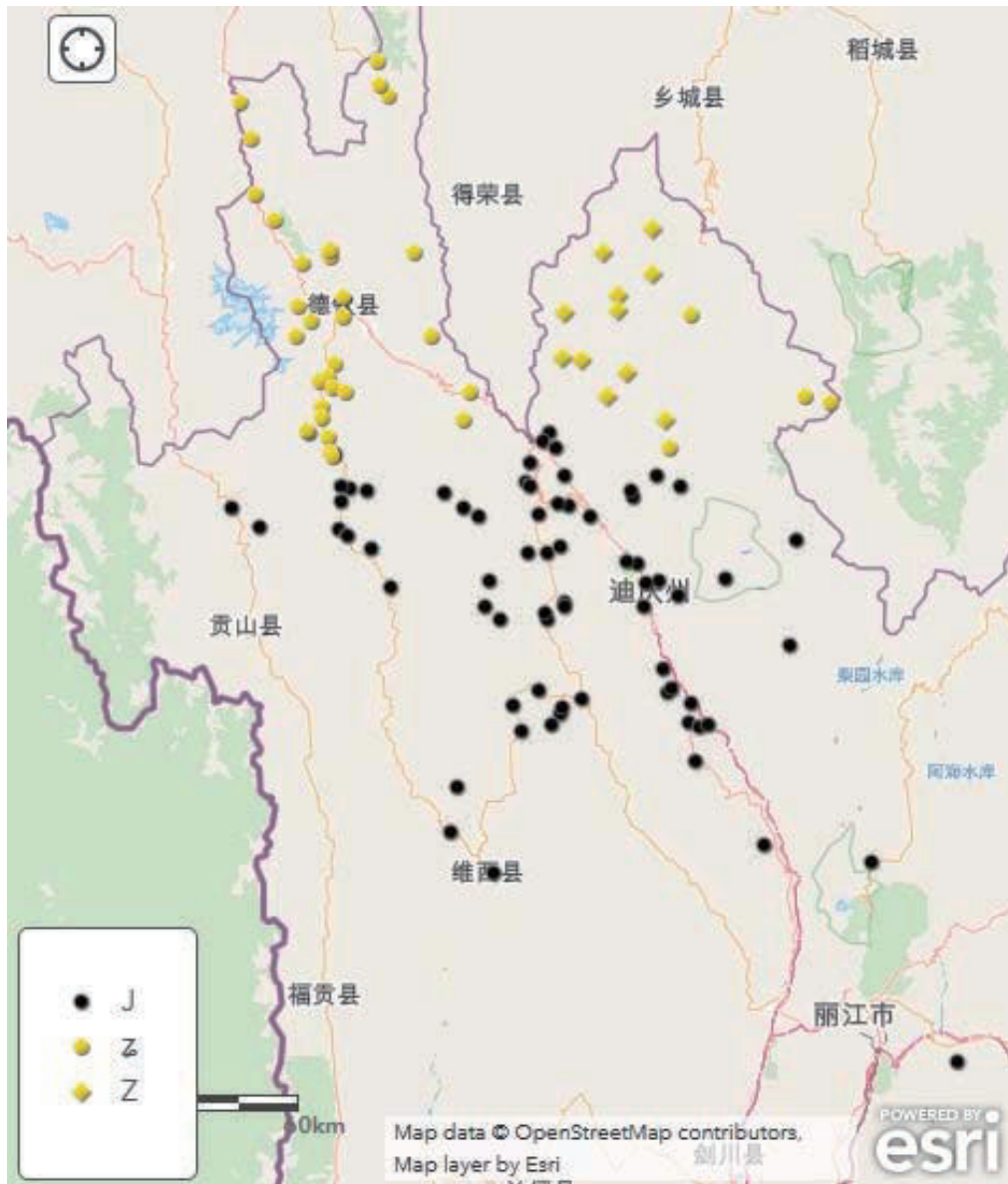


图 6: “文字、信”的声母语音对应

通过图 6 可以看到藏文 y 基字的语音对应。地理分布上，J 类、z 类和 Z 类有明显的分布差异：从地图中部可以分为南、北，其次在北部可以再分出东、西。其中，z 类和 Z 类为藏语支语言中显著的特征。如图 6 显示，z 类和 Z 类所分布的地区与云南以外的藏区毗邻。z 类在察瓦龙话（察隅县）中也有发现（铃木博之 2020），Z 类在得荣话、乡城话中也有发现（铃木博之 2016a）。加之，崩波岗方言群里还有出现了 c 类（铃木博之 2018；李春梅、铃木博之 2020）。此外的藏语支语言普遍为 J 类。各类在地理上呈现连续分布，只有图 6 南部的 J 类才会被其余类型隔开，而形成“孤岛”。

需要注意的是藏文 y 基字对应为 z 类的土话中的藏文 zh 的语音对应，因为后者的语音对应也会包括/z/。在本文讨论的地图范围内，和藏文 zh 对应的语音为卷舌擦音，因此，

两个藏文形式对应的语音形式中没有发生合流现象。但是，崩波岗方言群的藏文 zh 对应的语音为软腭擦音，即，先发生音变* $z > \gamma$ ，其次出现了藏文 y 基字所对应语音形式的腭前擦音化（* $j > z$ ），之后两者才发生了带声音的清化（ $\gamma > x$ ； $z > \epsilon$ ）。

3.2 藏文 g.yer ma “花椒” 的语言地图

下面图 7 基于首音节的声母部分而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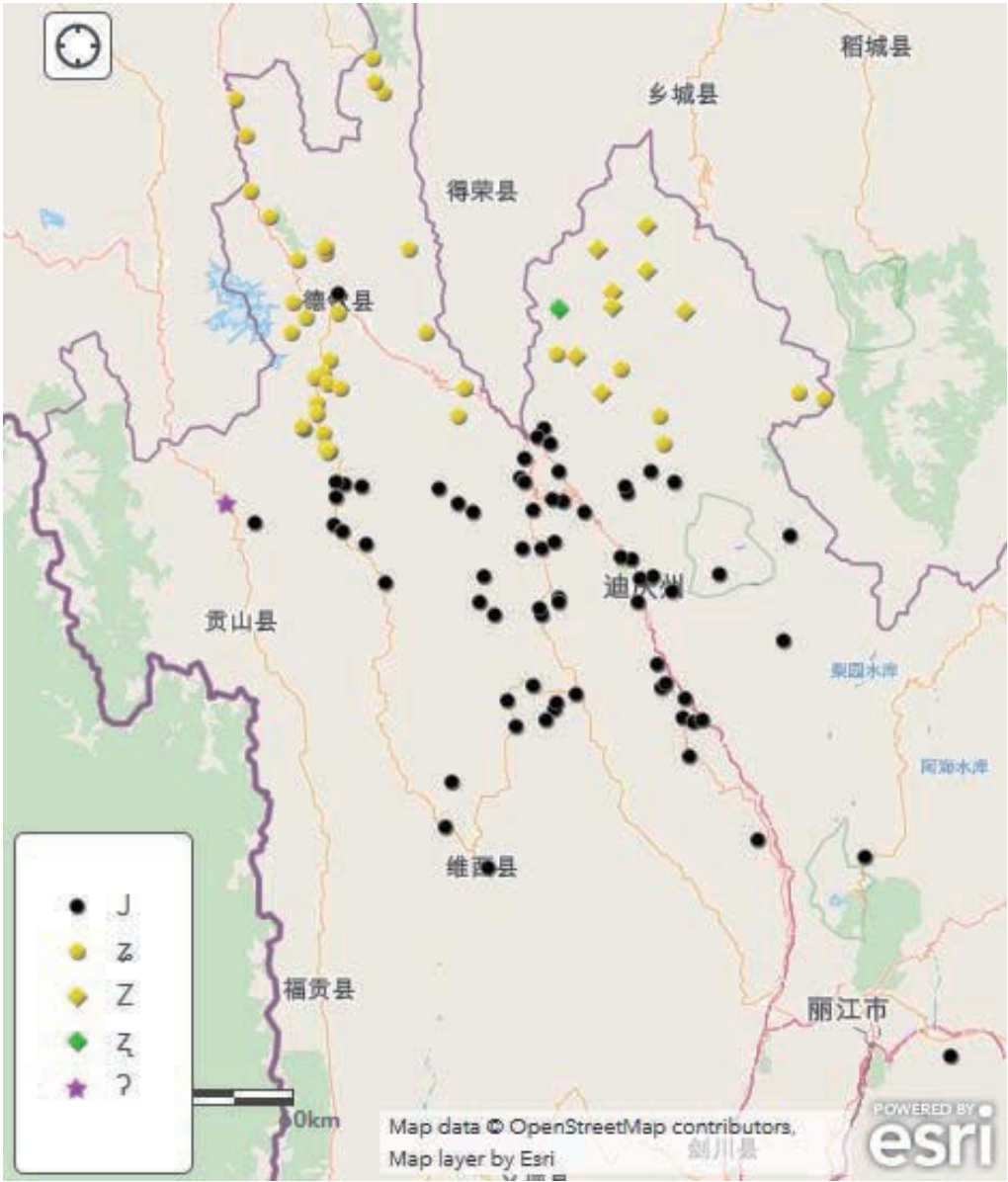


图 7：“花椒” 的声母语音对应

从图 7 可见，除了例外的 z 类和 ? 类（皆仅见于一个地点）之外，“花椒” 也有与“字” 相同的 J 类、 z 类和 Z 类。各类分布地域大致相同，但 z 类和 Z 类的分布细节不一样，主

要是地图的东北部（香格里拉市北部）的类型较为复杂。

从音变类型的角度来看， z_l 类（仅见于色仓话）很有可能是从 z 类演变过来的。 $*z > z_l$ 是在云南藏区常见的语音变化，在藏文带前加字的 zh 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比如**bzhi**“四”、**bzho**“挤（奶）”等。因此， z_l 类可以理解为 z 类的例外形式。

$ʔ$ 类（仅见于丙中洛话）可以看作 J 类的例外形式。藏文**g.yer ma**“花椒”的声母实现为 $/ʔ/$ 是罕见现象，而且藏文**g.yag**“牦牛”也必定与 $/ʃj, j/$ 声母对应，但类似的罕见案例在藏语支语言中确实存在，特别是在宗卡语（ $/ʔema/$ “辣椒”）、夏尔巴语（ $/ʔerman/$ “花椒”）等语言中可以见到（Tournadre & Suzuki 2021）。因此，可以认为丙中洛话的语音对应类似于这些语言。

3.3 小结

图8为将以上图6, 7中的语音对应信息整合后的综合分析图。

上述讨论的两个词的语音形式在同一个方言中的组合方式理论上一共有15类（ $3*5$ ）。但是，图8显示的组合仅有9种。

语音对应中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主要在香格里拉方言群建塘组中出现的特殊语音对应（铃木博之 2018b）：藏文 e 元音字首先变成 $*jə$ ，其 $*j$ 影响齿-龈声母而产生腭前化。根据此语音变化可以进一步了解“字”和“花椒”的声母差异。相关过程可构拟为，首先藏文声母 Y 类的声母变成 z （ Z 类）后，然后元音按其规则变化，发生 $*zi > zə$ （“字”）和 $*ze > *zjə > zə$ （“花椒”）两种变化。因此，在体现该音变规则的建塘组方言分布地域相邻的地方才会发现 Zz 类的方言点（翁上话、纳格拉话、巴拉话）。可以猜想到，其受到了建塘组方言语音规则的影响¹¹。可见，不同方言群的交界处会产生缓冲地带，那里会发生不稳定的语音对应关系。

¹¹ 为了验证此类影响，必须讨论上述介绍的第二大类（藏文介音 $R-Y$ 类语音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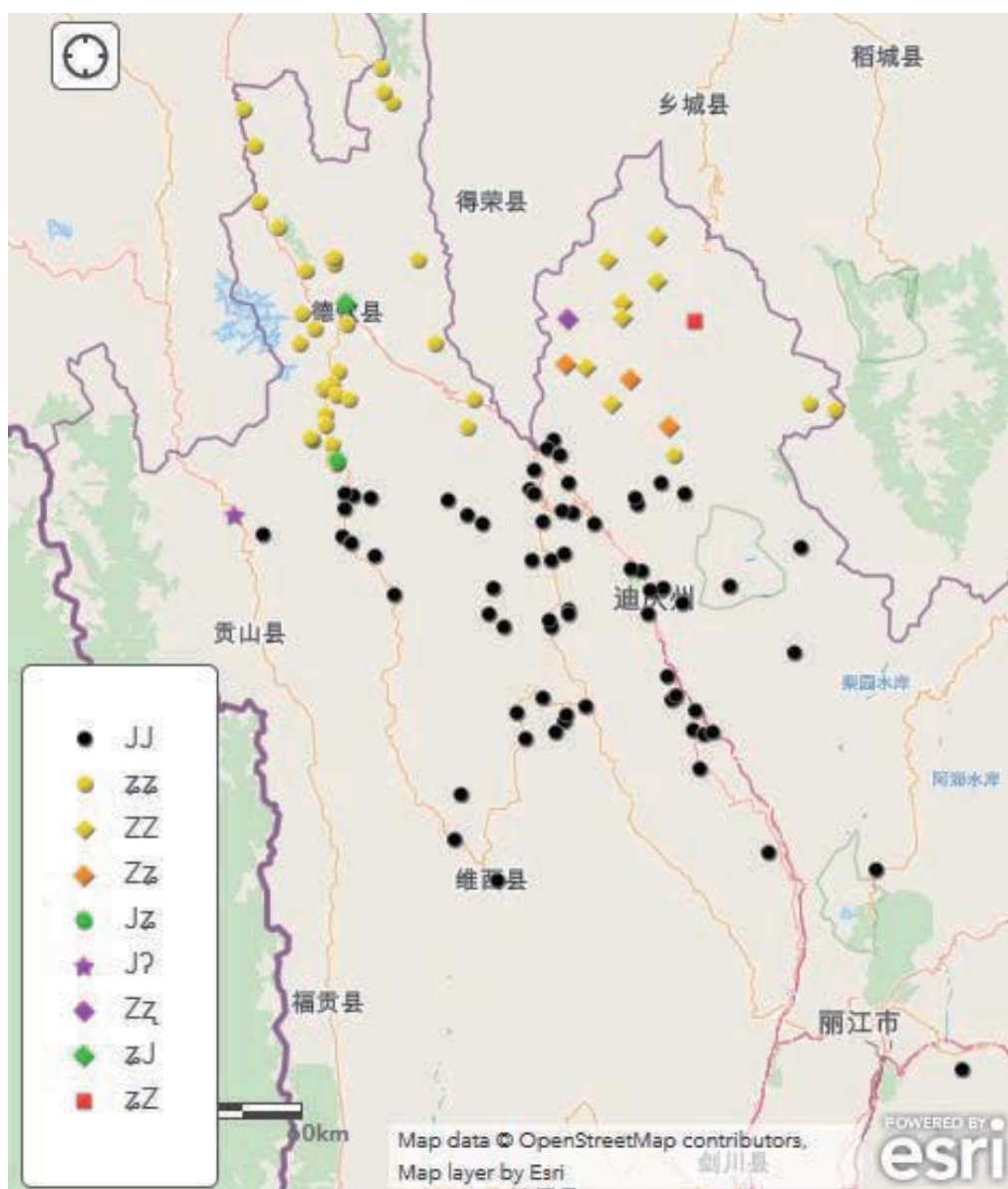


图 8：藏文声母 Y 类语音对应综合地图

Jz 类及 zJ 类各有一个地点，但其分布很难解释。前者分布的地方（尼通话）是 JJ、zz 两大类型的中间，体现为混合特征。后者（阿墩子话）分布在 zz 类地点的中间，从音变类型的角度来看属于例外。我们也不能排除特殊读法的原因，两者都本来为 zz 类，/j/ 的发音很有可能属于文读。

四、结语与余论

本文通过藏文声母 L-Y 的语音对应讨论了云南藏语方言群之间缓冲地带土话中的语音对应。图 9 是对本文讨论内容的综合性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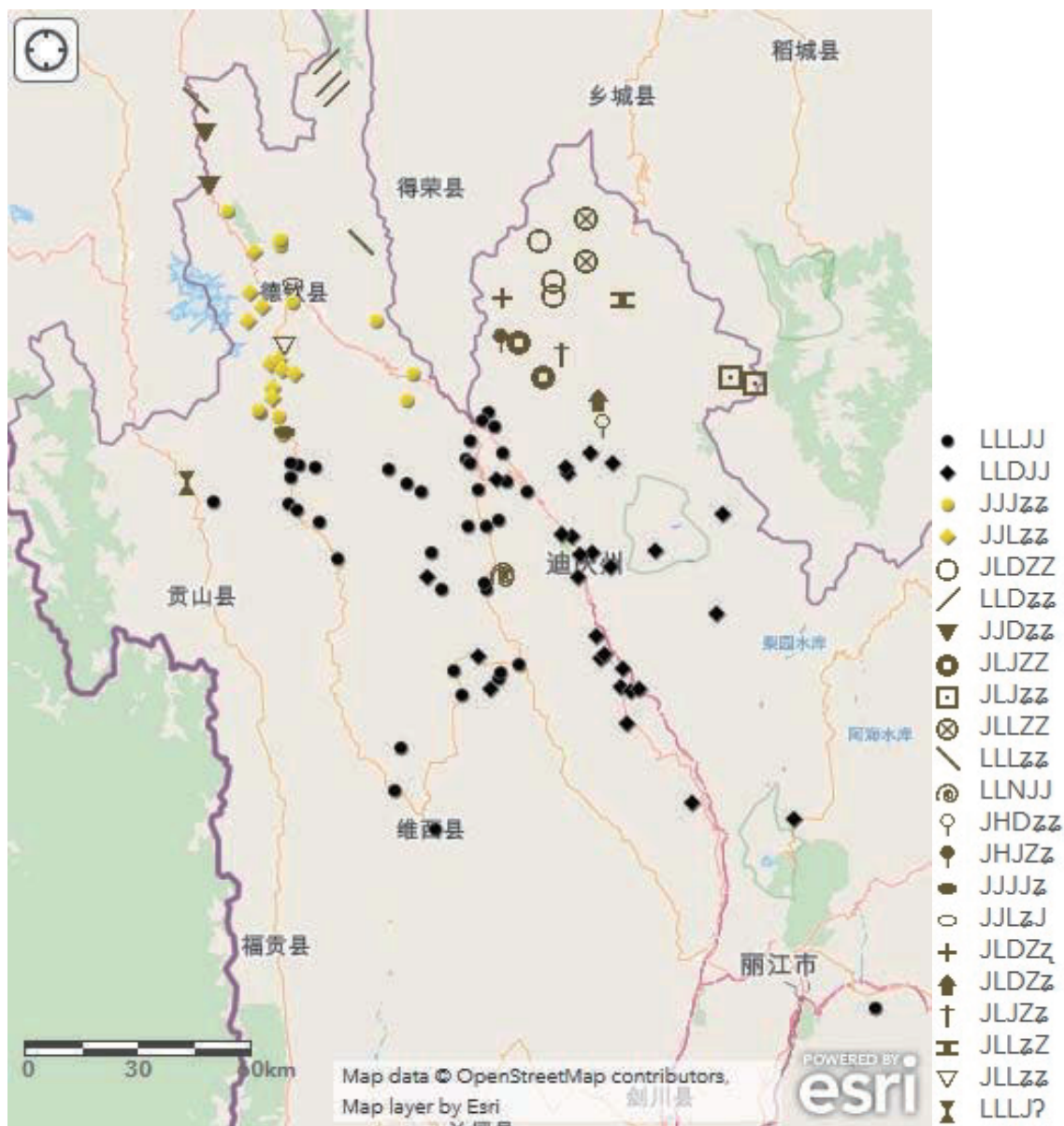


图 9：本文讨论结果的综合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藏文 L 对应形式和藏文 Y 对应形式都有 J 类，但本文探讨的五个词都显示出 J 类，但是图 9 中没有“JJJJ”。此情况意味着这两种语音对应（或称来源）并没有合流。与该类最接近的 JJJz 类（如图 8 的解释所说）很有可能为记录差错，因而可以推测为 JJJzz 类。此推测的背后有一个理论预测，是藏文 L 声母与/j/对应时，藏文 Y 声母不会与/j/对应。一方面，从地图（西）北部出现的 LLDzz 类及 LLLzz 类可以得知，藏文 Y 声母不会与/j/对应的这一情况并不由于藏文 L 声母与/j/对应，而是藏文 Y 声母单独可以发生音变，换言之，两者的藏文语音对应关系之间不一定是通过推链式音变发生的，虽然一定程度上也有互相关系。对此现象，理论上会有拉链式音变的可能性。例如，藏文

Y 声母/j/变成/z/类,之后为了弥补/j/音位置的空缺,藏文 L 的对应形式开始变成/j/。这就可以对 LLDzz 类及 LLLzz 类的存在提供适当的解释¹²。

本文讨论的五个案例并不是为了解释清楚口语和藏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开展的系统性探讨。因此,图 9 那样的综合地图意义有限。但是,图 9 表明的是,云南藏语主要分为南(黑色标记部分)、北两类,北部进一步分为东(以棕色标记部分为主)、西(以黄色标记部分为主)两类。西北部可以再分出北端(斜线部分)及其余部分。较为复杂的是东北部(香格里拉市北部)的语言情况,在藏文 L-Y 语音对应方面受过多种语音系统的干扰。斜线部分的语音对应类型并不呈现出类似其他土话的特征。因此,需要另外考虑其方言所属。

缓冲地带的口语中,不但藏文和语音的对应关系有混合特征,而且音系(特别是辅音系统)也会变得复杂。例如,真如翁上话(JLDZz 类)具有在云南藏语中最复杂的辅音系统(铃木博之 2018a),呈现出巴拉话(JHJZz 类)、浪都话(JLJzz 类)、开香话(LLDJJ 类)等土话音系的混合特征。基于藏文对应建立方言分类时,语音对应关系的复杂层次必须要仔细探讨。为了深入了解方言群的历史发展,学者们的工作重点应是在缓冲地带挖掘土话资料。

附记:本文的基本部分曾在“中国语言地理比较研究论坛”(2020 年 12 月)上宣读过,承蒙远藤光晓教授及罗仁地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本研究受以下两种经费资助: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 A“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JP17H04774);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B“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JP18H00670)。

参考文献

- 次林央珍、铃木博之[H. Suzuki] 2021〈东旺藏语语言地图及其与周边土话的关系〉收录于本论文集
-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4《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修订本]》四川民族出版社
- 江荻 2002《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民族出版社
- 江荻 2004《藏语语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 李春梅、铃木博之[H. Suzuki] 2020〈康定市吉居藏语所属问题〉《民族学刊》5, 102-109+154-156. doi: <http://doi.org/10.3969/j.issn.1674-9391.2020.05.013>
-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9〈川西地区“九香线”上的藏语方言:分布与分类〉《汉藏语学报》3, 17-29.

¹² 类似的情况在九寨沟藏语各种土话之间也有发现。铃木博之(2013a:48-50)报道了分布在九寨沟口内外的六个土话,其中五个具有*l > /j/、*j > /z/的类型,其余一个具有*l > /l/、*j > /z/的类型。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0「カムチベット語瓊波/沖倉[Khyungpo/Khromtshang]方言の音声分析とその方言特徴」『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9, 95-120. URI: <http://hdl.handle.net/10108/57437>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3a〈九寨沟口内外藏語语音面貌〉《亚洲语言论丛》9, 37-76. URI: <http://id.nii.ac.jp/1085/00001318/>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3b〈云南维西藏語的 r 介音语音演变：兼谈“儿化”与“紧喉”之交叉关系〉《东方语言学》13, 20-35.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6a〈藏語方言學研究與語言地圖：如何看待“康方言”〉《民族學刊》2, 1-13+92-94. doi: <http://doi.org/10.3969/j.issn.1674-9391.2016.02.001>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6b〈香格里拉藏語亞浪話的鼻音系統〉《東方語言學》16, 114-122.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8a「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形成」『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 5-63. doi: <http://doi.org/10.15026/92458>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8b「カムチベット語 rGyalthang 下位方言群における齒-齒茎音の前部硬口蓋化現象とその周辺」『言語記述論集』10, 1-11. 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1999/>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8c〈理塘县及其周边藏族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民族學刊》2, 35-44+106-109. doi: <http://doi.org/10.3969/j.issn.1674-9391.2018.02.005>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8d〈康巴藏語崩波崗方言群及其语音特征〉《四川民族學院學報》5, 66-72. doi: <http://doi.org/10.3969/j.issn.1674-8824.2018.05.012>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20「カムチベット語察瓦龍[Tshawarong]方言の音声記述と語彙」『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15, 105-137. doi: <http://doi.org/10.15026/99899>
- 張濟川 1993〈藏語方言分類管見〉戴慶厦等《民族語文論文集——慶祝馬學良先生八十壽辰文集》297-309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張濟川 2009《藏語詞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豐富發展他們的詞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Donohue, M. 2020. Language and dialect relations in Bumthang. *Himalayan Linguistics* 19.3, 1-45. doi: <https://doi.org/10.5070/H919247065>
- DTLF =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u Thibet. 1899. *Dictionnaire thibétain-latin-français*.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 Missions Étrangères.
- Ikeda, T. 2021. An introduction to Khengkha: A language of Central Bhutan. Y. Nagano & T. Ikeda (eds) *Grammatical phenomena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4: Link languages and archetypes in Tibeto-Burman*, 71-119.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 Matisoff, J.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RI: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19d79619>
- Matisoff, J. A. 2015. *The 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The Regents of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nline: <https://stedt.berkeley.edu/dissemination/STEDT.pdf>
- Suzuki, H. 2008. /l/ - /j/ interchange in Shangri-La Tibetan. Paper presented at 4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 Suzuki, H. 2016. In defense of prepalatal non-fricative sounds and symbols: towards the Tibetan dialectology.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10, 99-125.
URI: <http://id.nii.ac.jp/1085/00002195/>
- Suzuki, H. 2017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wind’ in Tibetic language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IV—Wind—*, 27-32.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4_wind_2017.pdf
- Suzuki, H. 2017b.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Bodgrong Tibetan (Gongshan, Yunnan): From a geo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VI—“Means to Count Nouns” in Asian Languages—*, 43-55.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6_count_2017.pdf
-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 Suzuki, H. 2020. Geo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Phongpa dialect in the history of Yunnan Tibeta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5-29. doi: <http://doi.org/10.5281/zenodo.4515013>
- Suzuki, H., Tsering Samdrup, Niangwujia (Nyingbo-Gyal), Jixiancairang (Chaksham Tsering), & Sonam Wangmo. 2019. /ŋ/ in Amdo Tibetan: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Journal of the Phonetic Society of Japan* 23, 76-82.
doi: https://doi.org/10.24467/onseikenkyu.23.0_76
- Tournadre, N. & H. Suzuki. 2021.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Xavier Becker and Alain Brucelle for the cartography). LACITO Publications (CNRS).
- Zhang, J. 1997. Particularités phonétiques du baima.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6.1, 131-153. doi: <https://doi.org/10.3406/clao.1997.1507>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 and /j/ sounds in Yunnan Tibetan
from a geolinguistic context**

Hiroyuki Suzuk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cent studies on Yunnan Tibetan, there are three dialectal group classifications: Sems-kyi-nyila, sDerong-nJol, and Chaphre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uffer zones’ between different dialectal groups by displaying linguistic maps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changes. The buffer zone designates an area where dialects feature two or more dialectal groups. The article primarily discusses /l/, /j/, and their relevant sounds corresponding to Literary Tibetan initial *l* and *y*. It establishes a clear buffer zone between the Sems-kyi-nyila and Chaphreng groups (located north of Shangri-La Municipality). No buffer zones exist in the other contact areas of dialect groups, in which we can draw clear-cut isoglosses.

东旺藏语语言地图及其与周边土话的关系

次林央珍

中央民族大学

铃木博之

复旦大学

内容摘要：鉴于目前未见以某个乡内的自然村为调查对象的藏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把东旺乡内的 31 个自然村即土话点在语言地图上标明，并图解“酥油”“你”“有”“母猪”“二”等五个基本词汇在各自然村之间的语音差异。据分析，发现这五个词的语音差异主要呈现在河谷区和高山区之间的差异，与地理分布和海拔高度有着明显联系。另外，本文还通过绘制东旺乡周边土话点的语言地图，指出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之间的关系及其语音差异。

一、引言

东旺是指位于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的一个乡。东旺乡位于香格里拉市的最北端，介于东经 $99^{\circ} 23' - 99^{\circ} 53'$ ，北纬 $28^{\circ} 22' - 28^{\circ} 52'$ 之间。其东部和南部分别与香格里拉市格咱乡、尼西乡毗邻，西部和北部分别与四川省得荣县、乡城县接壤，可见位处川滇边界（见图 1）。全乡总面积 1338 平方千米，内分河谷和高山地带，常年海拔处于 2540—5050 米之间。金沙江支流硕曲河自北向南纵贯全境，在东旺境内全长 66 千米，流域面积约 2613 平方千米。东旺乡下辖上游、跃进、中心、新联、胜利等五个村民委员会，共 54 个村民小组，58 个自然村，1029 户。据 2015 年调查，全乡总人口达 6371 人，其中藏族人口为 99.7%，另外还有汉、纳西、白、傈僳等其它民族，所占比例较小，主要是外来嫁入或工作人员。

东旺藏语是指东旺乡的藏族所使用的语言。按照目前较为通用的方言划分方法，东旺藏语应属于藏语康方言。过去，格桑居冕（1964）及其正式出版版本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把藏语康方言分为三个次方言即北路、南路和牧区，其中迪庆藏语属于南路次方言。《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志》（2001）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志》（2001）记载，迪庆州藏语属于康方言中的南路次方言，其土话可以分为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维西和东旺等四种。铃木博之（2008）把迪庆州藏语土话划分为建塘、云岭山脉东部、塔城、奔子栏、羊拉、云岭山脉西部、东旺等七个小组。可见，东旺藏语在迪庆州内有独立土话小组的地位，说明它相较于迪庆州各藏语土话，有着明显的区别特征。在东旺乡内部，各村落之间的语音又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甚至达到了无法流畅交流的地步，这主要表现在河谷和高山地区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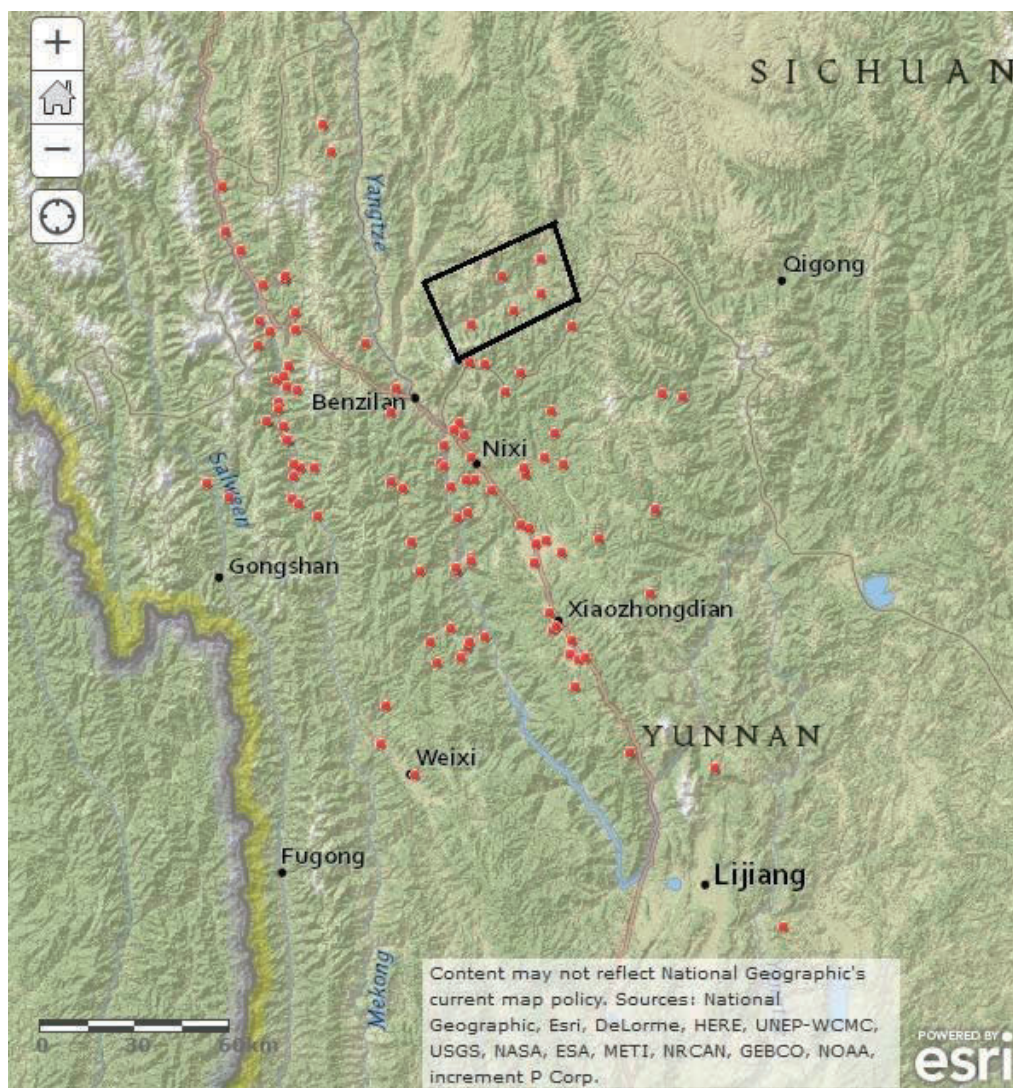


图 1：东旺藏语在云南藏语中的地理位置（根据 Suzuki 2018:12 补充了信息）

鉴于目前未见以某个乡内的自然村为调查对象的藏语地理语言学研究，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论，通过云南藏语斯瓦迪士 100 词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思路和资源，针对地理分布和海拔高度是否会造成或影响土话之间的语音差异这一问题进行地理语言学分析。本文以东旺乡内 31 个自然村即土话点为调查对象，选取“酥油”“你”“有”“二”“母猪”等五个基本词汇，用 ArcGIS online 分别绘制每个词的语言地图，考察它们在东旺乡内的语音分布情况及其呈现出的差异特征。另外，还通过绘制东旺乡周边土话点的语言地图，指出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之间的关系及其语音差异。

31 个调查点，包括如下地点：

新联村委会的 9 个自然村：火茸（附图 1）、格疼、列布、红卫、依崩、比吓、浪达、比茸、色丛；

胜利村委会的 6 个自然村：克斯、央都、花拉、争仁、麻龙、贡松；

中心村委会的 6 个自然村：龙、贡擦、白玉、习开、白中、泽央；
跃进村委会的 6 个自然村：崩丁、白堆、阿布、普鲁、格落（附图 4）、麦顶；
上游村委会的 4 个自然村：比优、珠热、洒渣、崩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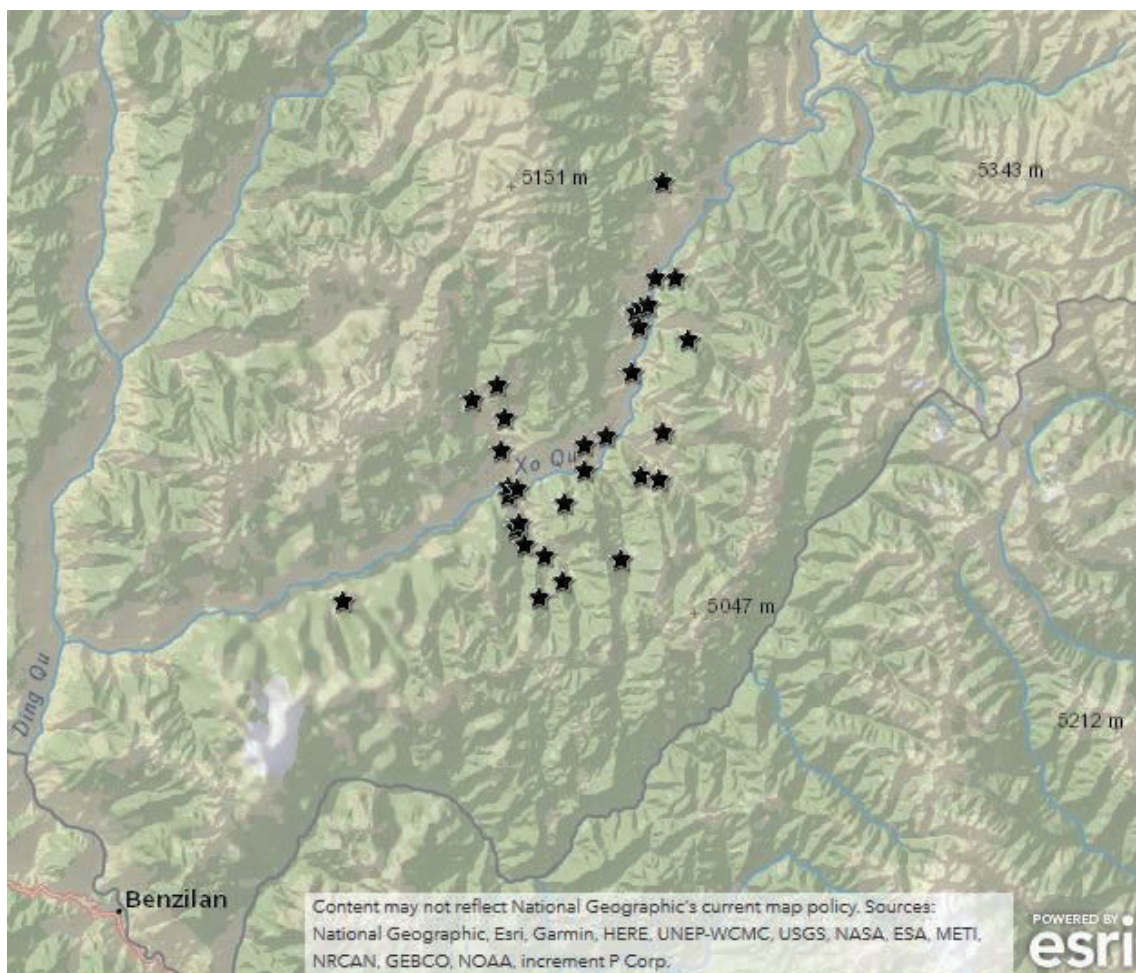


图 2：东旺乡内 31 调查点的分布情况

东旺乡内语言资料由第一作者收集并用普通国际音标记录，东旺乡外语言资料由第二作者收集并用藏语专用系统音标（pandialectal phonetic description）记录¹。两者资料的性质不同，因此，东旺乡内的语言地图以实际语音为标准进行绘制，而东旺乡内外共同的语言地图因依据的音标系统有差异，先按类似的词形处理为代码，并把语音相近的形式合并成一个标记，以代码为标准来绘制语言地图。地图的标记为单色，形状和相差度相联系。

¹ 详细描述参见 Suzuki (2016)及 Tournadre & Suzuki (2021)。

二、名词“酥油”的语言地图

“酥油”的藏文书写形式为 མར་ *mar*，是藏语固有名词，东旺乡内存在 me^{35} 和 mu^{35} 两种语音形式²，都来源于藏文 མར་ *mar*。从 *mar* 的 me^{35} / mu^{35} ，声母不变，韵尾 *r* 脱落，声调产生，这是东旺乡内各土话点的共同演变特征。 me^{35} 和 mu^{35} 的韵母不同，即 ϵ 为靠前元音， u 为靠后元音，这是东旺乡内各土话点间的个体差异特征。那么“酥油”一词的两种语音形式在东旺乡内的分布如何，有何规律，且与周边土话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语言地图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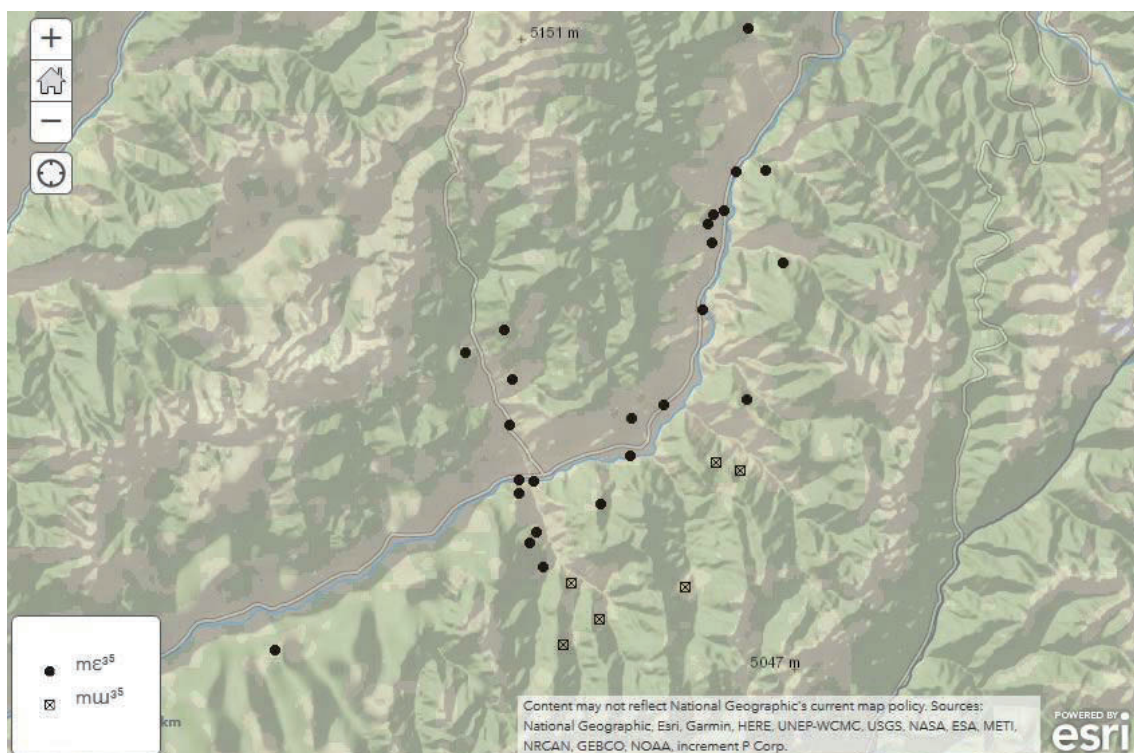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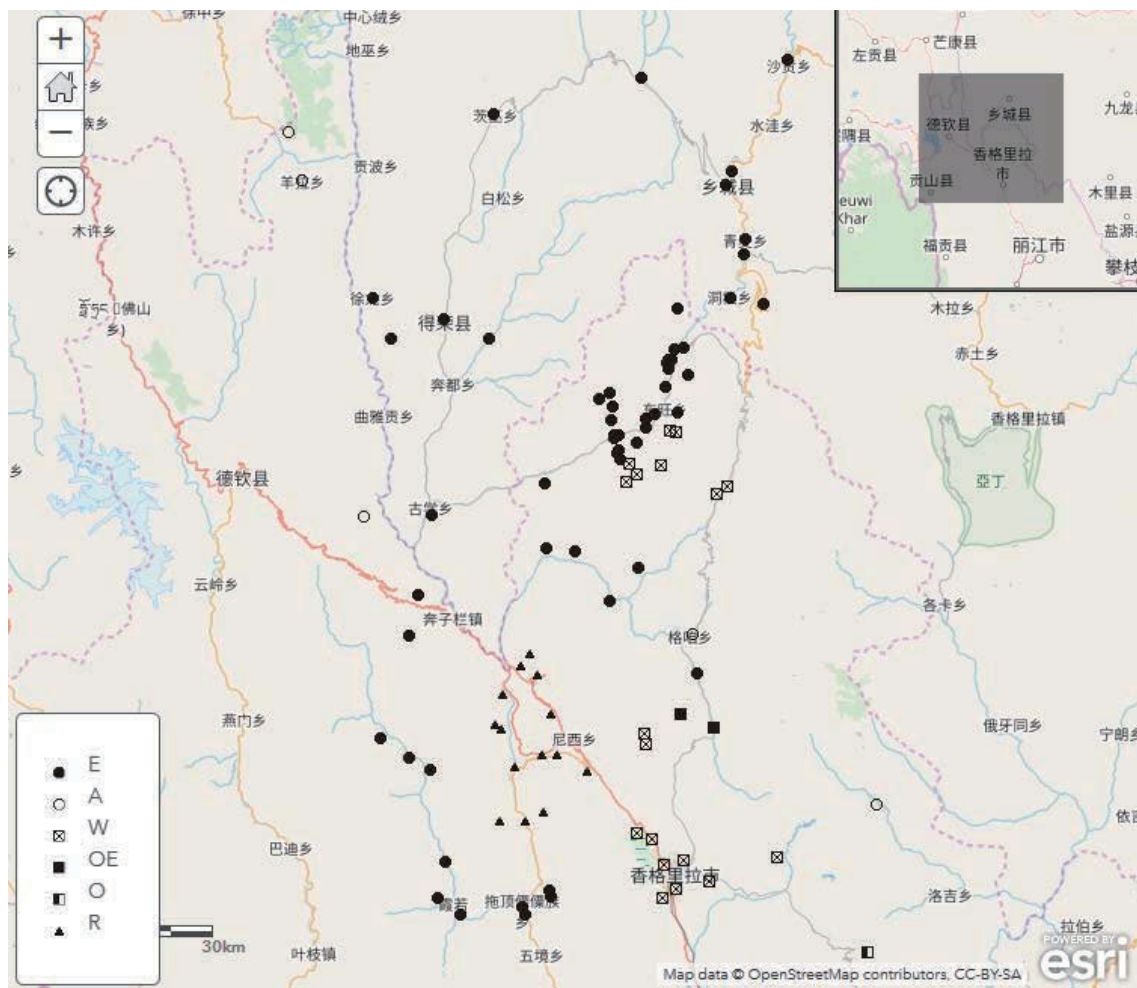


图 3：东旺藏语“酥油”的语音形式

图 3 是“酥油”一词的两种语音形式在东旺乡内的分布情况。可见，在 31 个自然村中，用 me^{35} 形式的有 25 个点，集中分布在东旺乡北面和南面河谷区（参见附图 4 至 6）；用 mu^{35} 形式的有 6 个点，分布于东旺乡南面的高山区。 mu^{35} 的 6 个分布点分别为隶属于新联村委会的火茸、列布、格疼，以及隶属于中心村委会的习开、白中和泽央，这 6 个点共同的特征是离东旺河较远，位于海拔较高的山区，牧业色彩重（参见附图 2、3）， me^{35} 形式的 25 个分布点的位置特征恰好与之相反。

² 前者形式的元音会带鼻化特征，其音系上的功能尚未确认。



图例³:

E=/mɛ/类; A=/ma/类; W=/mu/类; OE=/mø/类; O=/mo/类; R=/mar/类

图 4: 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酥油”

图 4 除了东旺藏语，还加了大量周边的土话点。图 4 总共显示 6 种语音形式，无论是在东旺藏语内部还是各周边藏语，这 6 种语音形式的差异都体现在韵母上。其中，靠前元音（mɛ³⁵）除了东旺藏语，在周边土话中也广泛存在，靠后元音（mu³⁵）与建塘镇以及格咱乡翁水村等周边土话一致。东旺藏语和周边土话的 mu³⁵ 是否存在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⁴。

三、第二人称单数体格代词（“你”）的语言地图

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你”的藏文书写形式为 ཁྱེད *khyod*。此藏文词形无形态变化，但东

³ 图 4 的分类依据元音性质，与长短、声调无关。对于此分类方法、背景及详细讨论，参见铃木博之（2019a）。

⁴ 对于藏文后加字 r 的语音对应关系，参见铃木博之（2018:47-48）的描述。

旺藏语在特定的格中呈现词干交替，在此讨论的是体格形式⁵。东旺藏语的“你”总共有六种语音形式，分别为 $\epsilon^h\gamma^{24}$ 、 $\epsilon^h\epsilon^{24}$ 、 $\epsilon^h\text{ie}^{51}$ 、 $\text{ts}^h\text{ie}^{51}$ 、 $\text{ts}^h\epsilon^{51}$ 、 $\text{ts}^h\text{œ}^{51}$ ，都是从藏文 ཁྱ མཉམས *khyod* 演变而来的。其中，声母有 ϵ^h 、 ts^h 两种变体，韵母有 γ 、 ϵ 、 ie 、 ϵ 、 œ 等五种变体，声调有低升和高降两种。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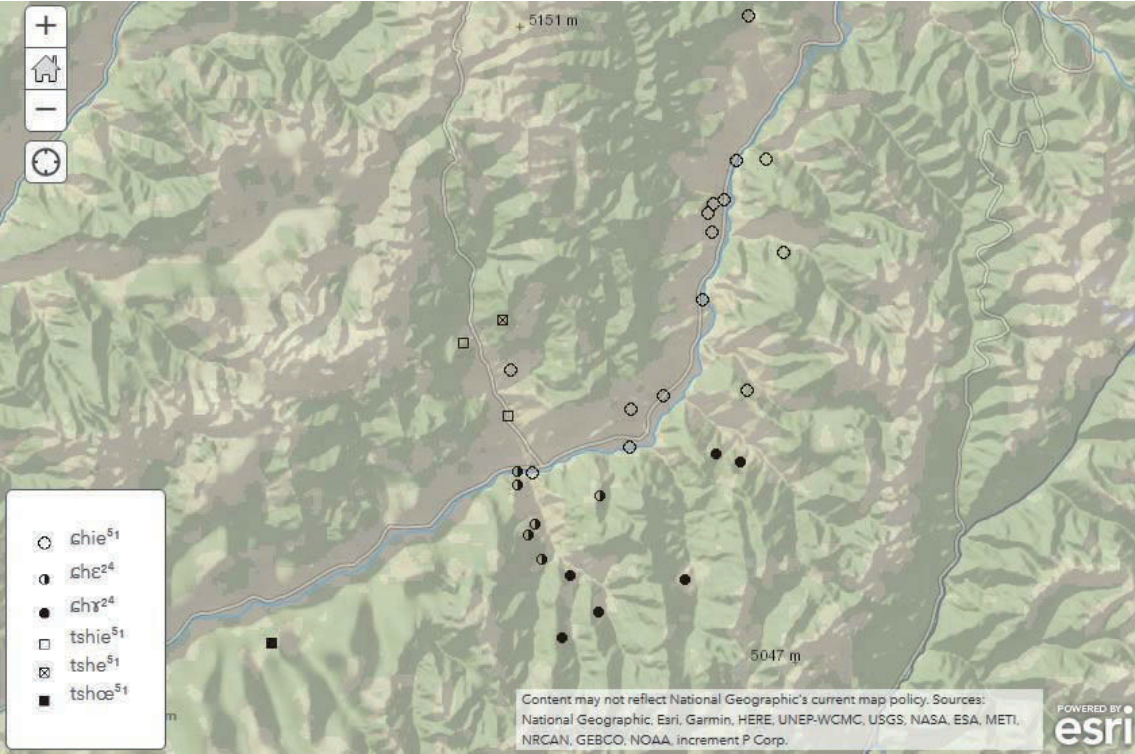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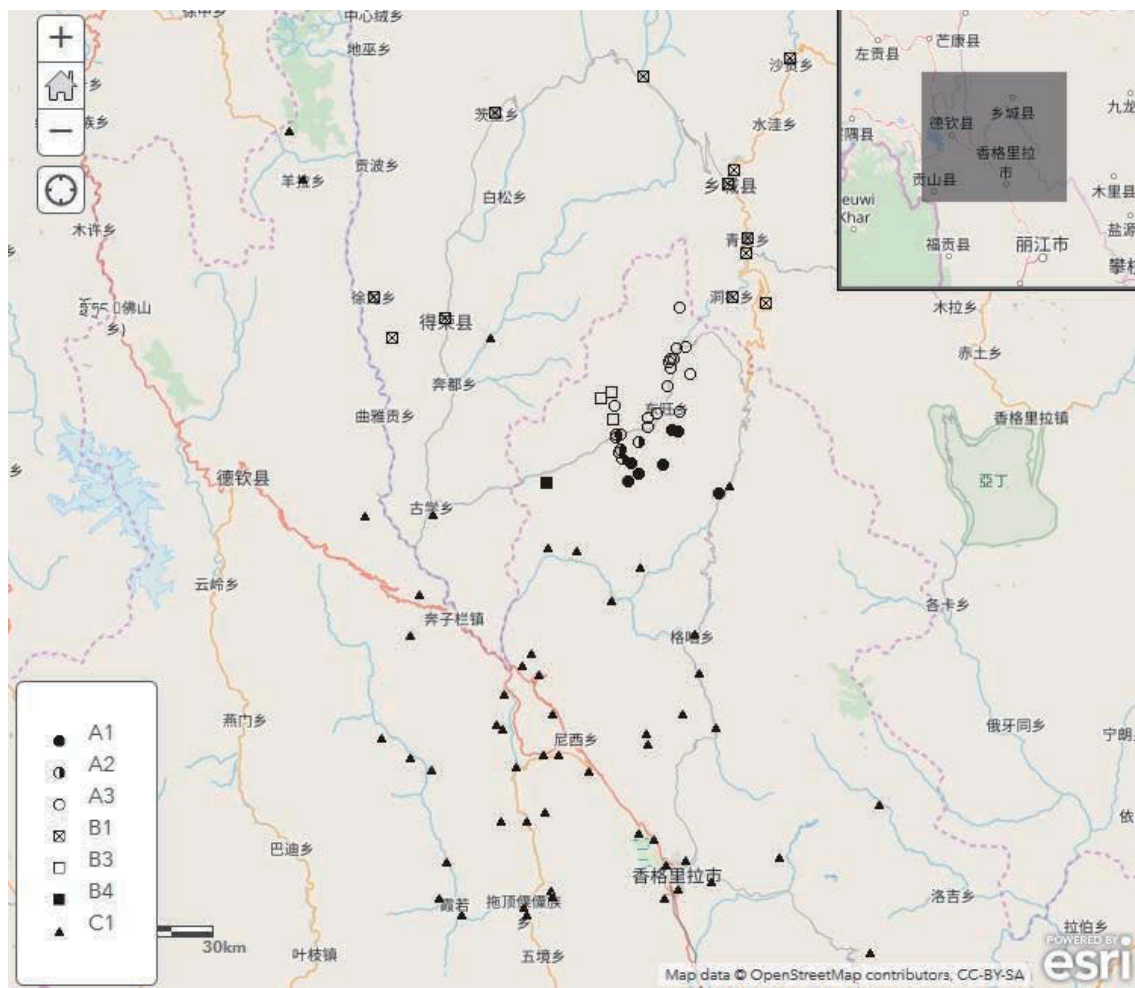


图 5：东旺藏语“你”的语音形式

可见，在 31 个自然村中，用 $\epsilon^h\text{ie}^{51}$ 形式的有 15 个点，集中分布于东旺乡北面和中南面河谷区；用 $\epsilon^h\gamma^{24}$ 形式的有 6 个点，分布于东旺乡南面的高山区，与“酥油” mu^{35} 形式的分布点重合；用 $\epsilon^h\epsilon^{24}$ 形式的有 6 个点，分布于东旺乡南面的河谷区；用 $\text{ts}^h\text{ie}^{51}$ 形式的 2 个点和用 $\text{ts}^h\epsilon^{51}$ 形式的 1 个点都位于东旺乡南北中部；用 $\text{ts}^h\text{œ}^{51}$ 形式的只有 1 个点，位于南面河谷区。语言地图直观显示，6 种形式的分布点各自都比较集中，语音差异主要体现在北面与南面、河谷区与高山区之间的差异。

⁵ 比如，火茸话的体格为 $\epsilon^h\gamma^{24}$ ，属格及作格为 $\epsilon^h\text{i}^{55}$ 。



图例⁶:

A=声母/ ϵ^h /类: A1= $\epsilon^h\gamma$ /; A2= $\epsilon^h\epsilon$ /; A3= ϵ^hie /;

B=声母/ ts^h /类: B1= ts^he /; B3= ts^hie /; B4= $ts^h\epsilon$ /;

C1=声母/ te^h /类

图 6: 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你”

图 6 在东旺藏语的基础上加了大量周边土话点, 总共显示 7 种语音形式, 其中东旺藏语就占了 6 个, 说明“你”在东旺藏语内部呈现出的差异远远超过了各周边藏语。“你”的语音差异在声母和韵母上都有体现, 但都与藏文 ཁྱེད་ *khyod* 呈现对应关系。东旺藏语中分布较少的声母形式 (ts^h , B) 与四川省乡城、得荣各县的形式一致, 分布较多的声母形式 (ϵ^h , A) 仅在东旺藏语中存在 (除格咱乡翁水村外)。

⁶ Suzuki (2018:25) 不提供形态差异, 仅描述在云南藏语“你”都和藏文 *khyod* 对应。本图例中的数字与元音有关, 而且与图 8 图例也有关。

四、存在动词向自我示证形式（“有”）的语言地图

存在动词“有”（存在动词向自我示证形式⁷）的藏文书写形式为 ཡོད་ *yod*，东旺藏语中有五种语音形式，分别为 *zie*¹³、*ze*²⁴、*zɿ*²⁴、*ze*²⁴、*zœ*²⁴，都是从藏文 ཡོད་ *yod* 演变而来的。藏文声母 *y* 一般与 */j/* 对应，*/j/* 到 */z/* 的演变是藏文到东旺藏语的一种系统音变⁸。例如：

书面藏语	东旺藏语	汉义
<i>yin</i>	<i>zẽ</i> ⁴¹	是（判断动词向自我示证形式）
<i>g.yag</i>	<i>za</i> ²⁴	牦牛
<i>g.yar</i>	<i>zɿ</i> ⁴¹	借
<i>yi ge</i>	<i>zɿ</i> ²⁴ <i>gi</i> ⁵⁵	书
<i>yod</i>	<i>zɿ</i> ²⁴	有
<i>yang</i>	<i>zõ</i> ³⁵	又

东旺藏语存在动词“有”的 5 种语音形式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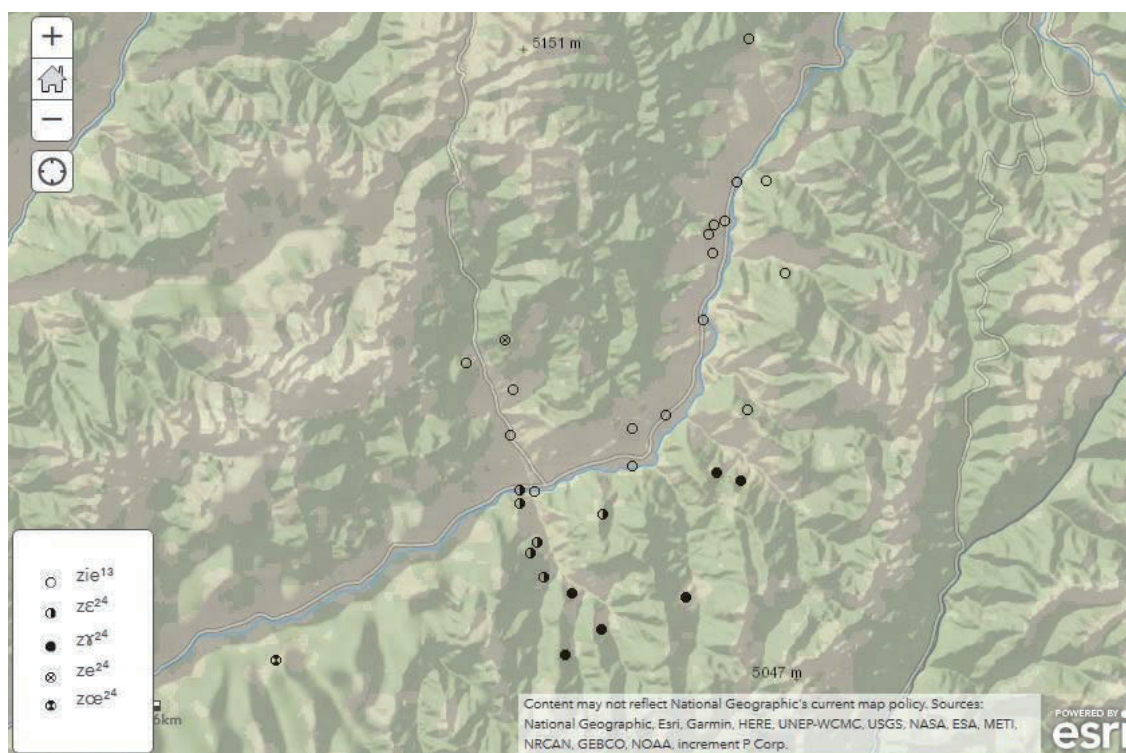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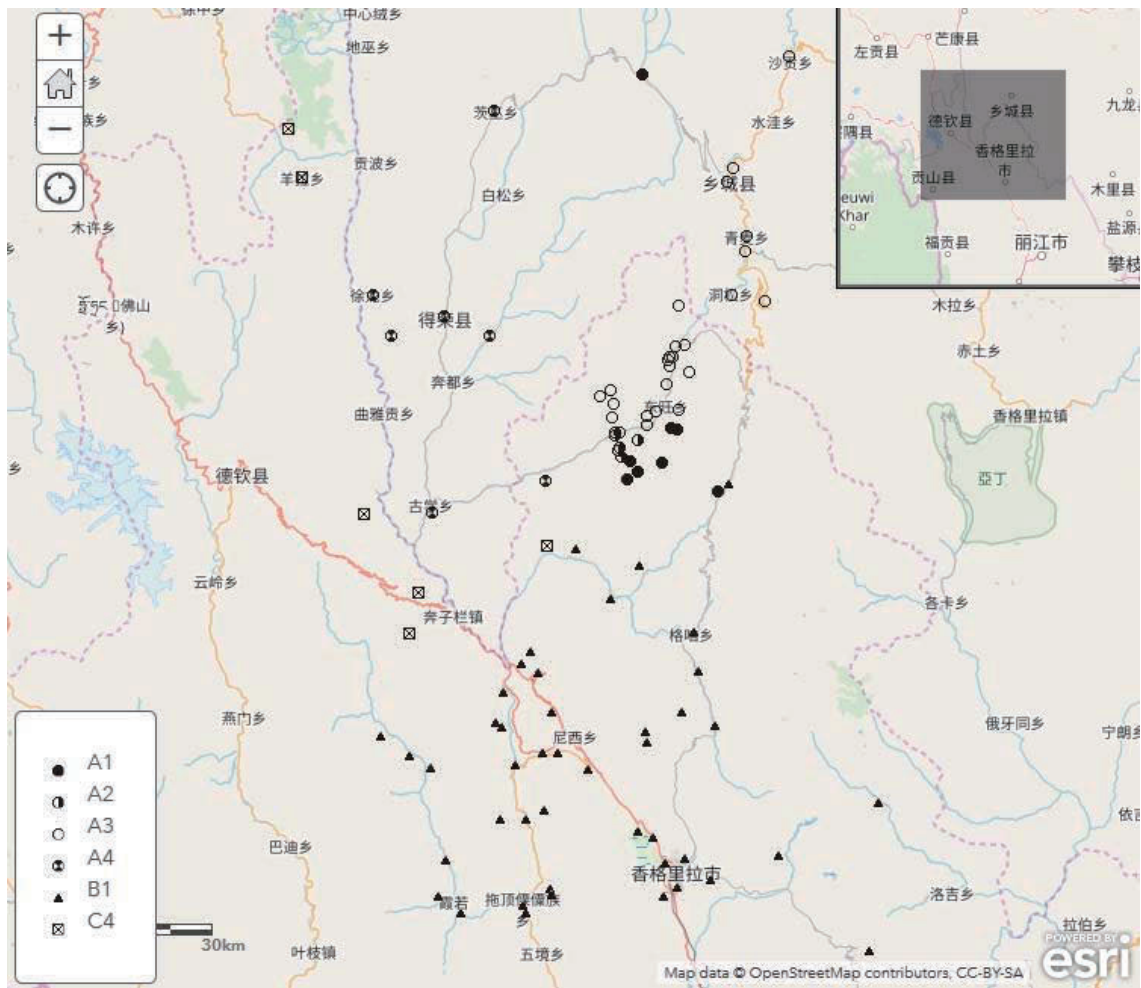


图 7：东旺藏语“有”的语音形式

⁷ 康南地区藏语支语言中存在动词的形式与分类参见铃木博之（2019b）。

⁸ 也可以参考 Bartee (2007) 和 Suzuki (2008)。

可见 31 个自然村中，用 zie^{13} 形式的有 17 个点，分布于东旺乡北面和中南面河谷区；用 ze^{24} 形式的有 6 个点，分布于南面河谷区；用 $z\gamma^{24}$ 形式的有 6 个点，分布于东旺乡南面的高山区；用 ze^{24} 形式的有 1 个点，位于东旺乡南北中部；用 $z\alpha^{24}$ 形式的有 1 个点，位于南面河谷区。同样，“有”在东旺藏语内部的语音差异主要体现在北面与南面、河谷区与高山区之间的差异。



图例：

A=声母/z/类：A1=/zɿ/；A2=/zɛ/；A3=/zie/；A4=/zœ/；

B1=声母/j/类；

C4=声母/z/类

图 8：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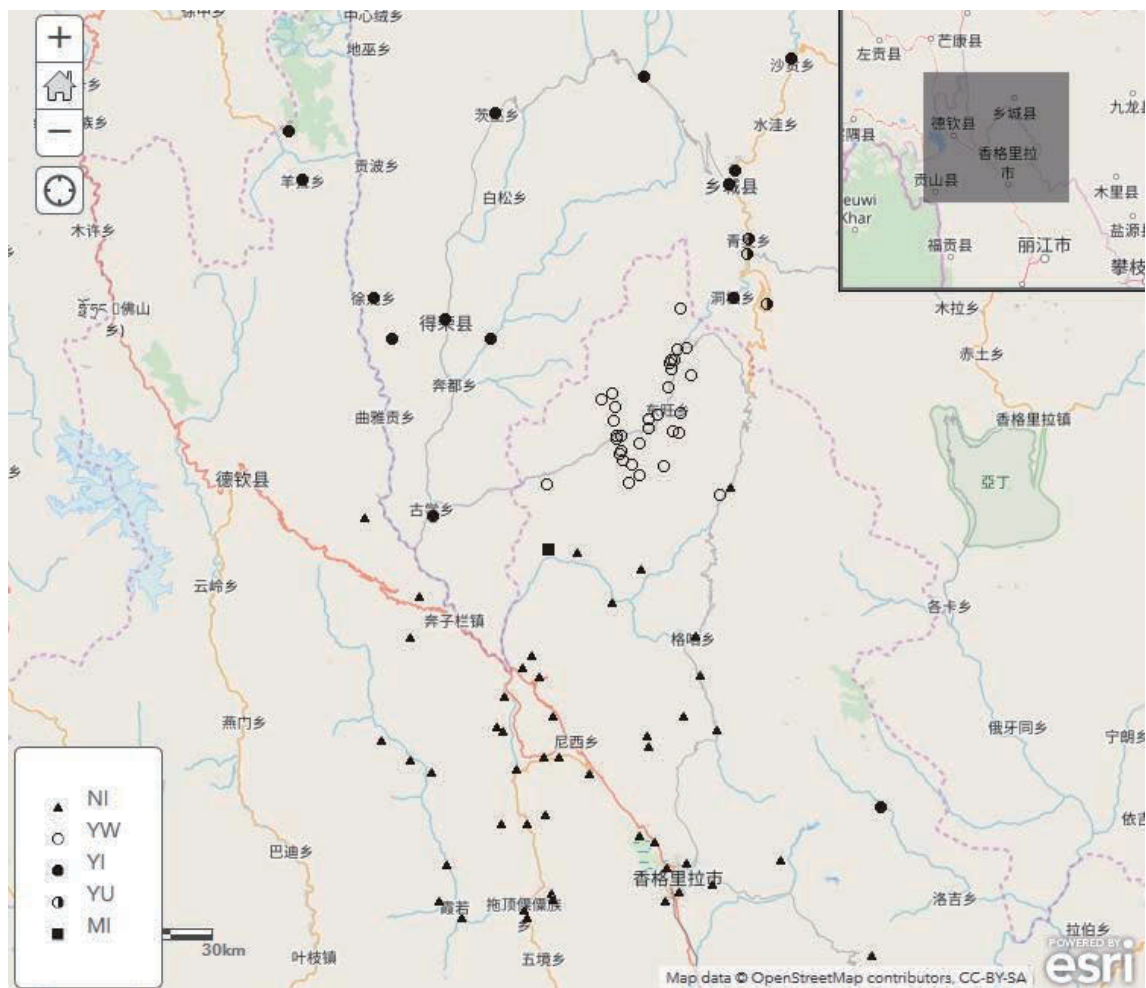
图 8 显示存在动词“有”在东旺藏语及其周边土话中总共有 6 种语音形式。“有”在东旺藏语内部只是韵母有差异，声母形式统一用 z，但与周边土话比较，声母出现了差异，主要体现在 A 形式（z）和 B 形式（j）间的差异。东旺藏语用的 A 形式发生了从 j 到 z

的语音演变，而周边土话用的 B 形式直接沿用了藏文的 j 形式，没有发生音变。东旺藏语的声母形式与乡城、得荣各县的形式一致。韵母形式的共性呈现连续分布特征。

回看以上图 3、图 5、图 7 并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酥油”的 mu^{35} 形式、“你”的 $\epsilon^{h\gamma^{24}}$ 形式、“有”的 $z\gamma^{24}$ 形式，它们的分布点完全重合，都是那 6 个位于高山区的土话点。再看“你”的 $\epsilon^{h\epsilon^{24}}$ 、 $\epsilon^{hie^{54}/ts^{hie^{54}}}$ 、 $ts^{he^{54}}$ 、 $ts^{h\ae^{54}}$ 形式和“有”的 ze^{24} 、 zie^{13} 、 ze^{24} 、 $z\ae^{24}$ 形式，它们互相对应且分布点各自重合。这进一步说明了东旺藏语内部的语音差异并不是杂乱无章无规律的，而是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另外，高山区和河谷区之间的语音差异主要体现在韵母上，高山区倾向于使用靠后元音韵母，而河谷区倾向于使用靠前元音韵母。

五、数词“二”的语言地图

数词“二”的藏文书写形式为 གཉིས་ *gnyis*，东旺藏语的语音形式为 ηu^{41} ，来源于藏文的 གཉིས་ *gnyis*。藏文的拉丁转写式 *ny* 实际读音对应于东旺藏语的音标 η 。“二”在东旺藏语内部无差异，但与东旺乡外的周边土话之间有差异。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数词“二”的具体分布情况及差异如下图 9：



图例⁹:

NI=/nə/类;

YW=/ɲw/类; YI=/ɲə/类; YU=/ɲu/类;

MI=/mə/类

图 9: 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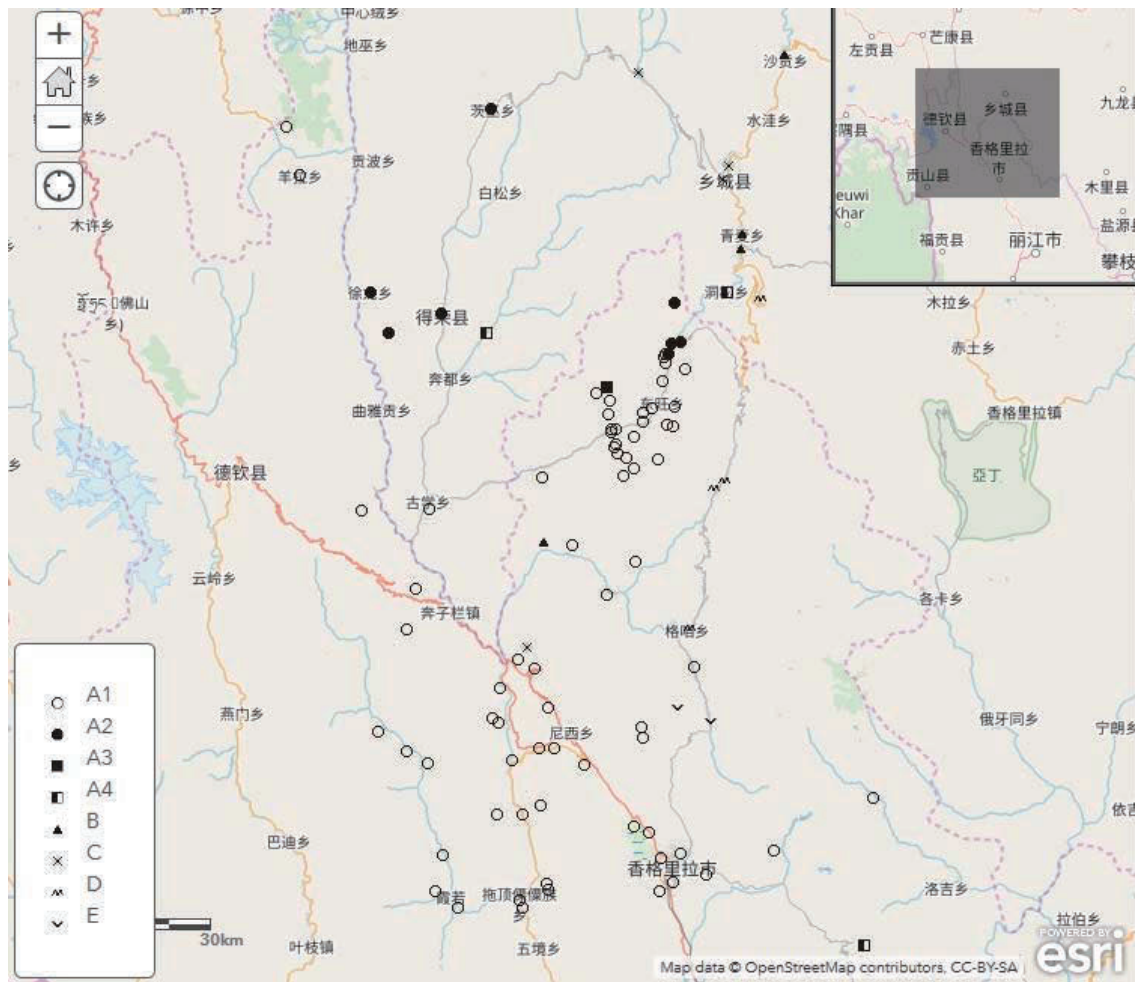
此语言地图呈现了 5 种语音形式，其中与东旺藏语相近的是位于东旺乡北部的四川省的乡城县、得荣县等土话点，它们都用与藏文相同的声母形式，即 *ny* 对应于 *ɲ*。

位于东旺乡南部且同属于一州或一县的，有 1 个土话点（巴拉村）的数词“二”的声母用 *m* 形式，其余都用 *n*，与东旺藏语差异较大。在云南藏语中的 *m*、*n* 声母形式参见 Suzuki (2018:39-30)。

⁹ Suzuki (2018:39-40)提供声母形式的差异。图 9 中，除了声母，还有元音、韵母的差别也反映出来了。

六、复合词“母猪”的语言地图

“母猪”在藏语中是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的复合名词，藏文书写形式为 ཕག་མ་ *phag ma*，东旺藏语有 $p^ha^{24}ma^{55}$ 和 $mə^{24}wa^{54}$ 两种形式。其中， $mə^{24}wa^{54}$ 针对性别为母性的猪，是“母猪”的统称，与 $p^ha^{55}wa^{54}$ “公猪”对立，而 $p^ha^{24}ma^{55}$ 只表示已经生了小猪的母猪。以下图 10 是“母猪”一词在东旺藏语及其周边土话中的分布情况：



图例¹⁰：

A=*phag ma* 类：A1= p^hama /类；A2= $p^hamə$ /类；A3= p^hama /类；A4= $p^ha:mo$ /类；

B= $mo wa$ /类；

C= $p^ha ji ma$ /类；

D= $ji ma$ /类；

E=*mo phag* 类

图 10：东旺藏语与周边土话的“母猪”

¹⁰ 图例的分类及其形式可以参考 Suzuki (2019:46-48)。

此语言地图中,“母猪”总共有 5 种语音形式(A 至 E),形式 A ($p^h a^{24} ma^{55}$) 在东旺藏语的所有土话点中都使用,同时位于东旺乡南面的香格里拉土话中也占多数。形式 B ($mə^{24} wa^{54}$) 在东旺藏语的少数土话点中出现,与形式 A 共存(地图上未标出)。 $mə^{24} wa^{54}$ 主要分布在东旺乡北部的四川省乡城县内。地图直观显示,A 形式 ($p^h a^{24} ma^{55}$) 在迪庆州内分布范围广,为主要形式,而 B 形式 ($mə^{24} wa^{54}$) 是四川乡城藏语及东旺藏语的共同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p^h a^{24} ma^{55}$ 中的“ ma^{55} ”和 $mə^{24} wa^{54}$ 中的“ $mə^{24}$ ”同是表示性别的词缀,但在复合词中它们的位置却出现了一前一后的现象。

从上文对图 4、图 6、图 8、图 9、图 10 的分析来看,东旺藏语与隶属于四川省的乡城、得荣等土话点的语音极其相似,这种相似值已经超过了与同属于云南迪庆州的各周边土话间的相似值。东旺乡位于川滇边界,和乡城、得荣县互相接壤,这也印证了语音的相似或差异性与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七、结语

本文针对性探讨的五个具体词即“酥油”“你”“有”“二”和“母猪”并非是笔者随机选取,而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些词都属于藏语固有基本词汇;二是避免涉及的词类太过单一,所以包括名词、代词、动词和数词等;三是它们体现的语音差异在东旺藏语中本身具有代表性。根据上文对这五个词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特征:

1. 东旺乡虽然是一个藏族聚居的自然小乡,但乡内各个自然村的语音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系统的对应关系。其差异主要与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有关,具体表现在南面和北面(东旺河上游和下游)、河谷区和高山区之间的差异。
2. 东旺藏语内部虽然存在语音差异,但不同的语音形式基本都能与藏文的同一种形式对应,这就说明了东旺藏语内部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历史演变。
3. 东旺藏语的语音面貌与其北部的乡城藏语、得荣藏语及东南部的香格里拉各土话之间都呈现出一些相似性,但明显与乡城藏语的相似值更高,关系更加密切。

总的来说,东旺藏语内部的语音差异与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不一定是导致语音差异的直接原因。东旺乡内,海拔较高的自然村位于高山区,地理位置偏远且封闭,与外界的联系较少;海拔较低的自然村位于河谷区,地理单元较为开放,与外界的距离更近,是高山区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设想高山区的语音面貌保留了更多古老特征,而河谷区的语音面貌受乡外语言的影响多,且发展和变化得更快。

值得关注的是,在东旺藏族的认知中,一般河谷区的语音面貌显得更加简单或时尚,是被高山区的藏族所模仿的对象,尤其是当下出门较多的高山区年轻群体,往往操着一口河谷区的话。相反,河谷区的人们对高山区的话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屑甚至嘲讽的态度。因此,高山区的语音面貌趋近于河谷区是否会成为东旺藏语的一种整体发展趋势?有待将来

再观察。另外，本文只是初步描写分析，还有待日后继续做更系统深入的研究来阐述造成东旺藏语语音变异及差异的原因和背景。

附记：本文初稿已在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地理学学术沙龙（2019 年 4 月）以及第 52 届国际汉藏语研讨会（2019 年 6 月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上宣读。本研究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 A “阐明藏文化圈东部的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JP17H04774）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B “利用高精度广域地图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多语言地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JP18H00670）的阶段性结果。

参考文献

-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 2001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 格桑居冕 1964 《藏语方言概论》（油印本）中央民族学院
-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 《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
- 闵江海主编 2001 《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志》深圳汇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8 〈迪庆藏语是康巴藏语中的“一个”次方言吗？〉《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3 期 6-1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824.2008.03.002>
- 铃木博之[Suzuki, H.] 2009 〈川西地区“九香线”上的藏语方言：分布与分类〉《汉藏语学报》第 3 期 17-29.
- 鈴木博之[Suzuki, H.] 2018 「香格里拉市北部のカムチベット語諸方言の方言差異とその形成」『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5: 5-63. doi: <https://doi.org/10.15026/92458>
-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9a 〈利用语言地图阐明音变的扩散和界限：以香格里拉藏语的“r 韵尾”语音演变为例〉铃木博之、仓部庆太、远藤光晓主编《东亚地理语言学论文集》1-13.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6_eastern_asian_2019.pdf
- 铃木博之[Suzuki, H.] 2019b 〈《藏拉法词典》（1899）收录的动词 snang 的口语用法及其来历〉《南开语言学刊》第 2 期 155-160.
- Bartee, E. L. 2007. A Grammar of Dongwang Tibet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 Suzuki, H. 2008. /l/ - /j/ interchange in Shangri-La Tibetan. Paper presented at 4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 Suzuki, H. 2016. In defense of prepalatal non-fricative sounds and symbols: towards the Tibetan dialectology. *Researches in Asian Languages* 10, 99-125. <http://id.nii.ac.jp/1085/00002195/>
- Suzuki, H.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list of Yunnan Tibet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 2019. How Tibetans classify pigs in their languages in the eastern Tibetosphere: Revisiting the pig issue through geolinguistics. In H. Suzuki, K. Kurabe, and M. Endo (eds) *Papers from the Workshop “Phylogeny, Migration, and Contact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Human Groups”*, 40-53.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7_phylogeny_dispersion_contact_2019.pdf

Tournadre, N. & H. Suzuki. 2021.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Xavier Becker and Alain Brucelle for the cartography). LACITO Publications (CNRS).

Zhang, J. 1996. A sketch of Tibetan dialectology in China: classification of Tibetan dialect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5.1, 115-133. doi: <https://doi.org/10.3406/clao.1996.1496>

附录：东旺乡人文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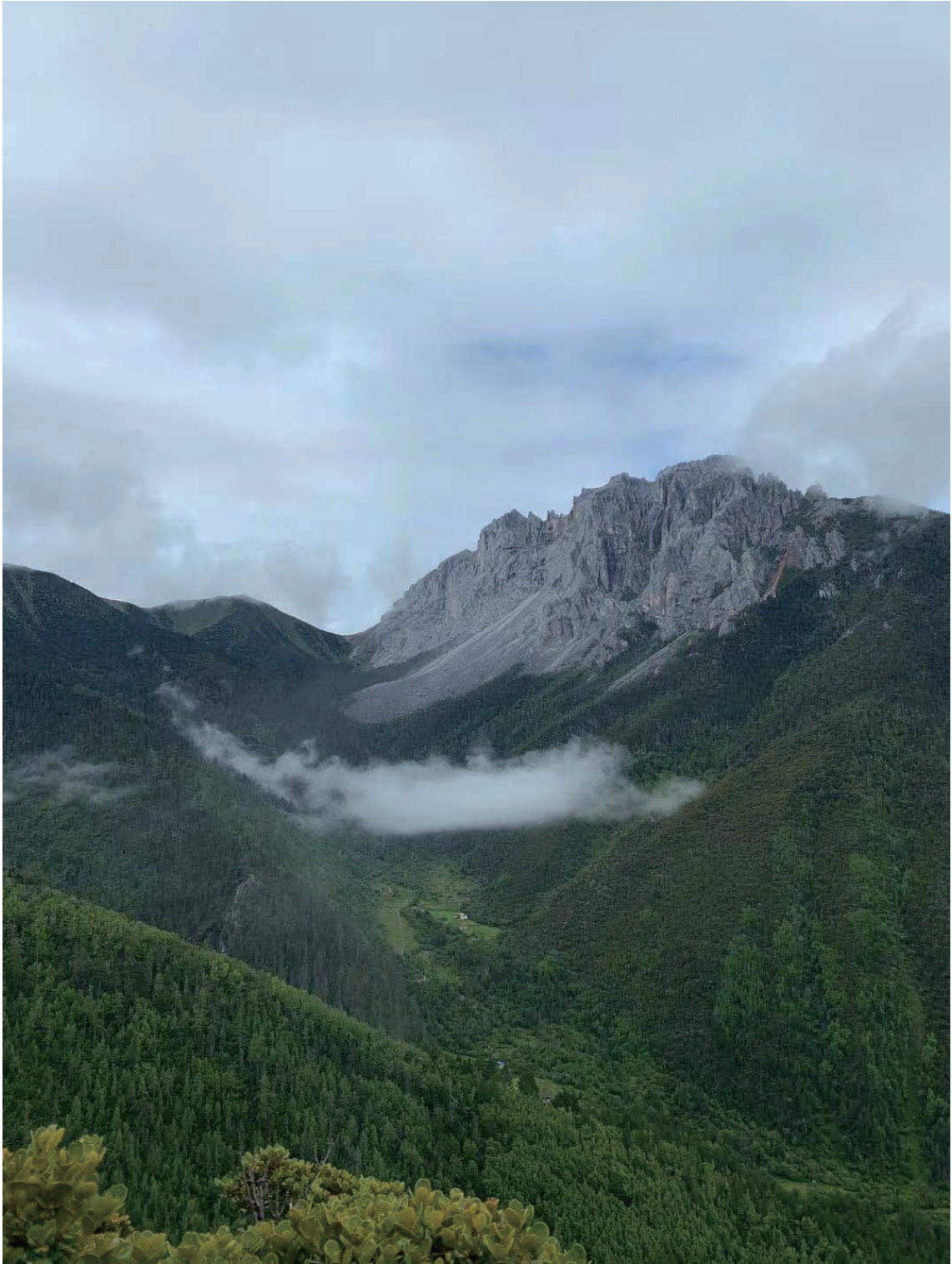
此附录旨在读者方便了解到东旺乡的自然地理结构与人文地理环境的情况。由于本文地图不够表达出其地形的原因，在此补上六张照片介绍东旺乡藏族人文环境。



附图 1：东旺乡新联村火茸小组，远离东旺河，位于高海拔山区，气候较寒冷。该小组生产方式为半农半牧，一年一季产（2020 年） 次林央珍 摄



附图 2：东旺乡新联村火茸小组的春季牧场，海拔比村庄高（2016 年） 次林央珍 摄



附图 3：东旺乡新联村火茸小组的冬季牧场，海拔最高（2020 年） 次林央珍 摄



附图 4：东旺乡跃进村格落小组，位于东旺河岸低海拔河谷区，该小组生产方式以农业为重，一年两年季产（2018 年） 次里拉姆 摄



附图 5：低海拔河谷区的秋收季（2020 年） 次里拉姆 摄



附图 6：依山而傍的低海拔河谷区村庄（2019 年） 次里拉姆 摄

Linguistic maps of gTorwangrong Tibet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varieties

Tshering Yangdr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iroyuki Suzuk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geolinguistic methodology to draw linguistic maps with 31 hamlets, or vernacular points, in gTorwangrong Township. No previous ge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Tibetic languages exists with the hamlets in a given township. The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of five words: (a) butter, (b) you (second person singular pronoun in absolutive), (c) exist (existential verb in egophoric), (d) sow, and (e) two.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five words are found mainly between the river valley and high mountainous areas and relate t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altitude.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Torwangrong Tibetan and surrounding vernaculars and their phonetic differences by drawing linguistic maps.

壮语“山”的语言地图及解释

鄢卓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山在大多数壮语中有石山和土山的区分。本文通过绘制现代壮语方言“石山”“土山”的词形分布图，对其各种词形进行分析解释，发现壮语“山”的词形往往与其边缘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有关。并结合侗台语族其他语言“山”的词形状况推定其历史层次，认为云贵高原边缘地带经历了 $*do:i^1 \rightarrow po^1$ 的词形更迭，而其他壮语方言区的词形表现是 $*do:i^1 \rightarrow pla^1$ （石山）， $*do:i^1 \rightarrow do:i^1$ （土山）“妥协-分担”型同义冲突的结果。另外，通过清代壮汉译语记载“山”词目的考察，推定 pla^1 从“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在清乾隆年间已经在宜州、德保完成；通过对旧志语料的观察，推测壮语“山”晚近以来词形变化不大，但也有词形更替的发生。

一、前言

本文壮语“山”一词的材料主要来源：《壮语方言研究》（1999）中的36个方言点，《广西民族语言方音词汇》（2008）忻城、贺州、三江、宾阳4个方言点以及笔者2017年11月、2019年11月调查的巴马、鹿寨、大化、马山、西林、隆林、那坡、天峨、乐业、桂平10个方言点¹，总计50个壮语方言点。

壮语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其次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这一区域内，山区面积广大，依据山的不同性质，区分作土山和石山。石山、土山大致表现如下图：



（石山）

¹ 笔者2017年11月、2019年11月于广西民族大学共采集到39个壮语方言点材料，其中有8处重复，故记31处，其中部分方言点与原有材料重复，故遴选10点作为说明材料。另据调查结果对与原材料重复点的语料有所增添补充。



(土山)

调查过程中，上林、贵港覃塘的发音人明确表示，在当地石山和土山是一定要区分的，“石山不长东西，土山长东西”“石山就是峭壁样的那种，土山是有草木的那种”。靖西果乐的发音人表示，在他们那里山都叫“phja¹”，没有石山、土山的区别。而平果的发音人表示，他们对石山、土山也不作区分，都称作“do:i¹”，如果一定要区分，可以称石山作“rin¹do:i¹”。因此，针对“山”这一概念，不同的方言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采取从分的原则，部分不区分石山、土山的方言点，以石山和土山为相同词形处理。

在大部分壮语方言点，“山”一词分别包含对应“土山”和“石山”两个下位意义，以武鸣壮语为例，石山作“pla¹”，土山作“do:i¹”。

关于“pla¹”，李方桂（[1977] 2011: 79）根据台语支各方言的表现构拟原始台语声母*phl-/r-。梁敏、张均如（1996: 78、454）认为侗台语的送气声母是后起的，源自前置辅音消失对后接辅音的影响，故而构拟古复辅音声母*xpl-。就现代壮语方言来讲，复辅音声母在武鸣等方言点得到保留，表现为 pl-，而多数地区已发生前腭化、后腭化的音变，即作 pj-/py-，田东、巴马发生 pj->te-/tj-的后继音变，也有部分地区流音-l-发生脱落，读作 p-。南部方言则对应为送气声母，或保留复辅音声母，作 phl-，或发生腭化作 phj-，或脱落流音-l-，作 ph-。由于壮语方言各地的对应演变关系是明确的，为了下文的简洁表述，在这里我们统一作 PL-，壮语使用此声母形式的“山”统一记作 pla¹。从侗台语看，“pla¹”这个词形在大部分语言中表示“悬岩、岩石”或者“石头”，如：

pja¹ 侗语 pja¹ 莫语 pha¹ 泰语 pha¹ 老挝语 pha⁶ 德宏傣语 phra² 石家话

而在壮语中指“山，石山”。金理新（2012: 293）指出壮语武鸣的 pla¹ 原本意义是“岩石”。结合整个语族的词形状况，我们推测是壮语中的“pla¹”发生了从“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

关于“do:i¹”，d-声母的实际音值为ʔd-，在部分地区表现为 l、n 语音变体，为了简明，壮语使用此声母形式的“山”也即记作 do:i¹。“do:i¹”词形在其他台语支语言中是山的泛指统称，如：

do:i¹ 泰 loi¹ 掸语 loi⁶ 德宏傣语 doi¹ 西双版纳傣语 ro:i¹ 石家话 doi¹ 老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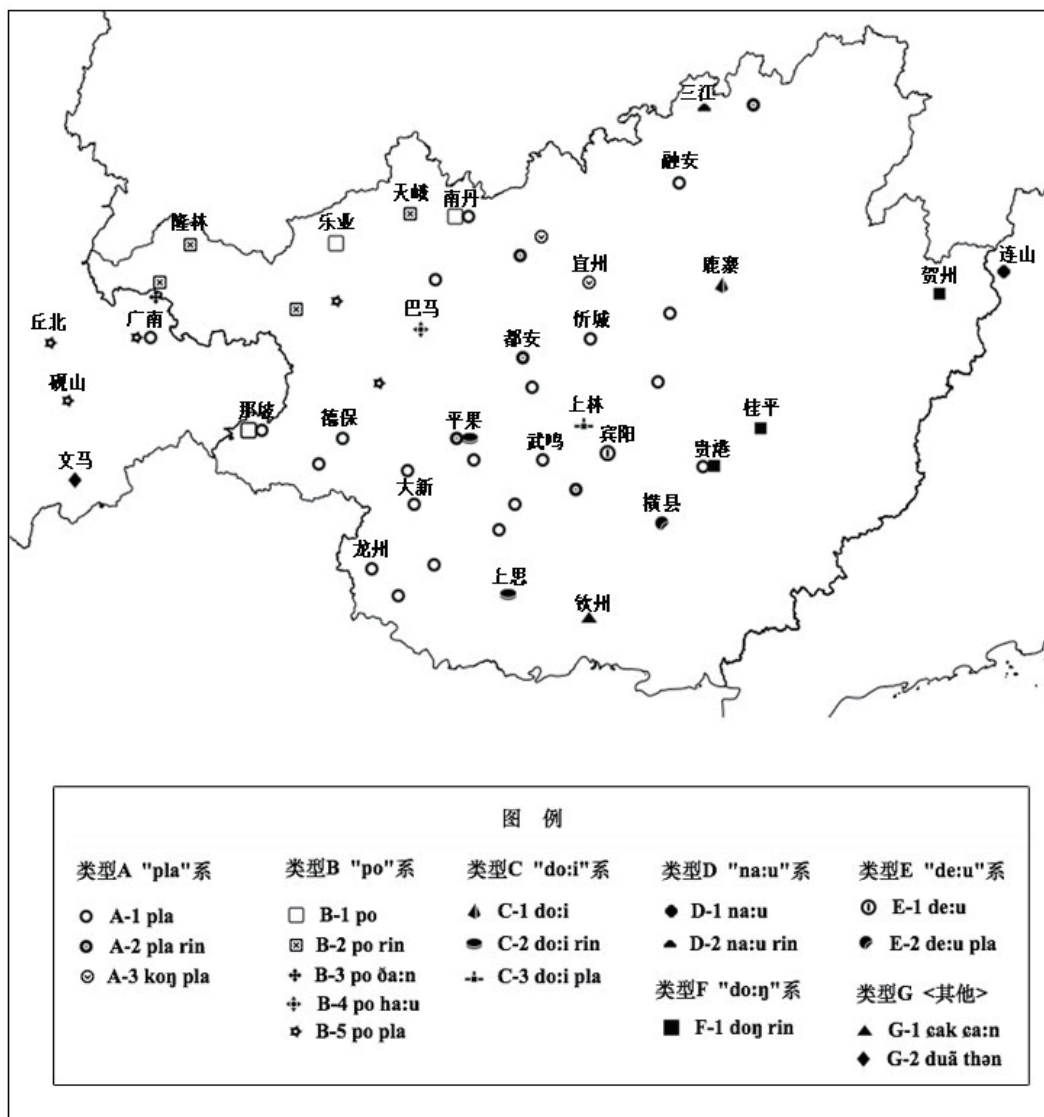
而在壮语中主要指示“土山”。结合台语支的词形状况，推测是壮语中的“do:i¹”发生了“山→土山”词义缩小。

二、壮语“山”的方言地图及解释

2.1 壮语石山的地理分布及解释

根据词根的不同可将壮语方言的“石山”分为“pla”系、“po”系、“do:i”系、“na:u”系、“de:u”系、“do:ŋ”系、<其他>7种类型，分别对应图例中的A、B、C、D、E、F、G类，又根据“石山”词形类别内部的实际表达，依合成词的不同词素组成将其分为若干小类，大致如下图：

图 1：现代壮语方言“石山”词形的地理分布图



2.1.1 类型A—“pla”系

从图 1 来看，类型 A “pla”系是分布最为广泛的类型。其中 A-1 单语素的 pla¹ 在南、北部方言均有分布，且以南部方言区较为集中，以合成词形式出现的 pla¹ rin¹、de:u⁵ pla¹、koŋ⁵ pla¹ 则全部分布在北部方言区。A-2 pla¹ rin¹ 中 rin¹ 即“石头”，rin¹ 在壮语南北部方言中的表现不同，北部方言表现为奇数调 r 音类的变体，南部方言读为送气声母 th-，在此我们不做过多阐述，以 rin¹ 形式兼指壮语南北部方言的“石头”。pla¹ rin¹ 即

pla¹ 添加语素“石头”组成的复合词。pla¹ 在部分壮语中泛指“山”，pla¹ rin¹ 是词义明确化的表达。“石山”在有的方言点也叫 rin¹ pla¹，是与 pla¹ rin¹ 词素相同、词序不同的词形，壮语偏正式定中结构的语序是定语后置，pla¹ rin¹ 形式为壮语固有构词语序的词形，rin¹ pla¹ 是受汉语构词影响定语成分前置的结果。A-3 koŋ⁵ pla¹ 中的 koŋ⁵ 是分类词“座”，在宜山、来宾作 kwa:n⁵，相当于壮语一般名词前 ʔan¹ 的功能，而在相当多的壮语方言中，“石山”的分类词与一般名词一样，都是 ʔan¹。

2.1.2 类型 B—“po”系

“po”系主要出现在桂西北以及云南境内的壮语方言。B-1 po¹ 是汉语“坡”的借词，且从第一调整齐的调类对应来看，确定为老借词，与中古汉语存在整齐的对应规律。“坡”为送气的“滂”母字，而壮语北部方言没有送气声母，借词适应当地的音系特征，读作不送气的 po¹。南部壮语方言区本身是存在送气声母的，汉语送气声母“滂”母字的借词“派”，“透”母字的借词“炭”，“溪”母字的借词“快”，在南部壮语方言分别作送气声母 [ph-]、[th-]、[kh-]，但“po¹”一词与北部方言一致，读作不送气的双唇清塞音声母，由此我们认为南部方言区使用的“po¹”一词应转借自北部方言，是词汇浸染的结果。B-2 po¹ rin¹ 与 pla¹ rin¹ 构词一致，只是更替变换了词根。B-3 po¹ ɔ̃a:n⁴ 中 ɔ̃a:n⁴ 为“山”的新借词形式，po¹ ɔ̃a:n⁴ 属同义联合构词。B-4 po¹ ha:u¹ 是巴马的词形，ha:u¹ 是“白色”的意思，构词理据大概是因为石山因为石头裸露而呈现白色。B-5 po¹ pla¹ 词形的形成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 pla¹ 保留原始“岩石”义，用作定语；同时也存在 po¹ pla¹ 并列构词的可能。但是 po¹ pla¹ 出现在砚山壮语中，砚山壮语中的“pla¹”为“石头”义，天峨、广南_南的发音人也表示在当地壮话中“pla¹”保留“山岩、悬岩”的意义。另外，与石山对举的土山在各方言点表达为 po¹ na:m¹，na:m¹ 为“泥土”义，故而认为 po¹ pla¹ 中 pla¹ 为修饰成分。由此确定桂西北、云南一带出现的 po¹ pla¹ 词形中 pla¹ 均为古老的“岩石”义。

2.1.3 类型 C—“do:i”系

“do:i”系词形零星分散在壮语方言区中。一般来讲“do:i”词形在壮语方言中往往指示土山，而在这里，使用单语素“do:i”的方言点的发音人表示，石山和土山是不作区分的，以“do:i”统称山，这与傣、泰语言中“do:i”的用法是一致的，关于新旧层次问题，我们下文再做分析。C-2 do:i¹ rin¹、C-3 do:i¹ pla¹ 则是具化识别“石山”的精确化表达。

2.1.4 类型 D—“na:u”系

“na:u”系词形仅出现在连山、三江两个方言点。我们推测 na:u⁴ 可能是借自汉语方言的“坳”，但是“坳”在连山一带的粤方言中读作 ŋau 或零声母的 au，且当地壮语方言中存在 ŋ-声母，由此，这种推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清楚当地是否存在后鼻音 ŋ-向 n-演变的倾向。壮语中存在分布区域狭窄的词，这些词在地域上的分布达不到方言词的标准，梁敏、张均如（1999：314）定义其为土语词，na:u⁴ 即属于这种类型。

2.1.5 类型 E—“de:u”系

类型 E-1 de:u⁵ 为宾阳壮话的表达形式，de:u⁵ 在壮语方言中本指“山坳（狭窄的山口），山间的平地”，在这里 de:u⁵ 实现了“山坳→石山”的语义转移。E-2 de:u⁵ 与 pla¹

组合，有两种构词可能，其一是 pla^1 保留原始“岩石”义，作为修饰成分；其二存在 $de:u^5$ 和 pla^1 并列构词的可能。结合语序位置关系，认为 pla^1 作修饰语的可能性更大。

2.1.6 类型 F—“do:ŋ”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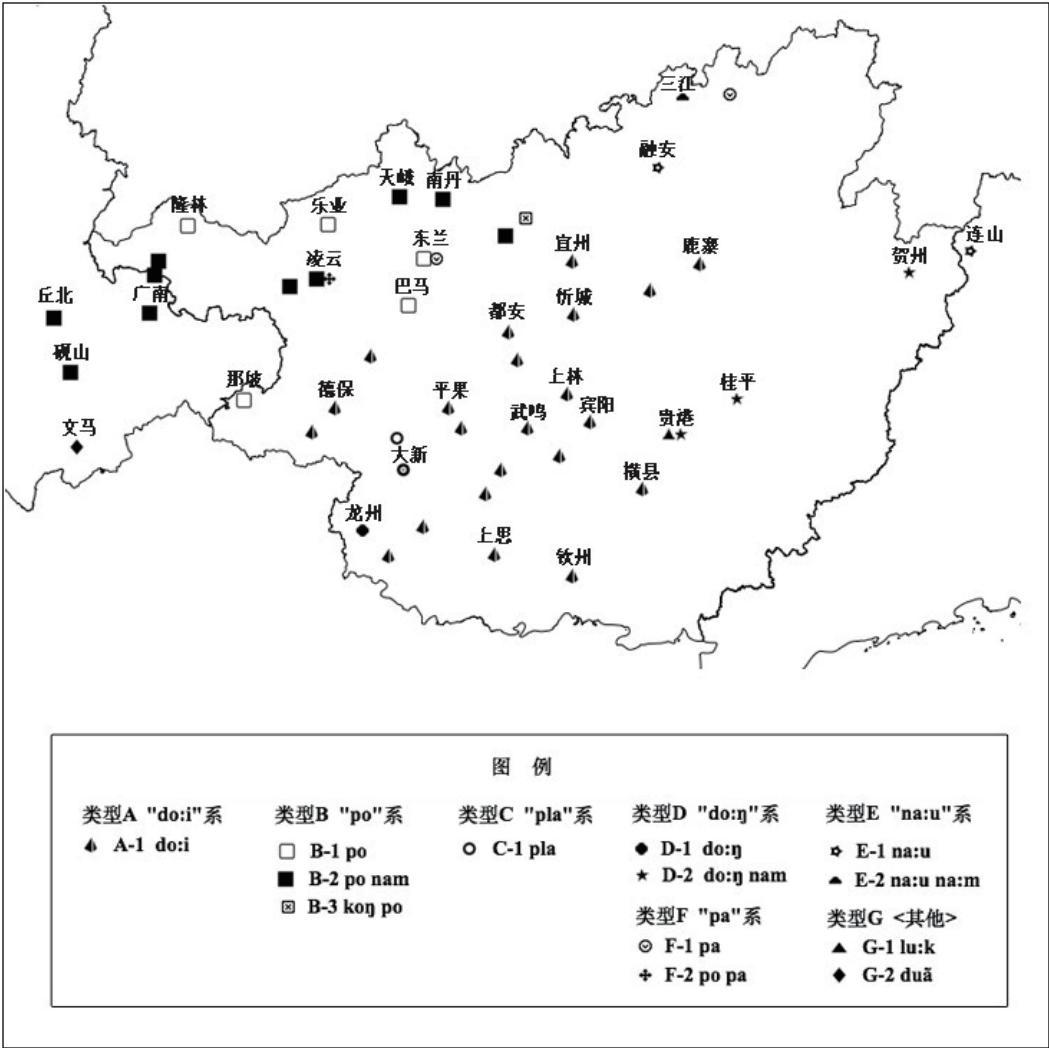
类型 F “do:ŋ¹ rin¹” 连续分布在桂东三个方言点，在桂平词序表现为 $lin^1 lo:ŋ^{12}$ 。do:ŋ¹ rin¹ 中的 do:ŋ¹，在壮语方言中指“森林、树林”，而在贵港、桂平、贺州壮语中转指“山”，山上多有树木，以特征泛指本体。根据 Gedney (2008: 178) 的记录，这种转指在大新、天等、宁明也有发生，转指山丘，有意思的是这种转指采用了变调手段以区别不同意义，do:ŋ¹ 指森林，do:ŋ³ 指山丘。

2.1.7 类型 G—<其他>

<其他>的词形有两种，G-1 $eak^8 ca:n^1$ 为钦州的表达形式，整个词条源自粤语借词， eak^8 、 $ca:n^1$ 分别对应白话的石、山。G-2 $duā^1 rin^1$ ($thən^1$)， $duā^1$ 与上文的 $na:u^4$ 一样，为分布范围较狭的文马土语词。

2.2 壮语土山的地理分布及解释

图 2：现代壮语方言“土山”词形的地理分布



² lin^1 、 $lo:ŋ^1$ 分别是 rin^1 、 $do:ŋ^1$ 的变体形式。

三、壮语“山”的新旧词形层次及成因分析

图 3: 现代壮语方言“石山”归纳词形分布图



图 4：现代壮语方言“土山”归纳词形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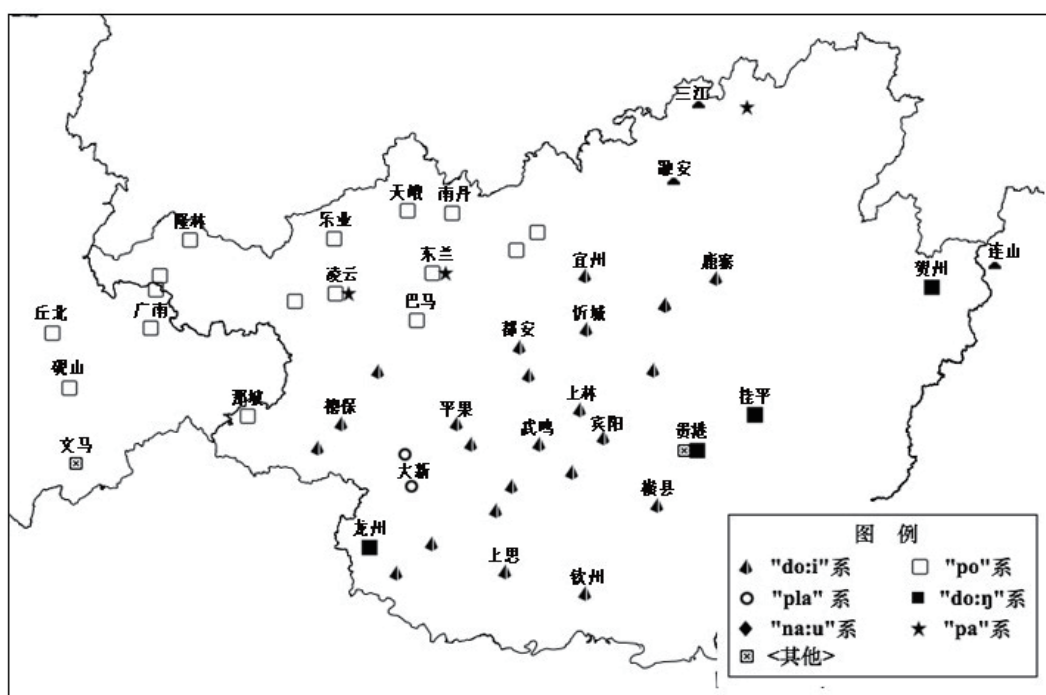


表 1：现代壮语“石山”“土山”词形占比

现代壮语方言 50 点差异统计比例 ³		
词义	石山	土山
主流词形 >70%	“ pla ”系（28 个点，占 51.0%）	“ do:i ”系（23 个点，占 43.4%）
	“ po ”系（14 个点，占 25.4%）	“ po ”系（16 个点，占 30.2%）
非主流词形 <30%	“do:i”系（4 个点，占 7.3%）	“pla”系（2 个点，占 3.8%）
	“do:ŋ”系（3 个点，占 5.5%）	“do:ŋ”系（4 个点，占 7.6%）
	“na:u”系（2 个点，占 3.6%）	“na:u”系（3 个点，占 5.6%）
	“de:u”系（2 个点，占 3.6%）	“pa”系（3 个点，占 5.6%）
	<其他>（2 个点，占 3.6%）	<其他>（2 个点，占 3.8%）

根据分布图及占比统计，现代壮语方言“石山”“土山”的“do:ŋ”系、“na:u”系、“de:u”系以及<其他>词形为壮语“山”的次要形式，在此，我们不做特殊分析，而对主流的“pla”系、“po”系、“do:i”系的新旧层次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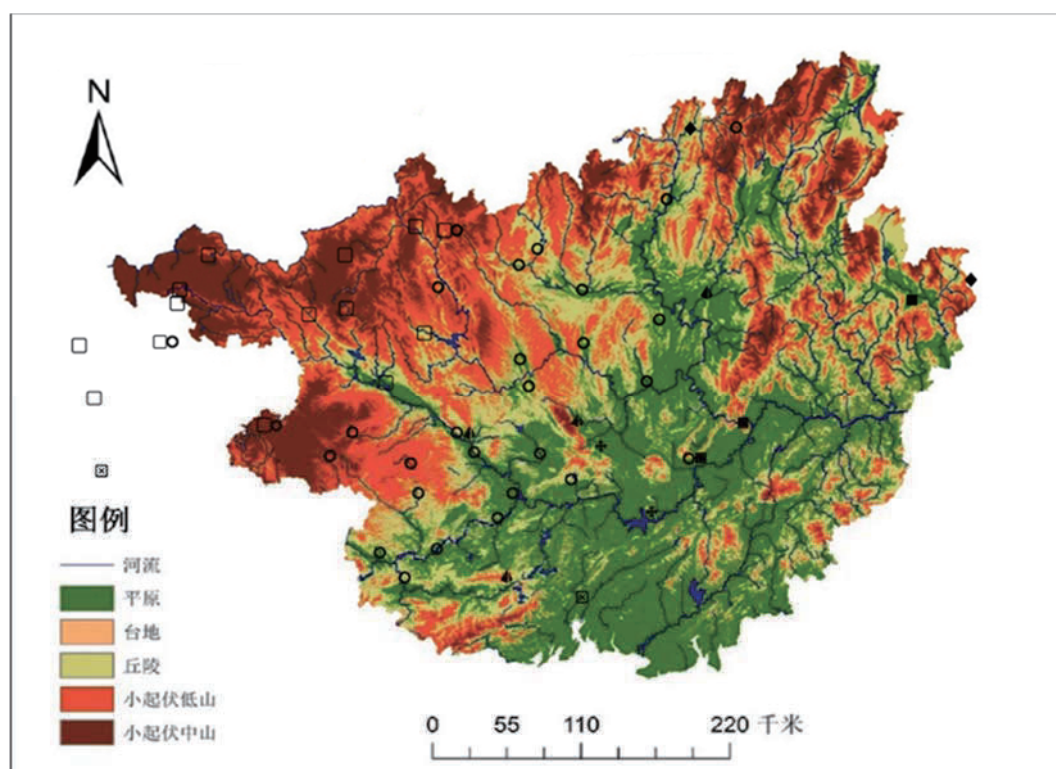
结合同语支傣、泰语言的情况，do:i¹在台语支的西南支、中支、北支均有指示“山”这一上位概念的用法，根据同语支的相同词形表现，推测 do:i¹为原始台语“山”的早期形式，泛指石山、土山，平果、鹿寨壮语方言的 do:i¹为早期形式的保留。

根据图 3、图 4 的对比，我们发现“石山”“土山”的“po”系的分布区域大致是一致的，也即上文提到的桂西北以及滇桂交界地带，那么为什么“po”系会集中出现在

³ 因为包含重复的情况，“石山”我们实际计算方言点数为 55 点，“土山”我们实际计算方言点数为 53 点。

这一区域呢？对此我们进行地理上的透视，将“石山”的分布图与广西的地形图⁴进行重合对比，得到这样的图示：

图 5：广西地形与壮语“石山”词形重合对比图



明显的，壮语“石山”的“po”系词形集中分布在小起伏低山和小起伏中山密集连续分布地带，这一区域正为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地形图没有覆盖的云南广西交界地带同样地处高原的边沿地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处高原黔南一带的布依语同样称“山”作 po¹，形成了云贵高原的“po”系区域。这一地带山势连延起伏，地形自然坡度大，世居云贵高原边缘的壮族人民深居群山之中，在主观认知中群山的相对海拔高度被削减，相较于平原丘陵地带，山势不显突兀，山体凸显度降低。在这一区域山即为坡，坡即为山，故借词“po¹坡”进入后，与当地地形契合，成为强势词形，占据这一区域，成为指示“山”这一概念的主导词形，我们这一推测得到了乐业发音人的认可。上文提到，在“po”系区域，当地壮话中的“pla¹”大多保留“山岩、悬岩”的意义，由此认为，在主体区域未曾发生过“pla¹”对“山”概念意义的占位，而广南_南、那坡 pla¹的“石山”义推测是桂西 pla¹词形外缘深入的影响。“po¹坡”为中古借词，借入后与固有词 do:i¹发生同义冲突，“po¹坡”形式强势，加之地形因素的影响，取代了 do:i¹词形，成为后继词形，也即 *do:i¹ → po¹。有意思的是，东兰、天峨的发音人表示，在当地方言中还保留 do:i¹，但已很少使用，可指示“上坡的路、石阶”或指示“斜坡”本体。就“山”的意义来说，po¹已完成对 do:i¹的替代；就“坡”的意义来说，po¹与 do:i¹发生了词义的置换。

⁴ 该地形图引用自广西师范学院罗凤伦硕士毕业论文《GIS 支持的广西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分析》

pla¹是壮语“石山”的主要表现形式，与 po¹在地理分布上呈互补分布，与 do:i¹在词义分布上呈现互补分布，分别指示石山、土山。已明确 do:i¹是同时包含石山、土山的“山”的早期形式，pla¹发生“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后，发生同义冲突，do:i¹、pla¹两种词形势均力敌，发生妥协，分担意义及用法，pla¹指示石山，do:i¹指示土山，岩田礼（2009：25）将这种“妥协-分担”的同义冲突比作共时音位学上的条件变体。在天等、大新，pla¹进一步扩大势力，do:i¹形式被消灭。就“石山”词形的新旧层次来说，*do:i¹→pla¹。另外，我们注意到，在仡佬语、水语中，pla¹也有指示石山的用法，但考虑到整个侗台语支 pla¹“岩石、山岩”意义的均衡保留，词义变化基本都是单向的，由此推测壮语、仡佬语、水语中的 pla¹完成“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是平行的创新。吴安其（2017：524）指出亚欧语言“石头”“岩石”“石山”“沙砾”“沙子”等有词源关系，如《释名》，“山体曰石”。可见这种词义转移是很容易发生的。

由此，关于桂西北及滇桂交界一带石山、土山*do:i¹→po¹，其他地带“石山”*do:i¹→pla¹的层次关系梳理清楚了，那么 po¹与 pla¹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坡 po¹”的借入时代与 pla¹发生词义转移的时代哪个更早呢？我们尝试做出如下分析：“坡 po¹”的借入时代为中古时期，据此，po¹借入完成“山”的占位确定发生在中古以后，而 pla¹何时发生词义转移不好判断，能追溯到的关于壮语“山”的广西旧志材料为清代材料，广西壮语地名的记录也有不甚精确的地方，另外也很难追溯年代。而事实上，我们可以将石山*do:i¹→po¹，*do:i¹→pla¹处理成两条词义演变规则，*do:i¹为底层形式，考虑到 pla¹的广泛分布，*do:i¹→pla¹的演变环境是自由的：

R1: *do:i¹→po¹/ _____ 云贵高原边缘

R2: *do:i¹→pla¹/ _____ 无限制条件

我们尝试将两条规则排序，如果 R2>R1，小起伏山地连续分布地带的石山则也会发生 do:i¹→pla¹的词形转移，“po”系地带也会被 pla¹占领，从一定程度上 R1 被阻断，而在桂西北一带“po”系呈整齐区域分布，pla¹往往保留“悬岩、岩石”义，可见未曾发生 pla¹“岩石→石山”的大规模占位。如果 R1>R2，则与现代壮语石山的分布形态大致相符。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推测，壮语 pla¹大量发生“岩石→石山”的时代晚于 po¹的借入时代。但是，从地理事实出发，桂、黔交界地带，低山起伏。天峨、乐业发音人均表示他们一般不区分土山和石山，石山比较少，与天等一带典型的石山有较大的差别。由此也可以认为这样的地理环境使 pla¹失去了发生“岩石→石山”词义转移的条件，也就是说，*do:i¹→po¹，*do:i¹→pla¹两种演变可以是互不干涉、互不矛盾的。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从地理事实观察到的结论，进而推测云贵高原的地形是造成现代壮语“石山”“土山”词形分野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事实上很多壮语方言使用“po¹”一词，但具体的所指有所差异，在桂西北一带指示山，而其他壮语方言保留汉语的意思指土坡，未进入“山”的核心语义。总结归纳如下表：

表 2：壮语“山”词形的历史变化简表

台语 早期形式	分布区域	石山、土山 语素异根	现代壮语词根表达	词形更迭
*do:i	云贵高原中、低 山连续分布带	-	石山、土山、土坡: po ¹	*do:i → po ¹ → (pla ¹ 那 坡、广南 _南)
	其他	+	石山: pla ¹ 土山: do:i ¹ 土坡: po ¹	*do:i → pla ¹ (石山) ↓ do:i ¹ (土山) 借词 po ¹ 外缘化

四 清代民国壮语“山”的词形探讨

上文通过现代壮语方言“山”词形分布,对新旧层次及词形更迭的成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的清代乾隆年间(1748—1750)广西三种“华夷译语”以及广西旧志可以对当时的词形情况有一个简单的认识。但“山”的词形状况仅在《广西庆远土司译语》《镇安府属土州县司译语》两册译语中得到保留。

表 3：现代壮语方言与清代壮汉译语对音汉字读音对应情况

词义	门类	古壮字	清代音译汉字	现代壮语方言	现代汉语方言
山	地理门	𪔐	八(庆远府,宜州)	宜州洛东 pja ¹	洛东平话 pat ⁴³ 雒容官话 pa ³¹
	地理门	𪔐	巴(镇安府,德保)	德保马隘 phja ¹	田东平话 pa ⁵⁴ 柳州话 pa ³³

“庆远译语”注音汉字为“八 [p-]”,现代壮语方言为 pja¹,而汉语方言中没有 pja 这样的音节,由此采用了音近记音的手段。“镇安译语”中注音汉字为“巴 [p-]”,对应德保壮语的 phja¹,存在不音和的现象。这有两种可能性:(1)这里的“巴”的对音可能是上文提到的壮语本族词“土坡 pa⁵”的注音,270 年前的德靖土语区可能使用“土坡 pa”词形指示“山”的意义。但是根据古壮字来看,“𪔐”在诸多壮语方言中出现,且常常出现在地名中,用于记录山“p(h)la”,而壮语“土坡 pa⁵”的古壮字为𪔐,由此根据壮字的形式判断,可能性不大。(2)通过对“镇安译语”的整理,发现注音汉字“巴”出现了两次,分别对应德保壮语的“山”和“鱼”⁵两个词条,这两个词的壮语读音在今德保壮语中恰巧是 [+送气] 区别特征的最小对比对。在《镇安府志》(1892)方言附中记载小镇安土司(那坡县)“山”一词用“霸 [p-]”记录,声母同样是不送气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确定在译语时期“山、鱼”两词的声母均读作不送气,另外结合译语其他送气声母的对音来看,是整齐对应的。用声母不送气的注音汉字对应声母送气的壮语很可能是因为汉语不存在 pja 和 phja 音节,只能用听感上接近的 pa 音节注音造成的。这种壮语读音与注音汉字读音在送气与否问题上不一致的情况在“庆远译语”中也存在,如:用“怕”给“pja¹ 鱼”注音。由此认为,当汉语中没有的 pj、phj 等复辅

⁵ 鱼 饮食门 𪔐 巴(镇安府,德保) 德保马隘 pja¹ 田东平话 pa⁵⁴ 柳州话 pa³³

音音节时，很可能出现用汉语送气声母对应壮语不送气声母或用汉语不送气声母对应壮语送气声母的情况。

根据“庆远译语”“镇安译语”的对音来看，可以确定 pla^1 从“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在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宜州、德保完成。

广西旧志中也有关于壮语方言“山”的记录，可以帮助大致了解当时的词形状况

表 4：广西旧志记载“山”

词义	县志名称	年代	注音	现代壮语方言
山	《平南县志》	光绪十年（1882 年）	堆	$pra^1/do:\eta^1$ （贵港）
	《隆安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𡵚（读如巴）	$phla^1$ （隆安）
			岭曰𡵚（去声）	$do:i^1$ （隆安）
	《凌云县志》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	破ㄅㄛ（po）	po^1 （凌云）
	《上林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𡵚（音累）	$do:i^1$ （上林）
	《桂平县志》	民国九年（1920 年）	堆	$do:\eta^1$ （桂平）
	《邕宁县志》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𡵚（即堆字）	$do:i^1$ （邕北）

从广西旧志可以了解到，清末民国至今，壮语“山”的词形变化不大，相较现代壮语无太大差异。旧志中平南、贵港壮语中“山”的代表词形 $do:i^1$ ，而现代词形为 $do:\eta^1$ ，推测发生 $do:i^1 \rightarrow do:\eta^1$ 的词形替换可能是晚近发生的事。隆安属壮语南部方言区，有送气声母系统，但是注音为“𡵚 [p-]”，由于材料限制，我们不能了解县志的记音标准，推测《隆安县志》中记录的“𡵚”可能与“镇安译语”相似，可能为“石山 $phla$ ”的音近记音。

五、结语

根据壮语同语支语言“山”的形式、现代壮语“山”的地理分布差异、清代壮汉译语材料以及民国时期广西旧志的语言材料，可以了解壮语“山”的词形及其更替情况。做出如下结论：

（1）山在大多数壮语中有石山和土山的区分。归纳来看，壮语“石山”“土山”词形主要由“ pla ”系、“ $do:i$ ”系和“ po ”系组成。结合侗台语同语族语言观察，“ pla ”系是壮语发生“岩石、山岩”→“石山”词义转移的结果；“ $do:i$ ”系为原始台语“山”的早期形式，而在壮语方言中多指示土山，“土山”义是与“ pla ”系竞争妥协一分担意义后的部分保留，从词义变化上讲“ $do:i$ ”发生了“山”→“土山”词义范围的缩小；“ po ”系来自老借词“坡”，是语言接触造成的外来词占位。总体来讲，壮语“山”的词形形式较多，往往包含与“山”相关的边缘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2) 壮语“山”的“po”系词形集中分布在桂西北及滇桂临接地带,与云贵高原边缘的小起伏中、低山连续分布带形成区域性重合,是“地理事实决定语言现象,语言现象反映地理事实”的真实写照。

(3) 就“山”主流词形的新旧层次来说,云贵高原中、低山连续分布带经历了*do:i→po¹→(pla¹那坡、广南_南)的词形更迭,而其他壮语方言区的词形表现是*do:i¹→pla¹(石山), *do:i¹→do:i¹(土山)“妥协-分担”型同义冲突的结果。

(4) 根据“庆远译语”“镇安译语”的对音来看,可以确定 pla¹从岩石→石山的词义转移在清代乾隆年间已经在宜州、德保完成。通过旧志材料,可以观察到晚近以来,壮语“山”的词形变化不大,但推测贵港、桂平壮语可能存在 do:i¹→do:ŋ¹的词形更替。

附记: 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 AutoNavi-GS(2019)6379号)。本文为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9YJSB01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为曾师晓渝教授指导笔者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节。写作过程中承蒙曾晓渝教授、曾智超、刘欣、肖能萍以及广西民族大学的各位发音人提供帮助;曾晓渝教授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陈孝玲 2009《侗台语核心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8《广西民族语言方音词汇》,北京:民族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1989《古壮字字典(初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 1984《壮汉词汇》,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何景熙修、罗增麟纂[1937] 1974《凌云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黄占梅修、程大璋纂[1920] 1968《桂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金理新 2012《汉藏语系核心词》,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方桂著、丁邦新译 2011《比较台语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李连进 2000《平话音韵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刘振西等纂[1934] 1995《隆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罗凤伦 2014《GIS支持的广西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分析》,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莫炳奎[1937] 1968《邕宁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韦景云、覃晓航 2006《壮语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吴安其 2017《亚欧语言基本词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谢建猷 2007年《广西汉语方言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 岩田礼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
- 羊复礼修、梁年等纂[1892] 1967《镇安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杨盟等修、黄诚沅纂 [1934] 1968《上林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 曾晓渝 2017《〈广西庆远土司译语〉壮汉对音研究》，《民族语文》第3期。
- 张均如、梁敏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均如、梁敏等 1999《壮语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张慧娟 2015《广西旧志中语言资料考察》，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荣 2018《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编华夷译语》第十卷，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年。
- 周耀文、罗美珍 2001《傣语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59《布依语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Tomas John Hudak 2008 *William J. Gedney's Comparative Tai Source Boo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inguistic Map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Mountain” in Zhuang

YAN Zh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ost Zhuang dialect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ountains: rock and earth mountains. This paper draws map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between both kinds of mountains and interprets the word form variations. Some variation is explained by the expanding, narrowing, and metonymy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designating relevant referents. Supported by evidence from other Tai-Kadai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strata are implicit in the Zhuang word for “mountain.” Dialects located on the edge of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changed, *do:i¹ → po¹, and changes to the other dialects, namely, *do:i¹ → pla¹ (for rock mountain) and *do:i¹ → do:i¹ (for earth mountain), were the result of a compromise-dividing synonymic collision. The historical recordings from Zhuang-Chinese translated docu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show that the meaning transfer of pla¹ from “rock” to “rock mountain” was completed in Yizhou and Debao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se recordings demonstrate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word displacements in a small number of dialects, the Zhuang words for “mountain” have remained generally unchanged ever since.

从地名看民族语言的分布

高天俊

华中科技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以“登”、“底”和“孟”等民族语地名通名为例,探讨了民族语地名和民族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民族语地名可以作为语言分布地图绘制和修正的参考依据;民族语地名的汉语音译与民语地名本身的发音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这些信息或能为语言演化历史等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地名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则是记录了民族认知心理、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发展历史等丰富信息的资源宝库。从语言分布的角度来看,民族语地名的分布往往与使用该语言族群的现时和历史分布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如能获取某一语言地名的分布情况,或可对确定该语言的分布范围和族群的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以“藏彝走廊”地区几个有代表性的藏缅语地名通名为例,探讨民语地名与语言现时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语中的地名通名

在国内的书面地名系统中,民族语地名往往通过音译或意译法被转用汉字记录,如怒江地名“俄玛基”为傈僳语音译,“俄玛”是当地的一种竹子,“基”意为“山、坡”;“温许局”是白语的音译,“温许”意为“温泉”,“局”意为“河”;“俄夺各”是傈僳语,“俄夺”意为“核桃”,“各”意为树林。相较于意译地名而言,音译的民语地名因同时保留了地名的民语发音和语义信息而更有价值。在民语音译地名中,地名通名则因数量多、分布广而很适合用作统计分析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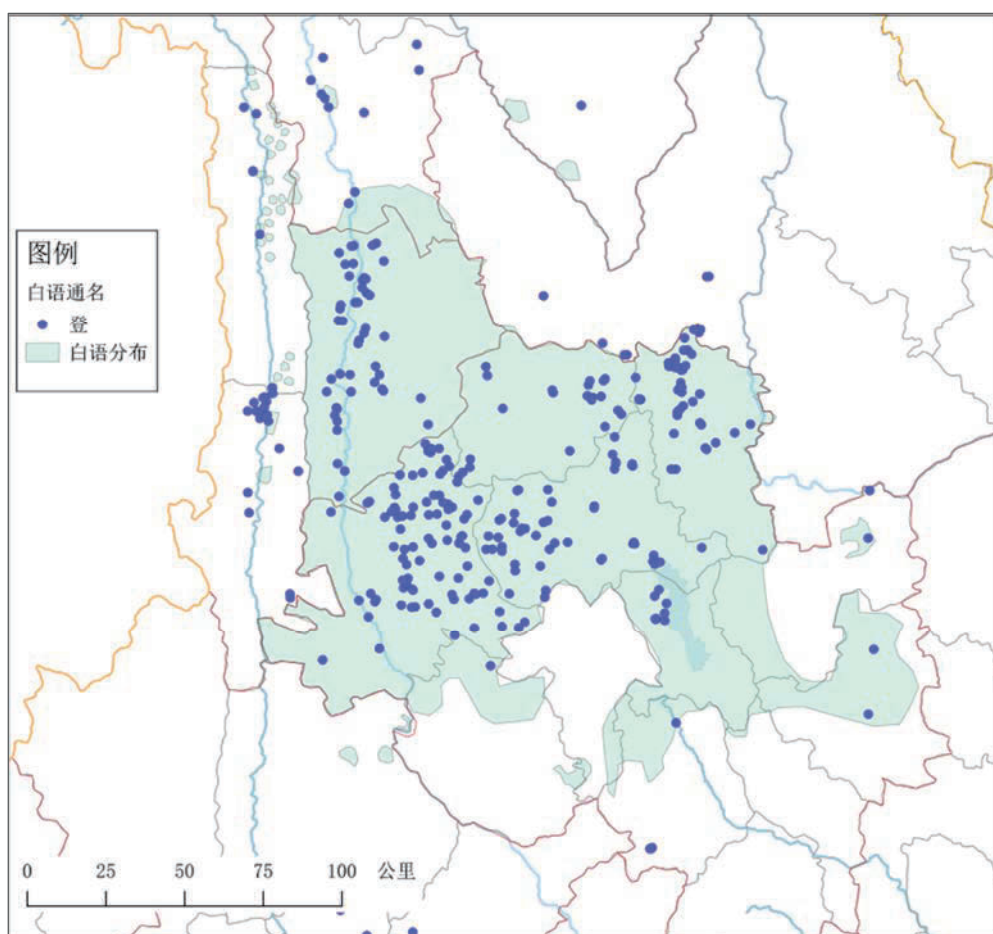
上述所谓的地名通名指的是地名中做中心语及表示地理方位、类别等的一类词。常见的通名有行政区划名(如区、县、乡、村),聚落类名(如寨、庄、集、营),自然实体类别(如山、河、岭、坡、箐)等。同汉语一样,民族语中也有许多特有的地名通名,如傣泰语地名中的“那、纳”意为“水田”,“板、皈”意为“村子”(罗美珍,1999),怒语地名中的“究”(意为“坪”,如“亚刊究”、“农干究”),白语地名中的“登”(意为“坝子”,如“哈户登”、“甲登”)等等。相对于壮侗语而言,藏缅语地名在结构上多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也就是说藏缅语地名中的通名多在整个地名的末尾,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截取地名中最后一个字(或多个字)的方法从地名数据库中找到各类地名通名的实例。通过将民语地名通名的分布与该民族语分布地区进行对比,可以观察和检验地名分布与语言分布之间的关系。

二、白语地名通名“登”与白语的分布

目前，大理州、怒江州等主要的白族聚居区分布有大量的白语地名，其中有许多白语特有的地名通名，如“𪛗”、“胆”、“登”、“招”等（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190-191）。但是，由于白族汉化程度较深，许多白族地名也被意译的汉化地名所代替，如“𪛗”（坝子、平川）这一分布极广的通名，已多被汉语“川”、“甸”等所替代（如“邓𪛗”现称“邓川”，“俄𪛗”现称“禾甸”）。目前，保存实例数量较多的白语地名通名已不多，“登”（意为“村子”）就是尚存的白语地名通名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将地名数据与语言分布数据绘制在同一张地图上可以直观的观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图1）。由图1可见，“登”的分布基本覆盖了白语分布的主要地区，其中尤以云龙县、剑川县、兰坪县澜沧江沿线和怒江州洛本卓乡分布最为集中，这种分布已能大体勾勒出白语几大方言区的概貌。同时，在白语分布区外，“登”类地名极为罕见，“登”与白语、白族的密切对应关系由此可见。

图1：白语地名通名“登”与白语的分布¹



¹ 图中的白语分布图系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制作。

图 1 已能直观的展示出民族语地名对语言分布的指示作用，但这种展示仍是感性的，地名与语言之间的关联还可以通过客观的定量方法进行验证。以白语地名“登”和白族人口分布为例：表 1 展示了白族人口分布最多的 16 个县市的人口（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和乡村地名数据，我们计算了各县市白族人口所占比例和“登”类地名在全部地名中所占比例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764 ($p=0.0005701$)——白语地名“登”与白族人口分布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地名和人口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一般而言，民族人口的分布和民族语言的分布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因此细致的绘制出民族语地名分布地图，对于观察该语言的现时分布及语言地图的绘制和修正，能起到极有价值的参考作用。

表 1：主要白语分布地区“登”的数量

地区	总人口	白族人口	白族人口比例	登	地名总数	“登”所占比例
大理市	652048	392821	0.6024	14	654	0.0214
漾濞彝族自治县	102305	11529	0.1127	0	1028	0.0000
祥云县	455605	43671	0.0959	2	970	0.0021
宾川县	348754	45335	0.1300	2	1025	0.0020
弥渡县	313156	1810	0.0058	0	903	0.0000
南涧彝族自治县	211433	2446	0.0116	0	1192	0.0000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304368	7011	0.0230	4	1243	0.0032
永平县	175163	6325	0.0361	2	1589	0.0013
云龙县	199880	140008	0.7005	89	1751	0.0508
洱源县	268313	165788	0.6179	44	972	0.0453
剑川县	169973	149805	0.8813	22	510	0.0431
鹤庆县	255328	144923	0.5676	42	913	0.0460
福贡县	88127	3920	0.0445	6	548	0.0109
泸水县	171974	37020	0.2153	18	752	0.0239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146017	9941	0.0681	10	1113	0.0090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366705	40546	0.1106	4	1527	0.0026

三、“底”与傈僳语的分布

傈僳语“底”意为“平地、坪子、地方”（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204），这是傈僳语地名中最有代表性的地名通名之一。从“底”的分布来看，它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1 版）》（图 C10）中傈僳语的分布也有较高的契合度。但是，在维西县东部和丽江市东部有较大一块地区也集中分布有许多“底”类地名，而这块区域在地图集（第一版）的傈僳语分布地区上并未显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地图集的调查存在部分遗漏；二是这部分地区的“底”类地名属于其他语言；三是这一区域是傈僳语的历史

分布地区。事实上，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中，这一区域确实也是傈僳语的分布地区。由此看来，相较于第一版而言，《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的语言分布图绘制显得更加细致准确。傈僳语地名通名“底”的分布表明民族语地名的分布对于语言分布地图的检查、修正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四、民语地名的音译字与民语发音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

在将民族语地名音译为汉语时，其所采用的汉字与民语地名本身的发音之间往往存在较复杂的对应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既有语言之间的，也有语言内部的。

首先，使用同一个汉字记录的地名，可能来自不同的语言。如“洛”在纳西语（如洛那、满洛、固洛等）、傈僳语（如里独洛、公中洛、害碧洛）中都有“箐、山谷”之意（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213，204），而在彝语中，“洛”还有“石头”（如洛花冲、洛嘎）之意。在这三种语言的地名中，意为“箐、山谷”的“洛”是在纳西语、傈僳语和怒语等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同源词，而彝语中意为“石头”的“洛”则明显是另一个发音相似的词项了。在民族语地名通名中，不同语言的不同通名因语音相似而采用相同汉字记录的情况并不鲜见，对这种复杂的对应情况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才不致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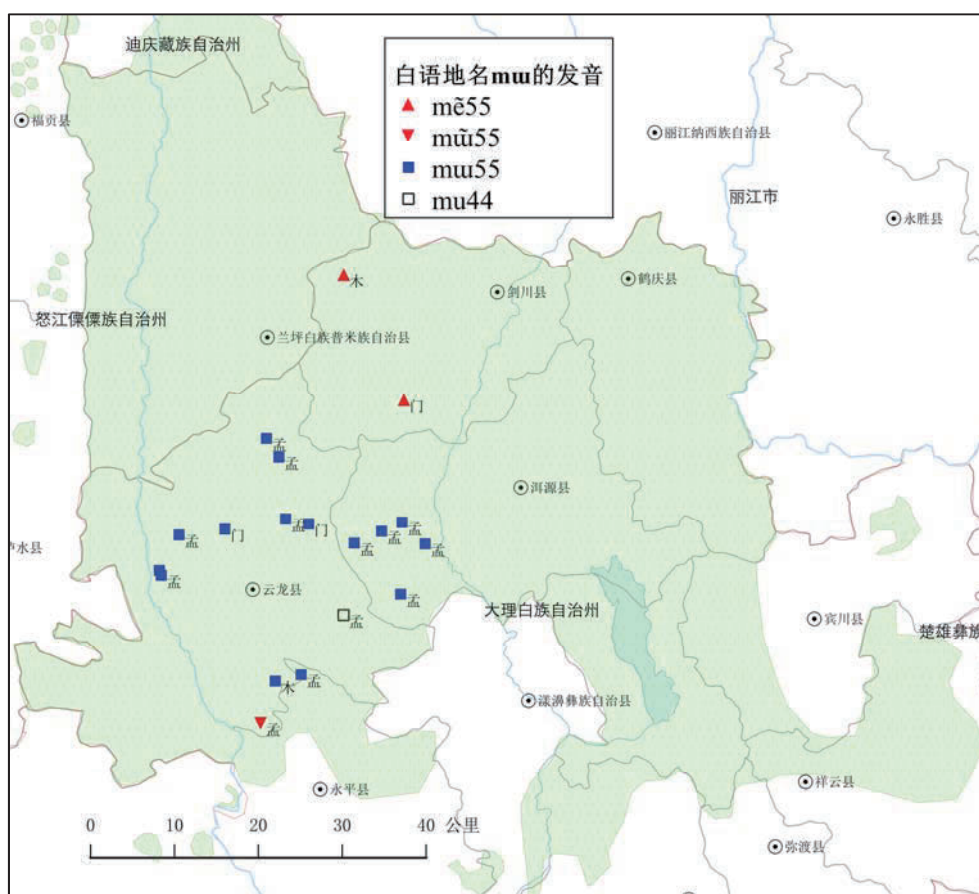
其次，同一个语言的同一个地名通名，在转写为音译汉字地名时，常有采用不同的汉字的情况。如彝语词“水”在不同地区的地名中可以见到“矣、易、洩、迤、邑、以、依、衣、异、云、雨”等多种不同的形式（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185）。此外，汉字音译民语地名的用字情况常能反映出民族语使用者进行民-汉语音匹配时的语音感知心理和民族语语音演变历史信息。如白语地名通名“**mu55**”（意为“那里”）对应的音译汉字在各地各不相同（大概有“孟、门、木”等几种，见表2）。“孟、门、木”三个汉字的主要区别在于鼻音韵尾的有无，其对应的白语发音的区别也主要体现在元音鼻化的有无上。目前，除剑川的两例和云龙的一例外，该通名其他实例的元音都已无鼻化特征。从语音演变的角度看，可以推测早期白语“**mu55**”的韵母应带有鼻化特征，但这一特征已在大多数地区脱落。“**mu55**”的汉语音译选字情况还能反映出白语使用者学习汉语时的语音匹配心理。由于白语各方言中多已没有鼻音韵尾，白族人学习（使用）汉语方言或普通话中含鼻音韵尾-n、-ŋ的字时，常从白语中选取一个其心理感知上最接近的音进行匹配。一般而言，白语使用者倾向于用 **u**、**iu** 来匹配汉语中的 **ən**、**əŋ** 和 **in**、**iŋ**，如 **u**←**əŋ**（**mu**←孟，**ku**←根，**su**←声），**iu**←**in/iŋ**（**iu**←音，**iu**←赢）。

表 2：白语地名通名“**mu**”的发音

地名	白语发音	县
上春 孟	ts33tshv55mu55	洱源县
盆 孟	pu33mu55	洱源县
下村 孟	je33tshv55mu55	洱源县

水清孟	ey33tehy55mu55	洱源县
夫再木	fv55tse42mē55	剑川县
长檐门	tsē31jī55mē55	剑川县
何把孟	xo31pa44mu55	永平县
树五孟	su55u31mu55	云龙县
大田孟	tə31tei31mɔ33mu55	云龙县
课孟	kho55mū55	云龙县
期登木	tēhi55tsu31mu55	云龙县
梨树门	ey55li55mu55	云龙县
着洼孟	tso42ua44mu55	云龙县
富己孟	fv55tei31mu55	云龙县
毛孟	mɔ42mu55	云龙县
丕登孟	te44mu44	云龙县
白地孟	pɛ42tei31mu55	云龙县
白地门	pɛ42tei31mu55	云龙县

图 2：白语地名通名“mu”的分布



五、结语

民族语地名是该民族在一地生活留下的一种文化标记,它常与人群的分布有着较强的对应关系。本文仅以“登”、“底”和“孟”等地名通名为例展示了地名与民族(语言)之间的联系。除通名外,各民族地区地名系统中还存有大量的各类民语地名,如能对民语地名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综合分析,将有可能绘制出一幅精细的民族语分布图。此外,地名系统相较于人群迁徙而言具有一定的稳固性,人去地名留的现象广泛存在,如能获得系统性的历史地名信息,有望对重建民族迁徙和语言演化的历史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附记:本研究受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藏彝走廊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有声数据库建设与研究”(19YJC740011)的资助。感谢远藤光晓、布莱德雷和黄河三位先生对本文提出的极有启发的建议。本文所涉地图均使用 QGIS 制作。

参考文献

-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1991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地名志》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 罗美珍 1999 《傣、泰语地名结构分析及地图上的音译汉字》《民族语文》第 2 期
-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7 《云南省志·卷六十三·地名志》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2012 《云南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 中国地名委员会 1985 《地名学文集》 测绘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 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少数民族语言卷》 商务印书馆

Vie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Names

Tianjun Ga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names in ethnic languag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thnic population in China using “登,” “底,” and “孟” as examples. Studies show that place names can be significant evidence for drawing and revising language distribution maps. Meanwhile, there i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place names in ethnic language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ethnic place names, which is helpful to language evolution history studies.

以语言地理类型视野再审视白语的方言分区

杨晓霞

大理大学

内容摘要: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于白语分区研究的两种观点, 并从四个白语语言特征为例重新审视了白语的分区和演变问题。

正如桥本万太郎所说, 对于东亚大陆语言, “只有通过语言结构的区域性外貌变化, 同时尽可能与‘纵’的演变相对照, 才是有效的追溯语言发展的踪迹和这种语言亲属关系的方法”。对于白语这样和汉语接触历史较早的语言, 语言特征演变规律的厘清需要语言地理类型的视野。本文以具体特征的地理分布来再度审视白语的方言分区问题。

全国白族总人口为 1,933,510 人 (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的族源地、祖居地和主要聚居地, 约有 80% 的白族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 此外还有少量分布于云南省内外, 如云南省内的昆明、丽江、怒江、迪庆、保山、玉溪、楚雄、文山、临沧等州市以及贵州省毕节市等;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及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等。白语的方言分区限定在云南省范围内。这是由于目前, 仅云南省内的白族聚居区仍将白语作为日常生活交流的常用语言, 云南省之外的白族聚居区都已经转为使用汉语为主。

过去对白语的方言分区有两种观点: 1. 三大方言分区; 2. 东、西支分区。

一、白语的三大方言分区

白语的三大方言分区是 50 年代社会历史大调查的成果, 建立在 1957 至 1960 年间的对近 20 个点的白语方言点音位系统进行归纳的基础上。这种划分建立在白语语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共时比较基础之上。由于白语内部的共时差异主要体现在语音上, 因此三大方言划分的主要依据也是语音特征的差异, 同时兼顾了词汇和语法特征的差异。根据这些特征差异大致可以把各地白语划分成三类, 每类分别选取一个代表点来命名。三大方言被命名为: 剑川方言、大理方言、碧江方言。又因为三个代表点的地理位置相对是中、南、北, 三大方言也称为中部方言、南部方言、北部方言。剑川方言分剑川、鹤庆两个土语, 大理方言分大理、祥云两个土语, 碧江方言分碧江、兰坪两个土语。具体分布如下表:

表 1:《白语简志》中的白语方言分区

方 言	土 语	具体分布
剑川方言（中部方言）	剑川土语	剑川、兰坪、鹤庆、丽江、云龙、洱源、漾濞、宾川、永胜、宁蒗等地
	鹤庆土语	
大理方言（南部方言）	大理土语	下关市、大理、洱源、宾川、云龙、漾濞、永平、云县、凤庆、祥云、弥渡、巍山、保山、南华、昆明、沅江等地
	祥云土语	
碧江方言（北部方言）	碧江土语	碧江、福贡、贡山、维西、中甸、云龙、洱源等地
	兰坪土语	
未能认定所属方言区		德宏、楚雄、文山、曲靖、昭通、玉溪、昆明市

云南语言间的接触纷繁复杂，语言接触的影响又或是历史迁徙等诸多原因造成部分白语点，如：德宏、楚雄、文山、曲靖、昭通、玉溪、昆明市的白语语音特征较为独特，难以划入三大方言的某个特定方言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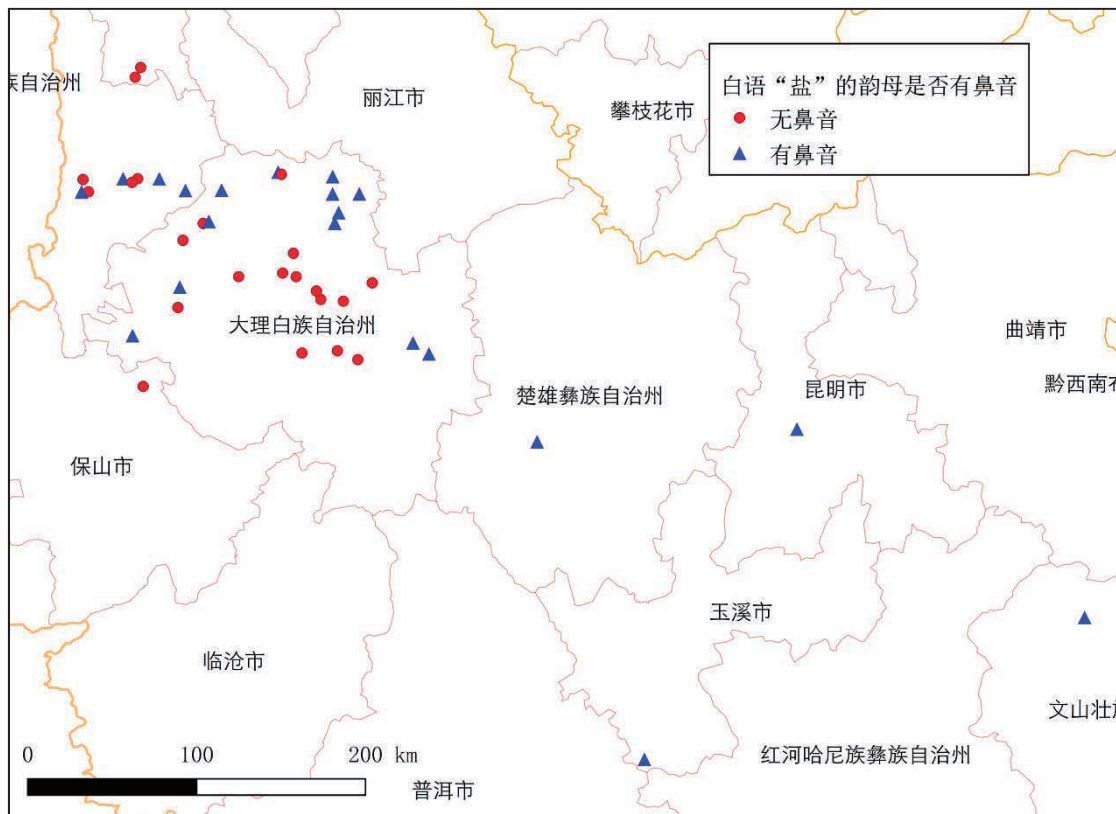
二、对白语三大分区的再观察

根据《白语简志》，三大方言区分区的区别特征中区分度比较高的特征为如下几项：语音上，南部方言（大理）没有鼻音韵母，中部方言（剑川）没有卷舌韵母，北部方言（碧江）具有舌尖后声母、小舌声母，有浊塞音、浊塞擦音音位。词汇上，北部方言（碧江）词汇借用汉语程度相对最弱。语法上，南部方言（大理）否定词“不”修饰动词或者形容词的位置后置；北部方言（碧江）人称代词复数有主格和领格的差异。选取例词对这几项语音区别特征中的鼻音韵母、卷舌韵母和舌尖后声母进行地理类型分析。

2.1 以“盐”为例观察鼻音韵母的地理分布

分布显示，没有鼻音韵母依旧是南部方言（大理）区别于另外两个方言区的典型特征。南部方言（大理）一直处于白汉语言接触的核心地带，比其它两个方言区吸收了更多的汉语借词。但是没有鼻音韵母这一区别特征却一直非常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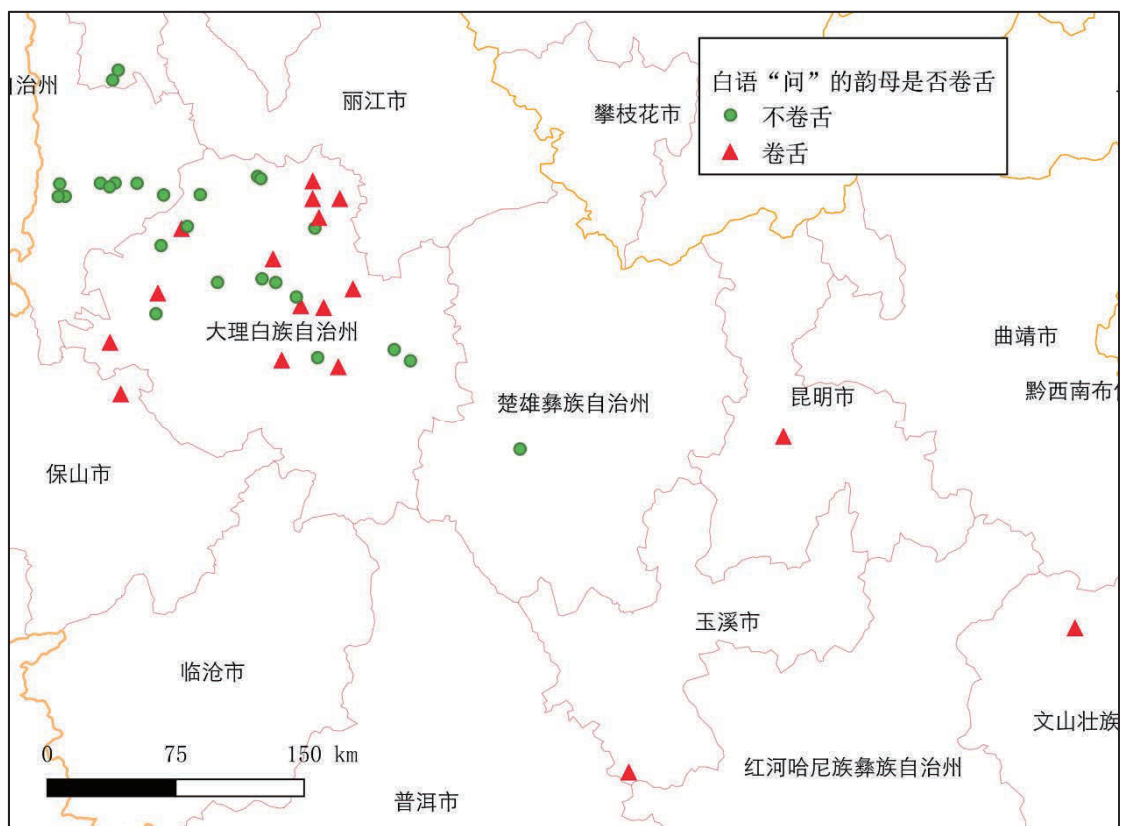
图 1：白语“盐”的韵母鼻音的分布



2.2 以“问”为例观察卷舌韵母地理分布

从地理分布看，韵母不卷舌是北部方言（碧江）区别于另外两个方言区的典型特征，在中部方言（剑川）和南部方言（大理）中卷舌和不卷舌的区分并不明显。按照《白语简志》，卷舌韵母应当是大理方言区别于另外两个方言的特征。这样的不一致，或许是一种新近的发展变化。由于卷舌音的发音本身比较费力，出于省力的原则，卷舌音逐渐脱落也是有可能的。在大理方言区代表音点喜洲镇，大多数自然村白语韵母卷舌的情况很典型，可是也有例外，周城自然村的白语韵母卷舌特征却很微弱，几乎完全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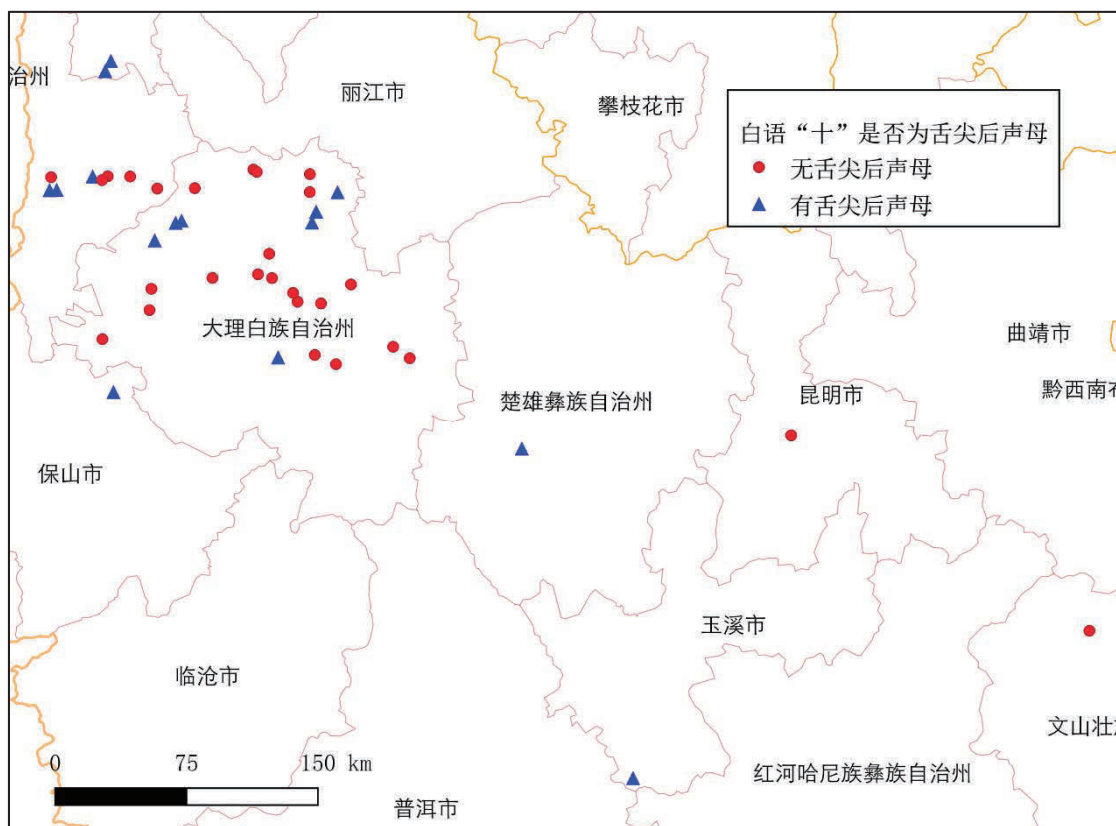
图 2：白语“问”的韵母是否卷舌



2.3 以“十”为例观察碧江方言舌尖后声母的地理分布

过去认为北部方言（碧江）区别于其它两个方言的语音特征是具有舌尖后声母、小舌声母，有浊塞音、浊塞擦音音位。分布图显示，北部方言（碧江）和中部方言（剑川）都有数量不少的点具备舌尖后声母。南部方言（大理）不具备舌尖后声母。所以有无该项特征是南部方言和另外两个方言区分开的重要特征。

图 3：白语“十”的声母是否为舌尖后音



综合对上述 3 项特征的观察，过去三大方言分区的标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分度弱化，需要在更丰富语料的基础上重新讨论分区区别特征。

三、白语的东支与西支分区

白语东支与西支的分区是汪锋（2012）在白语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的这项研究在 9 个白语代表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语音、词汇演变的 19 项亲缘分群语言特征，利用遗传分类学的计算程序，得出了白语方言树图和以东、西支对立为主的白语方言谱系树。其结果显示了从共同祖语中最早分出了两支白语：一为西支，包括了地理位置相对偏西的恩棋、金满、妥洛、俄嘎、共兴，另一为东支，包括了地理位置相对偏东的金星、大石、周城、马者龙。西支白语使用者主要是分布在怒江州境内的白族勒墨支系和那马支系，东支白语使用者主要是怒江州以东的大理州及以东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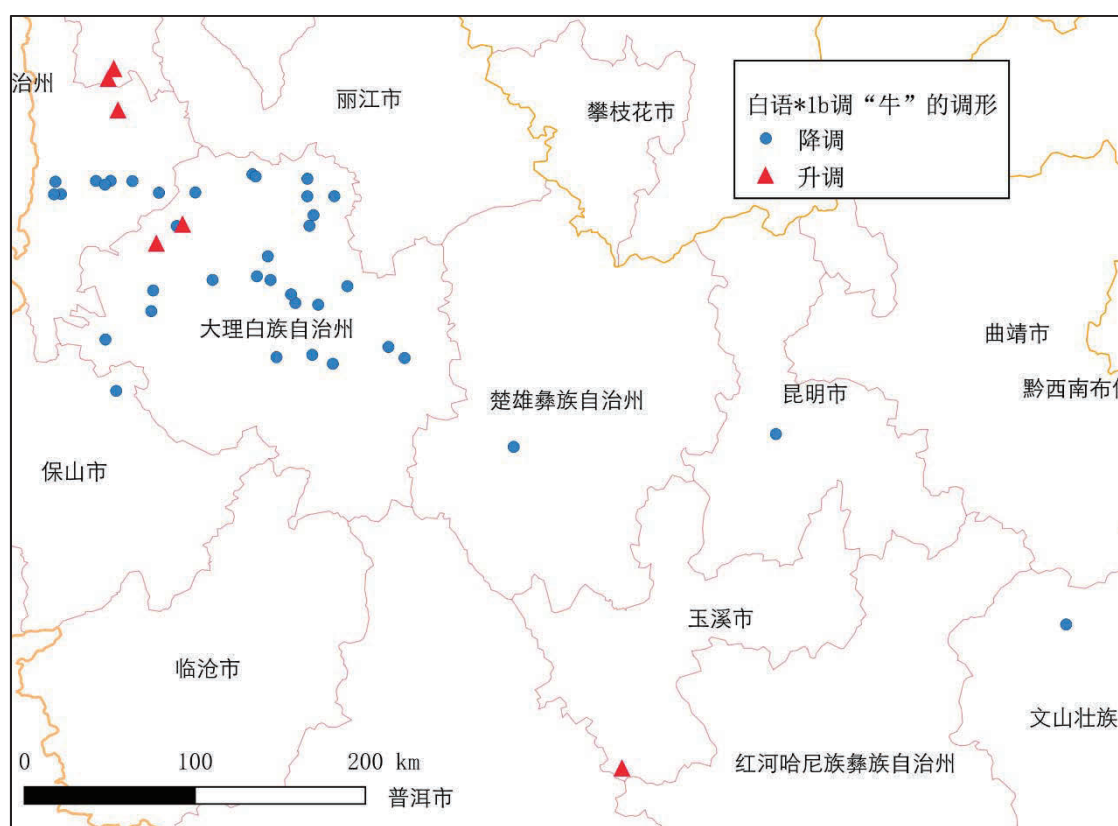
对于像马者龙白语这样距离主要白族聚居区较远，已经形成白语方言岛的语言点，东、西支分区的方式能够对其进行明确的归类。

四、从白语*1b 调演变的两种形式的地理分布看东、西支方言分区

东西方言的分区建立在白语历史比较的基础上，这里从白语中的*1b 调（汪锋 2012）在地理分布上所反映的不同演变路径来观察东、西支分区的基础。

我之前的一篇文章（杨晓霞 2016）从发声态的视角，根据语音分析确认了白语中的*1b 调在浊音清化的过程中，由于以嘎裂声和喉塞尾两种相关的发声态形式演变而造成声调调型表现出升与降两种相反的形式。这里以“牛”的调型分布为例进行观察。

图 4：白语*1b 调的调型（以“牛”为例）



伴随着不同发声态的两种调型演变，降调形式是主流，分布广泛；升调形式数量很少，分布范围小。从地理位置上看，*1b 调表现为升调形式的特殊演变发生澜沧江沿线区域，这反映了在位置偏西的澜沧江流域的白语可能具有相对特殊和稳定的语言特征，从而导致了该项特殊演变的发生。

表现为升调形式的 4 个点中，妥洛和共兴按照东、西支白语分区属于西支白语，白石和象图同样属于澜沧江流域，在浊音清化的过程中与西支白语发生了一致的演变，应当可以纳入西支白语方言。

从之前的卷舌韵母例词地理分布情况中可以看到西部的狭长区域没有卷舌韵母的存

在，从共时到历时演变或者仅仅是共时的观察中都可以大致从地理分布上看到东、西区域的差异。

五、结论

5.1 三大方言分区的特点

《白语简志》划分的三大方言建立在白语语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共时比较基础之上，准确把握语言特征的共时差异。这一分类主要考虑了共时的差异而不是历时的不同（Wiersma2003）。从三大方言过去的分区方式来看，妥洛和共兴都有舌尖后声母、小舌声母，有浊塞音、浊塞擦音音位这些作为北部方言典型的区别特征，同时又具有卷舌韵母（本属于南部方言的区别特征）。白石白语有舌尖后声母、几乎要脱落完全的鼻化，象图白语有舌尖后声母兼具卷舌韵母。按照三大方言分区的方法，可以将妥洛、共兴、中排、象图、白石这几个点排除出南部方言（大理），但是属于中部还是北部方言，就不是那么好划分了。

5.2 东、西支分区的特点

建立在白语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所有相关语言点的特征纳入整体语言特征的亲缘分群考量和计算。对于因历史上迁徙到远离核心聚居区的白语语言点，这些语言点与核心区的语言点相比，往往共时区别特征不清晰，也能够通过历时演变特征进行方言分类。

5.3 新方言分区模式的可能性

方言学者在给不同方言进行分区时，自然首先把视点集中到方言的语言特征中来，而最终给方言的归属进行定性时，却也有必要把方言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并加以考虑。因为不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该方言的某些语言特征也许不存在了。（詹伯惠2002）

白族主要聚居于横断山系云岭余脉的坝子和峡谷中，主要聚居地按照地理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洱海区域、怒江流域、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的白族称为“勒墨”，澜沧江流域的白族称为“拉玛”。洱海区域的称为“民家”。洱海区域是白族聚居的核心区。洱海区域的白族分布于洱海周围的平坝，交通相对便利，是白族文明的发源地，是与汉族文明接触最频繁，在三个区域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相应的，洱海区域的白语借词数量也较怒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更加丰富，与汉语的接触历史最久远。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的白族分布在高山大河之间。地理环境的界限也使生活其间的白族人的语言呈现出区别特征。

从洱海坝子到澜沧江流域再到怒江流域，这三个区域的白语音系呈现出地理上的类推机制，浊声母逐渐清化，声调数量增加（杨晓霞2018）。从浊声母清化这一特征的演变进程来看，洱海区域的变化最快，澜沧江流域次之，怒江流域最慢。

东、西支分类与白族较早时期的迁徙有相关性。居住在最西边的白族勒墨支系中现在

仍然流传着祖先是由东边的澜沧江流域迁徙而来的说法，而居住在东边澜沧江流域的白族那马支系中则流传着祖先是由更偏东南的洱海坝子迁徙而来的说法。

把东西支分类作为一级分类，在此基础上再分别进行东支的南中北二级分类以及西支的东西二级分类，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附记：本研究受大理大学云贵高原坝子社会与文化研究创新团队（SKLX2019210）以及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理国写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白文批注释读及数据库建设”（18XMZ010）的资助。本文所使用的白语语料中，白语喜洲土语、白石土语来自自己的田野调查，其余语料来自王锋（2008）的《白语方言词汇》、汪锋（2012）《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

参考文献

- 徐琳、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2008 《大理丛书·白语篇》 云南民族出版社
- 汪锋 2012 《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以白语为例》 商务印书馆
- 寸云激、马健雄 2020 《云贵高原坝子社会研究的方法与问题》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杨晓霞、高天俊 2016 《从发声态看白语的紧音》 民族语文第 6 期
- 詹伯慧 2002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 方言第 4 期
- Wiersma, Grace. 2003. Yunnan Bai.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Re-exam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Bai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Geographical Typology

Xiaoxia Yang
Dal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y of Bai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and re-examines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Bai languages based on four specific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天津方言单字调与连字调地理分布研究

曾晓渝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天津辖区内的官话方言声调系统以 4 调类为主。本文基于 304 个方言点的调查资料，展示了天津方言 4 调类中 A、B、C、D 四类单字调的地理分布，分析了各类型内部单字调与连字调的关系及其变化，进而对不同类型单字调的历史来源作出解释。

天津方言，本文指天津市辖区内的官话方言，其各方言点分属冀鲁官话、北京官话的不同小片（依据钱曾怡 2010:10-11）。这里拟采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着眼于天津方言单字调、连字调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特点，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一、天津方言的单字调分类

1.1 天津方言单字调的内部差异

本文天津方言资料主要采用杨自翔教授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实地调查资料（共 304 个点）¹，其他资料另注明出处。

天津方言声调以 4 调类为主，有零星的 3 调类和 5 调类，这里根据调类调值的不同，将天津方言声调列表如下。

表 1：天津方言单字调的分类

类型	地区	阴	阳	上	去	去	备注
A 类 (四调类)	市区	21	45	13	53		杨自翔等 1999
	东丽	21	45	213	53		顾庄子等
	津南	21	45	113	53		双港何庄子等
	塘沽	21	45	213	53		塘沽西大沽等
	西青	21	45	113	52		曹庄子等
	北辰	31/32	45	213	53/52		天穆村、宜兴阜等
B 类 (四调类)	静海	43/33	45	213	31		独流、杨柳青等，主流
	西青	43/33	35/45	213	52		王二庄、焦庄子等
C 类 (四调类)	蓟县	55	22/33	213	52		穿芳峪等，主流
	宝坻	55	22/33	213	52		赵各庄等，主流
	宁河	35/45	24	312/41	52		宁河镇等，主流

¹ 杨自翔先生是南开大学退休老教授，他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实地调查了天津方言 304 个点的材料，其中少数点材料是当时杨先生带领学生调查所得，后来杨先生又有补充修改。

D类 (四调类)	武清	55	35	214	51		杨村镇等, 主流
E类 (五调类)	芦台宁河	55	33	213	52 阴	214 阳	李思敬 1995, 杨斌 2012
	汉沽滨海	24	31	412	53 阴	214 阳	李旭 2019
F类 (三调类)	唐官屯	13	45		31		主要在静海
	顺民屯	213	53	213	31		仅 1 个点, 在静海
	王庆坨	55		214	41		分布在武清
	胡柳子	24		214	41		

1.2 天津方言单字调类型地理分布

按照表 1 的分类, 这里将天津话单字调各类型的地理分布绘图如下。²

图 1: 天津辖区内单字调各类型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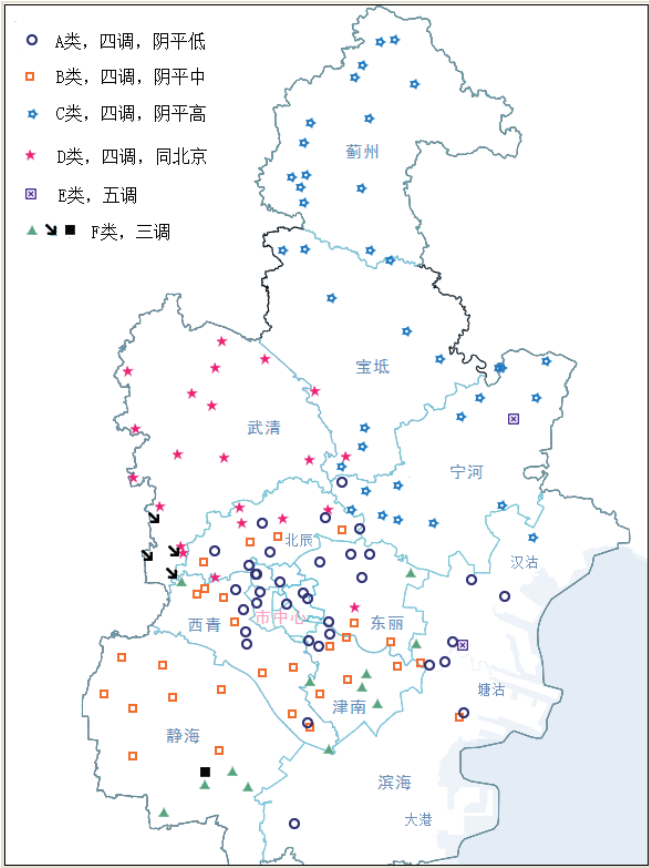


图 1 说明: A 类分布于天津城中心, 是老天津话的代表; B 类环绕 A 类, 分布于天津城的近郊区域; C、D 两类分布于天津北部, 所在区域蓟县、宝坻、宁河、武清分别近几十年才划归天津, 调类调值与邻近的河北方言、北京话近似或一致; 零星分布于边缘区域的 E、F 类(三调、五调)方言点很少, 且内部情况复杂。限于篇幅, 本文讨论

² 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绘制, 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AutoNavi-GS6379(2019)号)。

A、B、C、D 四类的单字调与连字调，E、F 类另文讨论。

二、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和连字调

2.1 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的连字调差异

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是天津方言的独特代表，主要分布于城中心各区，周边西青、东丽、津南、塘沽也有分布。

A 类调（阴 21，阳 45，上 13，去 53）是典型的天津老城区话，单字调内部较一致，其连读变调很有特色，其变调规律是：阴平+阴平→上声+阴平，上声+上声→阳平+上声，去声+阴平→阳平+阴平，去声+去声→阴平+去声（李行健、刘思训 1985，石锋 1986，杨自翔等 1999）。³ 那么，凡天津境内 A 类单字调的连读变调规律是不是都一样的呢？

根据杨自翔先生 1980-1990 年代的调查资料列出下面表 2 作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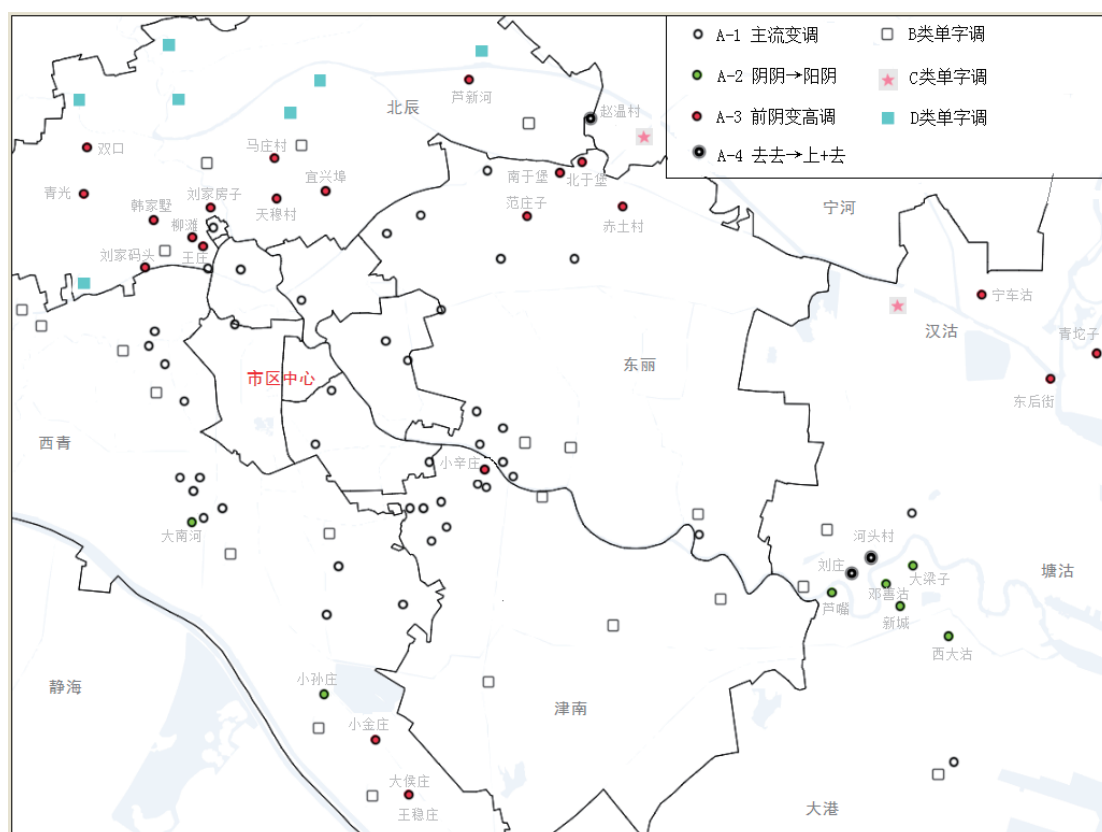
表 2：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内部异同

变调类型 声调组合	A 类单字调：阴平 21，阳平 45，上声 13，去声 53			
	A-1	A-2	A-3	A-4
阴平+阴平	13+21 上+阴	45+21 阳+阴	45/55+31 阳+阴	44/54+31 阳+阴
阴平+阳平	21+45	同 A-1	55/44/33+35 非低+阳	33/54+35 非低+阳
阴平+上声	21+13	同 A-1	55/44/33+213 非低+上	32/54+13 非低+上
阴平+去声	21+53	同 A-1	55/44/33+53 非低+去	55+53 非低+去
上声+上声	45+13 阳+上	同 A-1	同 A-1	同 A-1
去声+阴平	45+21 阳+阴	同 A-1	同 A-1	24+21 上+阴
去声+去声	21+53 阴+去 53+53 （多数）	同 A-1	同 A-1	24+53 上+去
方言点统计	44 个	7 个	21 个	3 个

表 2 显示，同样的 A 类单字调，其连读变调却有不同。A 类调共有 75 个调查点，前字阳平、上声、去声的两字组连字调基本一致，其主要差异是阴平前字的变调，个别点还有去去→上去的差别。下面是这些不同类型连读变调的分布图。

³ 石锋、王萍《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2004）分析天津方言（A 类调）的连读变调规律，老派依旧，新派有变化，即阴阴→阳阴，去去连读调值不变；李倩、史濛辉、陈轶亚《声调研究中的一种新统计方法》（2020）采用“增长曲线分析”法分析了 6 位出生于 80 年代的天津方言发音人连读变调基频平均值，其结果与石锋、王萍分析的新派声学表现一致。

图 2：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的不同连读变调地理分布



从图 2 可以看出，A-2、A-3、A-4 异于主流变调 A-1 的方言点，都分布在 A 类单字调的边缘地区，且均接近于 B 类、C 类、D 类单字调。对此，有必要再做以下相关比较分析（注：下表中有 B、C、D 类的单字调、连字调参见后文表 6、11、13；表中连读变调规律按主流情况标注有“+”、无“-”，不计个别方言点的例外；如果非例外则注明数量，后同）。

表 3：天津方言 A 类连读变调与其它类的比较

分 类 连读变调规律	单字调类型				A 类单字调的连读变调类型			
	A 类 市中心	B 类 静海西青	C 类 蓟宝宁	D 类 武清	A-1 44 个点	A-2 7 个点	A-3 21 个点	A-4 3 个点
阴阴→上阴	+	-	-	-	+	-	-	-
上上→阳上	+	+	+	+	+	+	+	+
去阴→阳阴	+	-	-	-	+	+	-	-
去去→阴去	-/+多	-	-	-	-/+多	-/+多	-/+多	-
阴阴→阳阴	-	+	-	-	-	+	+	+
去阴→上阴	-	+	-	-	-	-	-	+
去去→上去	-	+	-	-	-	-	-	+
阴平前字非低	-	+	+	+	-	+	+	+

表 3 显示，除 A-1 类以外，A-2、A-3、A-4 类型的连字调不同于 A 类单字调的主流

变调特点，而倾向于 B 类单字调的连字调特点。其中，阴平+阴平→阳平+阴平（21+21→45+21），是 B 类的连字调特点；而且，西青、东丽范围内的阳、上、去前的阴平变为相似于邻近 B 类单字调的阴平调值 43/33，北辰范围内的则变似为邻近 C 类、D 类单字调的阴平调值 55。

那么，这些方言点的非主流变调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作具体分析。

（1）图 2 显示，非主流 A-2、A-3、A-4 类型连字调的方言点均分布在 A 类调与 B 类、D 类调接壤的边缘地带，推测这与强势的 A 类单字调扩散影响密切相关。

（2）表 3 显示，非主流 A-2、A-3、A-4 连字调的特点，恰恰与相邻 B 类调的连字调特点多有重合；一般说来，相对显性的单字调易学易变，但隐性的连读变调则难学难改。“变调即原调”（丁邦新 1982:640, 1984, 1989）已在若干汉语方言点中得以证实，根据天津方言 A 类非主流连读变调现象的分析，这些方言点的原有底层单字调很可能属 B 类单字调。

综上，非主流的 A-2、A-3、A-4 类型连字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语言接触的影响：单字调层面是强势 A 类调影响扩散的结果，连字调层面则是底层声调的遗留体现。

2.2 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的连字调格局分析

同是 A 类单字调，连读变调却有主流（A-1）、支流（A-2、A-3、A-4）之别。根据非主流变调方言点的分布区域及变调调值，推测这些方言点的原有底层单字调可能并非现在的 A 类单字调类型。由此可见，方言的声调特点由单字调和连字调共同体现，其声调系统既包含单字调格局，也包含连字调格局。

连字调格局指相对稳定独特的连读声调结构系统。本文确立连字调格局的原则：基于音系层面⁴，选取某调类在特定组合位置上的独特异化变调⁵，以调阶高低区分为基础，再辅之以调型区分，通过各调高低升降的区别对立来体现其格局特点⁶。

下面是天津方言 A 类单字调各代表点的连字调格局分析。

⁴ 排除语音层面的母语者不能明显感知的协同发音细微变化，例如 213 前字变 21，51 变前字 53，21 变 22 等；也排除语义层面的变调，如轻声变调。

⁵ “独特异化变调”指音高变化母语者能明显感知，包括变为一个新调（不同于单字调中的任何调类，语音性变调），以及变为单字调中的某一调类（音位性变调）。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把握尺度的问题，如果某调类在各调类前都变调，这无疑可以进入连字调格局；但若只是一种特定组合的前字变调，本文则根据是否为独特的跨调域变化，是否具有稳定性，再酌情考虑调型差异来进行取舍。例如，天津话 A-1 的连字调格局处理为与单字调格局一致，因为：“阴阴→上阴”“去阴→阳阴”不是跨调域变调，“去去→阴去”涉及跨调域变调，但仅限于少数，“上上→阳上”是北方官话的普遍规律，并非天津话独有。

⁶ 因为从音系角度分析，域调（register tone）的层级高于曲拱调（contour tone），有曲拱调的语言肯定有域调，有域调的语言未必有曲拱调，故域调是基础性的；听感分辨首先是调阶（音高），其次是调形。调域描写“中”（3/4）与系统内的高、低相对比而确定；调型描写，五度值 1 度之差的按平调处理。

表 4：天津方言 A 类调代表点单字调和连字调格局

声调格局 方言点	各代表点单字调及其格局				连字调格局				说明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A-1 (天津城区)	21	45	13	53	21	45	13	53	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一致。
	低	高	升	降	低	高	升	降	
A-2 (塘沽邓善沽)	21	45	13	53	21	45	13	53	阴阴→阳阴 连字调格局？
	低	高	升	降	低	高	升	降	
A-3 (西青小金庄)	21	45	13	53	44/33	45	13	53	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不同。
	低	高	升	降	中平	高	低	降	
A-3 (北辰韩家墅)	31	45	213	53	55/44	45	213	53	同上
	低	高	降升	降	高平	升	低	降	
A-4 (塘沽河头村)	31	55	113	53	44/33	55	113	53	同上
	低	高	升	降	中平	高	低	降	
A-4 (宁河赵温村)	31	45	13	53	54/55	45	113	53	同上
	低	高	升	降	高平	升	低	降	

上表显示，A 类单字调内部有细微差别，但格局基本一致，阴阳上去四声依次为“低、高、升、降”；但是连字调格局就不那么一致了，连字调格局明显与周边 B、D 类调方言的单字调格局相似或一致。

表 5：天津方言 A 类连字调格局与其他单字调类型比较

比较 连字调格局	A 类连字调格局				比较其它单字调类型	方言点分布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A-1	21	45	13	53	同天津 A 类单字调 阴 21，阳 45，上 13，去 53	天津城中心
	低	高	升	降		
A-2	21	45	13	53	同上	西青、塘沽接近城中心的边缘
	低	高	升	降		
A-3/4 (部分)	44/33	45	13	53	近似天津 B 类单字调 阴 43/33，阳 45，上 213，去 53/31	东丽、西青、塘沽与静海接壤
	中平	高	低	降		
A-3/4 (部分)	55/44	45	213	53	近似天津 D 类单字调 阴 55，阳 35，上 213，去 51	北辰、宁河与武清接壤地带
	高平	升	低	降		

2.3 小结

作为天津方言独特代表的 A 类单字调，其连读变调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而不同的连读变调可能反映不同的历史底层。

A 类主流变调在单字调范围之内，单字调格局与连字调格局一致。但是，非主流连读变调则比较特殊，其主要特点：（1）阴阴→阳阴，这与近邻 B 类的连读变调规律一致；（2）在阳、上、去之前的阴平变高为 44/33 或 55 调。这样，非主流的阴平前字变调突

破了 A 类单字调调值，造成单字调格局与连字调格局不一致。

非主流变调方言点分布于天津城区边缘，其连字调格局分别相似于邻近的 B 类单字调（静海方言为代表“阴 43/33，阳 45，上 113，去 31/53”）和 D 类单字调（武清方言为代表“阴 55，阳 35，上 213，去 51”）。可以认为：这些非主流连字调格局方言点的原有底层单字调是 B 类或 D 类，由于天津主流方言的强势影响，其单字调逐渐变为 A 类，但连读变调却保留底层色调。

三、天津方言 B 类单字调和连字调

天津方言 B 类单字调分布在静海全境，以及西青、东丽、津南、北辰区与中心城区的接壤地带；B 类单字调环绕 A 类调分布。

3.1 B 类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

B 类型的单字调内部有细微差别：阴 43/33，阳 45/35，上 113/213，去 31/52；四声总体格局一致：中（阴）、高（阳）、低（上）、降（去）。

B 类调各方言点的阳平 45、35 和上声 113、213 调值的细微差别可以忽略，文中统一为主流的阳平 45、上声 113。值得注意的是阴平、去声各方言点的调值差异，其中阴平调值有 43（少数点记为 42、32）和 33（个别点记为 44）之别，去声调值有高降 52、中降 31 之分。

这里为了讨论方便，暂不区分听感非常近似的阴平调值 43、33，先根据听感上差别明显的去声调值高降 52、中降 31、两读 31/52 进行分类；这样，将 B 类调再分为三小类：B-1 阴 43，阳 45，上 113，去 31；B-2 阴 43，阳 45，上 113，去 52；B-3 阴 43，阳 45，上 113，去 31/52。

B-1、B-2、B-3 各类的连读变调规律大多一致，也有差异，简示如下表。

表 6：天津方言 B 类单字调与连读变调

单字调类别	B-1（去声 31） 50 个点	B-2（去声 52） 17 个点	B-3（去声 31/52） 4 个点
连读变调主要规律			
阴阴→阳阴 43/33+43/33→45+43/33	+	+	+
阴去→阳去 43/33+31/52→45+31/52	+	+	+
阳阳→阴阳 45+45→43/33+45	+	+	+
阳上→阴上 45+113→43/53/44+213	+	+/-（7/10）	+
上上→阳上 113+113→45+213	+	+	+
去阴→上阴 31/52+43/33→13+43	+	-	+
去去→上去 31/52+31/52→13+31/52	+	+	+
去声在阳平前读低降 31	+	+/-（6/11）	+
去声后字读低降 31	+	+/-（4/13）	+

表 6 显示，B-1、B-3 的连读变调基本一致，B-2 的有不同，主要是“阳上→阴上”

规律有一多半不合，而且去声后字多为高降。⁷

根据表 6，B 类调的连读变调虽然单字调范围内，但变调特点是阴平、阳平调值互换，故处理其连字调格局与单字调格局不同，如下表。

表 7：天津方言 B 类单字调及其连字调格局

声调格局 分类	代表点单字调及其格局				连字调格局				说明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B-1 (静海独流)	43	45	113	31	45	43/33	113	31	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的主要差异在于阴平、阳平互换。
	中平	高	低	低降					
B-2 (静海王口)	33	45	113	52	高	中平	低	降	
	中平	高	低	高降					
B-3 (西青小韩庄)	33	45	113	31/52					
	中平	高	低	降					

3.2 B 类单字调内部差异分析

3.2.1 去声调值 31、52 差异的地理分布及解释

B 类调共有 71 个调查点，其中去声为低降的有 50 个（B-1），去声为高降的有 17 个（B-2），去声 31/52 两可的有 4 个（B-3），其地理分布如下图所示。

⁷ 赵伯杨《静海方言声调分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中描写静海方言单字调阴平 33，阳平 55，上声 14，去声 31，总结连读变调规律为：阴阴→阳阴，上上→阳上，去阴→阳阴，去去→阴去，与表 6 中的任何一类不同。由于文中没有写明调查的发音人在静海哪个村，只交代了两位发音人男性 Yang Bin（38 岁，农民）、女性 Li Jinfang（37 岁，家庭妇女），均生长于静海，并在静海读小学初中，不会说普通话，不懂语言学（第 4 页），所以暂且存疑。

图 3：天津方言 B 类调去声调值差异各小类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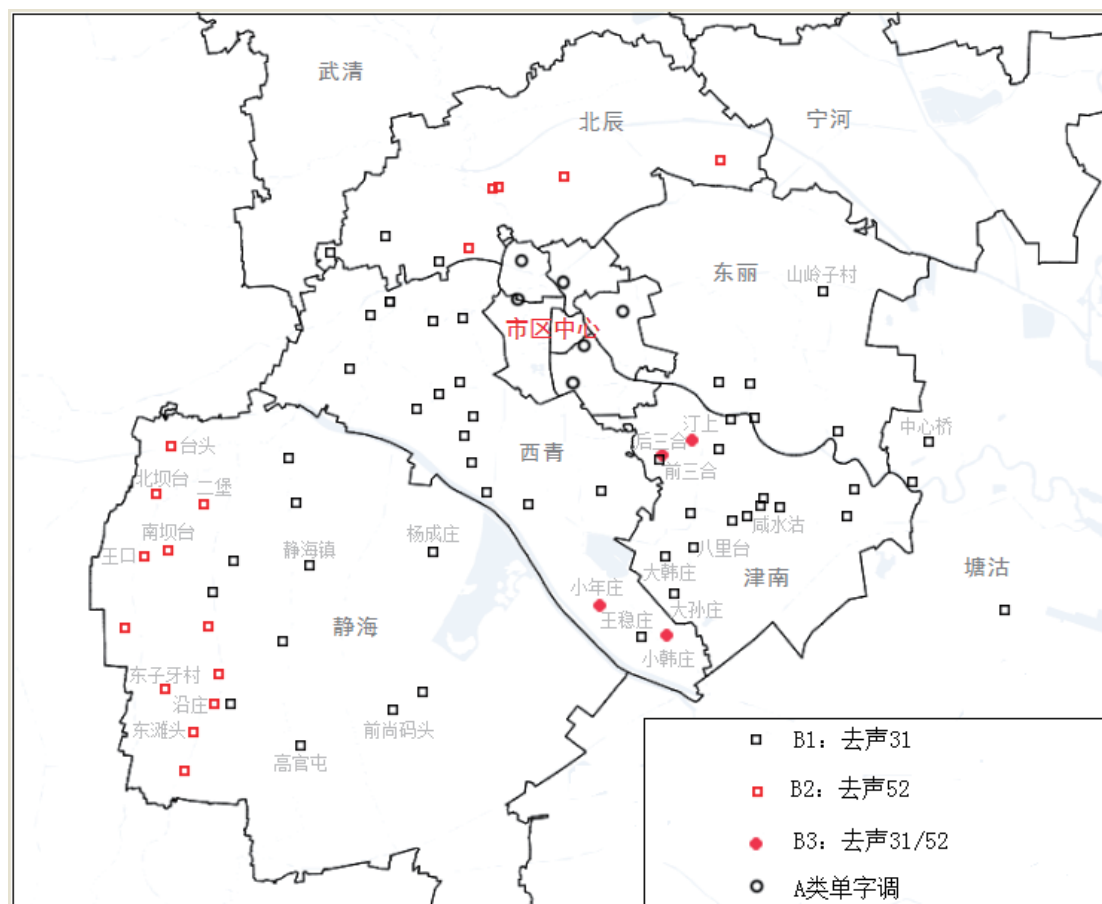


图 3 显示，去声为低降的 B-1 类是主流，去声是高降的 B-2 是支流，均分布在边缘区域；去声 31/52 两可的仅个别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B-1 类去声 31 调在连读变调中保持不变，而去声为高降的 B-2 类在连读变调中部分高降变低降 $52 > 31$ （静海王二庄、王口、北坝台、南坝台），尤其是去声 31/52 模棱两可的 B-3，连读中基本上都变为低降 31；由此推测，B 类去声的底层调值可能是低降调 31，高降是后起的。

3.2.2 阴平调值 43、33 差异的地理分布及解释

在 71 个 B 类调的调查点中，阴平调值有 43、33 的不同，虽然二者听感很接近，但其差异也不可忽视，相关统计情况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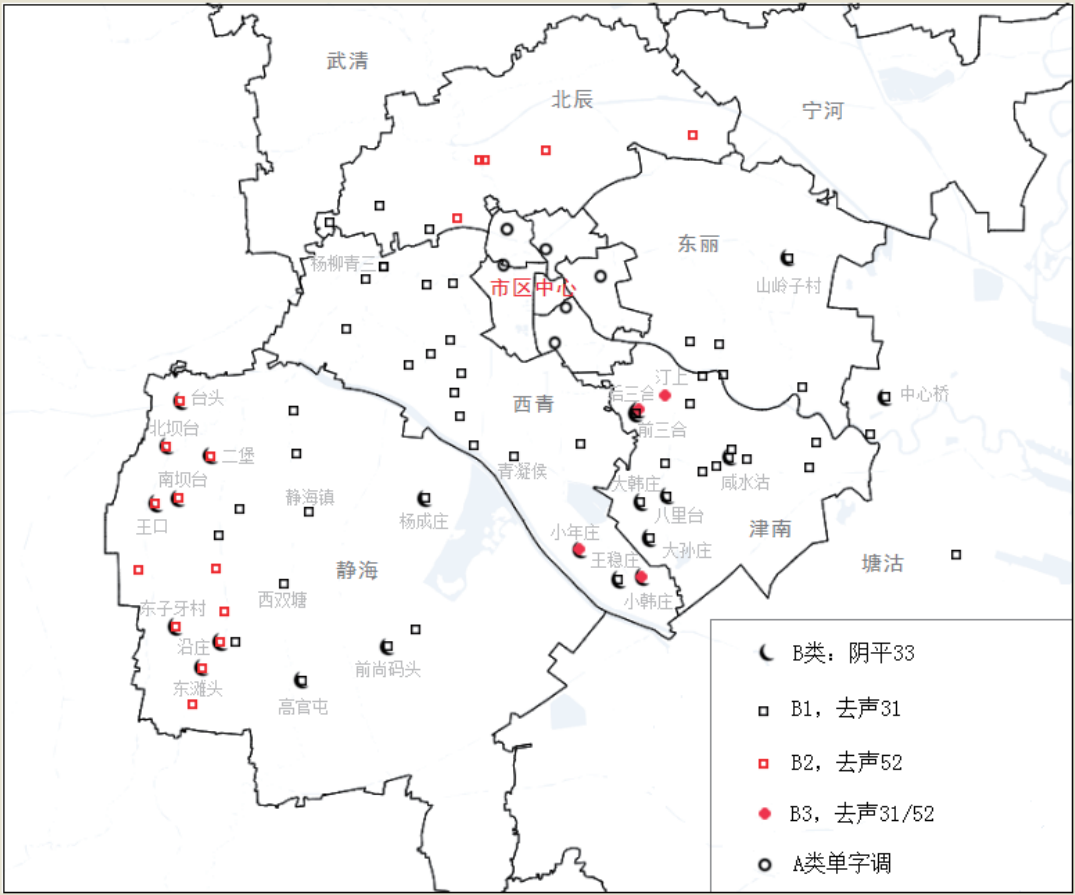
表 8：天津方言 B 类调阴平调值差异统计

调值差异统计 B 类调小类	阴平调值		备 注
	43 调	33 调	
B-1 （去声 31）	39	11	33 调占 22%
B-2 （去声 52）	9	8	33 调占 47%
B-3 （去声 31/52）	1	3	33 调占 75%
合计	49（占 69%）	22（占 31%）	

表 8 显示，整个 B 类调中，阴平 43 调是主流，而且主要在 B-1 中。阴平 33 调多在

B-2、B-3 中。下面是阴平调值差异的地理分布图。

图 4：天津方言 B 类调阴平调值差异的地理分布



从图 4 看，阴平读 33 调的，无论是属于 B-1 还是 B-2、B-3 小类，大多都分布在边缘区域。再来看相关的连读变调情况，下面选取代表性方言点进行比较（B 类的连读变调总体规律见前文表 6）。

表 9：天津方言 B 类调阴平调连字调比较

连字调 两字组	B-1（去声 31）		B-2（去声 52）		B-3（去声 31/52）	
	阴平 43	阴平 33	阴平 43	阴平 33	阴平 44	阴平 33
阴平+阴平	55+32/43	45+33	44+32	43/45+32	44+43	34+32
阴平+阳平	43+45	53/43+45	44+45	43/33+45	44+45	33+45
阴平+上声	43+213	53/43+113	44+113	43/33+113	44+213	33+113
阴平+去声	55+31	45+31	55+52	33/45+52	44+31	44+52
方言代表点	静海独流	静海高官屯、 杨成庄	静海子牙乡 王家村	静海二堡、王 口，东滩头	津南汀上	西青小韩庄

由于 B 类调有“阴阴→阳阴、阴去→阳去”的连读变调规律，所以注重阳平、上声前的阴平调值。基本情况是：阴平调值为 43 类的在连读中没有发现变为 33 的；而阴平调值为 33 类的，连读中却有变为 43 的；考虑到 B 类调中阴平为 33 调的虽数量少（仅占 31%，参见表 8），多分布在边缘地带（参见图 4），但在 B-1、B-2、B-3 类中都存在，

笔者调查⁸静海镇单字调的 Praat 语图显示，阴平调值曲线倾向于 433，而且 33 比 43 更宜作为基础调，因此推测，43 调是由 33 调变来的，即 33 调是底层调值。

3.3 小结

天津方言的 B 类单字调和连字调格局的差异表现为阴平、阳平调的互换(参见表 7)。
B 类调的阴平存在 43、33 的差异，去声存在 52、31 的差异；根据其地理分布特点及连读变调情况分析，推测阴平调底层调值是 33 调，去声底层调值是 31 调。
天津方言的 B 类调主要集中在历史悠久的静海，体现天津土著民方音特点，其单字调、连字调均不同于作为明代天津卫移民语言的 A 类调。

四、天津方言 C、D 类单字调和连字调

4.1 天津方言 C 类单字调和连字调

天津方言的 C 类分布于北部，离天津老城区较远，主要所在区域蓟州（蓟县）、宝坻、宁河 1973 年划归天津市，因此其单字调与相邻的河北方言一致或近似。

4.1.1 C 类单字调的内部差异及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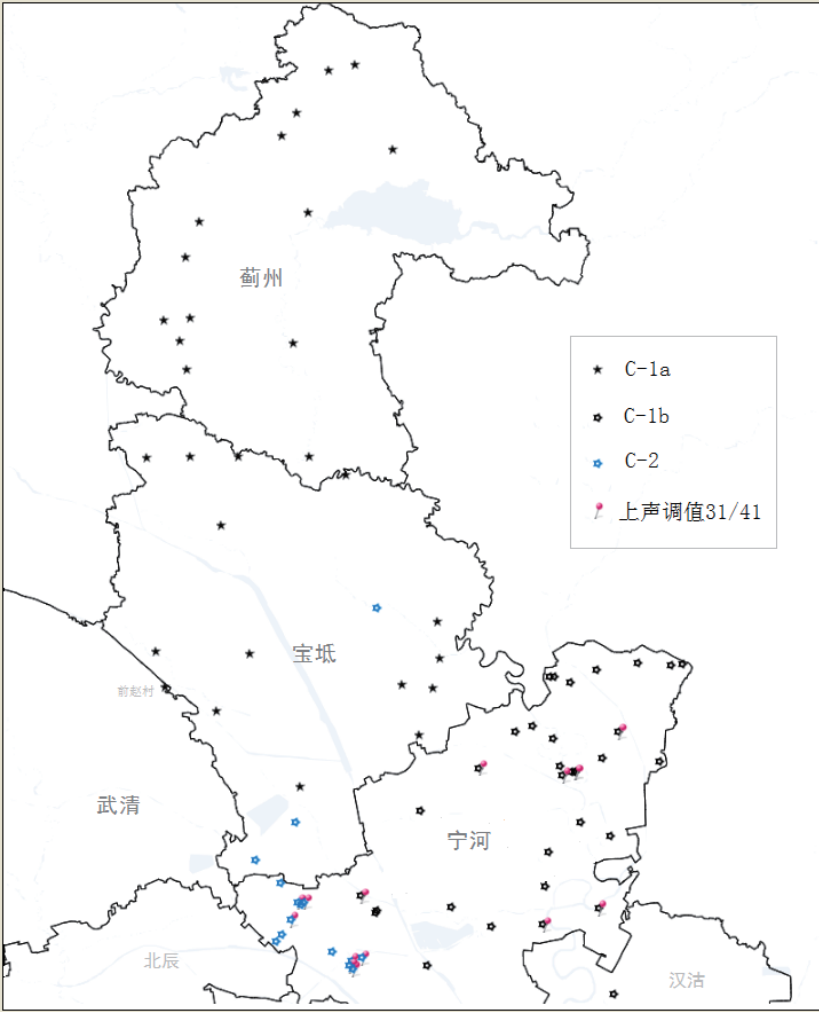
C 类调共有 78 个调查点，单字调内部存在差异，具体调值情况见以下图表。

表 10：天津方言 C 类单字调内部差异

分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调查点数量	主要分布区域
C-1	a	55	22/33	213/214	52/51	29 个	蓟县、宝坻
	b	35/45	32/33	312	52/53	25 个	宁河
		35/45	32/33	31/41	52/53	8 个	
C-2		55/45	24	312	52/53	9 个	宁河、宝坻
		55/45	24	31/41	52/53	7 个	宁河

⁸ 笔者 2019 年 8 月调查了静海县静海镇的傅先生（52 岁）和姚先生（43 岁），二位在静海土生土长，自称说的是标准静海话，他们的单字调和两字组连读变调与杨自翔先生 30 年前调查的静海话（B-1 类）基本一致，用 Praat 软件分析其单字调调值：阴平 433，阳平 445，上声 113，去声 41，连读变调规律保持不变。

图 5：天津方言 C 类单字调差异的地理分布



4.1.2 C 类调的连字调

C-1a、C-1b、C-2 各类的连读变调规律有一致性，也有差异，简示如下表（注：表中连读变调规律按主流情况标注“+”“-”，忽略个别方言点的例外）。

表 11：天津方言 C 类单字调与连读变调

单字调类别 连读变调主要规律	C-1a (阳平 22)	C-1b (阳平 32)	C-2 (阳平 24)
	29 个点	33 个点	16 个点
阴去→上去 55/35+52→13/213+52	+	+	-
阳阴→阴阴 22/33+55/35→35+55	-	+	-
阳阳→阴阳 22/33+22/33→55/35+22	+	+	-
阳上→阴上 22/33+213/31→55/35+213/41	+	+	-
阳去→阴去 22/33+52→45/35+52	+	-	-
阳去→上去 22/33+52→213+52	-	+	-
上+上→升调+上 213/31+213/31→35/25+213/31	+	+	+

表 11 显示，C-1a、C-1b 的连读变调大多一致，C-2 则明显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C-1 类连读变调的显著特点是阳平前字由低调变阴平高调，而且阴平高调（55/45/35）在去声降调（51/52）前变作低升 13/213，这种变调很特殊，故在连字调格局中予以体现。C 类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的内部异同如下表。

表 12：天津方言 C 类单字调及其连字调格局

声调格局 分类	代表点单字调				连字调格局				说明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C-1a (蓟县洪水庄)	55	22	213	51	13	35/55	21/24	51	格局变化 阴+去→13+51
	高	低	降升	降	低	高	降升	降	
C-1b (宁河南理珠)	45	32	312	52	13	35/55	31/24	52	阳平前字多变 高调
	高	低	降升	降	低	高	降升	降	
C-2 (宁河朱中台)	45	24	312	53	55	24	21	52	格局不变
	高	升	低	降	高	升	低	降	

4.1.3 关于 C 类调的上声调值差异分析

在天津方言 C 类调区域内，北端蓟县全部、中间宝坻大部均属于 C-1a 小类，单字调和连读变调规律内部一致性强（参见表 10-11，图 5）；而南边宁河境内存在着 C-1b、C-2 类，并且上声调值有降升调 312/412 和降调 31/41 的差别。

C 类单字调上声调值存在 213、212、312/412、31/41 的差别，根据地理分布，C 类单字调的上声调值从北到南呈似乎呈现低降升→高降升→降调变化趋势（如下面图 6 所示）；上声为降调 31/41 的方言点数量少且多与高降升调 312/412 方言点相邻或交替。

再从连读变调看，C 类调上声无论是凹调还是降调，其共同点是：（1）前字变 31（后字阴平、去声）和 24（后字阳平、上声）；（2）轻声前变 41/31；（3）上声单字调是凹调（多为起点高于终点或持平），连读后字为有读降调 31/41 或为变体（例如，从东北到西南有后棘坨兰庄、东棘坨于京庄，大北闸沽大北村，廉庄高院村、任凤村、朱中台等）。

如果扩展视野，天津辖区内官话方言的上声调主流是 13/213/214，而靠近天津的北京官话、冀鲁官话的上声也基本上都是 213/214；不过，这一片的保定、霸州、文安、静海等地普遍存在上声在轻声前读作 312/412 或者 31/41 的现象。

鉴于上述情况，C 类上声单字调调值 213、212、312/412、31/41 的内部差别，就可能有两种方向的演变序列：

演变方向之一：由低降升到高降升再到降调 213→212→312/412→31/41，这种演变比较特殊，逆主流异化，体现方言个性。

演变方向之二：由降调到高降升再到低降升 31/41→412/312→212→213，这是朝强势方言方向变，依据“轻声前变原调”推测其变化起点。可是，这一片土著方言的上声原调值究竟是不是中降调还须研究。

★ C-1a
 ★ C-1b
 ★ C-2
 ★ 上声调值 31/41

宝坻
 武清
 宁河
 汉沽

上声 213
 上声 212/312/412
 上声后字变 31/41

天津方言的 D 类分布于西北边，主要在武清（1973 年划归天津），北辰、宝坻境内有少量方言点，东丽、蓟县有个别点。

4.3 小结

C-1 的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有差别，其连读变调典型表现是：阴平在去声前由高变低（55→13），阳平前字则多由低变高（22→55）。

分布于天津西北边的 D 类调与北京话基本相同，内部差异很小，一致性强。

五、天津方言各类声调比较分析

5.1 天津方言 A、B、C、D 类主流的连读变调规律比较

这里选取天津方言各类声调的主流 A-1、B-1、C-1、D 作比较。

天津方言非轻声两字组连读变调均为前字变调，各类声调在轻声前均保持单字调调值，但连读变调规律各不相同。比较如下（下表中的调型描写，五度值一度之差的按平调处理）。

表 13：天津方言 A、B、C、D 类主流的连读变调规律比较

变调规律 声调组合	A 21 45 13 53	B 43 45 113 31	C 55 22 213/313 52	D 55 35 213 51
阴平+阴平	阴阴→上阴 21→13/__21	阴阴→阳阴 43→45/__43		
阴平+去声		阴去→阳去 43→45/__31	阴去→上去 55→13/__52	
阳平+阴平			阳阴→阴阴（≈50%） 22→45/__55	
阳平+阳平		阳阳→阴阳 45→43/__45	阳阳→阴阳 22→55/__22	
阳平+上声		阳上→阴上 45→43/__113	阳上→阴上 22→55/__313	
阳平+去声			阳去→阴去（≈50%） 22→45/__52 阳去→上去（≈50%） 22→213/__52	
上声+上声	上上→阳上 13→45/__13	上上→阳上 113→45/__113	上上→升上 213→35/__313	上上→阳上 213→35/__213
去声+阴平	去阴→阳阴 53→45/__21	去阴→上阴 31→13/__43		
去声+去声	去去→阴去（≈2/5） 53→21/__53	去去→上去 31→13/__31		
变调特点	①低→低/__低平 ②低→高/__低升 ③高→高/__低平 ④高→低/__高降	①中→高/__中平 ②中→高/__低降 ③高→中/__高平 ④高→中/__低升	①高→低/__高降 ②低→高/__高平 ③低→高/__低平 ④低→高/__低降升	①低→高/__低升

		⑤低→高/__低升	⑤低→高/__高降	
		⑥低→低/__中平	⑥低→低/__高降	
		⑦低→低/__低降	⑦低→高/__低降升	

根据上表，各类声调的连读变调规律特点比较分析如下。

(1) 天津方言各类声调共有上上相连前字变高调规律，这也是北方官话的共有特点；其原因是上声为复合调值 113/213 且在低调位，为发音省力，语流中会消除复杂调并且前字变高调。

(2) A 类以同调域调型变化为主，其“阴阴→上阴”(21→13/__21)、“去阴→阳阴”(53→45/__21)在低调域、高调域内的调型变调在北方官话中是少见的。

(3) B 类以跨调域调型变化为主；C 类全是跨调域高低变化；B、C 类的共性是变调规律多，二者共有音类变调规律“阳阳→阴阳”“阳上→阴上”，阳平调无论高低都参与变调，由此可见 B、C 两类方言关系密切深厚。

(4) D 类声调与北京话一致，除了“上上→阳上”以外，连读变调规律与 A、B、C1 三类都不同。

(5) 总体而言，天津境内方言的跨调域变调更多且分布广，但老城区 A 类则不然，同调域调型变化为主，阳平不参与变调，与 B、C、D 类不同。

5.2 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动因分析

天津方言连读变调的根本动因是保持方言自身韵律特点的内在调节变化。

关于 A 类调，石锋、王萍(2004)根据天津方言 A 类调(A-1)老派“阴阴→上阴”，新派“阴阴→阳阴”(21+21→45+21)，指出这是新派受普通话影响阴平调变高的结果；刘巍(2020)认为：30 年前天津近郊边缘(A-2, A-3, A-4)的“阴阴→阳阴”是天津中心方言对郊区扩张形成的，近年天津城中心新派的“阴阴→阳阴”是普通话对天津城中心方言的影响。笔者认为，A 类调(A-1)新派“阴阴→阳阴(21+21→45+21)”也不排除自然音变的可能性，因为两个低调相连很容易前字变高调(OCP 原则)，而且就整体系统看，新派保持“去阴→阳阴(53+21→45+21)”、单字调不变，并未受普通话影响。

关于 B 类调，其单字调、连字调近三十年来无明显变化。B 类的连字调特点是阴平、阳平调值互换，有学者认为，“幽燕板块”(包括天津境内方言)阴平、阳平变调是在北京话的牵引作用下产生的(张世方 2010:162)，但是，B 类阳平与北京话阳平调值同为高升，变调为中平，反而与北京话不同了，故其变调动因来自音系内部。

关于 C 类调，有学者认为，蓟县方言(C-1 类)阳平 22/33 前字变高调是因北京话影响所致(支建刚 2007:24-25)。确实，C-1 类单字调除了阳平是 22 低调，阴、上、去的调值都和北京话基本一致，而且阳平前字多变为近似北京话阳平的高调，但是，其阴平 55 调在去声前都变低升调 13/213，这与北京话差别很大；而且，C-1 内部阳平前字是否变高调有区域差异，蓟县、宝坻区域(C-1a)的阳平在阴平前保持低调，宁河境内(C-1b)的阳平在去声前保持低调(参见表 11)，未朝北京话方向变，而显示出方言内部韵律特

点的制约力。

5.3 天津方言 A、B、C、D 类主流的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比较

这里选取天津方言 A、B、C、D 类的主流 A-1、B-1、C-1、D 作比较。

表 14：天津方言 A、B、C、D 类主流的单字调与连字调格局比较

类型	单字调格局				连字调格局				说明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A	21 低	45 高	13 升	53 降	21 低	45 高	13 升	53 降	格局一致
B	43 中	45 高	113 升	31 降	45 高	43 中	113 升	31 降	阴平、阳平互换
C	55 高	22 低	213 升	52 降	22 低	55 高	213 升	52 降	阴平、阳平互换
D	55 高	35 升	213 低	51 降	55 高	35 升	213 低	51 降	格局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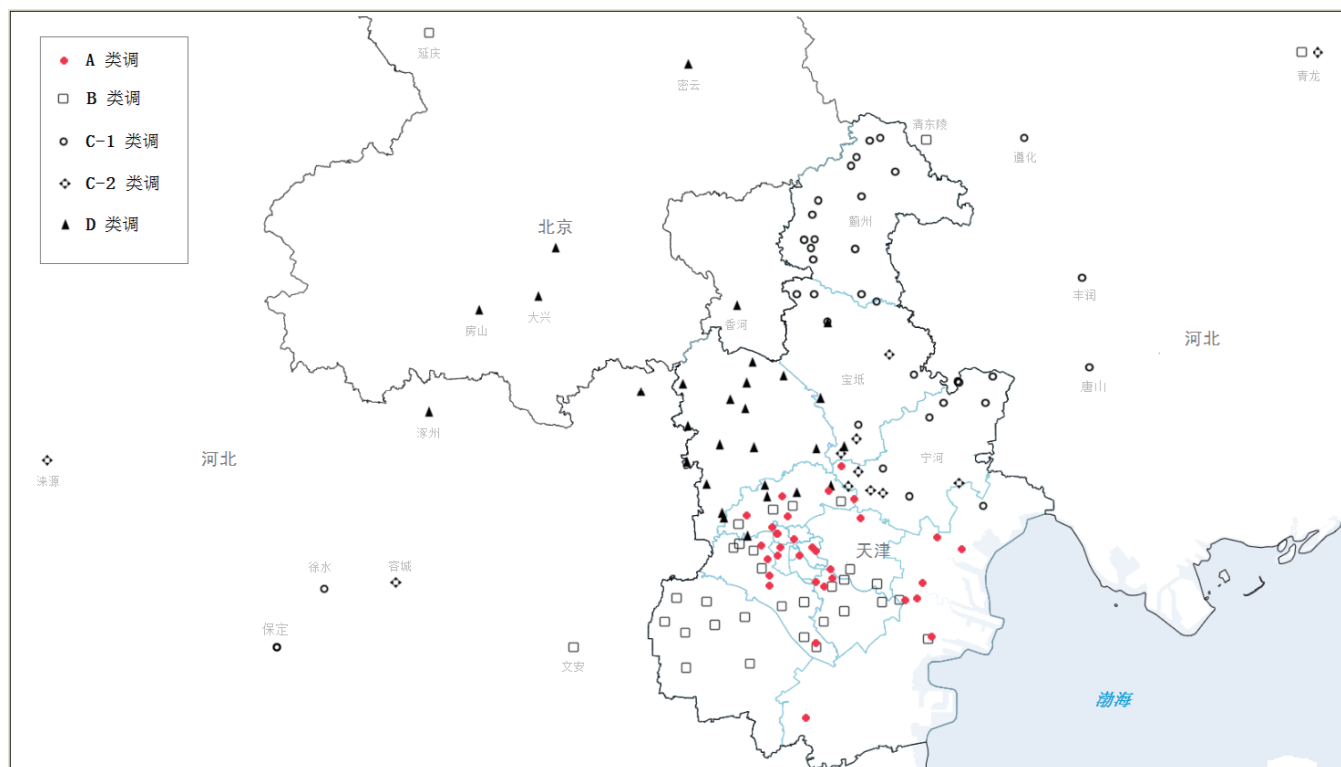
上表显示，B、C 两类连字调阴、阳平调值互换导致声调格局变化；而连读变调中阴平、阳平调值互换是“幽燕板块”方言典型性的普遍现象（参见张世方 2010:158-163）。

A（天津老城区）、D（武清区，同北京话）的格局不变，这是否显示其更具稳定性，且与 B、C 类底层有所不同？

5.4 天津方言 A、B、C、D 类单字调在周边地区的分布

天津方言 A、B、C、D 类单字调在周边地区的分布情况如下图（图中津外方言点材料引自张世方 2010：146-148，刘援朝 1991，杨春宇 2010，李子鹤 2008，杨春霞 2016，殷倩楠 2017，张琦 2018，陈晓 2018）。

图 7：天津方言 A、B、C、D 类单字调在周边地区分布图



上图显示，与天津方言 B、C、D 类单字调相同的方言点在周边地区均有分布（因地图所限，河北承德、围场、安国，辽宁锦州、葫芦岛、朝阳、兴城、义县等地也有分布），唯独 A 类调只限于天津境内，且集中于老城区。

六、结语

（一）天津境内的 A、B、C、D 四类声调系统分别由单字调和连字调双层系统构成；连读变调的根本动因是保持方言自身韵律特点的内在调节变化。

（二）相同的单字调也许连读变调规律不同，这很可能反映其底层来源的不同，如 A 类调的非主流变调规律及连字调格局差异，显示出原有底层调可能是 B 类或 D 类调。

（三）连读变调规律更能反映方言底色，B、C 类阳平调值高低不同，但共有音类变调“阳阳→阴阳”“阳上→阴上”规律，可见二者作为“幽燕板块”方言历史关系深厚。

（四）单字调格局与连字调格局有可能一致或不一致；A、D 类的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一致，考虑到 A 类是天津强势方言，D 类同北京话属权威方言，所以初步设想单字调、连字调格局一致的声调系统更具稳定性，但这须要更多方言的调查研究来求证。

（五）A 类调方言代表老天津话，至今学界对老天津话的历史来源存在不同观点。王临惠(2019:176)新著的结论：“天津方言的底层是生活在这一区域土著居民的方言。”⁹

⁹ 王临惠《天津方言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2019:176):“天津方言与周边方言底层一致，个别变异现象从周边的方言中都可以找到源头，如天津方言阴平读低降调，与山东境内的方言一致，

路继伦等(2019: 169)研究结语:“天津话源自宿州话的假说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¹⁰可是,A类的声调格局、连读变调特点、分布区域等各方面都与土著方言B、C类明显不同,也与D类(属北京话声调)迥异;为什么会这么另类?如果排除开初建立天津城的明代天津三卫大批军屯移民后裔语言的因素,是很难说清楚的。

附记: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官话方言连字调格局研究”(批准号20AYY020)的资助。承蒙杨自翔先生热情支持本文得以使用他的调查资料,谨此向杨先生深表敬意和感谢!同时,感谢南开大学博士生刘巍同学帮助整理杨先生30年前的调查材料。这篇论文曾在南开师生语言学术沙龙中讨论过,刘巍、倪博洋、鄢卓、曾智超、刘欣、肖能萍、刘京杰同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艾溢芳 2016《高本汉<北京话语音读本>整理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 晓 2018《清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北京话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第4期。
- 丁邦新 1982“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4:629—644。
- 李 倩、史濛辉、陈轶亚 2020《声调研究中的一种新统计方法》,《中国语文》第5期。
- 李世瑜、韩根东 1991《略论天津方言岛》,《天津师大学报》第2期。
- 李思敬 1995《切韵音系上去二声全浊声母字和部分去声次浊声母字在河北宁河方言中的声调表现》,《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
- 李行健、刘思训 1985《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第1期。
- 李 旭 2019《天津汉沽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方言》第4期。
- 李子鹤 2008《保定话连读变调现象及解释》,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 巍 2020《天津方言阴平+阴平两种变调形式的时空解释》,《汉字文化》第9期。
- 刘援朝 1991《北京话与四周邻近地区四声调值的差异》,《语文研究》第8期。
- 路继伦、李哲、王晓梅、殷悦、路云 2019《优选论框架下的天津方言语源研究》,天津:

知庄章组字声母与精组洪音字声母合流和东北官话、胶辽官话一致。因此,可以断言,天津方言的底层是生活在这一区域土著居民的方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来自周边的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可问题是,同在一个区域,同样不可避免周边各种官话方言的渗透影响,为什么天津老城话与静海、西青等郊区土著方言明显不同?

¹⁰ 路继伦等《优选论框架下的天津方言语源研究》(2019: 168-169):“从声调系统、连读变调情况和优选论音系分析上看,天津方言和宿州方言既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天津话源自宿州话的假说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此项研究基本思路存在问题,首先,所针对的“天津方言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淮北平原”(李世瑜、韩根东 1991)观点后来得到补充修正,据文献记载明代天津三卫官兵及随军家属并非来自宿州一个点,其主体来自明代南直隶辖区各州县,他们的通用语是弹性的“南京官话”(曾晓渝 2013);其次,仅以现代天津话与宿州话声调比较论证二者600年前是否有渊源关系,研究思路方法上存在时空问题,故所得结论尚欠说服力。

天津大学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 2010《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 石 锋 1986《天津方言双字组声调分析》，《语言研究》第 1 期。
- 石 锋、王 萍 2004《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载沈钟伟、石锋主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王临惠 2019《天津方言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 斌 2012《宁河方言语音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春霞 2016《北京密云县方言语音格局的实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杨春宇 2010《辽宁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杨自翔 1980s-1990s《天津方言调查资料》，未刊稿。
- 杨自翔、国赫彤、施向东 1999《天津话音档》，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殷倩楠 2017《北京房山方言语音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曾晓渝 2013《天津话源流焦点问题再探讨》，《中国语文》第 2 期。
- 张 琦 2018《北京大兴方言语音格局的实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世方 2010《北京官话语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赵伯杨 2009《静海方言声调分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支建刚 2007《蓟县方言语音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onosyllabic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Tianjin Dialect

ZENG Xiao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ndarin dialects in Tianjin consist mainly of a four-ton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304 dialect points, this paper show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 B, C, and D types in the four-tone category of Tianjin dialec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syllabic tone and tone sandhi within each dialect and its changes;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different tone types.

日照方言尖团音的地理语言学调查

亓海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 本文采用“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对日照多个乡村尖团音的读法进行调查,并以“椒-娇”为例对日照方言内部的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日照方言中尖团音正在发生变异,尖团音处于腭化过程中。

一、调查缘起

日照位于山东东南部,包括东港、岚山、莒县、五莲四个不同的区,日照东临黄海,西部与莒南相接,北部与胶南相邻,南部与江苏相连。

日照方言属于胶辽官话青莱片,具有胶辽官话的典型特征。日照方言精组细音字和见组细音字读法不同,也就是分尖团,尖团音的读法在山东方言中比较特殊。在日照内部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读音类型。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2002)描写了诸城、五莲一带方言的语音特点,指出山东五莲分尖团,团音字读“tʃ, tʃʰ”,精组字读“t, tʰ”石明远在《莒县方言志》(1995)中记录了莒县尖团音字的读法,尖音字为“ts, tsʰ, s”,团音字为“tɕ, tɕʰ, ɕ”,岳立静(2005)对日照东港区24个方言点“知庄章”和“精见端”母字的读音类型进行调查描写,指出日照东港区精组细音字和见组细音字存在地域差异,与知庄章组字存在或分立或合流的复杂的对应关系。从上述学者的调查可以看出日照方言不同方言点精见组字发音差异大,精见组字音值和音类存在复杂的关系。

据我们的前期初步调查发现日照方言尖团音内部差异较大,特别是非擦音声母字,精组细音字在日照内部有“tθ、t、tɕ”三种不同的读法,见组细音字有“tɕ、ts、tʃ”三种不同的读法,除了声母的读法不同,有些方言点精、见组细音字的对立还体现为介音有无的对立,同时在部分方言点精组字内部还存在几种不同的读法,形成了一种读音混杂的面貌。

远藤光晓(2011: 39)指出通过三维的观察角度可以考察语言变异在一个地区不同时期之中产生的变化,将其称为“时空序列地图”,并采用三维“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涉及到地理空间和时间轴,观察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之中发生的变化”(远藤光晓, 2011),它最早由日本地理语言学家提出,德川宗贤1968年在新潟县糸鱼川早川谷沿峡谷对线性密集排列的方言点进行方言词汇的调查,使用了“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并绘制地图,显示出这一区域线性排列的各点发生的年龄变化。

为调查日照方言尖团音变异的现状,我们采用“glottogram”的调查方法,分别在2018年7月、10月和2019年9月先后三次赴日照进行田野调查,对日照近百个村庄不同年龄发音人尖团音的读法进行了密集调查以观察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尖团音产生的变化。

我们在日照西部的莒县、东部的东港、中部的五莲从北到南各选择了一条线路进行密集调查，然后又在日照中部自西向东选择了一条路线进行调查。每条线路选择 7-8 个乡村，每个乡村选择 3-5 人，对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发音人进行年龄差异的调查，以“椒-娇”为例呈现不同类型的变异情况和变异路径。

二、三条路线的调查结果

2.1 路线一：西部不同乡村的年龄差异调查

线路一的调查点分布在日照西部，在莒县一带，在莒县我们调查了包括西韩家村、孙家山沟、宅科、金华、郭家泥沟、大林茂、龙王庙、南马坡、尹湖、西蒋村、杨家官庄、王家官庄、徐家村、躲水店子、李家念头、刘家菜园、城阳、姚家村、墩头涯子村、庄家围子、小罗庄、汀沟村、庄科、小店、长岭、穆家村、小寺、赵家石河、赵家坛子、东大庄、大石头在内的 26 个乡村，莒县地区全部方言点的地理语言学调查结果已另文描写。

在此选择以莒县县政府所在地城阳镇为中心由北到南分布的 8 个乡村，以呈现莒县型尖团音的年龄变异情况。

莒县型各乡村团音字“娇”都腭化为舌面音，尖音字“椒”处于变异中，尖音在不同乡村的几个年龄段内形成由“tθiɔ→tθjiɔ→tɕiɔ”的变异，从北到南各方言点尖音字腭化速度逐渐加快。位于莒县北部的庄科 20 岁左右的发音人尖音字“椒”仍与团音字有区别，位于这条线路南部的南马坡 40 岁左右的发音人尖团音已经没有区分了。

我们以“椒-娇”为例，呈现莒县型各点的发音情况。表一中尖音未腭化，“椒-娇”为 tθiɔ-tɕiɔ 的我们用 O 表示；尖音有腭化色彩，“椒-娇”为 tθjiɔ--tɕiɔ 的我们用●表示；尖音已完全腭化，“椒-娇”为 tɕiɔ-tɕiɔ 的用⦿表示。

表一 线路一“椒-娇”的读法

	1 南马坡	2 杨家官 庄	3 王家官 庄	4 李家念 头	5 城阳 街道办 事处	6 庄家围 子村	7 小罗庄	8 汀沟村	9 庄科
70-	O		O	O			O		
60-	O	O		O	O	O	O	O	O
50-		●	O		O				
40-	⦿		⦿			●		●	●
30-	⦿	⦿		●	●			⦿	
20-					⦿	⦿	●		●
10-	⦿			⦿					⦿

2.2 路线二：中部不同乡村的年龄差异调查

我们在日照中部由北向南调查了多个乡村，由北向南包括：许孟镇许孟村、高泽镇高泽村、洪凝镇莫家村、街头镇后街头村、南湖镇黄山村、三合镇一村、后村镇焦家集子、黄墩镇南塔村等村庄。

中部乡村由北向南老年人尖团音之间的地理差异不明显。尖音字“椒”在线路二北部的许孟村、高泽村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读为 tio ，团音字“娇”读为 $tsɔ$ ，尖团音区分明显，尖团音的区别既体现为声母的不同，也表现为介音的不同；在线路二南部的各乡村，比如焦家集子、南塔村在“椒-娇”老年人的读法也是“ tio -- $tsɔ$ ”，在线路二不同的地点之间老年人读法较为一致。

在同一村庄内部不同年龄之间尖团音读法有差异，读法多样，以许孟村为例，45 岁中年发音人尖团音读法发生了变化，尖音字“椒”腭化为 $teio$ ，“椒-娇”读法为“ $teio$ - $tsɔ$ ”。在线路二的洪凝镇莫家村 30 岁左右的青年发音人尖音字和团音字都发生腭化，“椒-娇”读法为“ $teio$ - $teio$ ”。中部各乡村尖团音在不同年龄发音人中形成“ tio - $tsɔ$ ”→“ $teio$ - $tsɔ$ ”→“ $teio$ - $teio$ ”的变化。

我们以“椒-娇”为例，呈现线路二五莲型各点的发音情况。表一中尖音未腭化，“椒-娇”为 tio -- $tsɔ$ 的我们用 $\oplus$ 表示；“椒-娇”为 $tsio$ -- $tsɔ$ 的我们用 $\otimes$ 表示；尖音有腭化色彩，“椒-娇”为 $teio$ -- $tsɔ$ 的我们用 $\odot$ 表示；团音腭化，“椒-娇”为 tio -- $teio$ 的我们用 $\ominus$ 表示；尖团音均腭化，“椒-娇”为 $teio$ - $teio$ 的用 $\bullet$ 表示。

表二 线路二“椒-娇”的读法

	1 许孟村	2 高泽村	3 莫家村	4 后街头村	5 黄山村	6 三合一村	7 焦家集子	8 南塔村
70-				$\oplus$				
60-	$\oplus$	$\oplus$	$\oplus$	$\oplus$	$\oplus$	$\oplus$	$\oplus$	$\bullet$
50-								
40-	$\bullet$	$\otimes$	$\bullet$	$\ominus$	$\ominus$	$\otimes$	$\ominus$	$\bullet$
30-	$\bullet$	$\bullet$	$\odot$	$\ominus$	$\ominus$	$\bullet$	$\ominus$	$\odot$
20-								

2.3 路线三：东部不同乡村的年龄差异调查

线路三我们选择以东港区日照街道办事处高家岭为中心、由北到南分布的 9 个乡村，以呈现东部线路各点尖团音的年龄变异情况。

在日照东部我们由北到南调查了 9 个乡村的多位发音人，共调查了包括户部黄庄沟、叩官镇叩关村、潮河镇刘官庄、河山镇小暖庄、日照街道高家岭、奎山街、高兴镇南范子村、涛雒镇涛雒村、虎山镇童家庄子村 23 个乡村，它们分布在日照东北部、东南部各乡镇。

线路三 60 岁以上老年人尖团音对立清晰，但不同乡村老年人尖团音的读法有差异。除潮河镇刘官庄村外，由北向南的其余 8 个调查乡村老年人尖音字“椒”都读为“ tio ”；团音字读法在不同乡村有差异，中心地带高家岭和周边的小暖庄团音字腭化，其他乡村老派团音字“娇”都读为 $tsio$ 。

线路三 40 岁以下中、青年人读法发生快速变化，在线路三的不同乡村及不同年龄发音人中形成“ tio - $tsɔ$ ”/“ tio - $tʃɔ$ ”→“ $teio$ - $tsɔ$ ”/“ tio → $teio$ ”→“ $teio$ - $teio$ ”的变化，由北向南逐渐扩散。

我们以“椒-娇”为例，呈现线路三各点的发音情况。下表中尖音未腭化，“椒-娇”

为 $t_{i\sigma}--ts_{\sigma}$ 的我们用 $\oplus$ 表示；“椒-娇”为 $t_{i\sigma}-t_{f\sigma}$ 的我们用 $\circ$ 表示；尖音有腭化色彩，“椒-娇”为 $te_{i\sigma}--ts_{\sigma}$ 的我们用 $\bullet$ 表示；团音腭化，“椒-娇”为 $t_{i\sigma}--te_{i\sigma}$ 的我们用 $\ominus$ 表示；尖团音均腭化，“椒-娇”为 $te_{i\sigma}-te_{i\sigma}$ 的用 $\odot$ 表示。

表三 线路三“椒-娇”的读法

	1 户部黄 庄沟	2 叩官镇	3 潮河镇刘 官庄	4 河山小暖 庄	5 日照高 家岭	6 奎山	7 高兴镇南 范子村	8 涛雒	9 虎山
60-	$\oplus$	$\oplus$	$\bullet$	$\circ$	$\bullet$	$\bullet$	$\ominus$	$\bullet$	$\bullet$
50-	$\oplus$	$\bullet$					$\ominus$		
40-			$\bullet$	$\circ$	$\bullet$	$\bullet$		$\bullet$	$\bullet$
30-	$\bullet$	$\bullet$	$\odot$	$\odot$	$\bullet$	$\bullet$	$\ominus$	$\bullet$	$\bullet$

三、结语

我们以“椒-娇”为例呈现了日照方言几条调查线路上不同的乡村之间尖团音读法的差异，由前文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日照方言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尖团音的读法上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尖团音读法更存古，西部地区莒县一带发展变化较快，在西部莒县一带团音字不论老派、新派均完成了腭化，西部调查线路尖团音的区别只体现在尖音上；而东部地区，以东港为代表的各点，老派尖音字和团音字都未完成腭化，可以清楚地区分。

第二，日照中部路线尖团音读法最为保守，内部差异小，中部线路尖团音的区别更多的体现为同一调查点新、老派年龄的差异。从中部线路新、老派的差异看，我们可以看到尖团音在由分到混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方式，在尖团音混同的过程中，一方面腭化音变不断推动尖音字声母和团音字声母同时朝着腭化的方向合并，另一方面，又会在合并的过程中出现矫枉过正的变化结果。

第三，在日照方言内部尖团音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变异，本文主要呈现的是各方言点的地理变异和年龄变异，具体到每个乡村内部，在不同的字和不同的词语之间尖团音读法仍有不同，需要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分析才能全面展示其变异过程。

附录（一）日照方言尖团音调查线路图



致谢：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YJA740034）的阶段成果。感谢岩田礼教授和远藤光晓教授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 罗福腾 2016 胶辽官话尖团音的现状与演变轨迹,《中国方言学报》
- 石明远 1995 《莒县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年
- 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 2002 《诸城方言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 亓海峰 2019 山东莒县方言尖团音的社会地理语言学研究,《语言研究集刊》第 2 期
- 亓海峰、远藤光晓 2019 山东莒县方言尖团音变异的初步考察,《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 5 辑
- 远藤光晓 2011 时间序列语言地图,《中国方言中的语言学与文化意蕴》,韩国文化社
- 岳立静 2005 日照方言知庄章和精见端的读音类型,《方言》第 3 期
- 曾晓渝 2005 从年龄差异看现代荔波话音变的成因,《语言科学》第 4 期
- 张慧丽、段海凤、陈保亚 2018 腭音与腭化音,《语言研究》第 1 期

A geolinguistic survey of ‘Jianyin’ and ‘Tuanyin’ in Rizhao dialect of Chinese

Qi Haife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Glottogram method to survey the pronunciation of ‘Jianyin’ (original sibilant series succeeded by high-front vowels) and ‘Tuanyin’ (original velar series succeeded by high-front vowels) in several villages of Rizhao. The age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the Rizhao dialect are analyz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Rizhao dialect’s ‘Jianyin’ and ‘Tuanyin’ are changing and are in the process of palatalization.

山东青州方言“日”字读音的地理分布及历史层次

刘欣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山东青州方言中“日”字音情况比较复杂，在表层共存的多种读音的分布差异之下可能存在历时演变的序列。本文运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研究“日”字音，通过绘制方言地图来窥探分析“日”字音地理分布差异及原因，同时剖析表层共存下的历时演变序列，同时尝试结合儿系字和其他日母字描绘演变链条，并通过共时差异分析语言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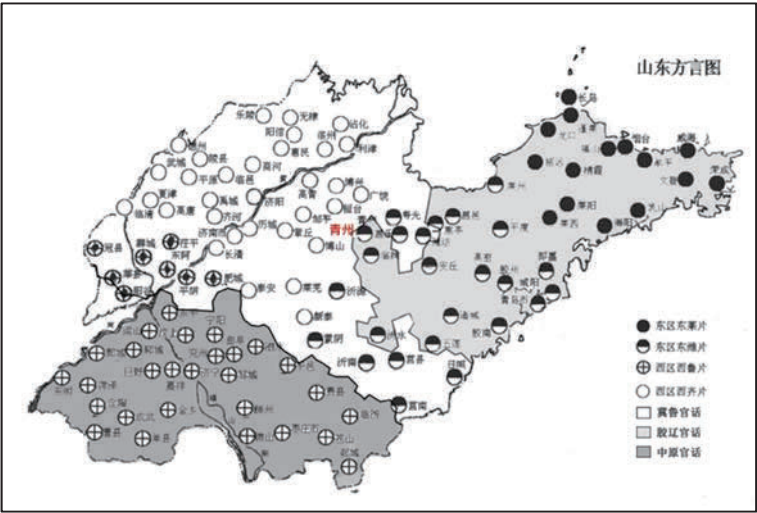
一、引言

1.1 青州市行政及方言概况

青州市是山东省下辖县级市，隶属潍坊市，根据《青州市志》，“青州位于山东省中部，东邻昌乐县，南接临朐县，西连淄博市的淄川区、临淄区，正北与广饶县接壤，东北与寿光县毗连。”

青州方言是青州市境内各民族居民使用的汉语方言，是按照行政区域界限划分的方言辖域。在《山东方言的分区》中，根据的钱曾怡（1985），划分青州方言处于东区东潍片和西区西齐片的分界线上。《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将山东方言划分为中原官话、冀鲁官话和胶辽官话等三个次方言区，青州方言位于青州片，属于胶辽官话区的一个方言片，处在胶辽官话和冀鲁官话的分界线上。

图 1：山东方言分区图¹



¹ 底图来自《山东方言研究》（2001：117）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

青州市下辖 4 个街道和 8 个乡镇，这些地区虽然同属青州，共同使用青州方言，但也有其独特的地点方言特点，内部差异不可忽视。这种共时变异也表现在地理上，我们尝试通过研究地理系统中的变异，分辨语音演变的历史层次，逼近其“真时”演变，分析地理和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关系。

本次田野调查的范围是青州市，我们按照适合微观尺度“至少每个乡镇一个点，下限为每个自然村一个点”的布点方式和取点尽量均匀的原则，在 2018 年 3 月对青州市的 41 个行政村进行了田野调查²，调查内容主要是“日”字和“二”字的读音。

表 1：“日”字读音调查材料

“日”字的义项	调查词条	例句
太阳	日头	今天的日头很大。
	日食	2008 年中国发生了日食。
特指某个地方	日本	他们一家去日本旅游了。
	日照	我的老家是日照。
一昼夜	日期	我们提前选好了日期。
	明日	明日是星期三。
	今日	今日我要去买书。
生活或生计	过日子	两个人过日子最重要的是互相包容。
特制某一天	过生日	今天我同学过生日。
每天，一天天	日新月异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
动词，脏话	日	

另外，张树铮（2005：22）提到，“《聊斋俚曲集》中有一句歇后语：‘章丘的话头——好日子。’原注‘日读二音。’”。普遍认为，《聊斋俚曲集》反映了清中期以前淄川一带的方言，这说明在青州附近区域，“日”和“二”的读音有一定的联系，因此考虑到日母的日系字和儿系字的密切关系，也为了更好地分析“日”字读音的历史层次，本文也调查了“二”的读音作为参照，方法同上。

表 2：“二”字读音调查材料

“二”字的义项	调查词条	例句
一加一后所得的数字	二百块	这条裤子二百块。
	十二	这孩子今年十二了。
	第二	张三考试考了第二。
	二次利用	这些东西可以二次利用。
两样	二话	他二话不说就忙活了起来。
不专一	一心二用	他做事总是一心二用。

² 调查涵盖了青州市城区（包括云门山街道、王府街道和益都街道的一部分）、2 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其余 12 个下辖镇区：益都街道、王府街道、云门山街道、黄楼街道、高柳镇、何官镇、东夏镇、谭坊镇、弥河镇、王坟镇、庙子镇、邵庄镇，共计 41 个行政村。为保证数据可靠，我们在调查时以词条和例句为材料，选取的所有发音人基本为 40 岁以上的青州人，他们多是祖辈居于青州，在当地均使用青州方言。

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州方言中，上述调查材料中“日”字在不同义项、不同构词情况下的读音主要有四种：[ɳ⁴¹]、[lɐ⁴¹]、[ʌ⁴¹]、[i⁴¹]；“二”字的读音有两种：[lɐ⁴¹]、[ʌ⁴¹]。特别的，[i⁴¹]的实际读音很可能是前面带有半元音的[ji⁴¹]（下文标注为[i⁴¹]），高元音零声母字前面带有同部位的半元音是汉语的普遍现象。

表 3：“日”字读音田野调查结果

	[ɳ ⁴¹]		[ʌ ⁴¹]		[lɐ ⁴¹]		[i ⁴¹]	
	村落数	占比	村落数	占比	村落数	占比	村落数	占比
日头	9	17%	36	69%	3	6%	4	8%
日食	26	50%	25	48%	1	2%	0	0
日本	18	35%	32	62%	2	4%	0	0
日照	18	35%	32	62%	2	4%	0	0
日期	20	38%	30	58%	2	4%	0	0
明日	16	31%	34	65%	2	4%	0	0
今日	28	54%	22	42%	2	4%	0	0
过日子	22	42%	28	54%	2	4%	0	0
过生日	14	27%	37	71%	1	2%	0	0
日新月异	27	52%	25	48%	0	0%	0	0
日（动词）	10	19%	38	73%	4	8%	0	0

表 4：“二”字读音田野调查结果³

	[ʌ ⁴¹]	[lɐ ⁴¹]
二百块	13	39
十二	13	39
第二	13	39
二次利用	17	35
二话	13	39
一心二用	13	39

二、“日”字的方言地图及解释

在制定调查材料时，主要是按照义项进行了分类，通过整理归类绘制出了青州市“日”字读音的方言地图 11 幅，“二”字读音的方言地图 2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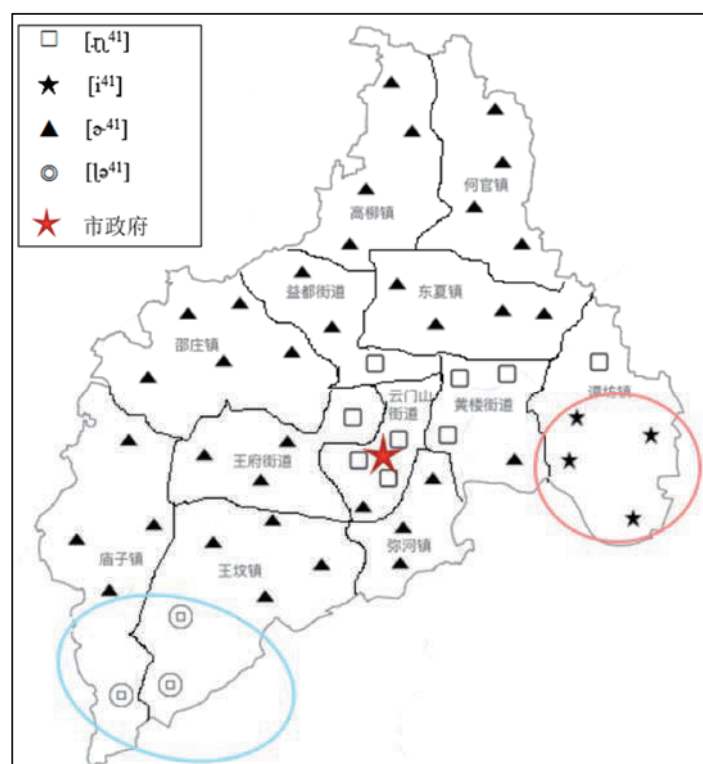
2.1 “日”字读音的地理分布差异

我们首先关注日字的语音形式。将 11 幅地图综合来看，其差异不大，主要差异体现在不同读音的区域差异和同一区域的读音差异。“日头”的方言地图反映的四种读音

³ 表中数字代表该读音所涉及村落的数量。

最为充分，我们以此为例⁴。

图 2：“日头”方言地图



首先是区域差异，根据调查结果“日”字共有四种读音：[ɲ⁴¹]、[lɤ⁴¹]、[ʂ⁴¹]、[i⁴¹]，具体而言，[ɲ⁴¹]集中于位于市区及周边乡镇；[ʂ⁴¹]集中于北侧和西部地区，多是围绕[ɲ⁴¹]分布；读音[i⁴¹]分仅在“日头”一词中出现且集中分布在东南部的谭坊镇；读音[lɤ⁴¹]主要分布在西南边缘。

二是同一区域的读音差异。明显的，我们可以发现调查涉及的某些区域在不同词中下表现出的一些不同的读音倾向。青州市区及临近的乡镇边缘的“日”字读音呈现出两类 [ɲ⁴¹]和[ʂ⁴¹]，“日头”“日本”“日照”“明日”“日期”“过生日”“日（动词）”主要读[ʂ⁴¹]，“日食”“今日”“日新月异”主要读[ɲ⁴¹]。

“日”字的读音[i⁴¹]只在东南部的谭坊镇出现，且只在“日头”这一个词中读[i⁴¹]，同样表示太阳的“日食”却读作[ɲ⁴¹]，而对于调查材料中的其他词谭坊镇的四个调查点都将“日”读作[ɲ⁴¹]，基本不使用其他读音。

2.2 “日”字读音的地理分布差异原因解释

对于同一个“日”字为什么会存在上述差异呢？

我们首先关注读音[ɲ⁴¹]。“日头”的读音[ɲ⁴¹]，是以市区为中心向西部放射的，这个读音也是与普通话相一致的。我们在调查中也获得了发音人对语音形式的新旧判断，但他们也表示是有更“土”的说法是读作[ʂ⁴¹]，但他们现在很少使用，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读音[ʂ⁴¹]而改用了与普通话一致的读音[ɲ⁴¹]。一般来说，在现代媒体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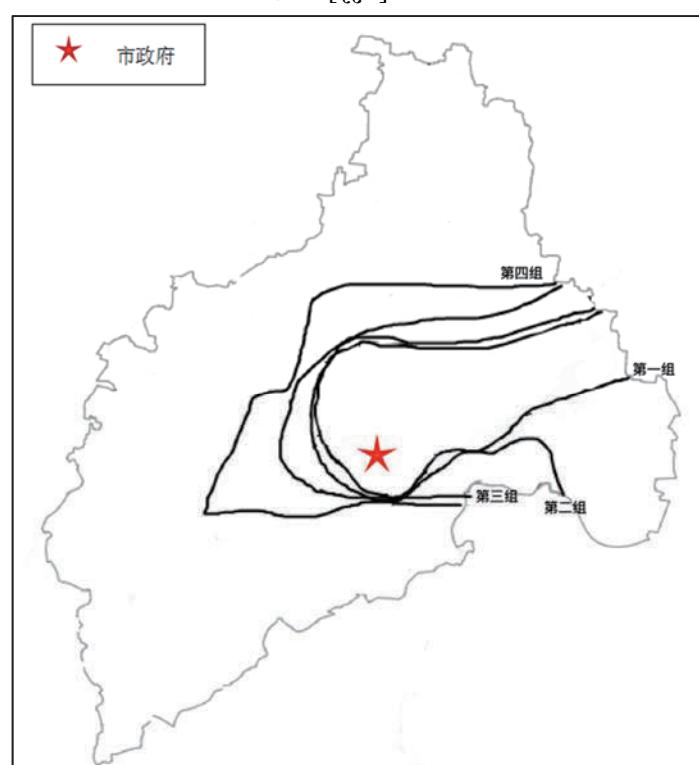
⁴ 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AutoNavi-GS6379 (2019)号）

下，共同语像火星飞溅一样扩散，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更容易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同时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也是不同方言区人们交际采用的通用形式，因此与其他地区经济文化往来频繁的地区也是容易受普通话影响的地区。黄楼街道不仅邻近市区也是国家级花卉博览会交易中心，与各地区经济往来频繁，多采用普通话进行交际，这也对语言语音产生了影响。青州方言音系中没有[ɿ]，演变的终点自然不会是[ɿ]，至于在市区中心出现的[ɿ]似乎可以认为是普通话的影响。因此青州市中部地区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完成了对旧有读音[ɿ⁴¹]的覆盖，因此从市区到外围乡镇的发展过程应该是 ɿ→ɿ。

那么为什么相同的“日”字的语音形式在不同的词中表现不同呢？11 幅地图，从微观上看，每张图都有些许不同，但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所有的图都展示了同样的分布，即便如此也存在着分布差异，根据[ɿ⁴¹]在不同词中的体现区域，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组，从内向外依次是：

- 第一组：日头
- 第二组：日本、日照、过日子、日期、明日、动词“日”
- 第三组：过生日
- 第四组：日食、今日、日新月异

图 3：读音[ɿ⁴¹]的分布区域



从第一组到第四组的顺序体现出的是由白到文的变化。“‘文’与‘白’代表两种不通的语音系统，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需可得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也就是说单就文白而言，比较文的语词的读音更多的呈现强势语言的面貌，呈现的是距离现在较近的读音，而口语化词的读音则是容易存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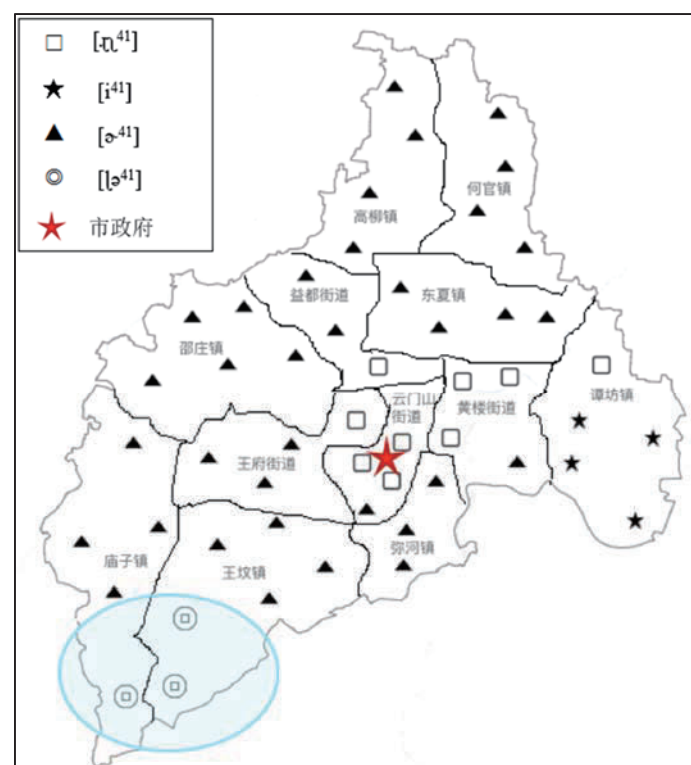
“日头”是一直处在使用中的且意义比较稳定，因此，“日头”这个词的语音形式也应该比较稳定。另外，作为一个核心词，它还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语音特征，反映更早时期“日”字的语音面貌，比较文的语词的读音更多的呈现强势语言的面貌，呈现的是距离现在较近的读音，而口语化词的读音则是容易存古的。

“前强后弱”是汉语音节发音的机制和原理，发音进行到音节末尾，气流减弱，因此音节的韵尾容易发生变异。实际上不仅音节发音是前强后弱，从省力原则上说，这条规则的应用范围应该更广，将这项规律推及到词的发音中就可以解释上述“日”字读音的差异。

2.3 “日”字读音其他特殊分布的解释

比较特殊的有 $[\text{ɿ}^{41}]$ ，它只分布在西南边缘的庙子镇，结合青州市的地形图来看，显然青州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部多是山区，东部为平原，庙子镇海拔较高，地势原因，有些村庄地理上比较闭塞，道沟村甚至只有叔侄二人。古音通常保留在比较闭塞的地区，比较闭塞、交通相对不便的西南部山区表现独特的 $[\text{ɿ}^{41}]$ 读音，很可能是相对古老的，按照周边分布原则， $[\text{ɿ} \rightarrow \text{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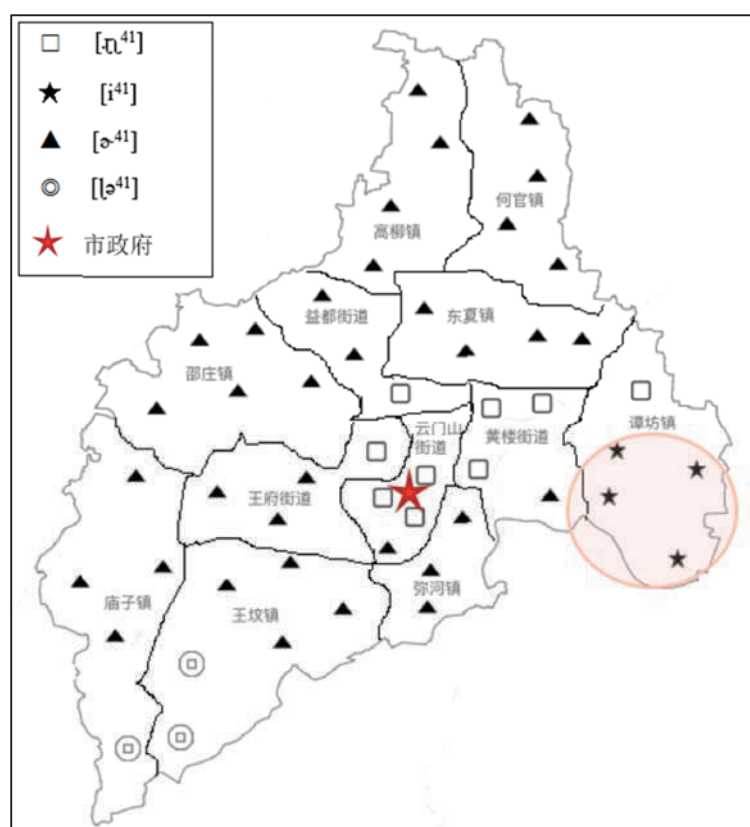
图 4：“日头”方言地图



语言地理学不仅仅满足于为语言演变排出顺序，还要追寻放弃 $[\text{ɿ}]$ 说 $[\text{ɤ}]$ 的原因。参考动词“日”的地图，笔者也曾询问邵庄等乡镇的发音人是否有 $[\text{ɿ}^{41}]$ 读音形式，在北文登地区发音人表示，他们现在将“日”读作 $[\text{ɤ}^{41}]$ ， $[\text{ɿ}^{41}]$ 这种语音形式太土且有不好的意思，因此只有在动词“日”这个不雅词的读音上，他们才选择了认知中的旧有形式，也就是说，发音人的发音考虑到了避讳这一层面。

一般而言，本地的旧有形式可以顽强地保留在本地的特有方言词汇中，动词“日”是在青州方言中存在的词语，同时考虑到母语者对音类、新旧的反应是敏感的，我们可以从主观推知读音[ɿ⁴¹]是西部地区的旧有形式，出于避讳等原因，这些地区的发音人放弃了这种形式，采用了他们认为比较文雅的读音[ɤ⁴¹]，这样以来便挤压了读音[ɿ⁴¹]的表现范围。而西南边缘的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猜测，西南部的若干调查点对于读音[ɿ⁴¹]的表现比较稳定，对于大多数词只有庙子镇和王坟镇这西南边缘的两个地点读[ɿ⁴¹]，而在动词“日”上表现出范围的极大延伸。考虑语言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这可能是由于语言内部的避讳导致的。在汉语中这种避讳现象并不少见，李荣先生（1982）在《论“入”字的音》中指出，“入”本来也有与“日”相同的音[ɹɿ]，但由于本身是个专用的禁忌字，有意回避而表现出了不合规律的[ɹu]。“日”在方言中也有这样一层粗俗的意思，例如把某月某日说成是某月某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ɿ⁴¹]读音是由于避讳禁忌意义、刻意回避[ɿ⁴¹]而表现出来的。

图 5：“日头”方言地图



谭坊镇北部的发音只有“日头”读[i⁴¹]的原因主要是语词比较古老导致的，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解释[i⁴¹]读音为什么出现且仅出现在谭坊镇。结合方言材料，读音[i⁴¹]是零声母的齐齿呼，止撮以外的母字读作零声母是胶辽官话的特征之一，钱曾怡（2001）将其作为山东方言南北分区的依据，“‘非儿类字’声母绝大部分读作零声母，韵母保留介音[i]”，与谭坊镇相邻的寿光市、昌乐县、临朐县皆有此体现，因此，谭坊镇“日”字的读音是符合日母字在胶辽官话的读音情况的。另外，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提到，根据山东方言的分区，青州市确实处于胶辽官话区，因此这可以解释青州地区受到东区影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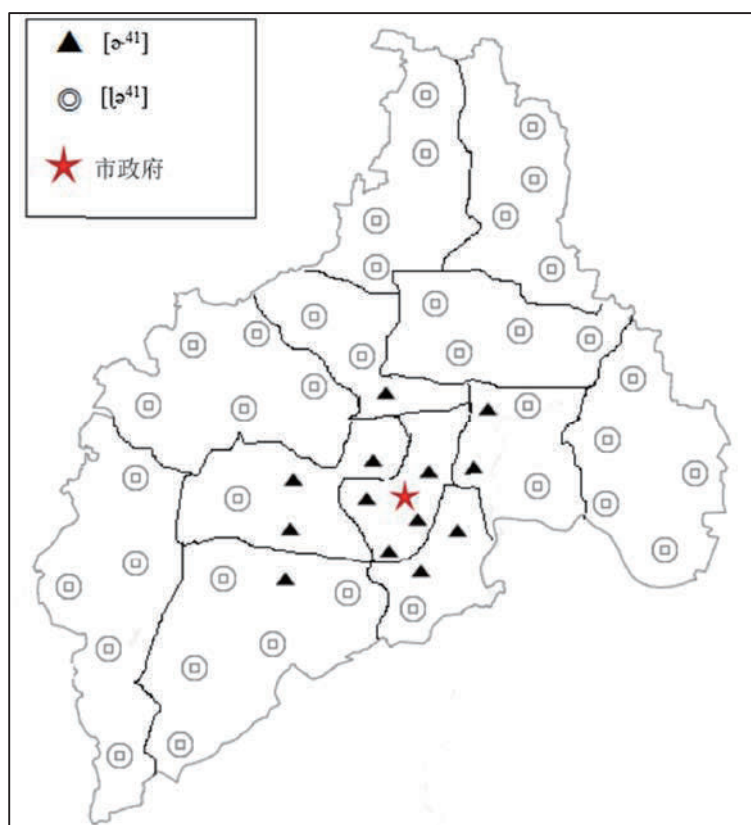
现读音[i⁴¹]。但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一体现胶辽官话止摄外日母字普遍读音的[i⁴¹]仅分布在谭坊这一镇孤立地使用，其他地区都没有表现出这一读音，这是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方言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在谭坊镇的东南部和中部仅使用[i⁴¹]这一种读音，而在北部比较靠近黄楼街道、东夏镇的地区则主要使用读音[n⁴¹]，但也有[i⁴¹]的存在。特定词汇读音的地理分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相邻原则，谭坊镇采用不同于青州市其他地区的读音[i⁴¹]可能是受到这一原则的影响。谭坊镇的北、东、南三面分别是寿光市、昌乐县、临朐县，也就是说谭坊镇在语音上被三个带有浓重胶辽官话色彩的地区包围，受其方言的强势影响，连接成片，更容易始终保留胶辽官话的语音特征；同时谭坊镇被称为“中国瓜菜第一镇”，与同样以生产果蔬闻名的昌乐县、寿光镇经济往来频繁，从方言接触的角度来看，谭坊镇也有充分的可能接受了东部方言文化圈的影响而效仿两地的语音形式。

对于读音[lə⁴¹]，我们也可以在历史文献中发现踪迹。根据张树铮（2005：22）“《聊斋俚曲集》中有一句歇后语：‘章丘的话头——好日子。’原注‘日读二音。’”《聊斋》的作者蒲松龄是淄川人，这反映出了清代淄川和章丘“日”字的读音面貌，在清代章丘方言中“日”和“二”是同音的，根据现代章丘方言，“日”和“二”都读作[lə⁴¹]，可以推知“日”和“二”的这种[lə⁴¹]读音在清代也已经稳定存在了。日母儿系字和日系字关系密切，对于“日”读音的历史层次分析也需要借助“二”的读音分析来进行。

三、“二”字的方言地图及解释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二”的方言地图进行分析，同言线地图可以直观反映出青州地区“二”读音同言线呈向心状，读音[ə⁴¹]在同言线包围圈中连续分布，在青州市形成了读音[lə⁴¹]包围[ə⁴¹]的分布状态。根据周边分布原则，即词形在二维空间上的排列呈ABA状分布，当词形B的分布地点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地时，那么其历史演变过程则是A→B。根据方言地图，我们发现“二”读音[ə⁴¹]主要分布于中部，[lə⁴¹]则环绕在[ə⁴¹]读音的外缘，这种分布就可以看作是ABA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部市区的[ə⁴¹]读音是后起的，是县城从普通话中引进的。

图 6: “二”的方言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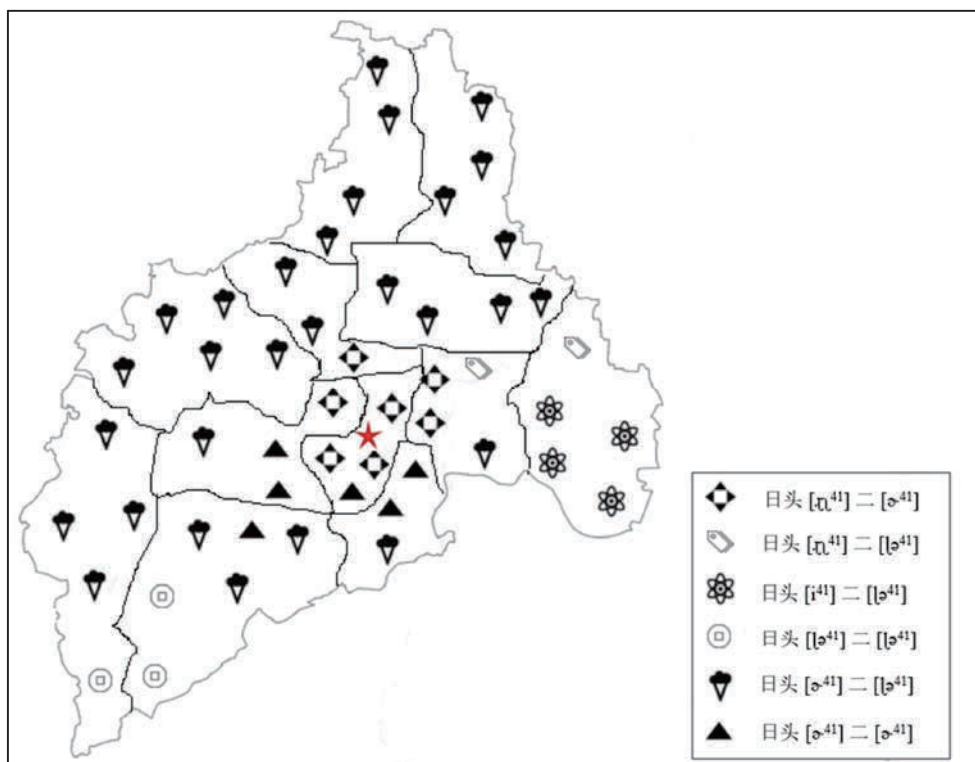


不同尺度的地图所能构建的语言史的长短是不同的，我们放到放到更大的版图来考察。根据钱曾怡（2001），将“二”等日母儿系字读作[lɛ̃⁴¹]并不是青州地区独有的，这在广大的山东中部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整个东区东潍片都表现出[lɛ̃⁴¹]，存在于东莱片和西齐片[ɛ̃⁴¹]之间。这说明东潍片读[lɛ̃⁴¹]是方言内部原因、方言的自身演变导致的而非受到济南强势方言或胶东方言的影响，否则应该呈现出与两侧同样的[ɛ̃⁴¹]读音。

今天的淄川方言和章丘方言，“日”和“二”读音是一致的，都读作[lɛ̃]，这期间淄川方言的“日”字的读音向“二”靠拢，由此我们猜测青州及附近地区“日”和“二”的语音发展存在影响现象。

为了清晰说明“日”和“二”读音的混杂情况，我们综合“日头”和“二”的方言地图绘制了下图。根据图 4.3 可以直观说明“日”和“二”发展路径存在并行、交叉的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对“日”字不同读音的历史层次进行说明。

图 7：“日头”和“二”的方言地图



由此有以下三点发现：

一是青州市区及周边乡镇在“日”和“二”上表现出与普通话一致的读音，猜测“二”的读音[ɿ⁴¹]和“日”的读音[ɿ⁴¹]是县城从普通话中引进的。

二是环绕在青州市区外围的“日”“二”同读[ɿ⁴¹]和分布在西南边缘同读[lɿ⁴¹]现象，我们猜测“日”和“二”语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并行发展现象。结合汉语历史，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日”字与“二”字在中古都是日母字，有共同的声母来源，差别只在韵的来源上，根据《中原音韵》支思韵、齐微韵分立，日母字之下也有这种区别，根据宁继福先生（1985：26-33）的拟音，元代《中原音韵》中入声韵消失，“日”[ɿ]，“儿耳二”[ɿ]，但[ɿ]与[ɿ]区别甚微，很可能“日”字舒化，压迫“二”字发生链推，从而形成新的[ɿ]韵母。

可以推测，青州一些地区作为臻摄开口字的“日”可能本与儿系字读音相近[lɿ⁴¹]，当市区及周边受普通话影响已经将“二”读作[ɿ⁴¹]时，有些地区没有将“日”从儿系字中区分出来，使得“日”受儿系字感染从而表现出与其一致的读音[ɿ⁴¹]，考虑到“日”字的入声字的独特性和在口语中的高使用频率，这种推测也是可能发生的。

三是北部和西部“日”读[ɿ⁴¹]音，而更应该读作卷舌音的“二”却读作了相对古老的[lɿ⁴¹]，我们可以猜测“日”读[ɿ⁴¹]可能是因为“日”的读音[lɿ⁴¹]是相对不稳定的，为了与儿系字区别从而发展走到了“二”的前面读[ɿ⁴¹]。

王力在《汉语语音史》（2010：357）中对日母字的发展做出过描述：“日母在元代分化为[r]、[ɿ]两母，[r]后来转变为[ɿ]，同时[ɿ]母转变为卷舌元音[ɿ]，二母仍不相混”，明清时代声母[ɿ]消失，儿系字转入影母读[ɿ]，而其他日母字则转入支思韵，填补空缺、维持系统性，改读为[ɿ]：

儿系字（“二”） [ŋzi] → [rɿ] → [ə] → [ʊ]

日系字（“日”） [ŋziẽt] → [ri] → [rɿ] → [ɿ]

体现的是一种日系字和儿系字体现了语言演变中的推拉变化。

我们认为在青州方言中也体现了儿系字和日系字的纠缠，由此我们可以完整地描述这种历史叠置现象，对于“日”字音来说[ɿ⁴¹]和[i⁴¹]是古老的读音且其历史来源不同，[ə⁴¹]也是较为古老的且产生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受到儿系字的感染，由于词汇扩散走入了儿系字的队列，二是出于别义需要从[ə⁴¹]发展而来，而[ɿ⁴¹]则是受共同语影响而后起的读音形式，这种情况下，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是突变式的，是在自然演变链条之外的。因此在二者的语音演变中体现出了自然音变和接触两方面影响。

“日”（臻开三）[ə] → [ə] / [ɿ]（普通话影响结果）（主流）

[ji] → [i]（另一音变链）

“二”（止开三）[ə] / [ə]（普通话影响结果）（主流）

四、青州方言日母字的发展趋势

4.1 青州方言日母字的共时差异

同为日母字，“日”与其他日母字有共同的中古源头，也经历了共同的演变。考虑其它日系字在青州方言中今读[ɿ]⁵，我们发现“日”的读音表现出相对独立性。

从整个日母字上看，“日”的读音[ə⁴¹]与其他日系字的读音[i]都表现出了边音的特征，二者应该是有关系的。同时地图上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青州附近冀鲁官话沧惠片阳寿小片的广饶、临朐、博山等地也将日系字读作[i]声母，形成接连分布，从分区上讲这是与西区方言相一致的，青州方言处在交界线上容易得到日母不读零声母的冀鲁官话的支持。

关注日母字的读音还要关注古非日母却混入日母的字，如喻母的“融”“熔”“溶”“荣”，疑母的“阮”等，在青州方言中读[i]；禅母的“瑞”在青州方言中读[ʃ]。这些字都是中古的三等韵，区别在于前者在更早的时期就混入了日母字，而后者还保持与日母的差别。这意味着他们的读音在某个阶段与日母字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推测，日母字是曾有过零声母或接近零声母的阶段的。

而青州方言所属的山东方言东区一般将日系字读作零声母，但是考虑东区方言相对独立，内部又十分一致，因此“日系字”读零声母应该是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且很可能是存古的表现，胶辽官话日母字的零声母读音体现了不同的音变链条。

因此，在青州方言“日”字上体现出的共时差异，其实是日母字在山东方言内不同方言片区的演变方向差异。不同方向的语音特点在青州地区内形成叠置，使得内部产生了差异，呈现出零散的、不规律的非连续分布现象，语音特征就呈现出了“漂移”的特性。具体表现在，有的特征与西片相同，有的与东片相同。青州方言被归为胶辽官话，底层体现胶辽官话本色，但受接触影响带有冀鲁官话特点，从共时层面体现地域上自西

⁵ 青州地区日系字读[i]自清代就已有体现。《七音略》中提到“日母所属字‘日如儒若然髯而柔热惹’等，自潍县以西，寿光、乐安、青州、临淄，以至武定、济南……各州府所属，及沂水以西……皆读为此谱重舌三位隆模之音”。根据他的记述，青州地区止摄日母字在清代就是读[i]的。

向东的扩散趋势，从历时角度体现出了演化阶段。

4.2 青州方言日母字的发展趋势

在现代社会中，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日益重要并占据了主流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公共空间内方言的使用被急剧剥夺，通过田野调查结果来看，我们也感受到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言，其影响势力是不可忽视的。

在我们的调查期间，市区及周边乡镇的发音人已经基本采用了普通话的语音形式，乡镇中的一些发音人也已经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作为第一反应，要经过询问，才会说出当地的方言语音；而那些普通话不标准的人，或者不会说普通话的人，更表现出一种自卑心理，他们认为自己说的话是比较“土”的，在调查中也保持一种消极态度。也就是说，在我们调查的地区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语言偏见和趋势，人们认为普通话是比较文明的、权威的，更多地用此代表自己的社会地位。出于语言经济性的原则和交际的需要，我们推测本地方言的语音形式可能会进一步向普通话方向倾斜，“日”将会在更多的词、更多的地区表现出与普通话一致的音[rɿ]。

但是对于普通话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在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中，方言不会一味地向普通话靠拢、与普通话一致，接触的过程中，方言本身的特征一定会有所保留。就“日”“二”字音而言，其旧有的语音形式并不会彻底消亡，首先[ɛ]是普通话中没有的音节，这会有助于它的保留，同时这种语音形式也与周边阳寿小片相同，它们接连成片，也为该音的保留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二”的读音[ɛ]将忠实地保留在方言中，这就会造成“日”和“二”的变化趋势的不同。“日”和“二”都是日常语言使用中十分常见的，出于区别意义的需要，在“二”读[ɛ]的情况下，“日”的[[ɛ]音必然将是不稳定的，这会进一步挤压[[ɛ]音的分布范围，使得[[ɛ]自然音变为[ə]音，从而有利于[ə]音的保留。这也正符合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乡土根性”。可见语言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方言是“乡土根性”和交际中普通话普及两股力量的交织下前进的。

五、结语

日母字在现代方言中的读音非常复杂，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各方言间的读音多有不同，我们从青州方言的“日”字音入手，通过田野调查的资料绘制方言地图来窥探分析“日”字音地理分布差异及原因，同时剖析表层共存下的历时演变序列，同时尝试结合儿系字和其他日母字对语言地图做出合理解释，描绘其演变链条。在青州方言“日”字上体现出的共时差异，其实是日母字在山东方言内不同方言片区的演变方向差异，体现出了东西区方言的势力对比。随着普通话的强势入侵，语言面貌也会发生变化，但其影响结果并非绝对体现为与普通话的一致，因此，这种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

附记：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AutoNavi-GS(2019)6379号)。本文由笔者在曾师晓渝教授指导下的本科毕业论文改写而成，写作过程中承蒙曾晓渝教

授、远藤光晓教授、鄢卓、曾智超、刘京杰、肖能萍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柴田武 2012《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大西拓一郎、陆艺娜 2011《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 贺登崧 2012《汉语方言地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 荣 1982《论“入”字的音》，《方言》第 4 期
- 宁继福 1985《中原音韵表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 1985《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第 4 期
- 钱曾怡主编 2001《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 青州市志编纂委员会 1988《青州市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王 力 2010《汉语语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潍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钱曾怡、罗福腾合著 1992《潍坊方言志》，潍坊：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 项梦冰、曹晖 2013《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张树铮 1999《方言历史探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张树铮 2005《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2《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Stratum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Ri” in Qingzhou Dialect

LIU X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onunciation of “Ri” in Qingzhou dialect is complicated. There may be a diachronic evolution sequence under 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that coexist on the surface. This paper uses the geolinguistics method to study the pronunciation of “Ri”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ason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i” by drawing dialect maps. Simultaneousl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sequence and tries to combine the “Er” family characters with other “Ri” characters to describe the evolutionary chain and analyze language evolution trends through synchronic differences.

辽宁方言日母日系字读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刘婧涵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日母日系字的音变现象是辽宁方言的一大特点，本文采用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辽宁地区日系字读音进行调查，展示音变情况、总结音变规律、探究音变产生原因、厘清不同形式的历史层次，并从新、老派方言对比中对各地区、各字项受现代汉语普通话影响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对辽宁地区日系字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辽宁方言总体面貌与普通话比较相似，但声母、韵母、声调都或多或少有自身特点存在，例如声母方面，日母字的音变现象就是一个显著特点。

目前学界一般将日母字声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儿系字，指古止摄开口日母字，普通话中读[ʅ]，二是日系字，指非古止摄开口日母字，普通话中读[z]¹。本文讨论的对象为日母日系字²，因为在辽宁方言内部，儿系字与普通话读音一致，而日系字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日系字音变是辽宁方言内部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各个方言点内部具体情况不同，出现音变现象的字项有差异，新老派读音情况也各不相同。

本文拟在语音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辽宁方言日系字今读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以解释日系字的音变原因，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文中的“音变”指相对现代汉语普通话而言读音相异的部分，由于辽宁方言语音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较少，本文将普通话作为参照系，采取与普通话对比的方式呈现各方言点的读音情况。

一、研究背景及调查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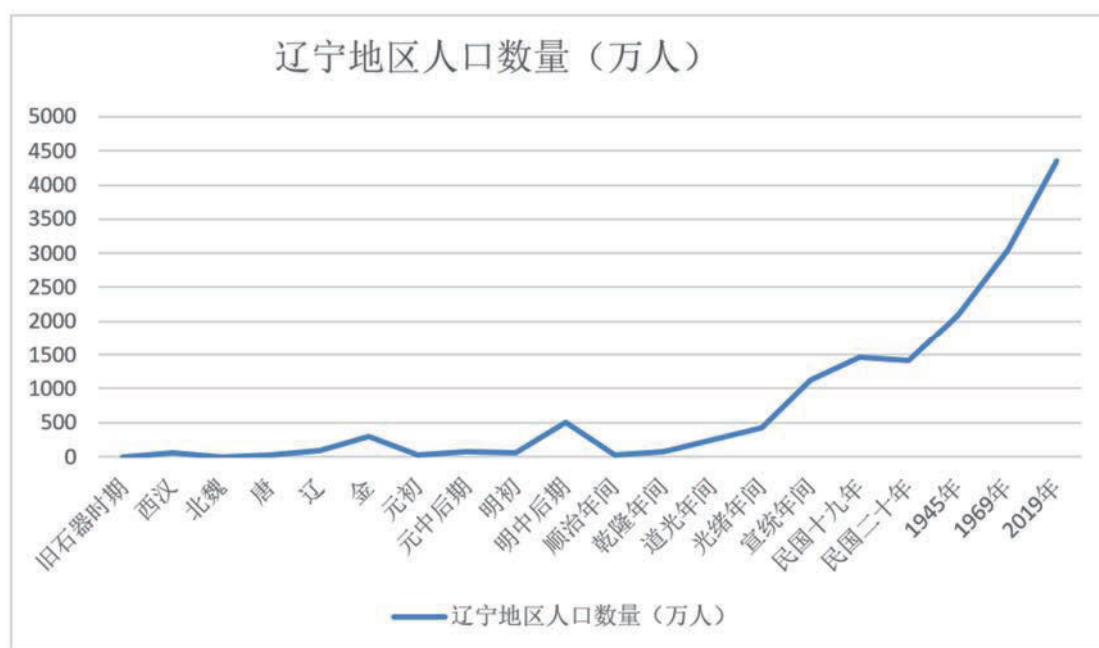
1.1 辽宁省的移民历史

研究辽宁方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辽宁省特殊的移民历史，汉语在辽宁地区的自然演变缺乏必要的时间条件。据《辽宁省志·人口志》的记载，历史上辽宁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地区，原住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口规模不大，居住地域不固定，汉族人口大多是各个朝代为戍边迁移的，或自发前往垦植的移民。

¹ 王利、刘芳 2014《晋东南晋语日系字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

² 下文简称“日系字”。

图 1：辽宁地区人口数量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清代以前辽宁地区人口经历了“三起三落”，三个人口峰值分别出现在西汉、金和明中后期，而人口骤减的原因往往是战乱。辽宁地区人口最后一次骤降发生在明末清初，在战争以及清军入关的影响下辽宁几乎成为无人之地，而后经过清代的政府性移民以及后来封禁后仍无法有效控制的群众自发移民，辽宁地区人口迅速增长，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兼有少部分天津、北京及河南移民。可以说，今天辽宁省大部分人口是清代以后移民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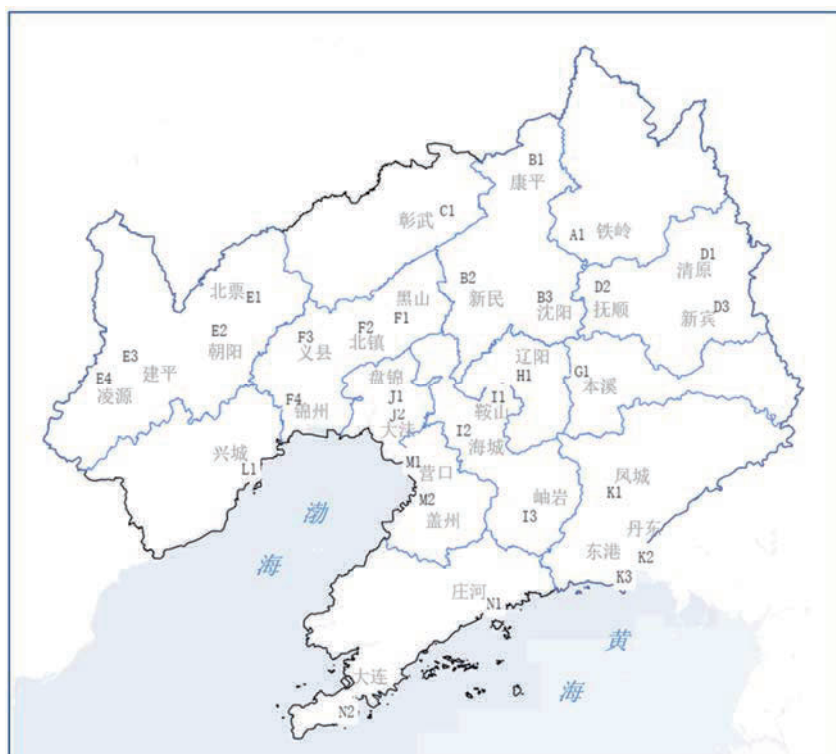
1.2 调查情况

本次方言调查的区域为辽宁省，按照宏观尺度“至少每个地级行政单位一个点，可以略多”³布点，尽量多地覆盖县级行政单位，取点尽量均匀。调查共涉及 12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市区以及 19 个县级行政单位，共计 31 个方言点，具体情况如下图⁴所示：

³ 项梦冰、曹辉 2012《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第 34 页。

⁴ 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AutoNavi-GS(2019) 6379 号）。

图 2：辽宁省调查点分布图



注：各方言点编号如下

A	铁岭市	A1	铁岭市区	G	本溪市	G1	本溪市区
B	沈阳市	B1	康平县	H	辽阳市	H1	辽阳市区
		B2	新民市	I	鞍山市	I1	鞍山市区
		B3	沈阳市区			I2	海城市
C	阜新市	C1	彰武县			I3	岫岩满族自治县
D	抚顺市	D1	清原满族自治县	J	盘锦市	J1	盘锦市区
		D2	抚顺市区			J2	大洼县
		D3	新宾满族自治县	K	丹东市	K1	凤城市
E	朝阳市	E1	北票市			K2	丹东市区
		E2	朝阳市区			K3	东港市
		E3	建平县	L	葫芦岛市	L1	兴城市
		E4	凌源市	M	营口市	M1	营口市区
F	锦州市	F1	黑山县			M2	盖州市
		F2	北镇市	N	大连市	N1	庄河市
		F3	义县			N2	大连市区
		F4	锦州市区				

为了准确描写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的面貌，本次方言调查选取两组发音人，即老派发音人与新派发音人。根据《方言调查字表》选取全部非古止摄开口日母字作为调查字项，剔除部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字，如“穰(禾茎)”等，共计调查字项 44 个，其中“绕”、“任”二字在《广韵》音系中均有两个声调，在调查中归为不同字项。在调查

表中将每个字项分别组词，兼顾生活常用词和新词语，并在询问中随机造句，以获得发音人真实的读音情况，尽量避免读书音的出现。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电话调查两种调查方式收集语料，由于本文不涉及声调变化，因此在记录时只记录声母和韵母情况。盘锦市、大洼县、凤城市三点未找到合适的发音人，语料分别来自《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⁵和《凤城方言语音研究》⁶，这两篇文章包含以上方言点日系字各个字项的具体读音。

二、辽宁方言日系字今读情况

2.1 概况

调查结果显示日系字声母在辽宁方言中的表现有三种，分别是零声母型、[l]型、[ʒ]型。音变情况有两种，大部分变成零声母加介音，开口呼加[i]，合口呼加[y]（“入、润、闰、弱、辱、褥”六字除按规律加介音[y]外还有加介音[i]的情况），如“惹”[iɛ]、“扰”[iao]、“肉”[iou]、“润”[yn]、“绒”[iun]；个别字声母变成[l]，一般在韵母为合口呼[u][uei][un]的情况下，如“乳”[lu]、“蕊”[luei]、“冗”[luŋ]，“扔”字属特例。

各个字项发生音变的程度不同，按照变化比分为高、中、低三类：

表 1：日系字字项音变程度⁷

音变程度（变化比）	数量	具体字项
高（67%-100%）	24	乳、饶、扰、绕（围绕）、绕（绕线）、柔、揉、染、任（姓）、任（责任）、纫、然、软、人、仁、忍、刃、认、瓢、壤、让、扔、绒、肉
中（34%-66%）	12	惹、蕊、冉、燃、热、润、闰、嚷、仍、茸、冗、褥
低（0-33%）	8	如、儒、入、日、弱、若、戎、辱

2.2 日系字各读音形式产生原因

2.2.1 辽宁地区日系字的底层形式

从历时音变角度，本文选取七部反映北方话或辽宁地区语音系统的文献和韵书，以期呈现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的演变历程。

⁵ 李南依 2019《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⁶ 戴鑫 2014《凤城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⁷ 变化比=音变点/总点数，结果保留到个位。

表 2: 日系字读音历时音变⁸

切韵 (601)	中原音韵 (1324)	五方元音 (1654—1664)	黄钟通韵 (1744)	音韵逢源 (1840)	华音启蒙 谚解 (1883)	支那语讲 义 (1910)
ŋʐ	ʐ	ʐ	j	ʐ	零声母	零声母

如表 2 所示,北方地区日系字最晚在元代已经演变出[ʐ]型,辽宁地区日系字在清代呈现零声母的形式,此时北京音仍为[ʐ]型。

目前学界对于东北地区日母字读零声母有两种主流的解释,一种认为零声母是鼻音声母[ŋ]弱化的结果,以项梦冰⁹为代表,另一种认为零声母是为了增加音系协和度而产生的“吞噬日母”现象,即[ʐ]>零声母,以陈保亚(1993:160-161)为代表。辽宁地区日系字是哪一种演变轨迹,在受到大规模移民影响前是否已随大部分北方地区一起演变为[ʐ]型,还需要从音系内部进行考虑。

东北方言中日母字今声母与知庄章组今声母状况密切相关¹⁰,因此在分析辽宁方言日母字变读零声母时也应考虑知庄章组声母情况,若出现知庄章组与精组合流的情况,那么音系中本应读作[tʂ][tʂh][ʂ]的音全部读为[ts][tsh][s],与[ʂ]对应的浊音[ʐ]也不应出现。目前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读音情况如图 3 所示:

⁸ 拟音引自孟祥宇 2012《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邹德文 2009《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华音启蒙谚解》和《支那语讲义》分别是朝鲜和日本的教科书性质的外国文献,根据岳辉(2006)的论证,《华音启蒙谚解》“以东北官话为基础,兼收并蓄北京官话的某些特点”,邹德文(2009)则认为《支那语讲义》“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东北方言”,因此这两本书所反映的音系可以作为观察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发展演变的资料。

⁹ 项梦冰 2006《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兼论切韵日母的音值及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¹⁰ 张世方 2009《东北方言知系声母的演变》,《汉语学报》第 1 期。

图 3: 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读音情况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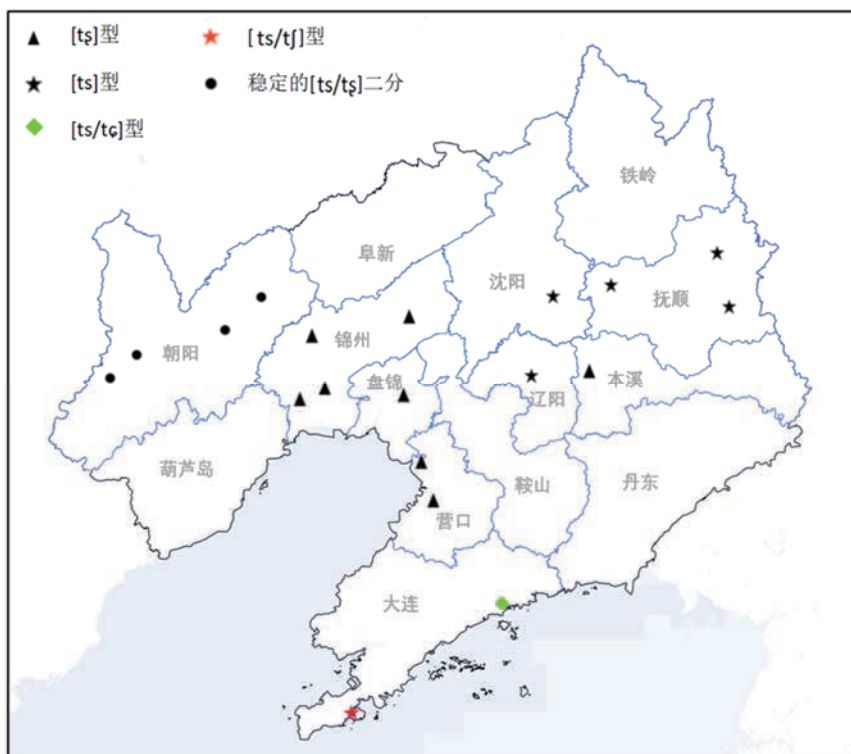


图 3 展示的方言点以外地区知庄章组读音为[ts/tʃ]自由变读，个别地区会出现[ts]更多或[tʃ]更多的现象，无规律可循。孟祥宇在文章《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中认为以 B、D、H 点为代表的沈阳型为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早期形式，辽阳、沈阳先后作为辽东地区的行政中心，民族交流广泛，语言受到阿尔泰语系影响，古知庄章组字与精组合流，并以沈阳为中心辐射周边。其余几种情况是受移民影响而产生的，点 E 紧邻北京地区而发展成北京官话，点 F、J、M、G 读音形式与紧邻山海关的河北几个地区方言情况基本相同，点 N 下的两种读音形式则是受到胶辽官话的影响¹²。本文认同这种看法，由此推断辽宁地区早期日系字读音为零声母，[z]型是后起形式。另外，“荣、容”等非日系字声母读为[z]，而没有随喻母大部分字读为零声母，说明这些字在某段历史上声母和日母非常接近¹³，随着日系字声母一并变为[z]，而这些字在辽宁方言中仍然读为零声母，也就是说，辽宁方言中的日系字没有经历从零声母到浊擦音[z]的自然演变，今天日系字的[z]型是后起型。虽然经历战乱后辽宁地区的底层方言几乎被抹去而被后来的移民方言所覆盖，但是日系字的底层恰巧与后来移民方言的部分形式相重合，因此得以留存，同时与移民型相互形成合力，使得日系字零声母型在辽宁地区稳固存在。

2.2.2 零声母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声母部分呈现出零声母型，不能否认有少数底层方言留存的痕迹，但是结合人口规模变迁的历史，今天的零声母型更多的是移民方言带来的。根据宋学¹⁴的

¹¹ 根据王艳慧《辽宁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中老派发音情况绘制。

¹² 孟祥宇 2012《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¹³ 高晓虹 2013《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第 2 期。

¹⁴ 宋学 1963《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说法，辽宁省汉族居民多自河北、河南、山东迁入，在分析零声母型产生原因时自然应该考虑这些地区的语音形式。由表 3 可以看出辽宁方言中日系字的零声母读音与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关系密切，这是方言竞争的结果。虽然操中原官话或北京官话的移民也进入辽宁地区定居，但由于规模较小，居住分散，其语言习惯难以保留下来，在与周围操强势方言的山东、河北移民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被同化。

表 3：辽宁周边方言日系字读音情况¹⁵

	染	肉	人	让	热	扔	软		
鞍山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吉沈片	东北官话
锦州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哈阜片	
朝阳	ʒ	ʒ	ʒ	ʒ	ʒ	ʒ	ʒ	朝峰片	北京官话
北京	ʒ	ʒ	ʒ	ʒ	ʒ	ʒ	ʒ	京承片	
唐山	ʒ	ʒ	ʒ	ʒ	ʒ	l	ʒ	保唐片	冀鲁官话
邢台	零/l	零/l	零/l	零/l	零	零/l	零/l	石济片	
沧州	零	零	零	零	ʒ	零/l	零	沧惠片	
烟台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登连片	胶辽官话
昌邑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青莱片	
丹东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盖桓片	
大名	零	ʒ	ʒ	ʒ	ʒ	ʒ	零	郑开片	中原官话

也就是说，今天辽宁方言中日系字零声母型是底层方言和移民方言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王力（2017:22）的拟音，日系字上古音为* η ，日系字均为三等字，带有介音-j-， η 与j都是舌面音，发音部位相同且均为响音，j发音更容易；另外根据强制非同值（OCP）原则，紧邻音段相同特征要发生异化，因此清代以前辽宁方言日系字在鼻音弱化的作用下变成零声母，与此同时大部分北方方言日系字已经由零声母介音擦化演变为[ʒ]，清初辽宁地区作为“龙兴之地”与北京交流密切，之间存在大量人员往来，日系字有机会随北京音变成[ʒ]型，但山东、河北移民规模大，其带来的方言相对于辽宁地区原有汉语方言属于强势方言，因此阻碍了底层方言进一步演变的过程。

2.2.3 [ɿ]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的底层读音形式为零声母，因此[ɿ]型是移民方言的产物。从移民主要来源地——山东、河北来看，[ɿ]声母在日系字的读音中广泛出现。

山东省日系字读音出现[ɿ]声母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胶辽官话，只有极个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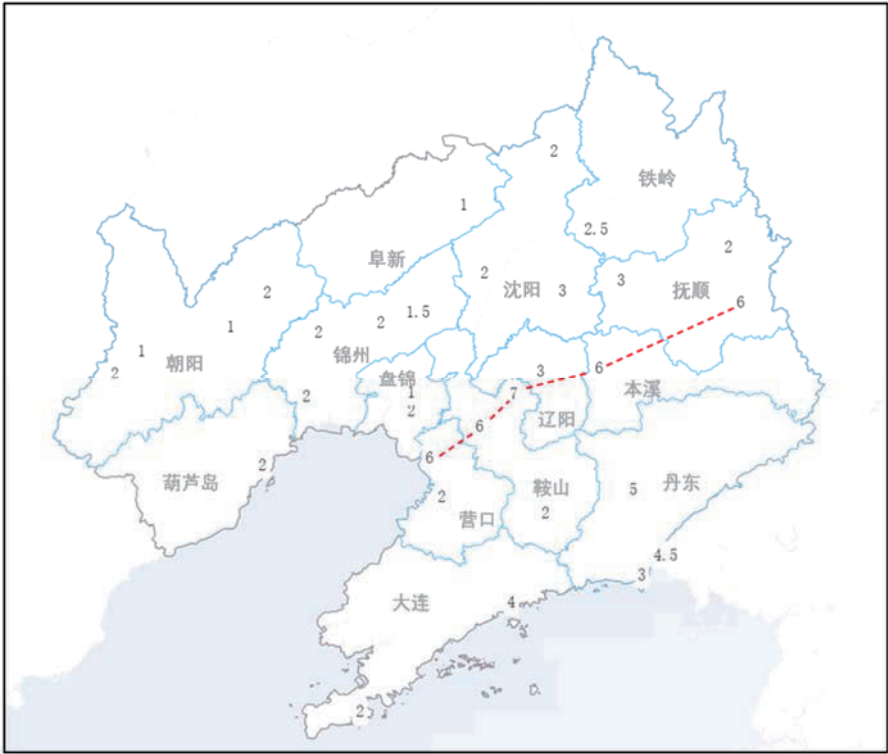
¹⁵ 表中“零声母”用“零”表示。

的读为声母[i]；另一类是数量众多，成系统地变为边音，在鲁中偏东的章丘、淄博、广饶、寿光等地日系字声母今天全部读为[i]，鲁中偏西的济南、惠民、肥城等地开口读[z]，合口读[i]。

河北省日系字出现声母[i]的地区集中在东南部，广大的中部和北部无[i]型出现，东南部各地日系字出现[i]声母可分为三种情况：全部读为[i]；开口呼读[z]，合口呼读[i]；有声母[i]出现但无规律。

今天辽宁地区呈现的部分日系字读为边音的格局是清代以后山东、河北移民带来的，各个地区移民带来的方言中出现[i]音变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种复杂的融合、竞争关系下，呈现出现有的结果，即一些日系字的读音变成了边音[i]，但数量不多，合口呼前变成边音的比例更大，图4展示了辽宁方言各点日系字读边音的情况。

图4：辽宁方言各点日系字读边音情况



注：图中各点数字为[i]声母在日系字中的辖字数，调查结果为[i]与零声母或[z]自由变读的计0.5。

日系字读边音的情况在辽宁方言中呈现清晰的“中部多、东西两部少”的格局，虚线一线是边音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这一线两侧边音出现频率递减。这与该区域地势低、有河流经过有关，移民无论从东部沿海路进入还是从西部过山海关沿陆路进入辽宁，很大一部分都会继续向中部腹地移动并最终定居，因此中部平原一带可以说汇集了各个地区的移民，人员交流较多，语音形式融合了多种方言，因此边音保留率最高。虚线西侧边音出现频率低于东侧，是因为与辽宁西部接壤的河北地区操北京官话或日系字无[i]型的冀鲁官话，在辽宁西部活动的移民，其方言中[i]型辖字数少，相对于零声母型处于劣势，因此保留较少，东部地区受山东移民带来的方言影响较大，[i]型日系字辖字数较多，在竞争中保留下来的也较多。

2.2.4 [ʒ]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读为[ʒ]声母的形式来源有二，均为外来方言影响，不是自然音变的产物。

其一是清代以后大规模移民带来的读音形式，这一部分产生时间早，影响范围不大，集中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是与河北相接的区域。上文已经说明辽宁地区日系字的演变节奏慢于大部分北方地区，在清代仍未发展成[ʒ]声母形式，而此时河北一些地区日系字已经出现[ʒ]型，随着移民进入辽宁地区并在方言竞争中保留在西部地区。

其二是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带来的读音形式，这一部分产生时间晚，但影响范围很大，对辽宁各个地区方言都产生了影响。普通话作为强势方言，在影响辽宁方言的过程中往往占有优势，其语音系统中的一些形式对辽宁本土方言进行了替代，这种现象在辽宁新派方言中体现尤为明显。

以上两种日系字[ʒ]型来源不同，作用的时间、范围也不同，辽宁东部日系字[ʒ]型基本可以认为来源于第二种，但中西部的日系字[ʒ]型则难以进行判断。

2.3 具体调查字项的语言地图

在厘清各种读音形式的大致来源后，再观察单字的语言地图¹⁶呈现出的读音格局就会更加清晰，这些单字地图能够准确地展示各个字项的具体分布情况，也能反映出一些共性特点，通过观察下列地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总体上中东部音变程度高，向西侧递减，与普通话读音相异的情况大多留存在东北——西南一线以及东部沿海。

由于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及政治中心地位，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由东西两侧向中部集聚，人员交流广泛，形成对各地方言兼收并蓄的语音格局，移民带来的日系字音变保留较多，另外，沈阳、辽阳是古代辽宁地区行政中心，在接受大规模移民之前该地保留的底层方言比较完整，底层方言日系字读音与移民方言日系字读音类似，二者形成合力，进一步巩固了该地日系字音变水平，推广普通话后这一区域受权威方言的影响也较小。

东部沿海一带音变程度高是因为受胶辽官话的影响大，山东移民经海路从大连登陆并一路北上，这其中操胶辽官话的移民占多数，也因此形成了胶辽官话两片主要区域隔渤海相望的局面。胶辽官话一大特点就是日系字基本都读作零声母，音变程度非常高，这一特点也随着移民的脚步被带入辽宁东部沿海一带。

音变程度较低的西部形成今天的读音格局是因为与这一地区接壤的河北地区日系字读音大多与普通话一致，因此相对中部，西部地区日系字发生音变的频率较小，一方面留居于此的移民所操的方言中发生音变的日系字较少，日系字音变程度高的方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接受的移民方言音系中包括声母[ʒ]，且出现频率较高，日系字在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更容易向标准音[ʒ]靠拢，因而呈现出辽宁西部调查点各字项多读为标准音形式的格局。

（2）不同字项音变程度的具体表现不同，总体上，常用字的非标准音形式势力较

¹⁶ 单字语言地图基于老派方言绘制。

强,如图 8、10、11、15 等,非常用字的标准音形式势力较强,图 6、7、43 表现得比较明显,说明辽宁地区语音的标准化进程首先波及到的是非常用字。其余字项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上保持标准音与非标准音势均力敌的状态。

(3) 可以推测跨渤海湾的交流频繁,在渤海湾东西两岸出现了一致的语言现象。如图 6、7、9、11、12、20、21、22、27、28、29、36 所示,营口、鞍山出现了与葫芦岛、朝阳一致的读音,而往往与邻近的盘锦不一致。操北京官话的移民数量较少,且多定居在辽宁西部,这部分移民跨越中部平原来到营口、鞍山定居并使北京官话在语言竞争中胜出的概率不大,因此推测是渤海湾两岸的居民通过水路有着较多的交流和较广泛的人员流动,使得在西部势力较强的北京官话得以影响到辽宁东南部的营口、鞍山两地。最明显的是图 41,自由变体式的读音形式只出现在了渤海湾两岸。通过图 13、14、15、26、31、33、34、35、44 可以看出北京官话与其他方言竞争的痕迹,北京官话的读音形式跳跃式地保留在营口或鞍山。

(4) 图 12、21、22、37、41、45 能够明显看出省会沈阳出现了与周边相异的读音形式,而与西部诸点一致,但这不是与西部地区语言接触的结果,按照柴田武(2018: 28)“周边分布原则”,这种读音形式应该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下新产生的,恰巧与北京官话的读音形式相同。作为经济、政治中心,沈阳更容易被标准音同化,不过也应当看到,沈阳的老派方言虽然有被标准化的痕迹,但并不是十分明显,只有个别字项率先向标准音靠拢。

(5) 两种势力较强的读音形式中间可能会出现自由变读的情况,如图 11、15、18、21、22、24、25、26、30、32、35、45、46、47、48 所示。这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自然情况下这些区域可能会有某一种形式最终胜出,也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自由变读的状态,但是按照推广普通话的趋势来看,很有可能是普通话的标准音强势介入并覆盖原有的自由变读形式,这一点在对新派发音人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6) 如图 6、7、8、9、22、28、35、36、37、43、46 所示,一些字项有多种读音形式,按照地理语言学传统的分析方法,应该考虑这些不同变体是时间上的更替关系,通过地理分布找出语音的发展链条。但是考虑到辽宁地区特殊的移民历史,语言缺少自然演变的时间条件,加之语言地图显示,很多变体形式都只是出现在零星地区,字项与字项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布上的关联,因此推测这些不同的读音形式是语言竞争结果的留存,移民带来的方言多种多样,经过竞争、淘汰,基本趋同,但是仍有一些势力较弱的读音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散见于个别地区。

(7) 图 35、36 显示,字项“冗”、“辱”在大连地区读如标准音。大连地区作为从海路而来的山东移民的登陆地,整体语言面貌与胶辽官话类似,且距操北京官话的移民的落脚点——辽宁西部距离较远,不易受北京官话的影响,日系字的读音为零声母型和 [ɲ] 型。在大部分字项中的确是这样体现的,但“冗”、“辱”二字出现了例外,这种例外也许与这二字是非常用字有关,笔者目前无法给出更明确的解释,具体原因还有待继续探索。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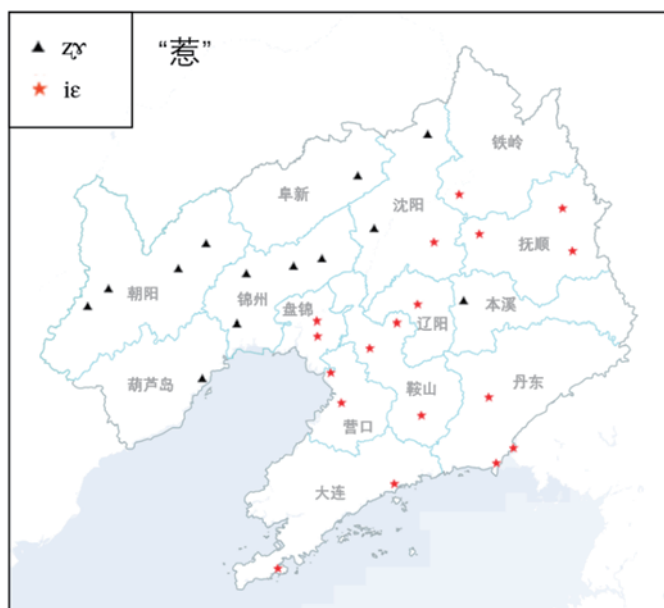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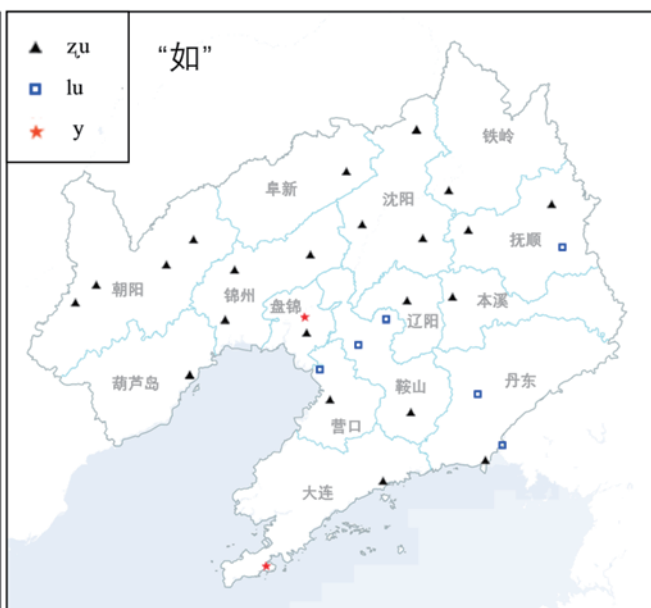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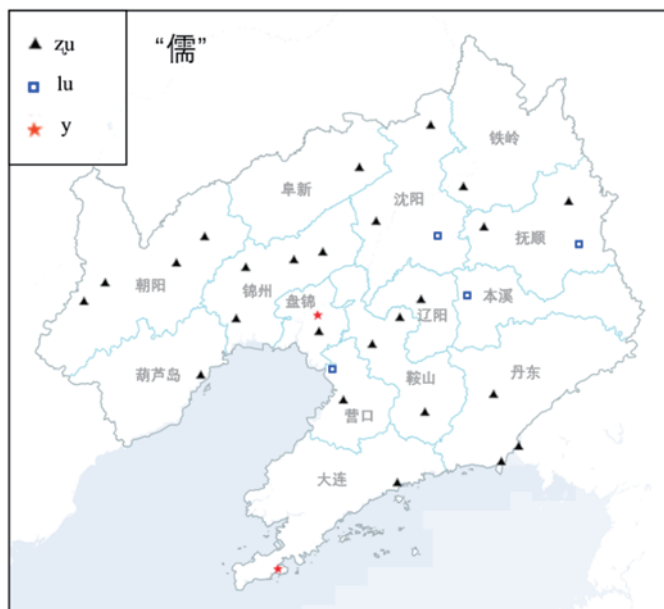


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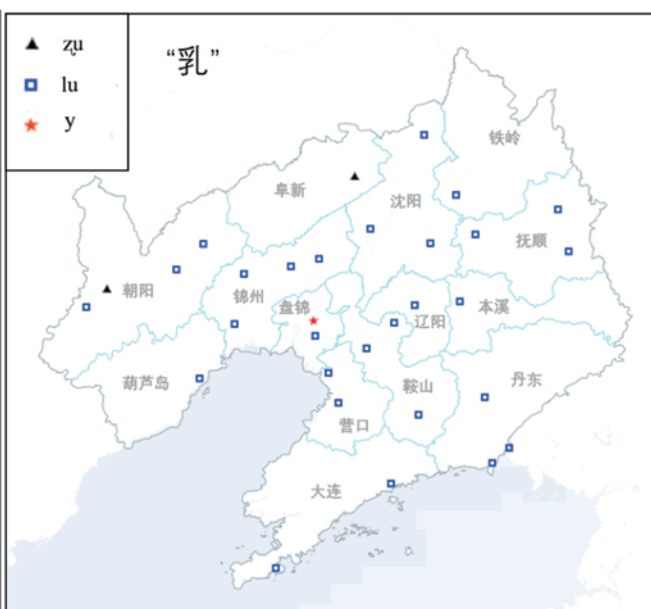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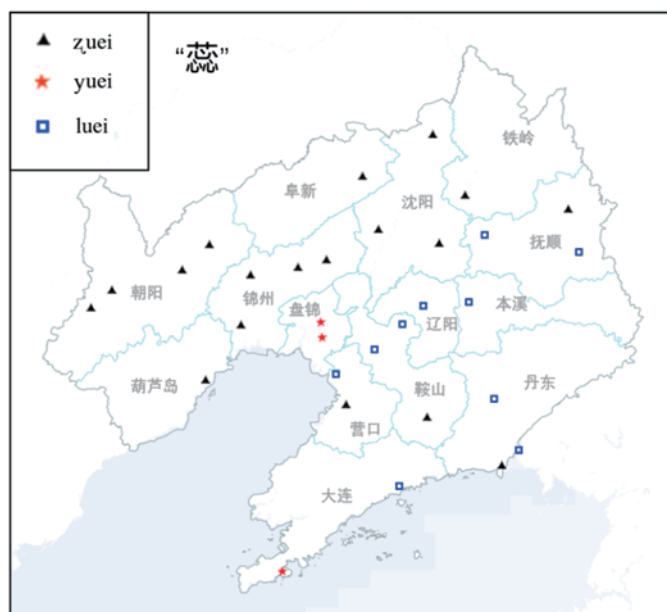


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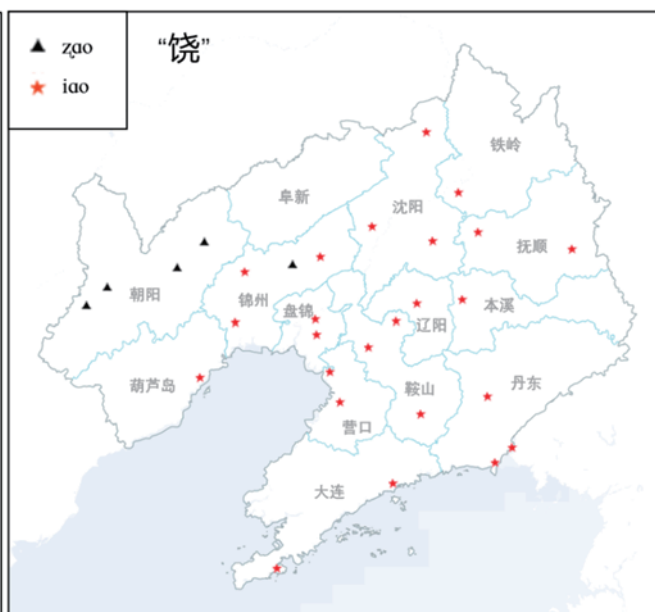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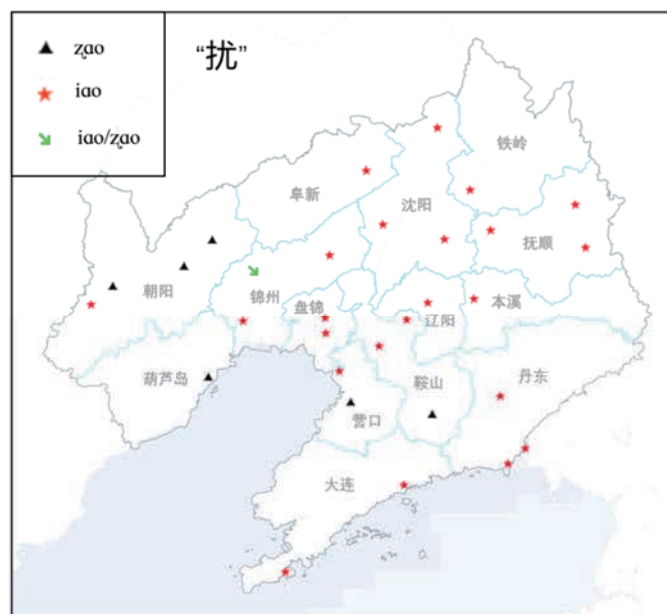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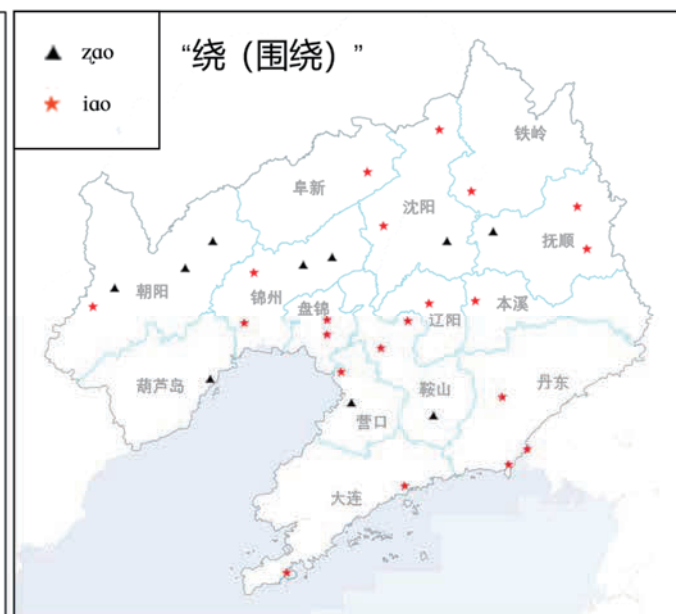


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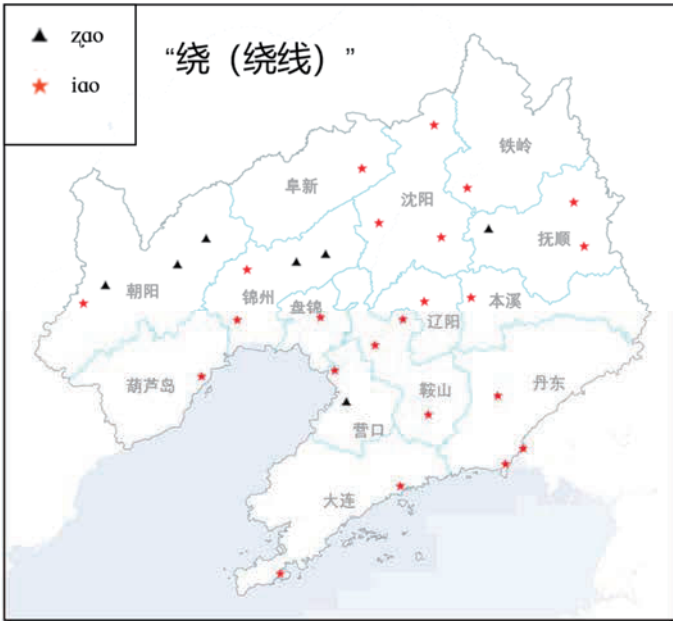


图 14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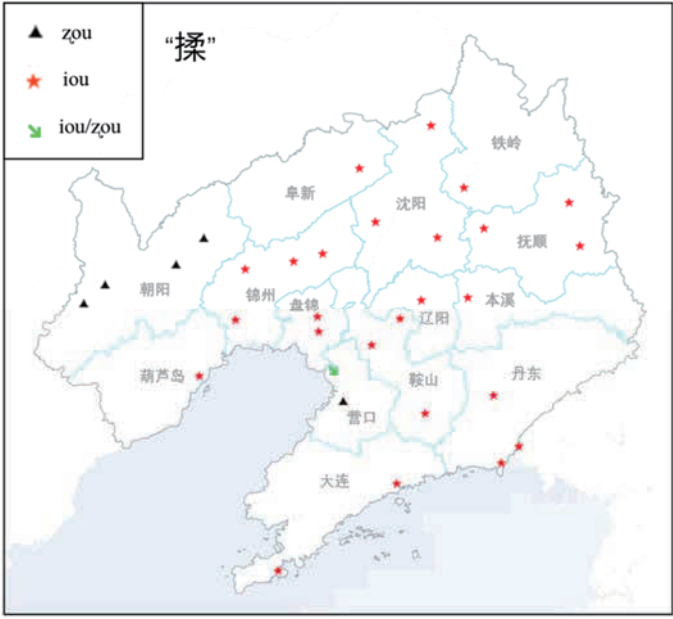


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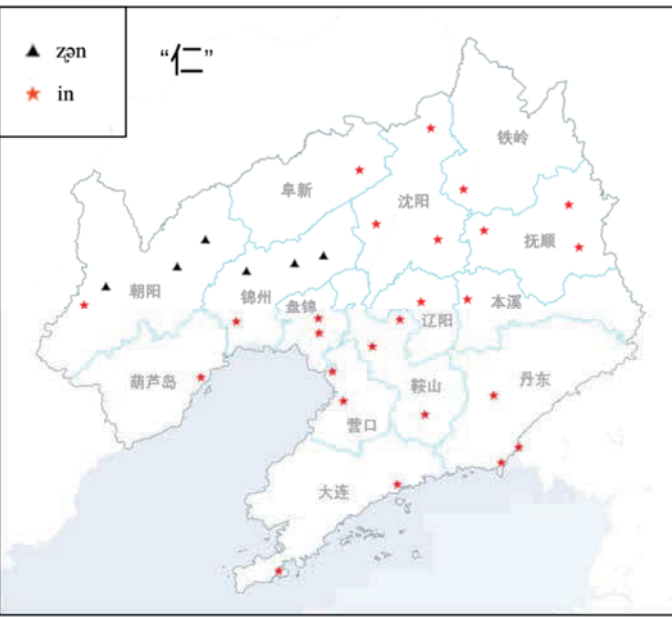


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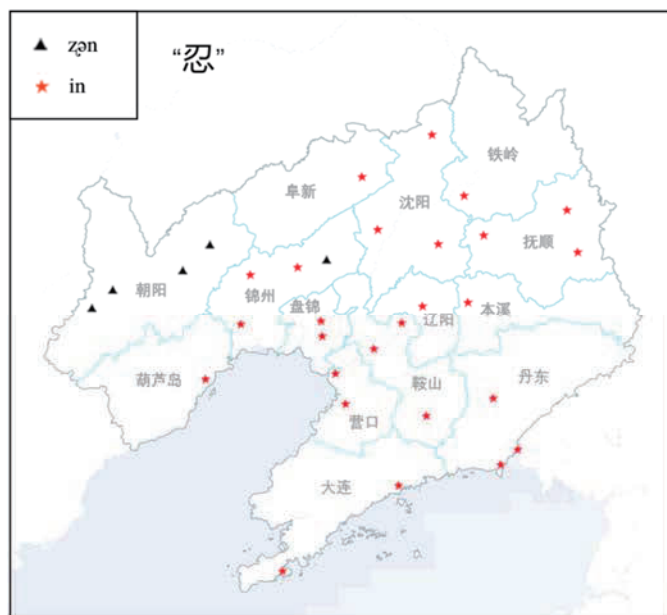


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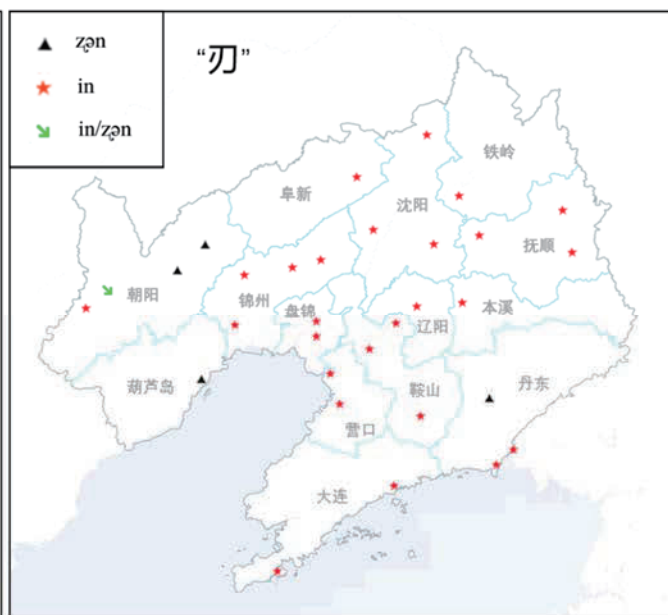


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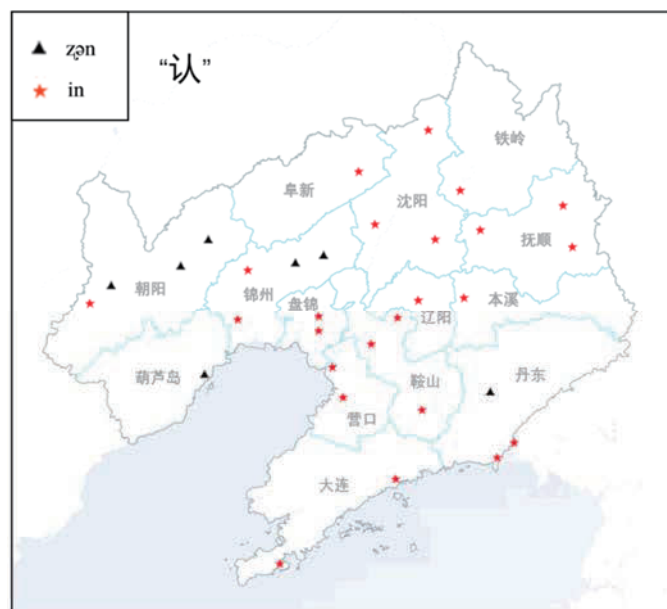


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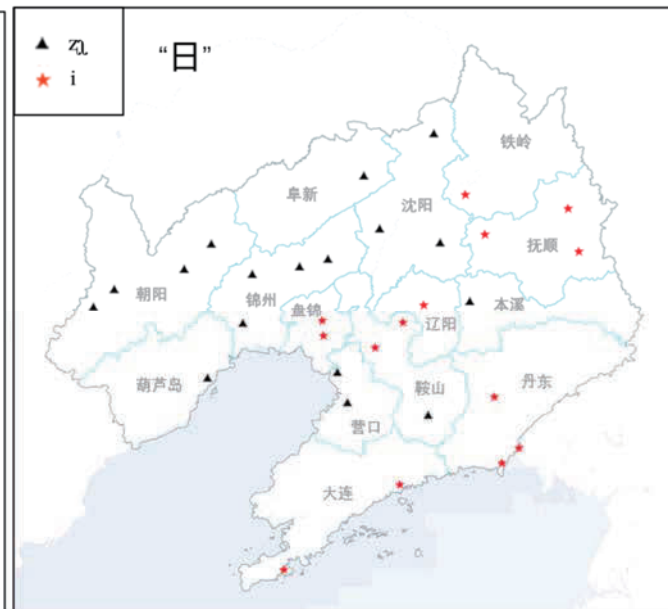


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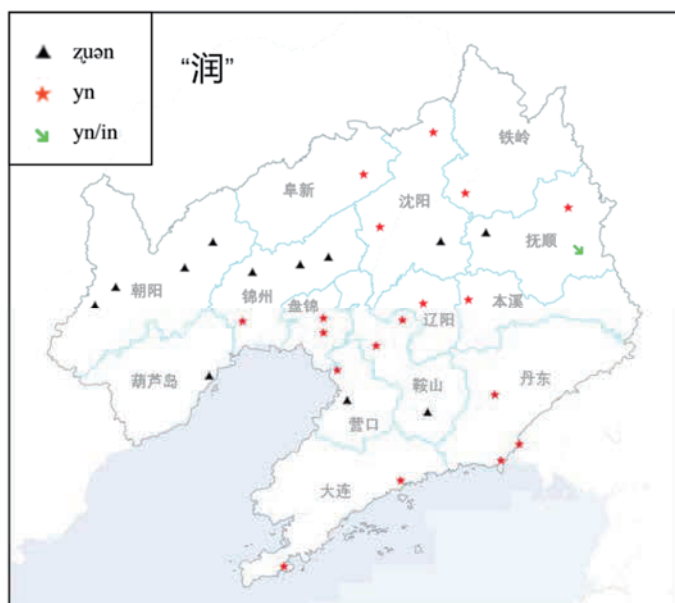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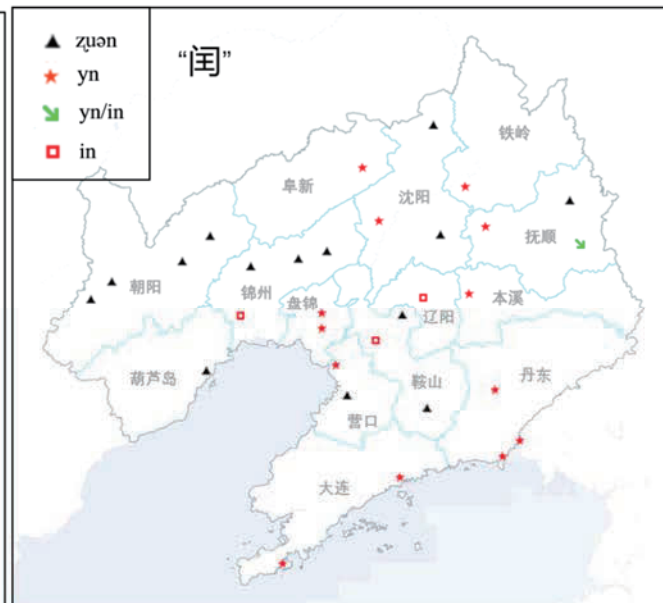


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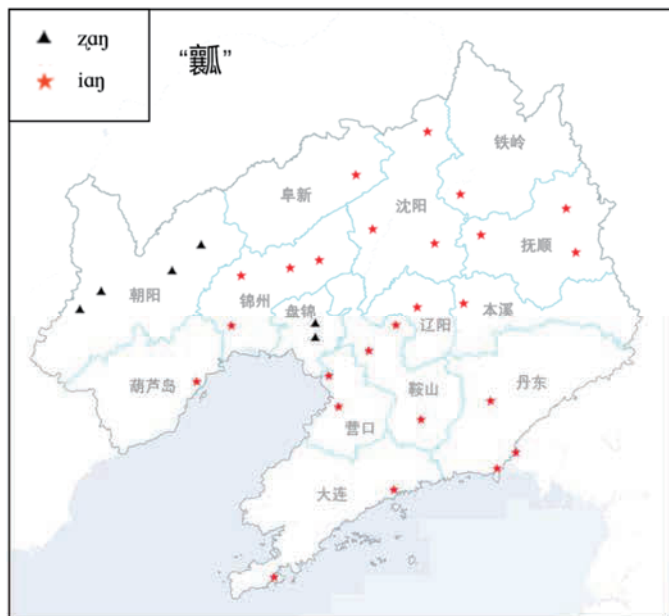


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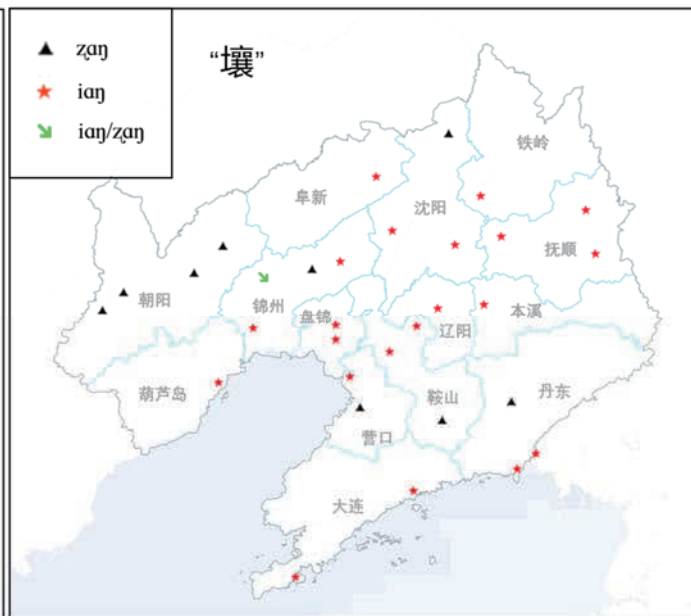


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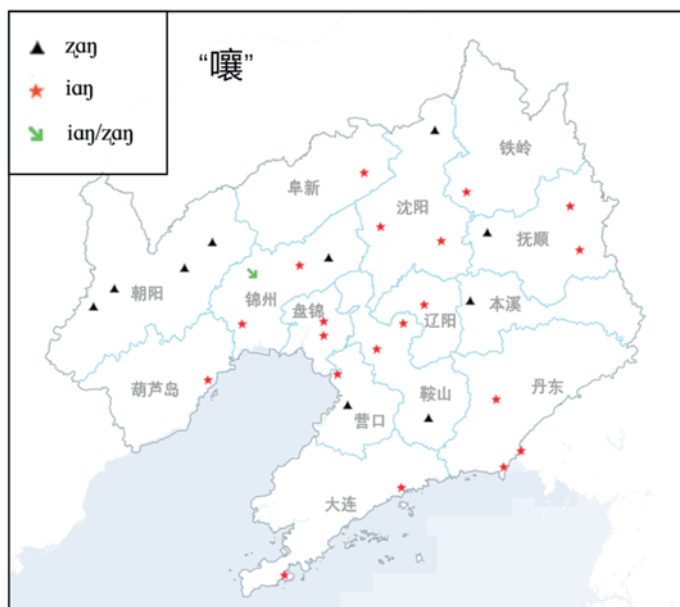


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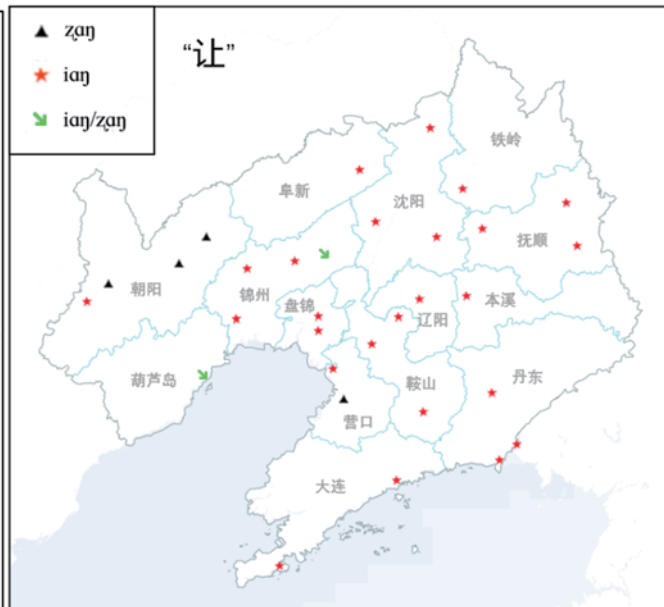


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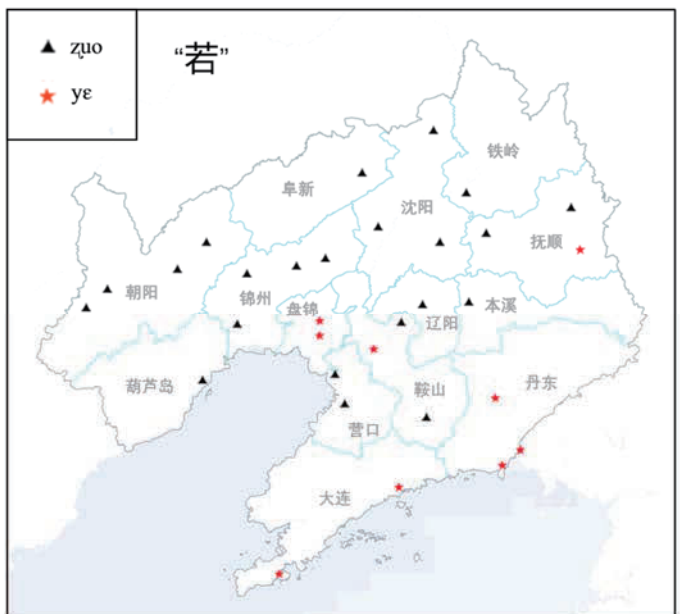


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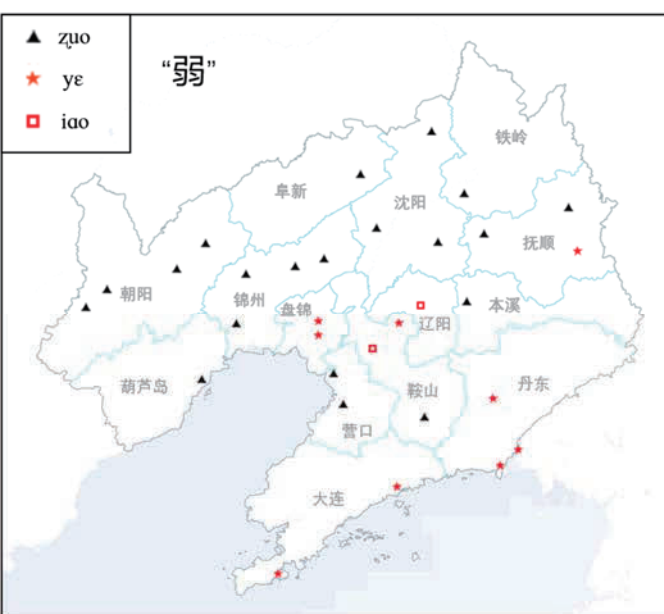


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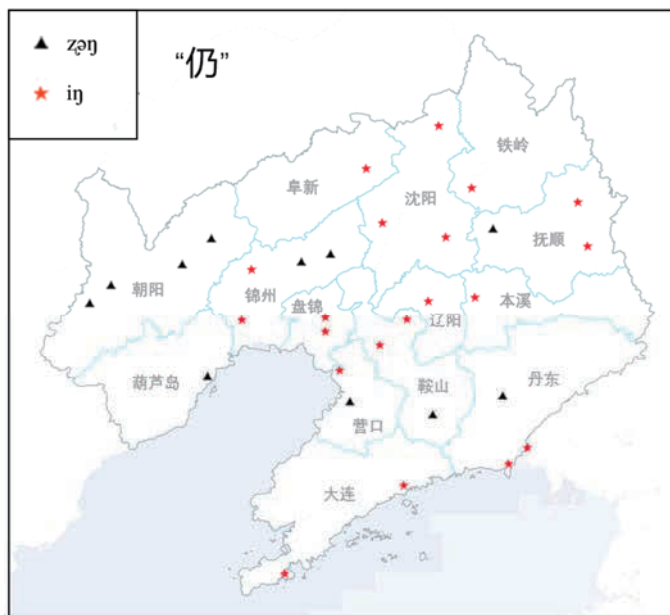


图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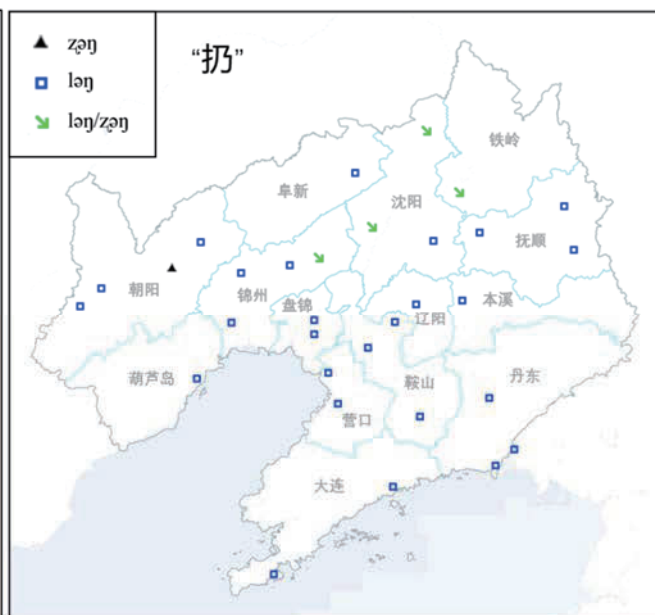


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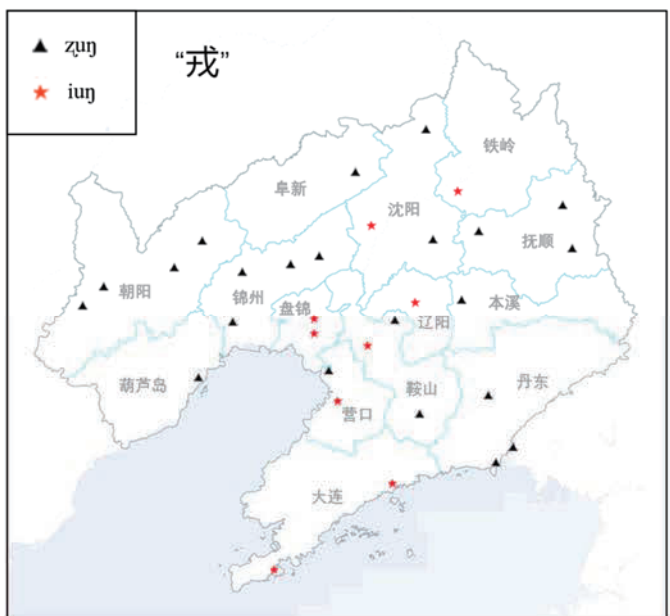


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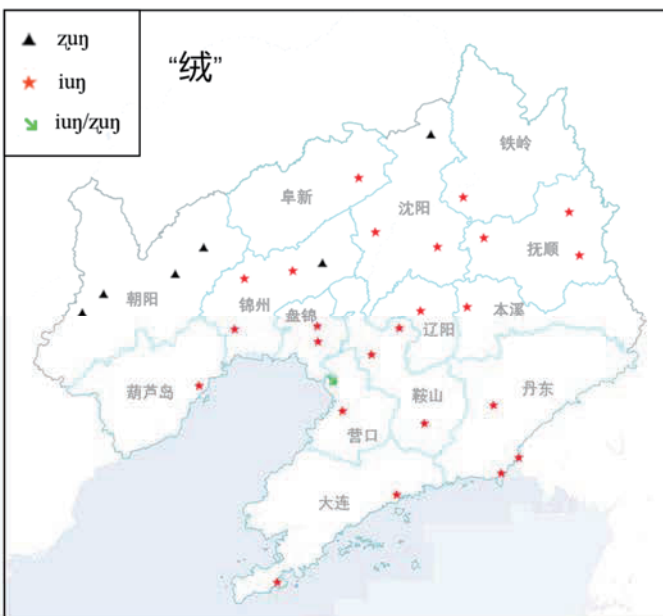


图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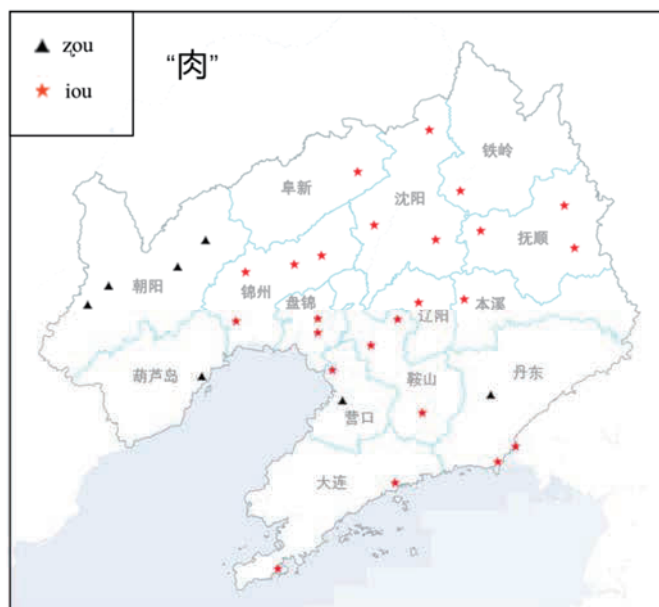


图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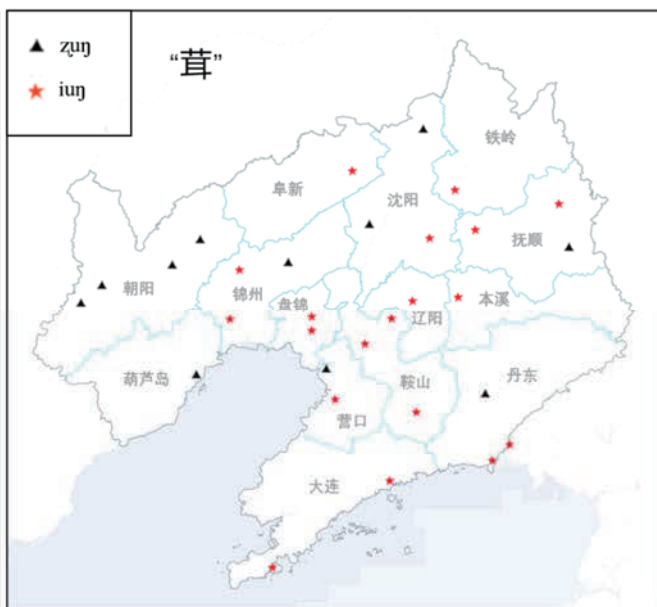


图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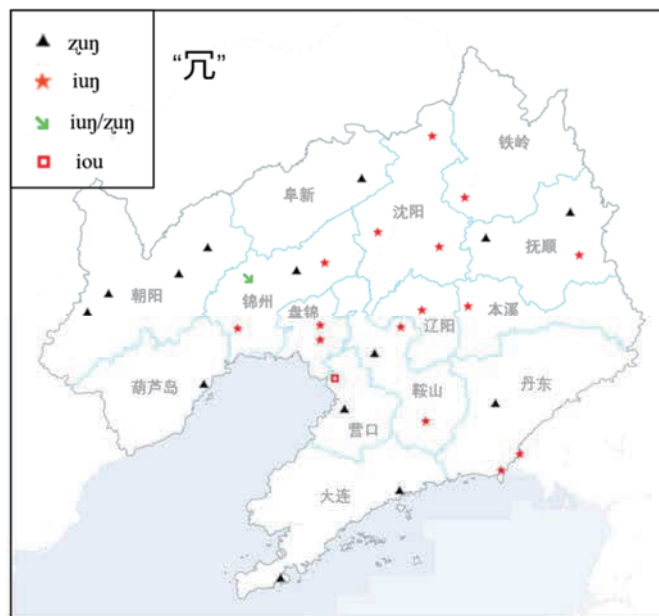


图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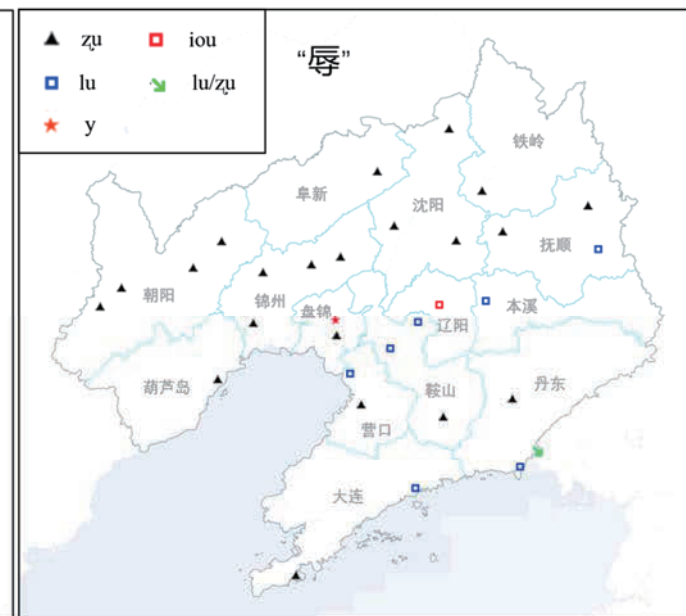


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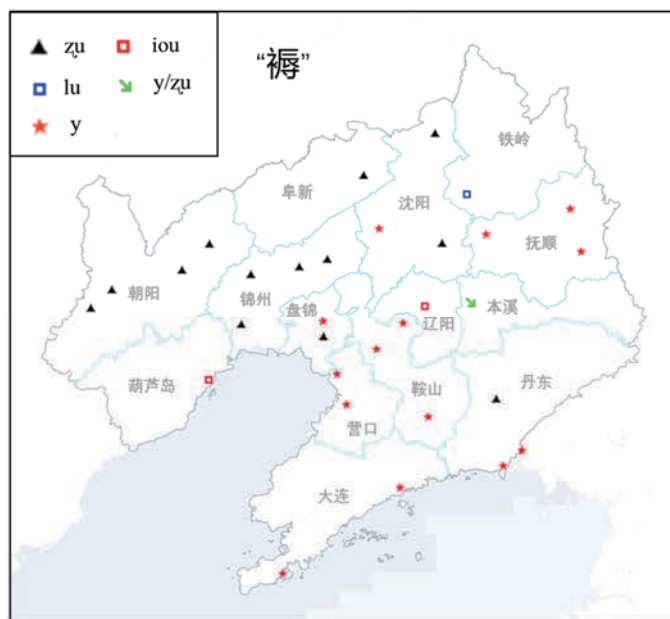


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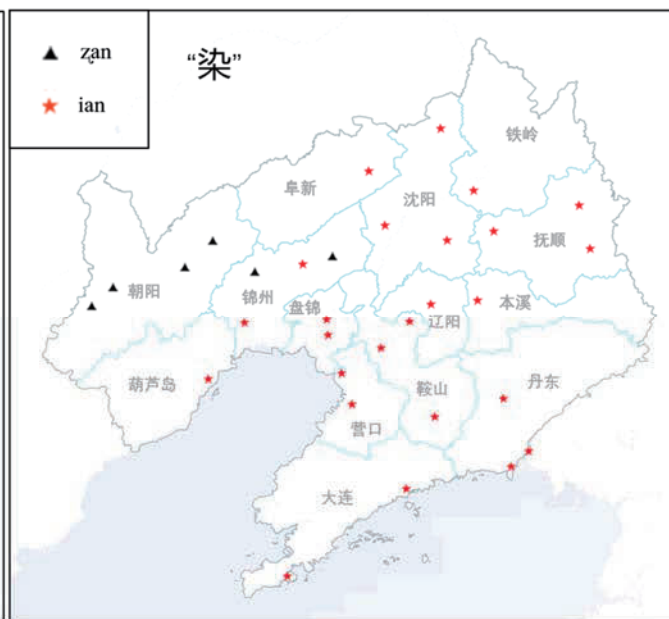


图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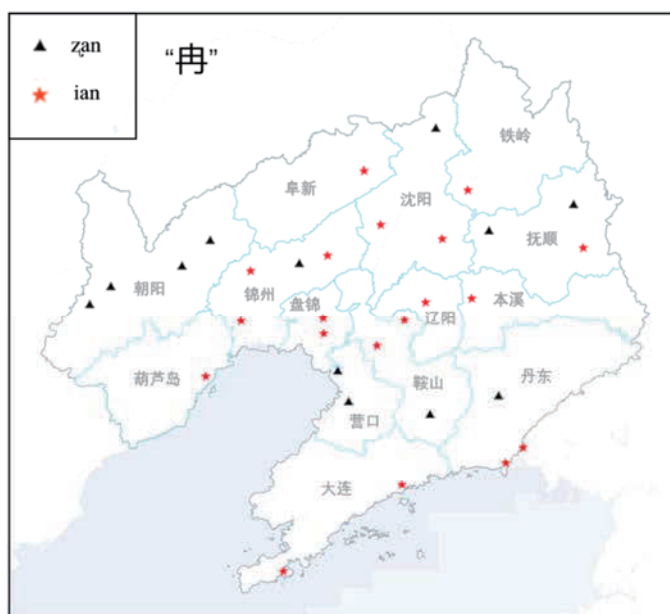


图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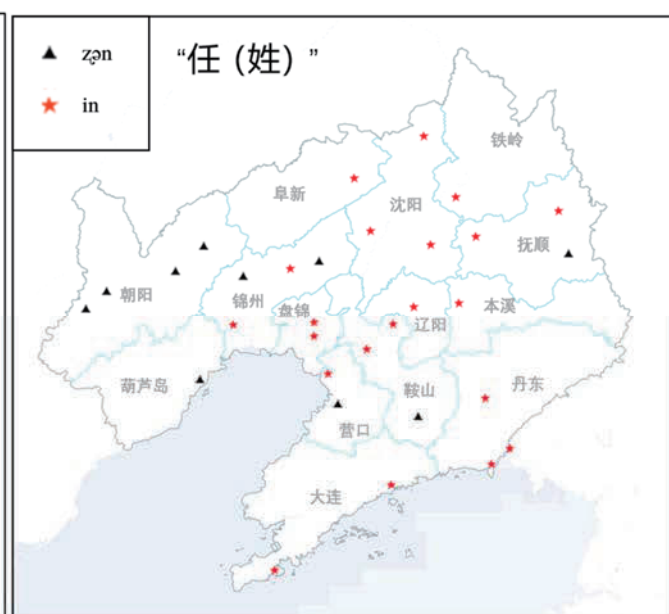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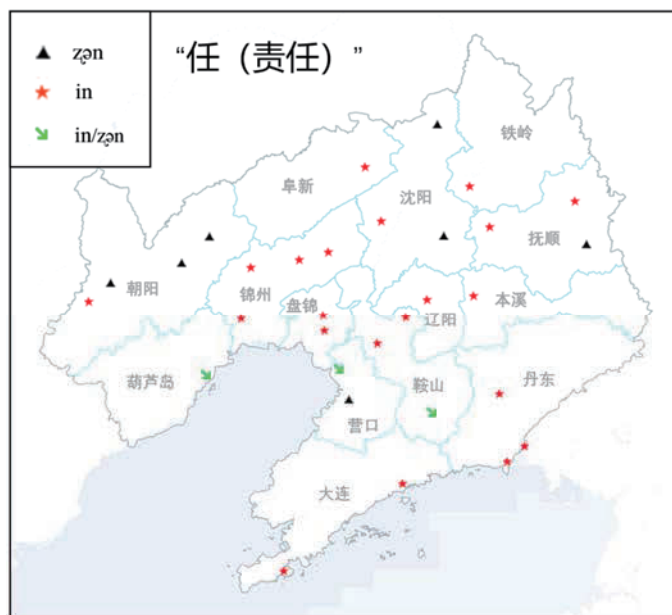


图 42



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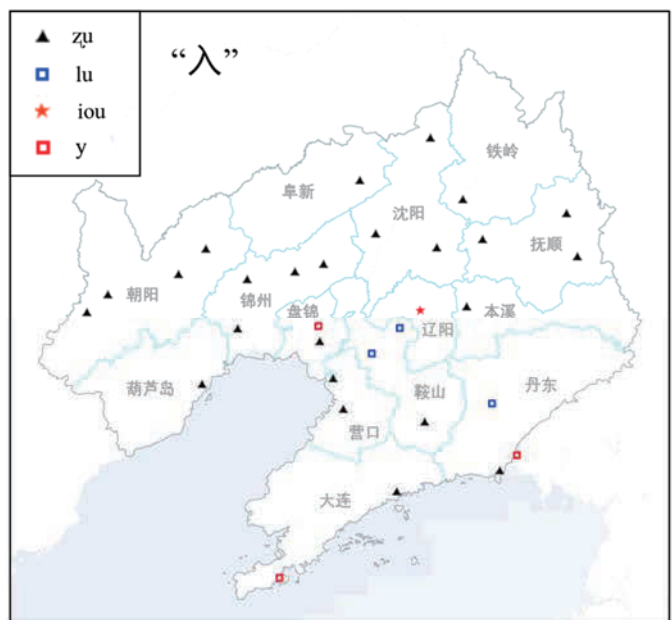


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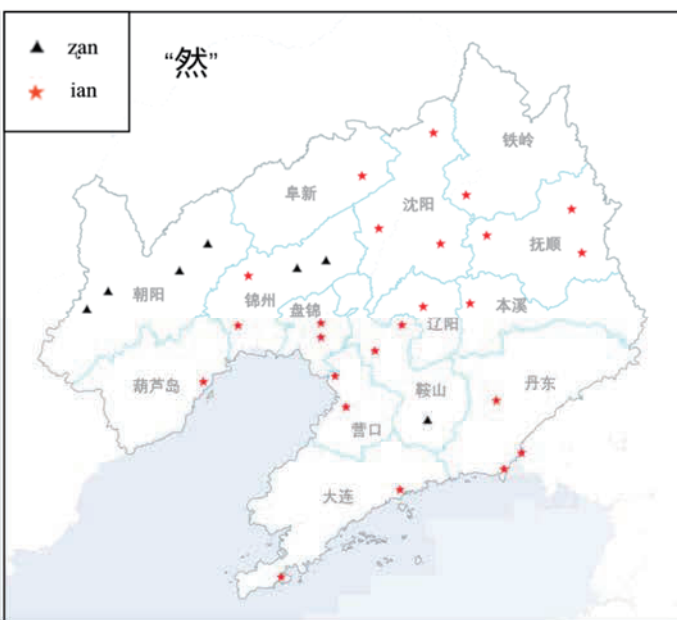


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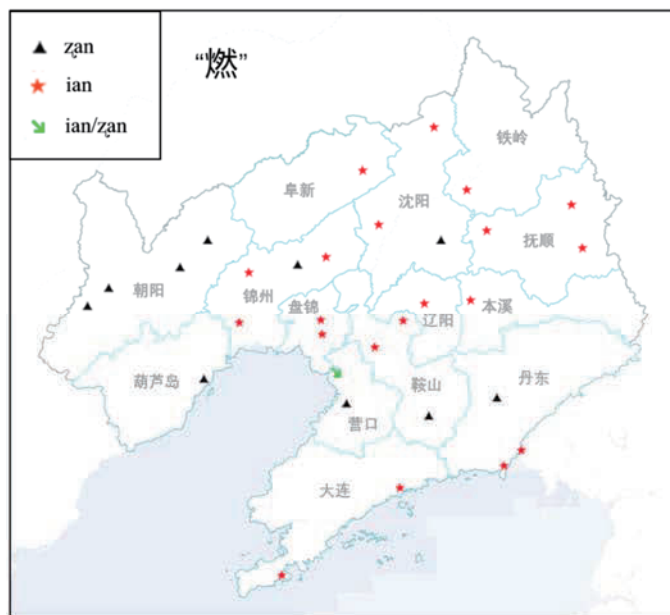


图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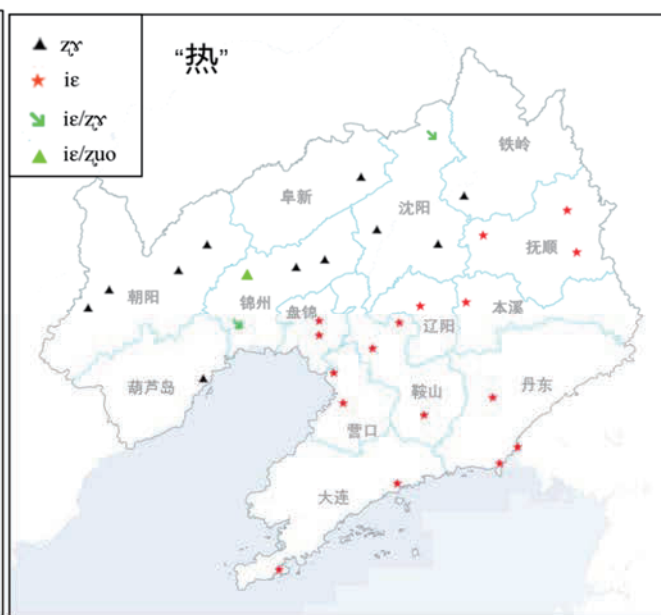


图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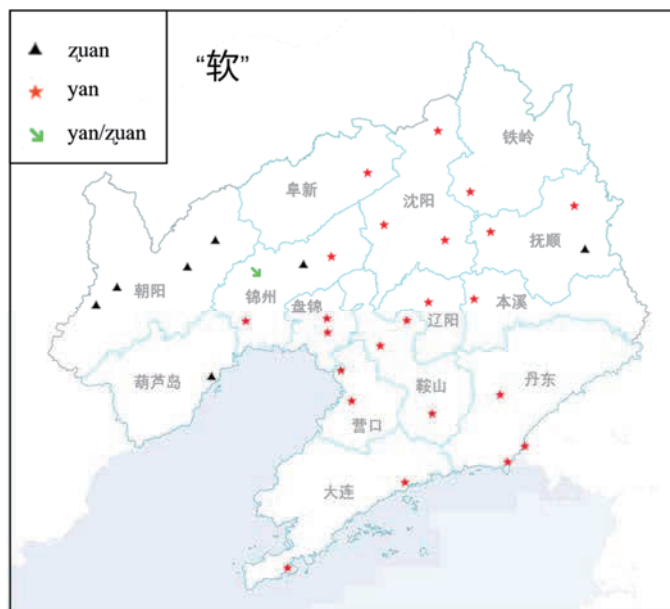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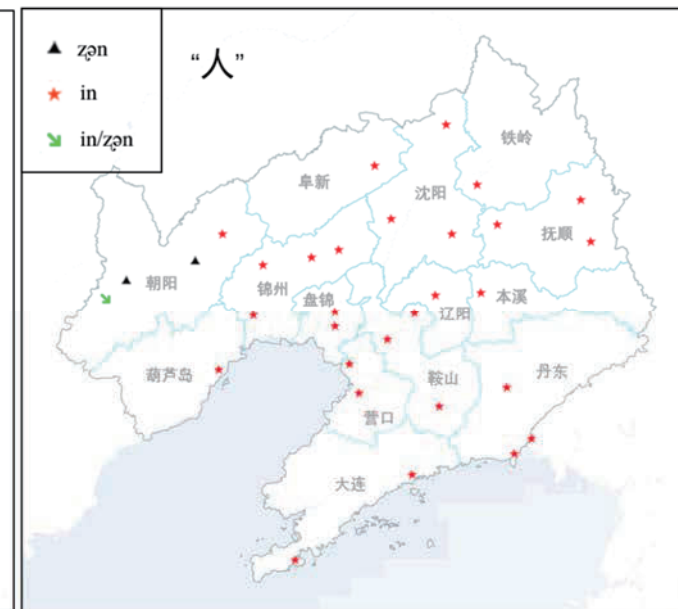


图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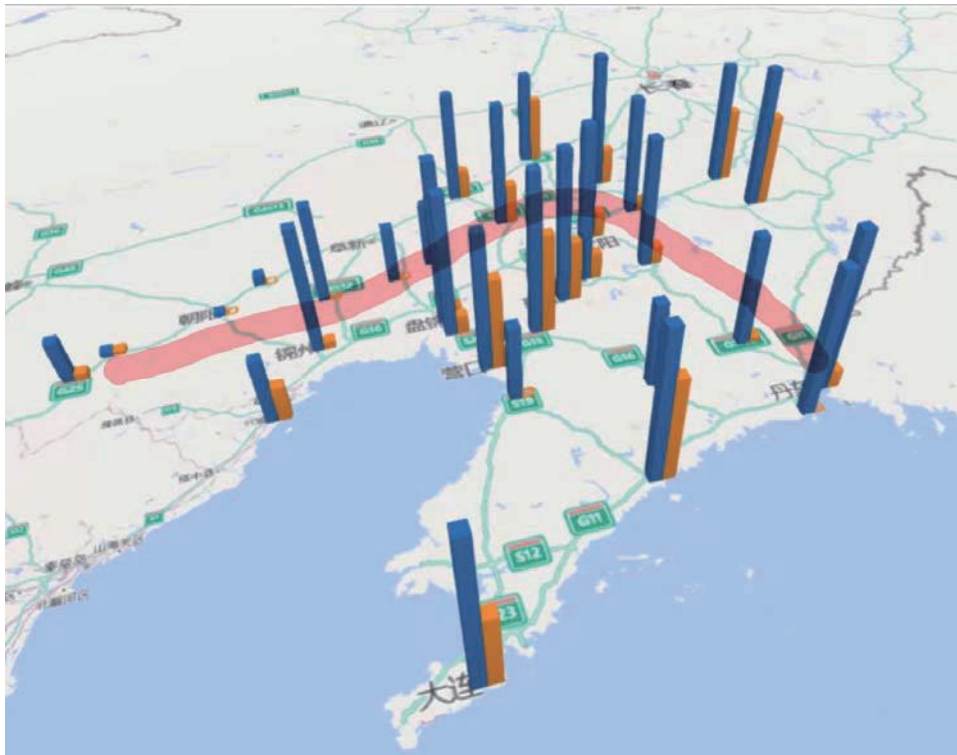


三、辽宁方言日系字的变迁历史及发展趋势

3.1 新老派日系字读音情况对比

本文通过三维地图¹⁷的形式展示日系字音变比（发生音变的字项数/字项总数）在各地的分布情况，方柱高代表该地日系字音变程度高，也就是多读为零声母型或[l]型，方柱低代表该地日系字音变程度低，多读为与标准音一致的[z]型。并通过柱形图颜色的差异（蓝色——老派，黄色——新派）展示新老派之间的对比。

图 49：新老派音变比对比图



从三维地图中可以看出，辽宁方言日系字的音变现象在各个方言点的老派读音中都有体现，总体上中东部音变程度高，向西侧递减。形成原因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及政治中心地位，移民集聚，人员交流广泛，形成对各地方言兼收并蓄的语音格局，并因为与底层方言形成合力而不易受权威方言影响；另一方面东部沿海一线符合自海路而来的山东移民北上的路线，受胶辽官话的影响大，保留了胶辽官话日系字音变程度高的特点。

而新派方言中日系字的音变程度在各点都有显著的下降，向标准音靠拢，并呈现出一条贯穿东西的条带状分界线，即图中标红的线，红线一带日系字音变程度最低，向南北两侧递增。结合上文可知辽宁西部日系字在老派方言中音变程度低于中、东部，与普通话格局更加相近，因此在新派方言中也更容易向标准音靠拢，音变程度进一步降低。在单字地图的分析中曾指出沈阳市区在老派方言中已经有向标准音靠拢的趋势，在新派方言中标准音以沈阳市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使中东部出现“中间程度低，南北两侧程

¹⁷ 该三维地图运用 Excel2019 软件绘制，底图采用必应地图（©2021Microsoft Corporation-GS(2020) 2193 号）。

度高”的语音格局，与西部地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条带状分界线。

3.2 辽宁方言日系字发展趋势

通过对不同发音人语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日系字的读音整体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很多字的读音在发音人口中已经与普通话一致，读为舌尖后浊擦音[z]。

从年龄的角度看，年龄越小，受普通话影响越大。新、老派日系字发音情况已经说明辽宁方言日系字受普通话影响向标准音靠拢在年龄层次上有很明显的体现。这其中有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也有“语言不安全感”¹⁸的成分使得新派发音人自觉放弃方言读音。

观察不同的词项可以发现，有些字的读音受普通话影响大，有些字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普通话对辽宁方言的影响从书面语词、新词语开始，逐渐影响口语词。字项下辖的词项中口语词、常用词多，则不易受普通话影响，“肉”字在口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如“吃肉”、“鸡肉”、“猪肉”等等，即使有非常用词“肉体”、“肉麻”等的影响，在读音上仍以保留方音为主；反之，则易受普通话影响，如“弱”字出现在辽宁方言出现频率低，只有“弱智”一词较为常用，但近年来从普通话中传入的非常用词如“软弱”、“弱不禁风”等非常多，因此“弱”的读音就有很强烈的向普通话读音靠拢的趋势。

另外，新派方言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向标准音靠拢，但在日系字音变中属于少数的[I]型几乎在各点都有保留，即使是新老派差异巨大的F4、J1等点，[I]型仍然存在，原本音变程度很低的E3、E4点在新派方言中也保留了[I]型，且各点[I]型日系字均匀地保留了1-2个（乳、扔），仅有D3一点保留了三个[I]型日系字（乳、扔、辱）。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第一，零声母型日系字在辽宁各地出现舌尖后音[tʂ tʂh ʂ]后容易向标准音[z]靠拢，因为人们知道“辽宁地区一些平舌音普通话读卷舌音”，在注意自身平翘舌发音的同时也对日系字有了关注，而[I]型与[tʂ tʂh ʂ]的关联并不明显，辽宁人在发音时难以注意到[I]型不是标准音；第二，调查结果显示各地保留的[I]型日系字主要是“乳”、“扔”二字，“乳”字读[I]音的情况主要存在于词“腐乳”中，“腐乳”属于常用词，不易被标准音替代，“扔”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中只有“扔**”或“扔了”的情况，不会与其他语素组成新词，与其他词组合成词组的情况也比较单一，组合度较低，难以受到读标准音的新词语同化。

总的来说，普通话对辽宁方言的影响是从书面语词、新词语开始的，逐渐同化包含某一字项的所有词、词组形式，不同字项受普通话影响的程度不同，有以下几种影响因素：

- （1）字项下辖的词项¹⁹中常用词多，则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 （2）[I]型相对零声母型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 （3）组合度低的字项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¹⁸ 路易·让·卡尔韦 2001《社会语言学》，曹德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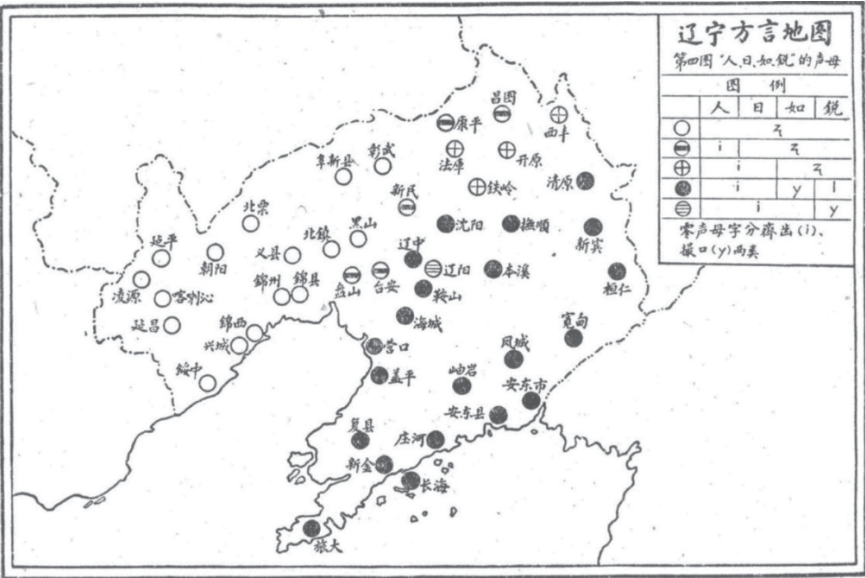
¹⁹ 包括与其他语素组成的词以及与其他词组成的词组。

目前辽宁方言中出现了文白两个语言系统，在国家推广普通话以及传媒发展的环境下，文读层正在逐渐扩张。从文白竞争的三个阶段²⁰来看，目前辽宁方言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处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中，虽然文读形式的运用范围受到严格的词汇条件限制，但是可以看到这种限制正在逐渐减弱，在年轻人中个别日常用语也可以采用文读形式，表现为文白并用，这些区域分布在图 49 条带状分界线的南北两侧；另一种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中，已经由“文白相持，势均力敌”的情况向“文读占绝对优势，白读形式的运用范围受到严格的词汇条件限制”过渡，这些区域分布在图 49 条带状分界线一带。如果结合教育普及、推广普通话的大趋势来看，第三阶段将逐渐成为辽宁地区方言发展状态的主流。

3.3 对更早时期辽宁地区日系字读音情况的探索

本文的方言数据大致能够反映目前辽宁地区日系字新老派的读音格局，反映辽宁地区日系字被标准音影响的现状，但比老派方言时间更早的语音格局是什么样子？宋学在其文章《辽宁语音说略》中有一张与日系字读音相关的语言地图，可以说这张地图反映的是辽宁地区“前老派方言”的情况，虽然只是对个别字的描写，但与今天的老派方言进行对比，也能从中窥见一些更早期辽宁方言日系字的读音信息和演变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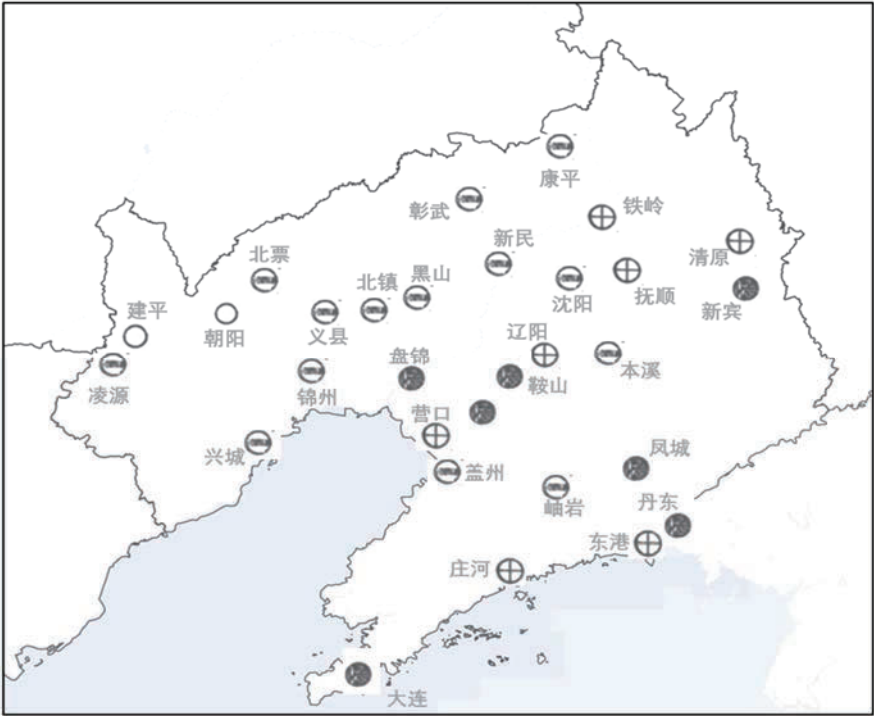
图 50：前老派方言日系字读音地图²¹



²⁰ 徐通锵 1991《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389-390 页。

²¹ 引自宋学 1963《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图 51：老派方言“人、日、如”声母分布图



由于此次调查的字项仅涉及日系字，“锐”字不在调查范围内，但忽略该字并不影响结果，因此图 51 仍采用与宋图一致的图例。从图 50 和图 51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老派方言较之前有一个“拉平”的特征，即改变了东西部泾渭分明的状态，过渡状态的分布区域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移民之间的接触情况，在此之前，落脚于东部和西部的移民之间交流较少，在各自聚居区形成一致的、区别于对方的语音格局，仅在中部平原有过渡态的出现。此后两部分移民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语言接触更加深入，中部的过渡区域扩张，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交通改善，人员得以在省内流动，另外沈阳音很可能是当时辽宁内部的权威方言，其对周边区域的读音形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总结来说，辽宁方言日系字内部经历了如下变迁：

表 4：辽宁方言日系字内部变迁情况

	前老派——老派	老派——新派	新派——
权威方言	沈阳音	普通话	普通话
人口流动情况	主要是省内流动	全国范围的流动	全国范围的流动
结果	东部（受胶辽官话影响大）、西部（受北京官话影响大）语言接触更加深入，中部平原的过渡态向四周扩张。	受推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向标准音靠拢，标准音的影响从贯穿东西的条带状分界线向两侧蔓延。	基本与普通话一致，仅在个别地区、个别词项中保留方言读音。

前老派到老派之间的过渡仅仅是一种推测，由于缺少更完整、更具体的语言材料，只能从几个字的动态变化中窥探辽宁地区日系字更早期的读音情况和发展情况，如果能够结合一些日系字以外的方言材料，或许能够找到共性规律，因此对于辽宁方言更早期

的面貌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四、结论

日系字的读音是辽宁方言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声母共有三种形式——[ʒ]、零声母和[ɲ]，其语音发展路径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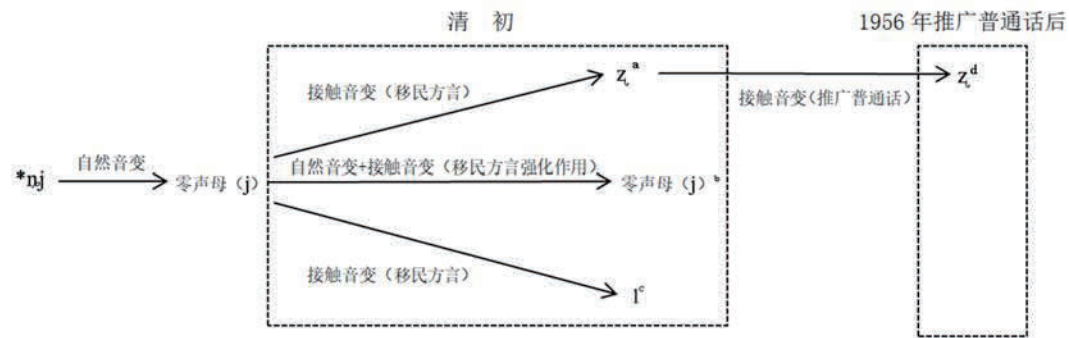


图 52 辽宁地区日系字声母演变轨迹

从历时角度看，辽宁地区日系字可能先经历了内部东西两方的接触，而后被权威方言普通话大规模地影响。从现有资料来看，辽宁方言日系字的读音受普通话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文白异读的现象，文读形式在新派方言中比例很高，很多白读形式仅存于个别地区老派方言中。在推广普通话、传媒发展以及普及教育的大趋势下，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是与普通话读音一致。

附记：本文由笔者在曾晓渝教授指导下的本科毕业论文改写而成，写作过程中承蒙曾晓渝教授、曾智超、刘京杰、刘欣提供帮助，远藤光晓教授审阅本文初稿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参考文献

柴田武 2018 《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保亚 1993 《语言文化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戴鑫 2014 《凤城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高晓虹 2013 《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第 2 期。
李南依 2019 《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05 《辽宁省志·人口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辽宁省人民政府，<http://www.ln.gov.cn/zjln/zrgm/>，[引用时间 2020-3-20]。
路易·让·卡尔韦 2001 《社会语言学》，曹德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孟祥宇 2012 《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利，刘芳 2014 《晋东南晋语日系字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 3 期。
宋学 1963 《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 王艳慧 2013 《辽宁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项梦冰 2006 《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兼论切韵日母的音值及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 项梦冰、曹辉 2012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春宇 2010 《辽宁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岳辉 2006 《〈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的语言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 期。
- 张世方 2009 《东北方言知系声母的演变》，《汉语学报》第 1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调查字表》，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汉语方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邹德文 2009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The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Ri-Consonant System in Liaoning Dialect

LIU Jing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onological change of the Ri-consonant system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Liaoning dial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consonant system pronunci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using geo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methods. It shows the situation of sound change, summarizes the law of sound change, probes into the causes of sound change, and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levels of different forms by comparing the old and new dialect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odern Mandarin on each region and each word,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i-consonant system in Liaoning Province.

从地理语言学的视角看文白读音的势力消长

黄河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院

提要：本文调查了宜兴市 58 个方言点麻三韵的文白异读，这种文白读音在地理上的消长，可以作为一种用来衡量吴语-江淮官话过渡地带方言的指标。本文基于精选的负载词调查字音，以更好地反映地理的差异。通过 10 幅字音地图、1 幅计数地图、1 幅同言线汇总图描写并讨论了麻三韵文白异读在这片区域的分布。我们发现白读音自北向南保存得越来越好，呈现地理上的渐层分布，说明文读音是沿着沪宁一线向东扩散，优先作用于靠近沪宁线的北部。

关键词：吴语 宜兴话 文白异读 同言线 麻韵三等

一、问题的提出

吴语普遍存在的文白异读，宜兴吴语也有此问题，其中文读来自官话。江苏省宜兴市处在吴语、官话的交界地带，宜兴话的文白体现为地理分布的差异，呈现了两股势力在宜兴境内势力的消长。本文以宜兴方言麻三韵为考察对象，宜兴话麻三韵有三种读音，《荆音韵汇》¹中分列于三个韵部：查部（*o/io）、谐部（*A/iA）、言部（*ie）。三个韵部拟音以及与今天宜兴丁蜀音、中古音对应关系如表 1：

表 1：三个韵部拟音以及与今天宜兴丁蜀音、中古音对应关系

《韵汇》韵部	丁蜀音	拟音				中古音
		开	齐	合	撮	
查部	o	*o	*io	*uo		假撮、佳韵（少数）
谐部	A	*a	*ia	*ua		蟹开二，假开三（部分字），泰韵（除帮见系）
言部	ii		*ie			咸、山撮二四等，三等（部分字），假开三（少数）

麻三韵分列在三个韵部，在这里反映的是一种文白异读现象。究竟读查部还是谐部，是一种用来衡量吴语-江淮官话过渡地带方言的指标，读查部体现更多的吴语性质，读谐部体现更多的官话性质。特定负载词中麻三字音在宜兴不同方言点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先来看涉及查部、谐部两个层次的字。在宜兴方言中涉及该问题的字是麻三精组、章组、影组字：

¹ 《荆音韵汇》是一部反映两百年前宜兴南部方音的字书，该书是《康熙字典》的简编索引，将字音按照当时宜兴音系“韵部—声类—调类”的次第排列，入声韵部单列，分四十二个声纽、二十四韵部。耿振生（1993）介绍了该书的音韵框架，并依据宜兴丁蜀话给各个韵部、声类拟音。黄河（2015）从文献学的角度介绍了该书的版本、体例及作者概况，并考证作者故里的地址和该韵书的方言基础，黄河（2016）阐述了该文献在方言学、文献学方面的价值。系统研究了《荆音韵汇》音系，并结合自己调查的老、中、青三代的宜兴方言材料，讨论了宜兴方言两百多年来的演变，并统计《荆音韵汇》的各类文献数据，编制《荆音韵汇》韵图，并附有点校的文献原文。

表 2：麻三精、章、影组字

精组	斜
章组	遮蔗蛇射社麝赦舍佘者车
影组	夜

以上诸字放在以下的负载词中进行调查：

斜：这条线斜佬。这条线是斜的。

遮：夏天头撑把伞遮遮太阳。夏天打把伞遮一遮太阳。

蔗：甘蔗

蛇：蛇

射：射击

社：公社

麝：麝香

赦：大赦

舍：宿舍

佘：佘太君

者：记者

车：车子

夜：夜头 晚上

其中“者”“射”方言土话中较少使用，只有较为书面的负载词，“赦”“佘”经常出现在本地戏文中，分别是“大赦”“佘太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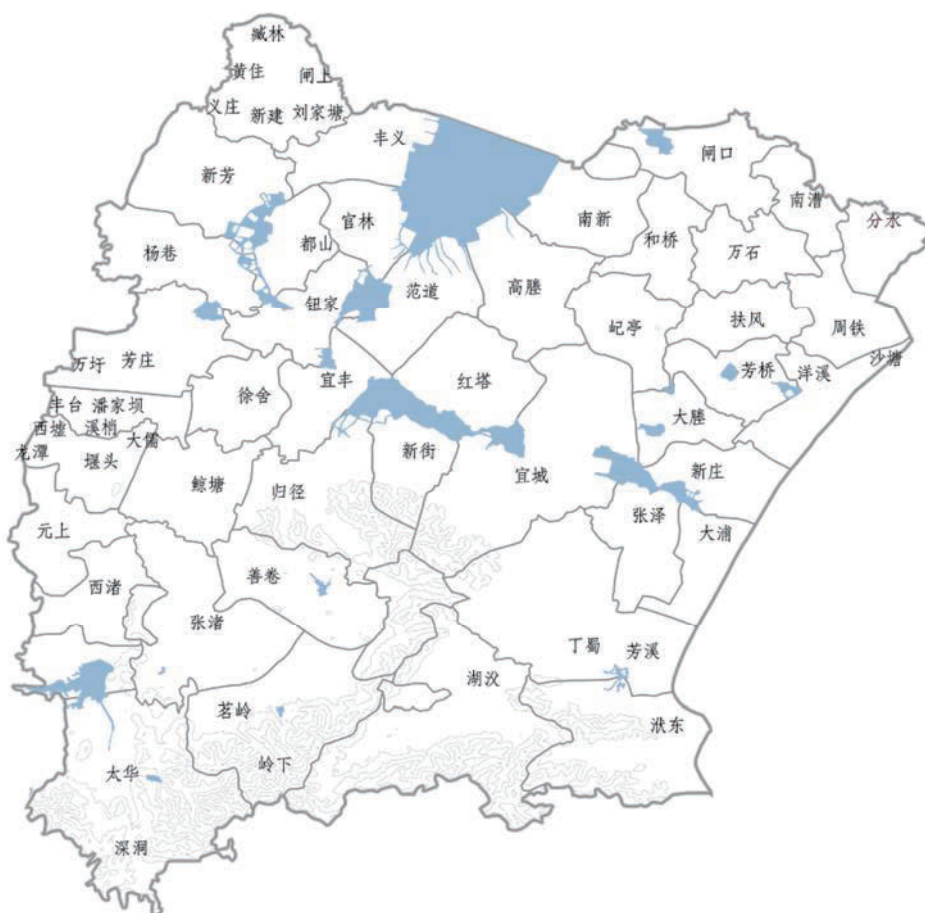


图 1：宜兴市 58 个调查点分布图

本文在宜兴市范围内调查 58 个地点的麻三字音的地理分布，对每幅地图逐一进行描写，然后统计整个宜兴麻三字音读入查部的比例，用语言地图呈现，以观察哪些区域的方言更多地体现吴语性质，然后将各个字音的同言线进行叠加，并观察音韵同言线的蕴含关系。图 1 是宜兴市地图，上面标注了 58 个调查点的位置和地名，蓝色区域为湖泊，宜兴南部的等高线阴影标示该地为山区。

二、麻三字音的地理分布

本节绘制麻三字音的语言地图来描写字音的地理分布。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上，字音的声调因为不涉及文白异读的问题，统一用 1（阴平）、2（阳平）、3（阴上）、4（阳上）、5（阴去）、6（阳去）、7（阴入）、8（阳入）来标注调类。接下来先一一交代各字的分布情况：

1. “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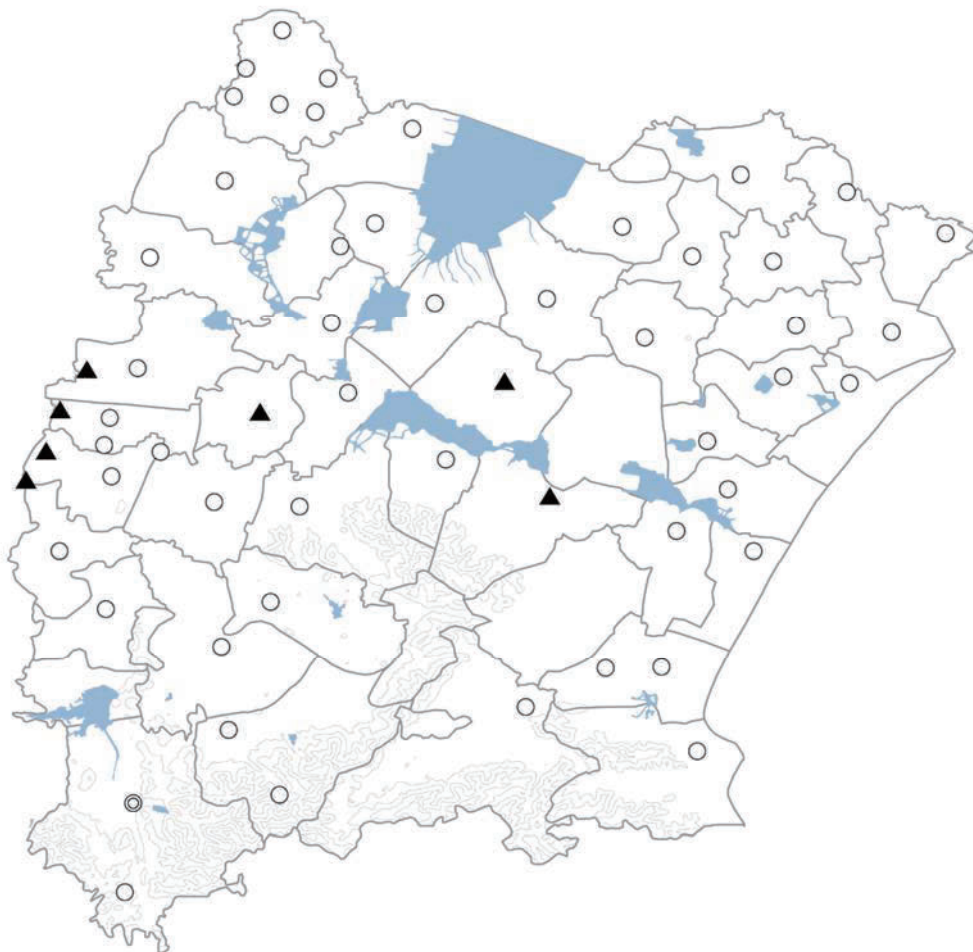


图 2 “斜”的字音

- zia^2
- ▲ zio^2
- ◎ zie^2

宜兴大部分区域都是读 ziA^2 ，即读入谐部的字音。只有宜城、红塔、徐舍，以及宜溧交界地区的丰台、龙潭、西墟、万圩读 zio^2 ，即读入查部的字音。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角的太华读 $zi\epsilon^2$ ，主元音的舌位较高。溧阳是读 zio^2 ，故宜溧交界地区的 zio^2 与溧阳是连续分布的。宜城、红塔、徐舍也都读 zio^2 ，只按照分布来推断，有两种可能：1. 宜城、红塔、徐舍的 zio^2 来自于别处，宜兴全市的本来就是读 ziA^2 ；2. 宜溧两市本来都读 zio^2 ，是除宜城外的大部分地区改读 ziA^2 ，宜城和宜溧交界地区还保存原来的面貌。 io 是白读， iA 是文读。我们可以排除第一种猜测，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从常州话麻三基本上都读 iA/A 来看，宜兴广大区域和常州话是连续分布的。

2. “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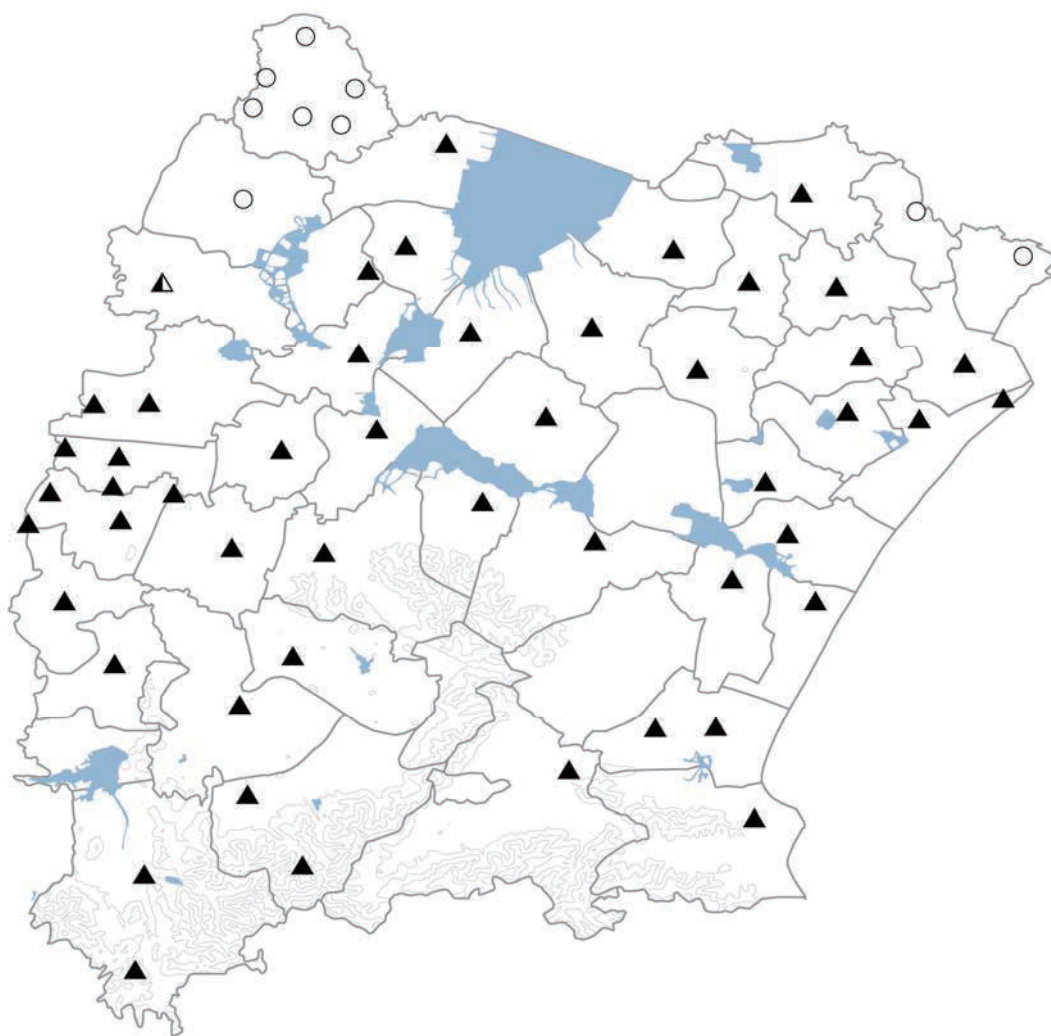


图3 “遮”的字音

- tsA^1
- ▲ tso^1
- △ tso^1/tsA^1

宜兴大部分区域都是读 tso^1 ，只有东北角和西北角才读 tsA^1 。杨巷位于两种形式的

交界地带，所以出现一部分人说 tso^1 ，一部分说 tsA^1 ，不过说 tso^1 的人要多一些。显然东北角、西北角说 tsA^1 和常州话是连续分布的。该分布可以看作是受到官话影响甚剧的常州话进一步南下冲刷宜兴北部方言形成的。

3. “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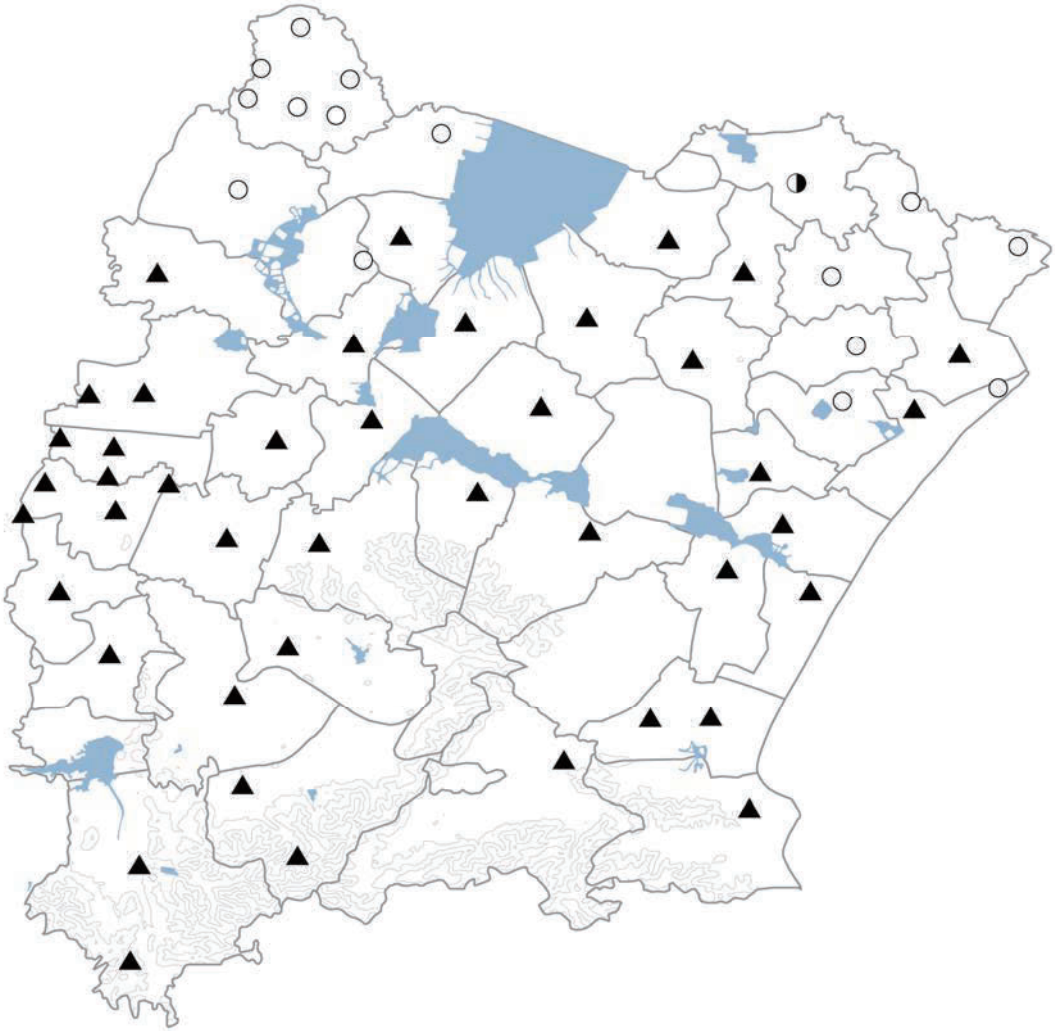


图4 “蔗”的字音

- tsA^3
- ▲ tso^3
- ◐ tsA^3/tso^3

“蔗”分布格局和“遮”是差不多的，都是宜兴大部分地区读 tso^3 ，东北角、西北角读 tsA^3 。闸口位于两片的交界地带，既有人读 tsA^3 ，又有人读 tso^3 ，读 tsA^3 的人更多一些。不同的是“蔗”和“遮”两种读音的地理分布边界，“蔗”受到常州话南下侵袭的程度要厉害一些。

4. “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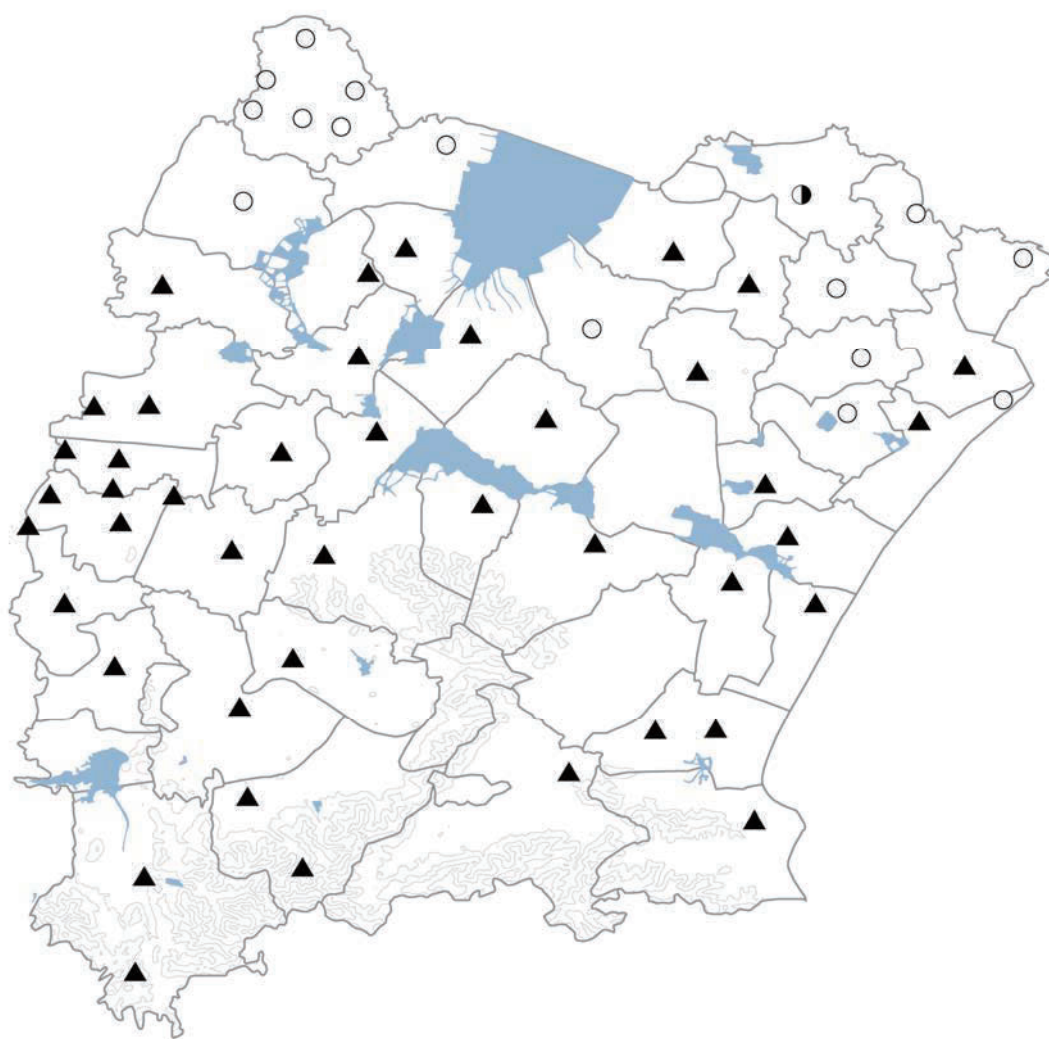


图5 “蛇” 的字音

- zA^2
- ▲ zo^2
- ◐ zA^2 / zo^2

“蛇”和“蔗”的分布十分接近，不同的是西北角的都山尚未沦陷，瀟湖南岸的高鰲也读 zA^2 。

5. “射”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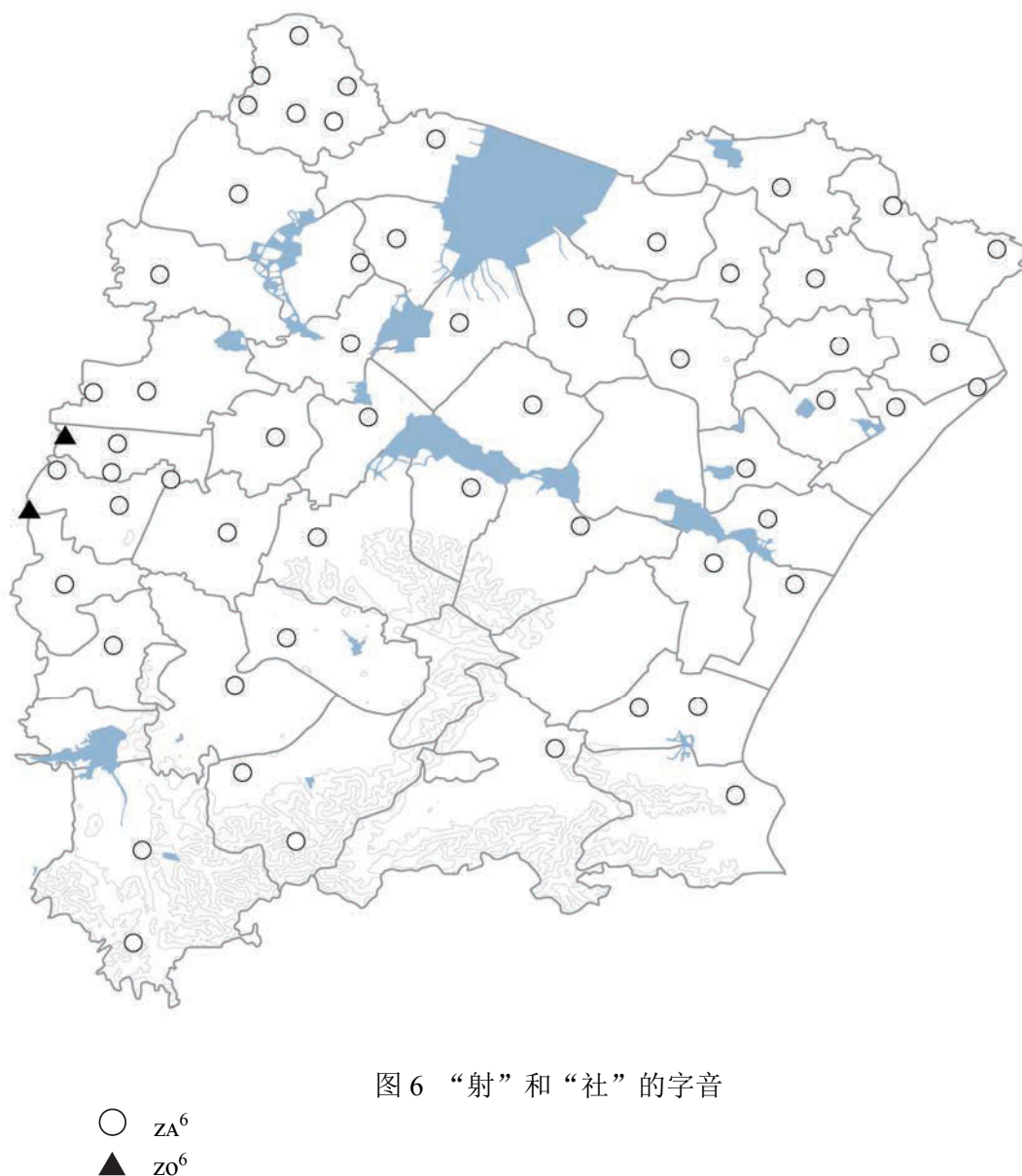


图6 “射”和“社”的字音

“射”和“社”二字的分布完全一致，所以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宜兴大部分区域两个字都读 zA⁶。只有宜溧交界地区的龙潭、丰台两个点读 zo⁶。溧阳两个字都读 zo⁶，两个点和溧阳是连续分布的。

6. “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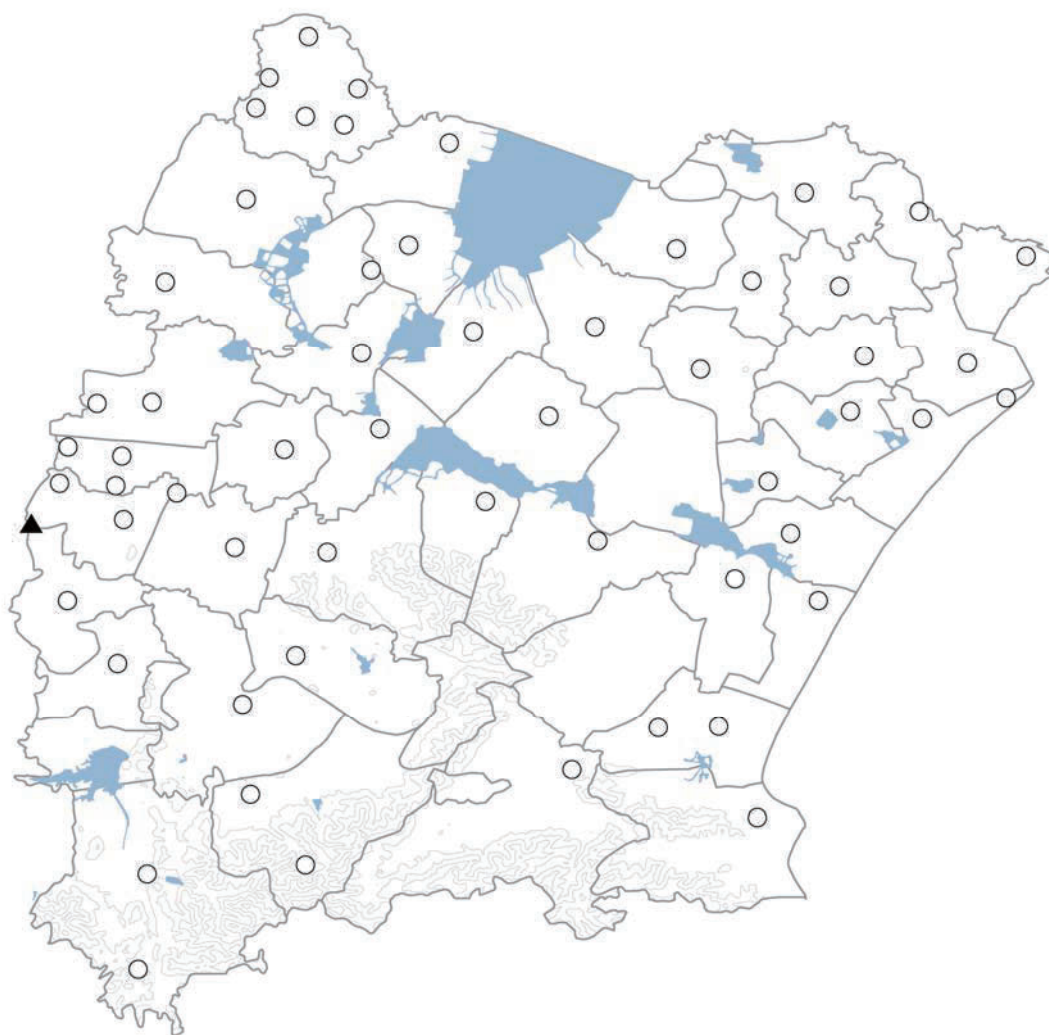


图7 “麝”的字音



“麝”的读音跟“射”、“社”比较接近，不过只有龙潭一个点读 zo⁶。

7. “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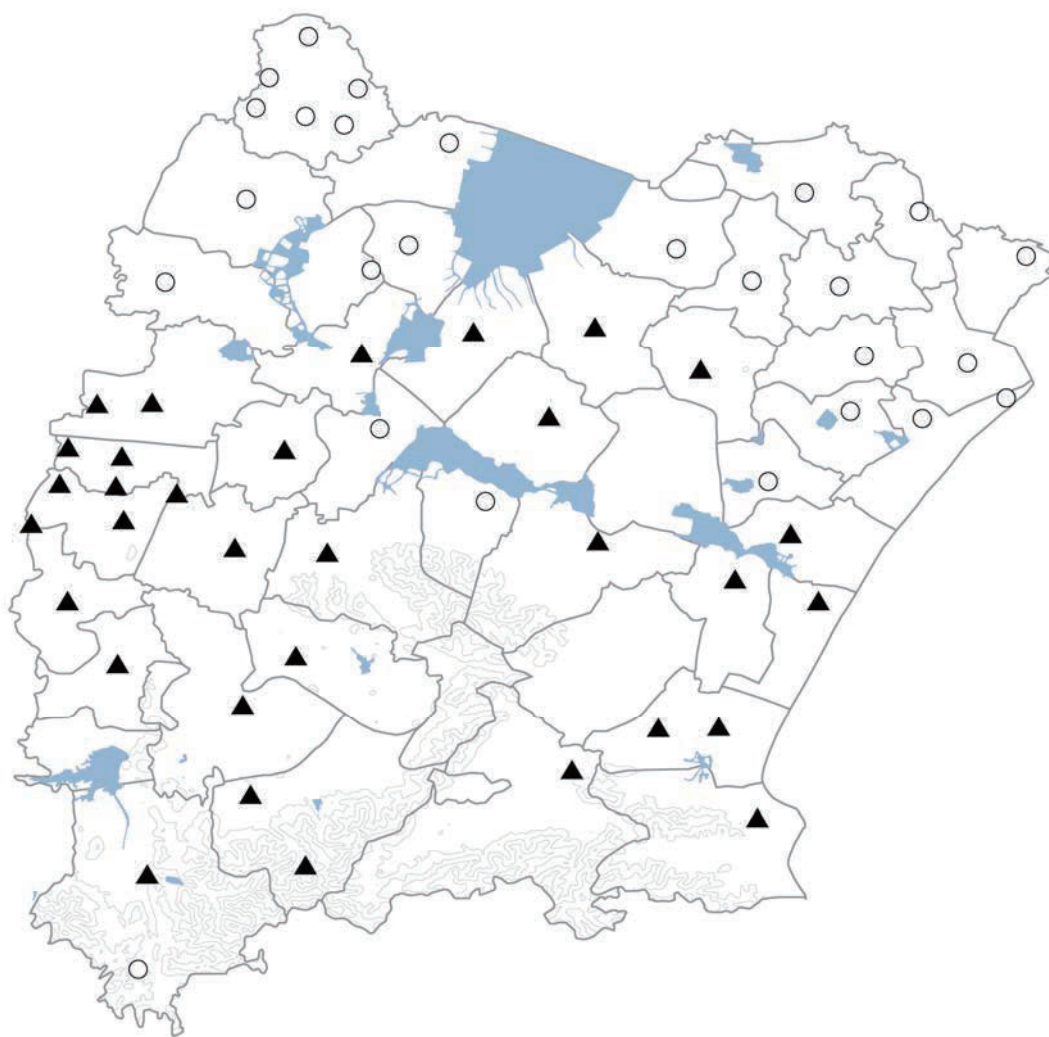


图8 “赦”的字音

○ sa^5

▲ so^5

“赦”大致上是按照南北分片，北部读 sa^5 ，中部、南部读 so^5 。中部、南部也有少量的点如深洞、新街、宜丰读 sa^5 。

8. “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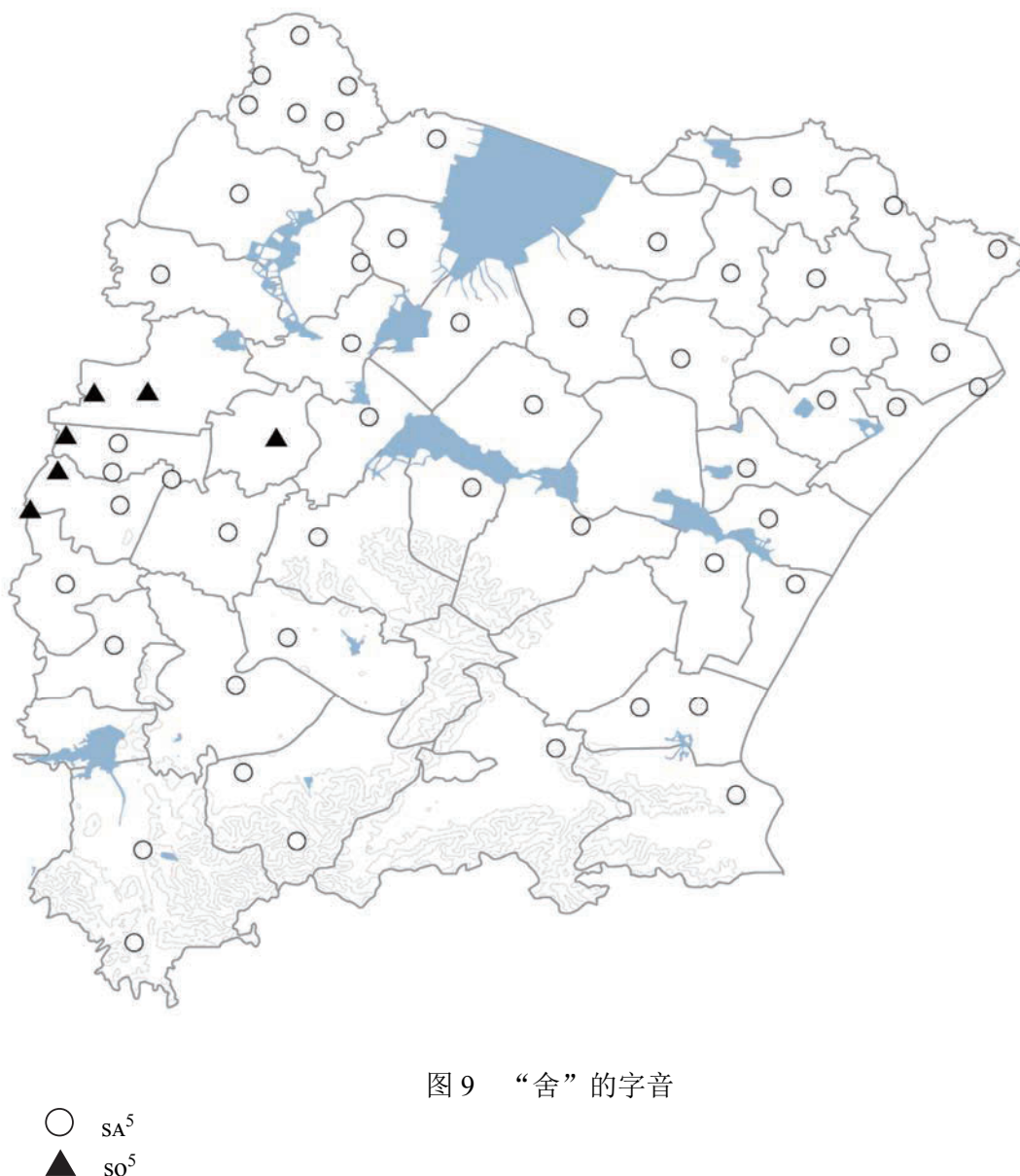


图9 “舍”的字音

宜兴大部分地区“舍”都读 sa^5 ，宜溧交界区域的丰台、龙潭、万圩、西墟读 so^5 ，和上文的情况一样，和溧阳连续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徐舍、芳庄两个点似乎插入 sa^5 的包围之中。为什么这两个点在 sa^5 的围攻之下还保留 so^5 的读音。笔者认为跟徐舍的地名有关，“徐舍”这个地名就有“舍”字，地名通常保留更早的读音形式，“徐舍”的“舍”就读 so^5 。地名的另一个特点是“客随主便”，尤其是今天划归徐舍管辖的新芳²，更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从而影响到其他负载词中“舍”的读音，以至于“宿舍”的“舍”也读 so^5 。

² 旧的行政区划下，新芳虽然尚未划归徐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后来行政变动时划归徐舍是因为原来徐舍就是这一片区域的中心。

9.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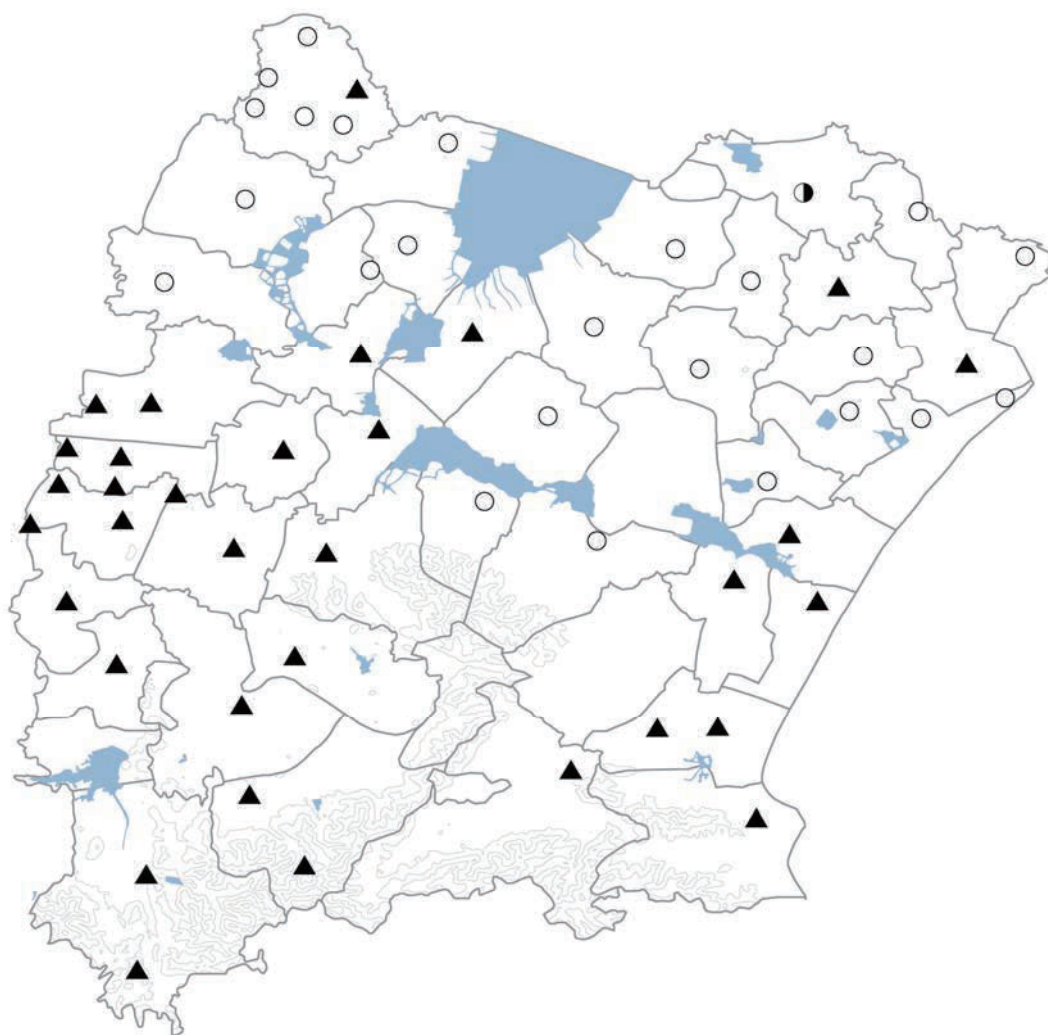


图 10 “余”的字音

- SA^2
- ▲ SO^2
- ◐ SA^2 / SO^2

“余”的字音分布依然是南北分布，南部读 so^2 ，北部读 sa^2 。但是比起“赦”“蛇”“蔗”“遮”的分界线要靠南，在 sa^2 的进攻下，宜城及周边地区都已经沦陷。

10.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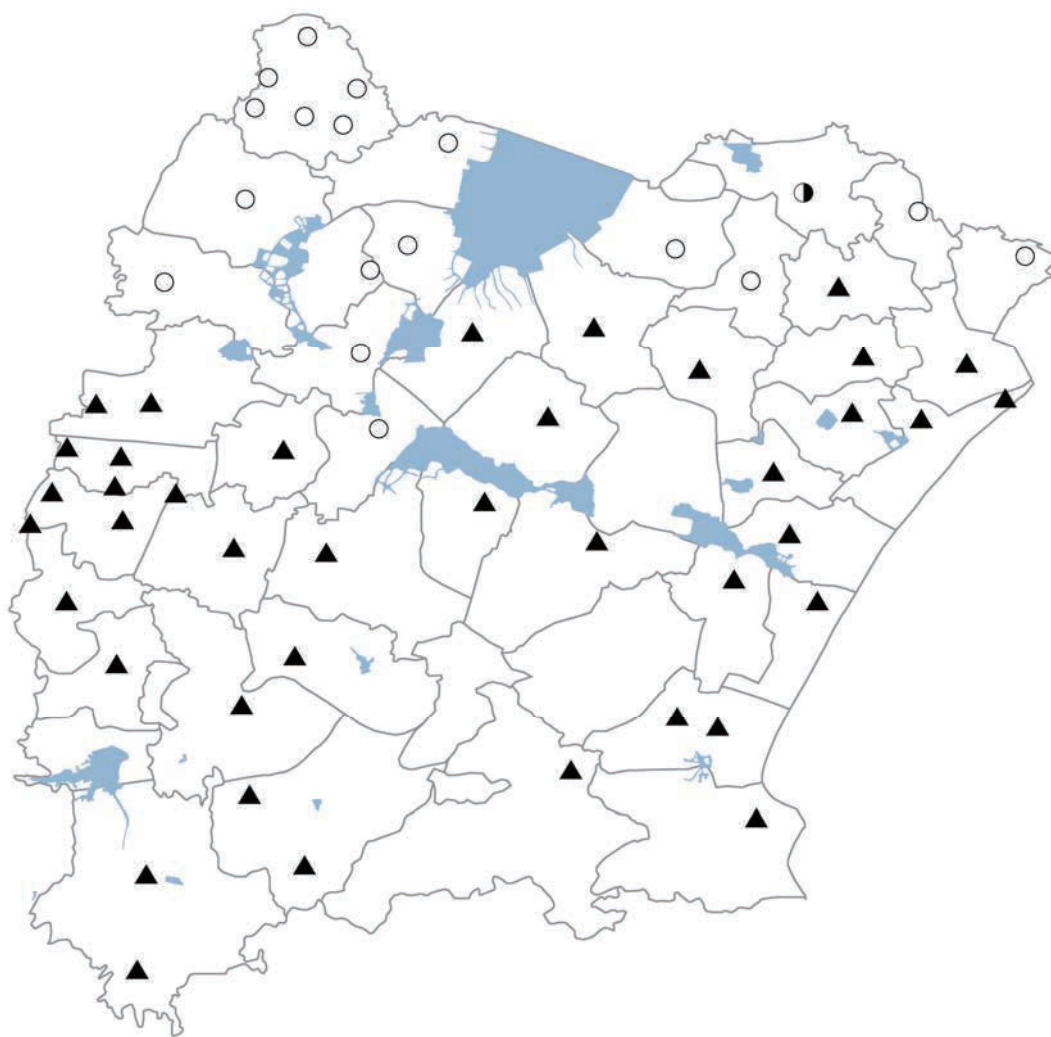


图 11 “夜”的字音

- fīa⁶
- ▲ fīo⁶
- ◐ fīa⁶ / fīo⁶

“夜”的字音宜兴大部分区域都读 fīo⁶，只有东北角和西北部读 fīa⁶。溧湖将宜兴和常州武进的交界线分为东西两线，西线南下的程度要远大于东线，已经到达钮家、宜丰一带。

三、 麻三字音读入查部的计数地图

“车”和“者”在宜兴全市的分布十分统一，所有方言点“车”都读 ts^ho¹，“者”都读 tsA¹，因此省去地图。接下来综合以上所有字的字音情况，计算各方言点的分值，某方言点如果有一个字读查部就计一分，去掉全市分布极为统一的“车”“者”二字，总分为 11 分。根据得分绘制计数地图，每个方言点的图标都是一个饼图，顺时针走向，以黑色为填充色，填充黑色的部分代表得分。黑色越多，该点读查部的字就越多，详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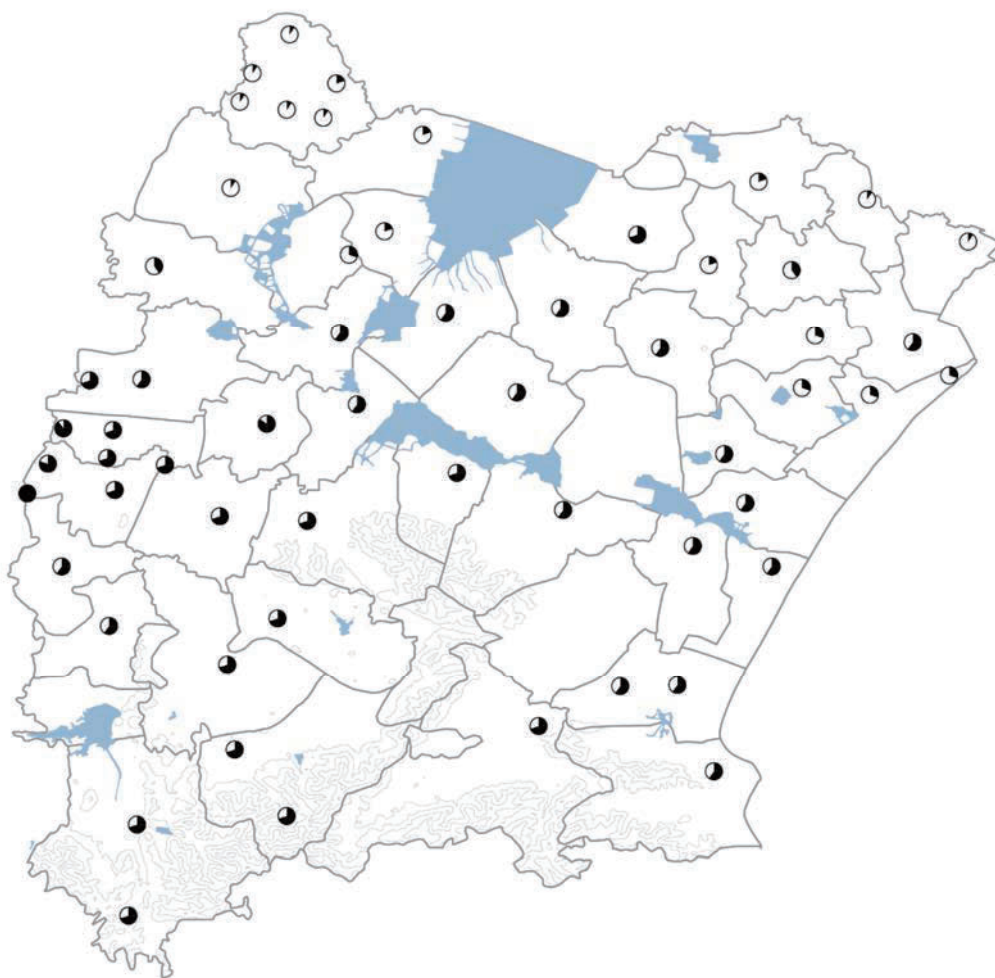


图 12 读入查部字音的计数地图

从图 12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整体趋势：1.南部的吴语自源层保留的更好；2.西南部和西部靠近溧阳的区域吴语自源层保留的更好；3.西北角受到常州南下侵袭的程度要大于东北部。宜兴历史上属于常州府管辖，宜兴话属于毗陵小片的吴语。常州一直是这一区域的权威方言，整体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是远离常州影响的西南部山区，在麻三的文白读上体现了更多的吴语性质。这说明来自官话的文读的传播路径是先大致沿着沪宁一线往东，然后逐步侵蚀沿线周围的区域，常州位于沪宁线上首当其冲，隶属常州府的宜兴自北向南呈现一种渐层分布的地理格局，越往南受到来自官话的文读音的影响越小。这一点从计数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四、麻三同言线的蕴含关系

将每个字音的同言线汇总到地图上³，可以得到下图：

³ 只画出分割整体区片的同言线，暂且忽略北部深入南部腹地的若干零散而不连续的分布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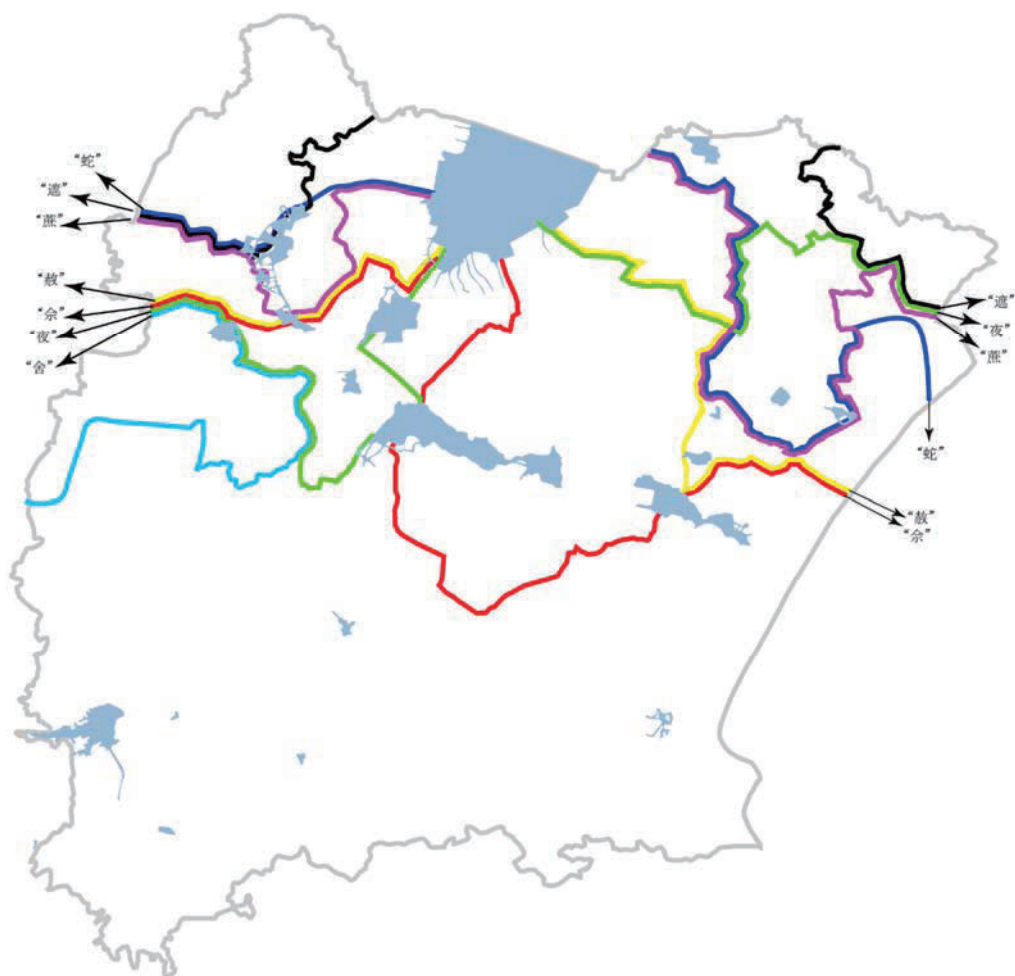


图 13 字音同言线汇总

宜兴北部的大片蓝色水域是太湖。太湖以东称为东线，以西称为西线。东西两线必须分开看，我们才能把握各字同言线之间的关系。某字的同言线越靠南，说明南下侵袭得越厉害。先来看西线，最北的是“蛇”，向南依次是“遮”“蔗”“赦”“余”“夜”“舍”。其中“赦”“余”的同言线在西线是重合的，“舍”的同言线并不是南北的分割线，而是把宜溧边界地区围出一块区域，区域内的形式和溧阳连续分布，区域外全部都是沦陷区。因此西线的同言线从北向南依次是：

“蛇” --- “遮” --- “蔗” --- “赦”“余” --- “夜” --- “舍”

东线的次序是“遮”“夜”“蔗”“蛇”“赦”“余”，其中“夜”和“蔗”“蛇”的同言线有交叉，此处的排序以交叉点的东部为准，因此得到东线的同言线从北向南依次是：

“遮” --- “夜” --- “蔗” --- “蛇” --- “赦” --- “余”

东西线的次序并不完全一致，这种次序究竟是跟词频还是其他因素相关，值得日后深入研究。至少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处在吴语、官话交界地带的宜兴有吴语普遍存在的文白异读，这些文白字音体现为地理分布的差异，其中文读来自官话，体现了两股势力在宜兴境内势力的消长。地理语言学可以很好地呈现这些现象，并用来观察吴语和江淮官话之间的势力消长。

五、余论

文白异读的消长适合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来呈现和分析，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过渡区域方言分布的实际面貌。计数地图可以让我们很好地观察官话侵蚀其他方言的传播路径和动态过程。不同字音的同言线的蕴含关系反映了在接触过程中什么样的演变机制，未来值得深入探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讨论文白消长问题的时候，为了确保可比性，对于同一个字，调查所有的地点都要用同样负载词去调查，脱离具体负载词环境去单纯统计字音的文白读音并无太大的意义。如果一个字在地点 A 不管什么词汇条件都只有一种读音 a，但在地点 B 存在文白读，其中文读为 a，白读为 b，且各自出现的词汇环境不同。假如我们仅仅以地点 B 出现文读音 a 的词汇环境去调查这片区域，我们会认为两个地点都只有文读音 a，而地点 B 的白读音 b 是无法调查到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测试各种词汇条件以明确情况。最终以地点 B 出现白读音 b 的词汇条件去绘制语言地图进行描写，才能较为正确地反映两地文白读的差异。本文开头所罗列的负载词便是这样得出的，需要对这片区域文白读的详细调查才能找到合适的负载词。抛开词汇条件论文白读音，绘制计数地图无法很好地反映语言事实。

附记：本文的研究受到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毗陵吴语变异研究》（项目批准号 18YJC740027）的资助。

参考文献

- 黄河 2015 孤本方音韵书《荆音韵汇》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第 2 期
黄河 2016 《荆音韵汇：两百年前的宜兴话》，上海：中西书局
耿振生 1993 十八世纪的荆溪方音——介绍《荆音韵汇》，《语言学论丛》（第 18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A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 Competing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Huang, He

Institute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mpeting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of the third division (等) of the Ma (麻) rhyme in 58 dialects in Yixing County from a geolinguistic perspectiv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lloquial reading under the same lexical unit can reveal the Mandarin incidence to the Wu dialect. The geographic pattern is identified through theme maps, quantitative maps, and isogloss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olloquial reading is higher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Yixing county than in the northern part,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Mandarin strongly influences the Wu dialect along the Shanghai–Nanjing railway line, while the area farther from the line retains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u dialect.

资料绘制周边语言的流音的分布地图，从汉语与周围语言的关系来看 er 音的位置。

二、儿而耳二字的分布情况

2.1 儿而耳二（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分类

目前收集的资料中出现的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声母形式可以先分成带鼻音的类型和不带鼻音类型的两类。不带鼻音声母的类型还可以分成卷舌音类、边音类、塞擦音类、擦音类、和元音（包括吴语等出现的带喉塞音的）类等等。其中，卷舌音类以外的声母基本上都与其他中古来源的声母形式合并。卷舌音有标性比较高，所以卷舌性可以视为日母字的特征。如果资料中的音形都源于同一个形式的话，我们可以设定带鼻音性而且带卷舌性的像[ɲ-]的形式为祖形。目下收集到的儿而耳二字资料中没有这种声母，可是在湖北蒲圻热惹等（日母）字带[ɲ-]声母。蒲圻的[ɲ-]与[n-]声母形成对立(表 1)，所以在蒲圻能以[ɲ-]做为日母的祖形，也可视为全方言的日母的祖形。如此就能合理地说明全国的儿而耳二字声母的演变。

表 1：蒲圻的日母字音

	二	日	熱	勒	聶	惹	拿	
蒲圻	ɕ	æʔ	ɲeʔ	neʔ	ɲieʔ	ɲa	na	趙元任 等 1948

就儿而耳二字的韵母，因为日母专在三等韵出现的声母，所以儿而耳二等字的韵母祖形能设定 i 类介音。参照诸家构拟的止摄开口字的中古音（表 2），本文暂时以[*ɲiei]为方言音形的祖形进行讨论。这个祖形是为讨论方便而用的，也不是中古音的构拟。

表 2：诸家构拟的中古音

	儿 平支	而 平之	耳 上止	二 去至	日 入臻
高本汉 (1997)	ɲziɛ	ɲzi	ɲzi	ɲzi	ɲziɛt
郭锡良 (2010)	nziɛ	nziɔ	nziɔ	nzi	ɲziɛt
Baxter and Sagart (2014)	nye	nyi	nyi	nyij	nyit
平山(2018)	ɲiɛ	ɲiɛl	ɲiɛl	ɲiɪ	ɲiɛt

本文把收集的方言音形分为以下 8 系 26 类。
北方 1 系：ri 类，北方 2 系：r 类、ɻ 类、zi 类、li 类、re 类，北方 3 系：l 类、ze 类、le 类、er 类，北方 4 系：el 类、e 类、o 类，其他：y 类，南方 1 系：nie 类（包括 nje 类），南方 2 系：ni 类（包括 nji 类），南方 3 系：n 类（包括 nj 类）、ngi 类、ng 类、i 类
南方 4 系：ẽ 类、gi 类、ie 类、i 类，其他：ne 类、nge 类。

2.1.1. 北方 1 系

1a1: ri 类: [ʐ][R]

2.1.2. 北方 2 系

2a1: li 类: [li]

2a2: ʎ 类: [ʎ][ʎ]

2a3: re 类: [ʐ][ʐo]

2a4: r 类: [ʐ][r]

2a5: zi 类: [dzi][ɗzi][zi][ʐi][ʐi][szɿ][ɗzɿ]

2.1.3. 北方 3 系

3a1: er 类: [er][ør][ʔEr][ʔər][hər][ər][əʔ][əʔ][ʔər][hər][er][ør][ər][ar][ər][ar]

3a2: l 类: [ʐl][hl]

3a3: le 类: [lə][lɛ]

3a4: ze 类: [tso]

2.1.4. 北方 4 系

4a1: el 类: [ʐəl][həl][ʔhəl][əl][həl]

4a2: e 类: [e][ɛi][ɣ][ɣe][ə][əʔ][ei][ɛ][ɜ][ʌ][ʌw][ai][æ][a][v][a]

4a3: o 类: [o][ə][ø][œ][ɔ]

2.1.5. 北方其他

5a1: y 类: [vɥ][iɥ][y]

2.1.6. 南方 1 系

1b1: nie 类: [nie][ɲiu][ɲie][ɲia]

2.1.7. 南方 2 系

2b1: ni 类: [nɿ][ni][ɲi][hɲi][ɲij][ɲiz][ʔɲi][ʔɲij][ɲi]

2b2: ngi 类: [ɲi]

2.1.8. 南方 3 系

3b1: ē 类: [ɛ̃]

3b2: gi 类: [gi]

3b3: n 类: [n][hn][ʔn][hn][ʔn]

3b4: ng 类: [ŋ][ʔŋ][hŋ]

3b5: ī 类: [ĩ][hī]

3b6: ie 类: [ie]

2.1.9. 南方 4 系

4b1: i 类: [i][w][ji][hi]

2.1.10. 南方其他

5b1: ne 类: [neɪ][nei][no][nɛ][na]

5b2: nge 类: [ŋe][ŋə][ŋo][ŋɛ][ŋɐi]

这些分类是为考察声母的演变用的，所以以声母和接下的元音（介音）为主而分类。以[*ɲiei]为祖形，非鼻音化和非卷舌音化是最初分南北方言的变化。从祖形到现代方言的主要变化还有元音的高化或低化、园唇化，自成音节化，er 音化等等。其中有些变化是南北方言共通的³。

2.2 儿而耳二字的分布⁴

北方 1 系的分布不多，但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从西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还到湖南等有些南方地区也有分布。北方 2 系的分布也不是很多，但从山东到河南、河北和渭河流域或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分布比较多。在这些地区可能卷舌性从声母向音节后边（韵母、韵尾）的移动压力（即是产生 er 音的压力）比较低、所以能保持有些古老的形式。北方 3 系的 3a1:er 类（普通话的类型）是分布最广的形式，全北方都有分布。4 系中 4a1:e 类的分布也比较广泛，从西北部到南方地区都有分布。有些在 3a1:er 类的分布的周边地区也有分布的倾向。4a1:el 类主要在吴语地区分布，明显的是北方 3a1:er 类的反映，可以视为吴语北方化的一种形式。在湖南、江西等地区多分布的园唇元音的形式（4a3:o 类，5a1:y 类）也可能是卷舌音的一种反映。

（本文的主要关心在 r 音的分布情况，所以南方系的分布在别的机会讨论。）

³ 高本汉（汉译版）1997 构拟了从中古音到官话音形的发展过程（表 3）。它与本文设想的发展过程也有一致的部分，但不一定遵从他的想法。

表 3：高本汉构拟的日母演变（高本汉（汉译本）1997：582）

ɲziɛ > zi > zɿ > z̥ > əz > ər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鼻音（ɲ）的脱落和卷舌音化

② i 音和声母同化，变为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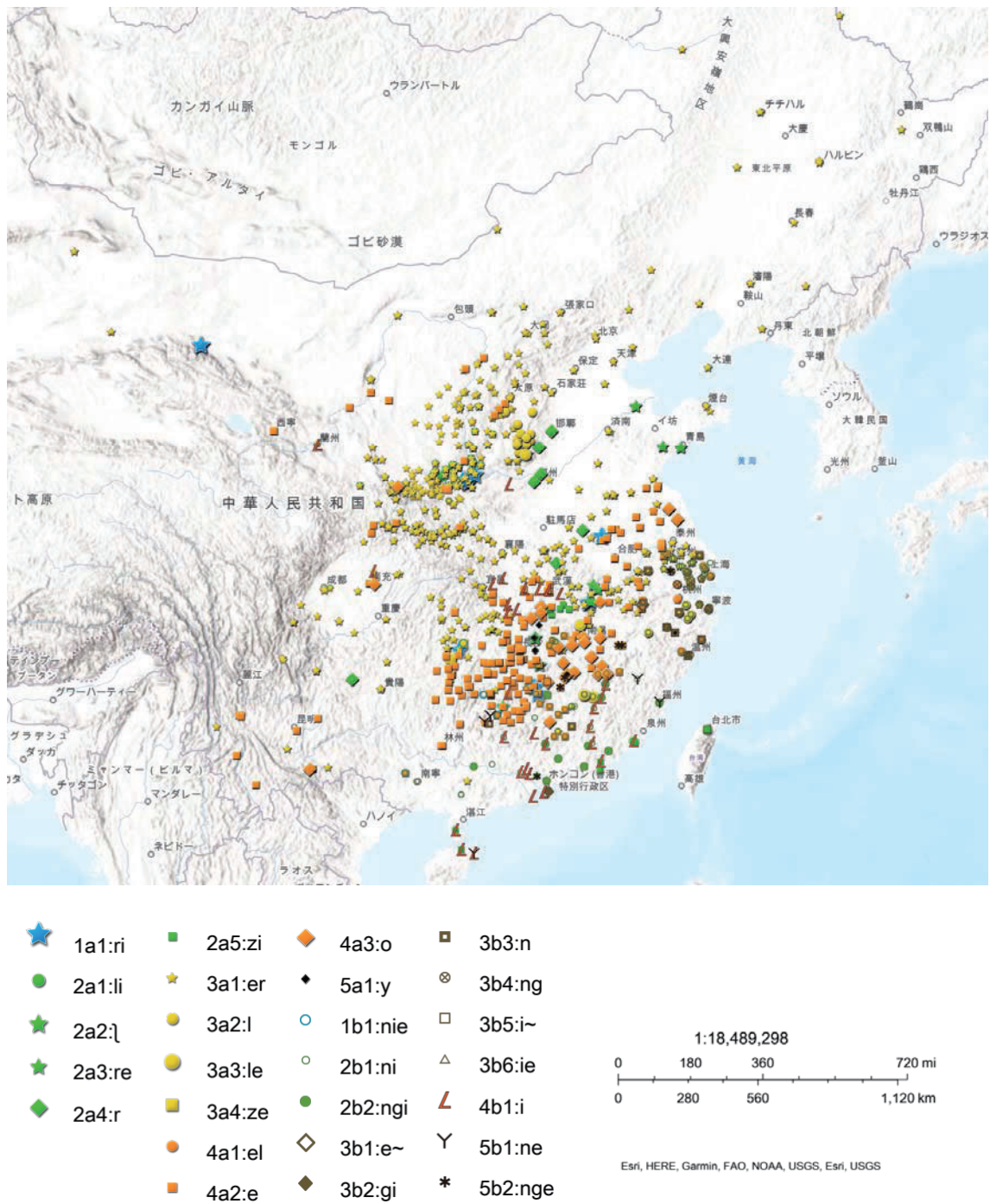
③ z̥ 变为自成音节的 z̥

④ z̥ 的前面出现 ə、然后 z̥ 变为韵尾。

⑤ z̥ 变为 r 类

⁴ 关于儿字的声韵母，曹志耘 2008 语音卷 205 也有地图。

图 1：止摄日母开口字的地图



三、日字的分布情况

3.1 日（臻摄质韵日母入声）字的分类

“日”字的方言音形分为以下 8 系 24 类。

3.1.1. 北方 1 系

1a1: ri 类: [ɹɿ][ɹɿʔ][ɹʊ][ɹʊœ][ɹɿ̃][ɹiʔ][ʒʊəʔ]

3.1.2. 北方 2 系

2a1: li 类: [li][lie][lie][lit][lit][liʔ]

2a2: ɿ 类: [ɿ][ɿxt]

2a3: re 类: [ɹaʔ][ɹaʔ][ɹɛ][ɹəʔ][ɹɛʔ][ɹɜʔ][ɹɤʔ][ɹʌʔ]

2a4: r 类: [ʀ]

2a5: zi 类: [zɿ][zɿʔ][ziek][ziəʔ][zit][ziʔ][zi][ziʔ][ziʔ]

3.1.3. 北方 3 系

3a1: er 类: [ɐ̃][ɐ̃r][ɐ̃r]

3a2: l 类: [l]

3a3: le 类: [lɐ̃][lɐ̃ʔ][le][lɐ̃t][lɐ̃ʔ][lɛ][lɐ̃t][lɛʔ][lɜʔ][lɤt]

3a4: ze 类: [zai][zei][zeiʔ][zɛk][zɛʔ][zɔʔ][ze][zəʔ][zəʔ][zɛʔ][zəʔ][zɛ][zɛʔ][zɜʔ]

3a5: si 类: [ɕi][ɕit][ɕik]

3.1.4. 北方 4 系

4a1: e 类: [ə̃][æ̃][ə̃ɐ̃][ɐ̃]

4a2: o 类: [o][œʔ][ɔ]

4a3: se 类: [thɐ̃][szə̃]

3.1.5. 北方其他

5a1: y 类: [yɿ][yɛʔ][øʔ]

3.1.6. 南方 1 系

1b1: nie 类: [nie][niəʔ][niɜʔ][nieʔ]

: nje 类: [ɲɲyoʔ][ɲie][ɲieʔ][ɲiəʔ][ɲiə̃][ɲiə̃ʔ][ɲiə̃][ɲiə̃ʔ][ɲiə̃tɲ][ɲie][ɲieʔ][ɲiet][ɲiet]

1b2: ngie 类: [ɲie]

3.1.7. 南方 2 系

2b1: ni 类: [ni][nik][nit][niʔ][nɪʔ][ɲiʔ][ɲiʔ][ɲi][ɲi][ɲiʔ][ɲit][ɲiʔ][ɲiʔ][ɲiʔ]

2b2: ngi 类: [ɲit][ɲiʔ]

3.1.8. 南方 3 系

3b1: n 类: [ɲ]

3b2: gi 类: [git]

3b3: ie 类: [ieʔ][iəʔ][ia][iəʔ][iet][iɜ][iəʔ][jet][jiet]

3.1.9. 南方 4 系

4b1: i 类: [i][it][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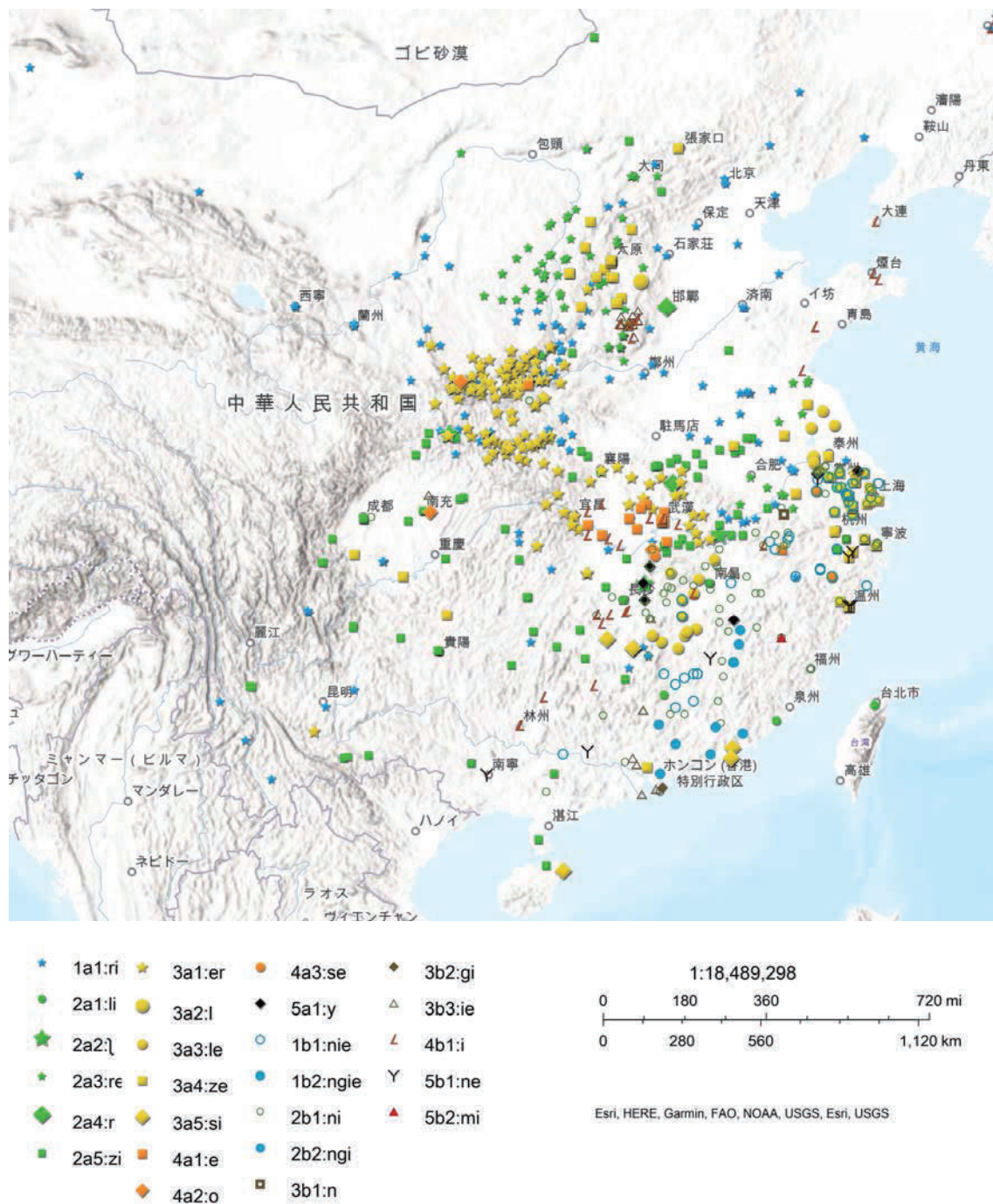
3.1.10. 南方其他

5b1 ne 类: [ne][nɐ̃t][nɛʔ][nəʔ][nɛʔ][nɐ̃t][ɲɐ̃t]

5b2 mi 类: [mi]

3.2 日字的分布

图 2: 日字的地图



日字以*ɲiet 视为祖形,也与“儿而耳二”等字的演变同样,非鼻音化和非卷舌音化是分南北方言的最重大的变化。

日字北方系的分布呈现周圈分布的特征。即最古老的北方 1 系在全国最广泛地分布,下一古老的北方 2 系在以北方 1 系的内部为主分布,下一古老的北方 3 系,特别是 3a1:er 类在以北方 2 系的内部为主分布,最新的北方 4 系,特别是 4a1:e 类是在 3a1 类的内部分布的。4a1:e 类的中心地区是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这种地区位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受到从南北两方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南北折衷式的语言形式。从南北两方的观点看/er/音,音节头的卷舌音的消失是南方的特征,可是虽然移动到音节后边,卷舌性仍在保留是北方的特点。/er/音从音形上可以视为南北折衷的形式之一。日字的地理上的分布情况会支持这种看法。

四、其他 er 音的情况

有些方言除了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以外还有带流音韵尾的字。

例如:

A: 扔[ər]: 西宁、隆德、府谷、南充

B: 然[ɹər]: 临县 (cf. 射[ɣər]车[tɕʰər].....)

C: 热[ə]: 长阳

D: 若[ə]: 黄梅

E: 惹[ər]: 蒲溪 cf. 热[ɹɛ]

F: 蛇[sər]车[tshər]: 芜湖

G: 入声韵尾[-l](八[pal]刮[kual]雪[siəl]没[pəl].....): 都昌阳峰

图 3 表示“儿而耳二”等字和“日”字以外的带流音韵尾字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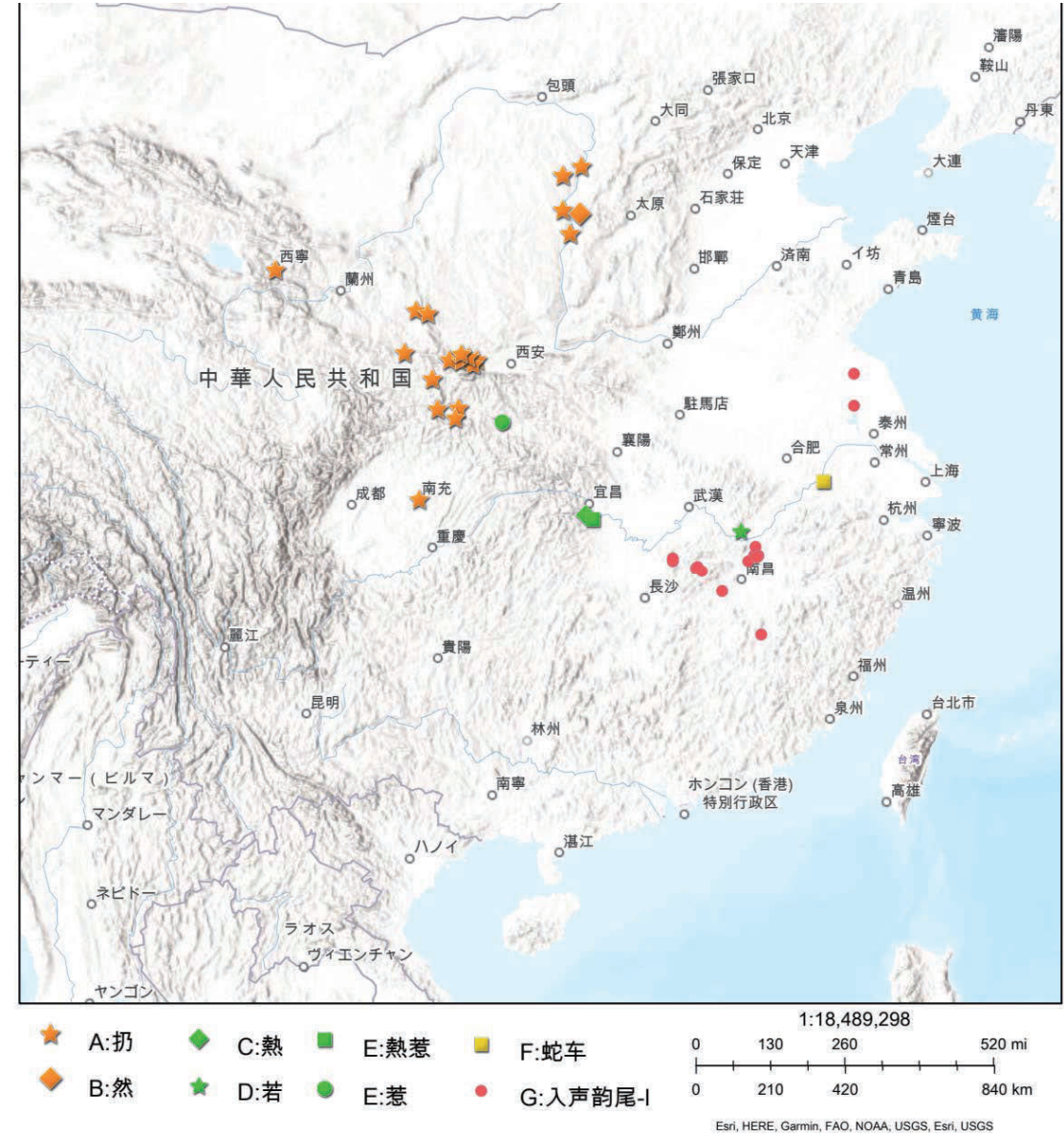
ACD 等类是在各方言的音韵系统上个别发生的例子。A 类的分布在西北方言比较广泛,可是有同一个中古音韵地位的仍字一般不带流音韵尾。所以扔字的 er 音的分布有可能是随着词汇性的扩散形成的。可是 BEFG 等类是几个字一起带流音韵尾,这种情况表示这些流音韵尾的是随着方言内部的音韵变化而形成的。ABCDEF 类的 er 音的产生条件可能是共同的,这些音节都带卷舌声母(包括以前是卷舌声母的)和带开中元音(也包括以前的状态)。可以推测这些音韵条件是引起流音韵尾(er 音)的条件之一⁵。

G 类是入声韵尾为[-l]的种类,分布在江苏、江西、湖南等。G 类的发生原因与 ABCDEF 类不同,可是地理上是随着长江形成连续性分布。这种分布类型可能是岩田礼 2009 的“长江型分布”的一种。岩田 2009 所举的长江型分布的范围比图 3 的分布邻域更广泛,特别是

⁵ 关于声母引起的 er 音的例子,北京话的“多少钱”为“多儿钱”等现象是比较有名的(周一民 1998:189)。关于开中元音的卷舌化,可以想起初学汉语的日本大学生往往把“喝”“各”等字说成[ər]音。

在南方的分布比较大。所以图 3 的分布可能会视为长江型分布的萌芽状态。岩田 2009 指出长江型分布具有“过渡性”和“创新性”的两面。他的议论是关于词汇的，所以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音韵现象，可是就 er 韵看的话，从音节头排除卷舌性这一面可以视为“创新性”，而在韵母上保持卷舌的这一面可以视为“过渡性”，所以 er 音也可以说是具有长江型分布的特征。

图 3：其他 er 音的分布



五、异读的情况

异读的存在暗示起码其一种不是该方言里发生（音韵变化的结果）的形式。

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都有异读。有两种读音的方言比较多，也有三种读音的方言。例如：

儿 (2 种音) [ər][ʐ] 白水 (王建领主编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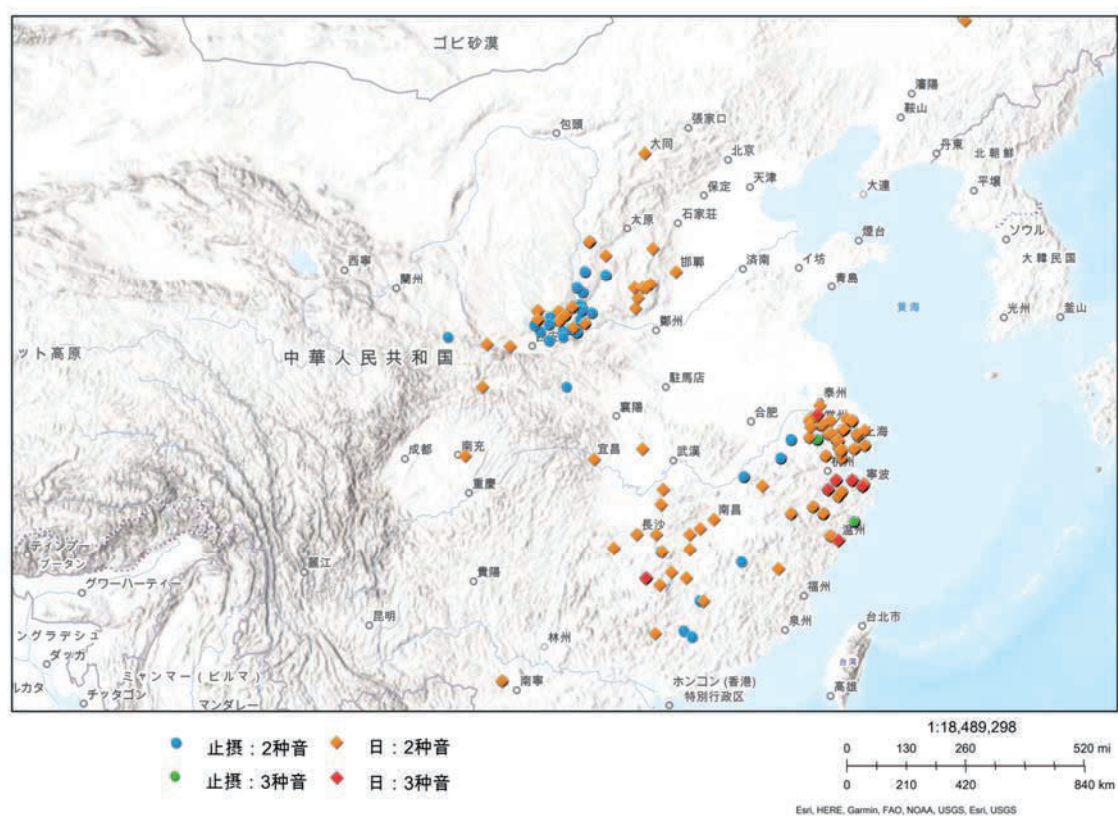
耳 (2 种音) [f̥ər][ɲi] 上海 (钱乃荣 1992)

日 (3 种音) [ʐ][ei][ni] 安仁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3)

地图 4 描绘止摄日母开口字和日字的异读情况。

在北方，山西南部和渭河流域地区有异读的方言比较集中。在南方，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区比较集中。有 3 种读音的方言多在浙江南部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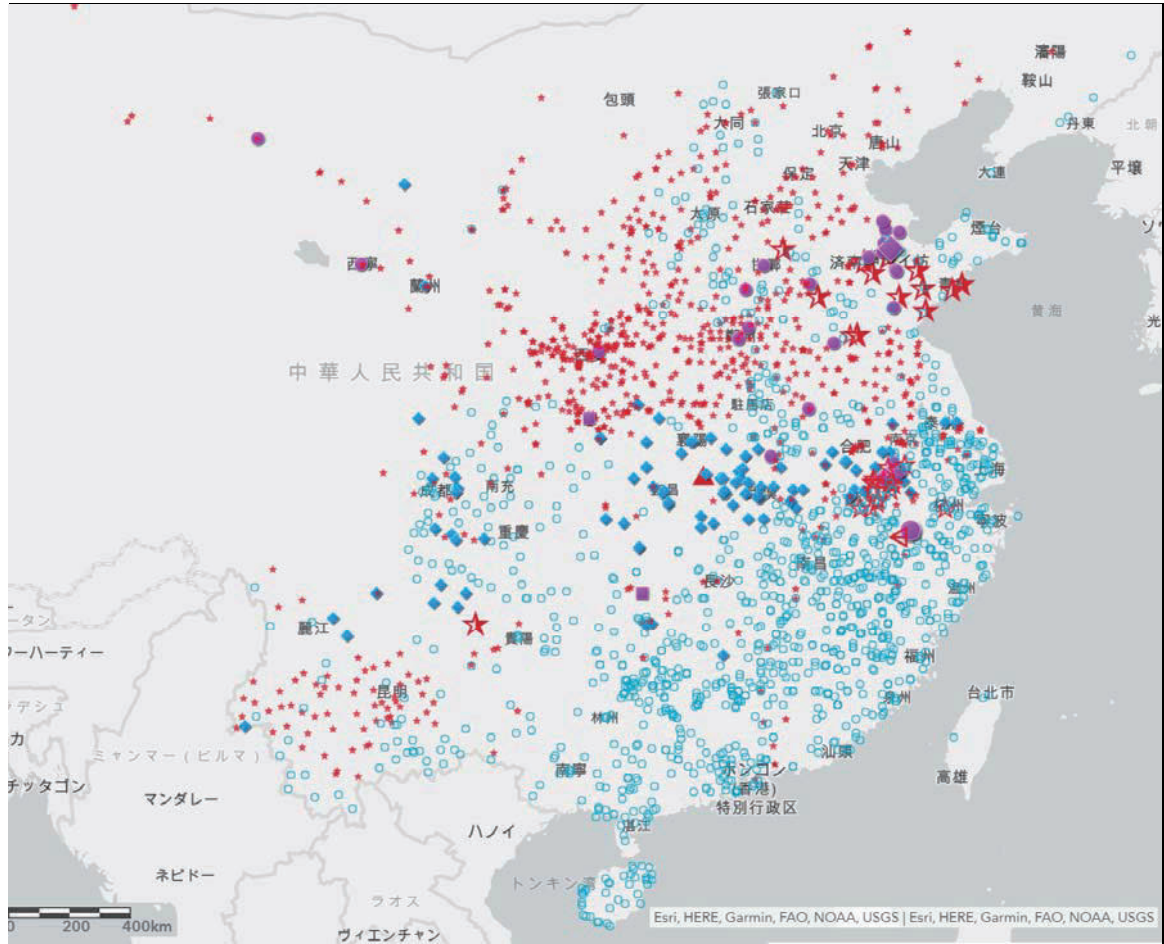
图 4：异读情况



六、流音在汉语和非汉语的情况

最后概观汉语方言和非汉语的音节（词）头/音节（词）末流音的分布情况。

图 5：汉语方言的音节头流音



◆ A1:/l/ & /r/ & /r/	● A4:/l/ & /z/ & /r/	☆ B2:/l/ & /r/	○ C1:/l/
● A2:/n/ & /l/ & /r/	■ A5:/n/ & /l/ & /z/	☆ B3:/l/ & /r/	◆ C2:/z/
◆ A3:/l/ & /r/ & /z/	★ B1:/l/ & /z/	▲ B4:/z/ & /r/	★ C3:/r/
		◀ B5:/n/ &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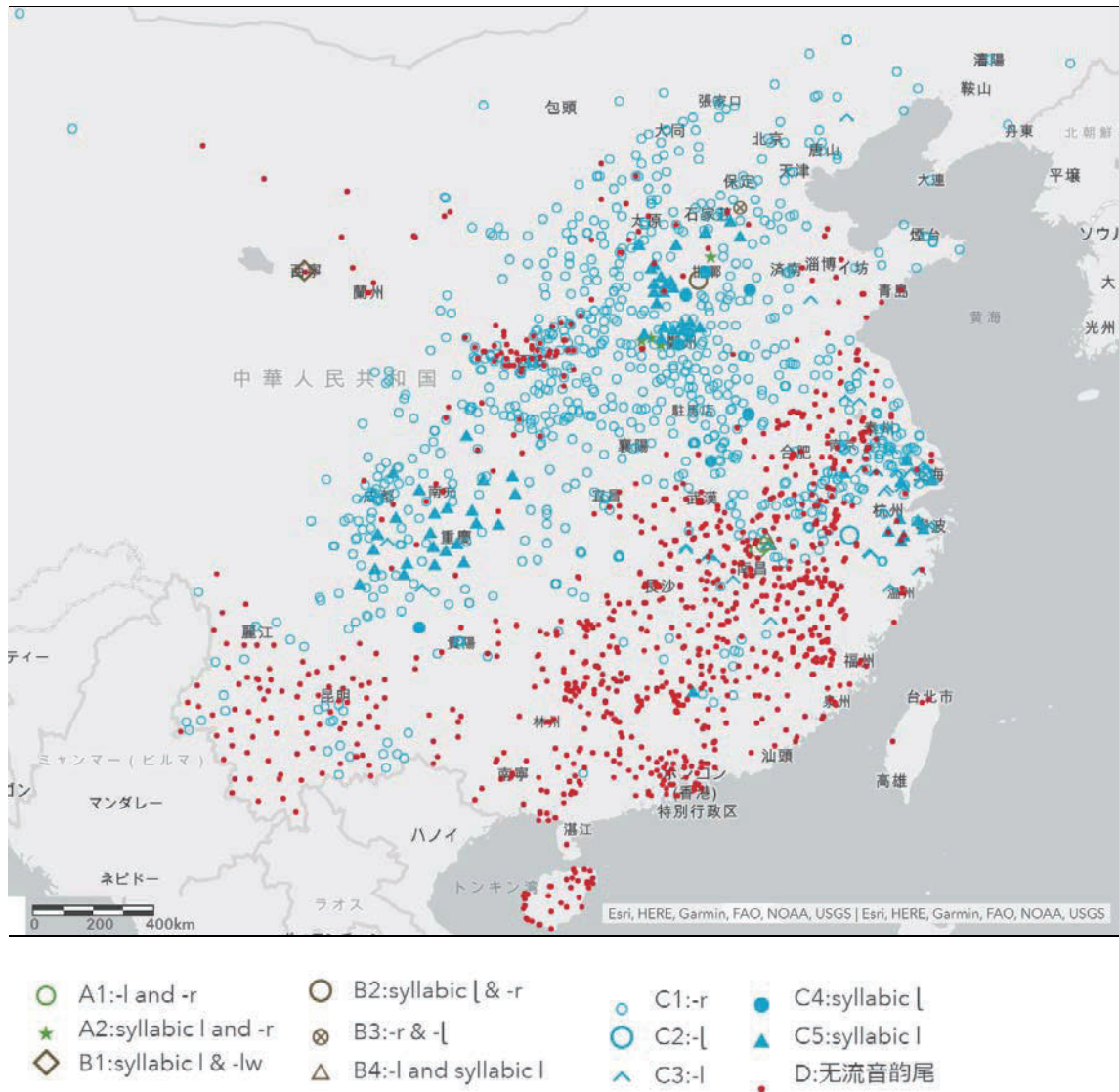
6.1 汉语的音节头流音的分类⁶

- A1: /l/ & /r/ & /r/: 繁昌[ɿ][ʰ][z]
A2: /n/ & /l/ & /r/: 淳安[ʰ][ɿ][ɿ]
A3: /l/ & /r/ & /z/: 芜湖县湾址[ɿ][r][z]
A4: /l/ & /z/ & /r/: 邯郸[ɿ][z][ɿ]、酒泉[ɿ][z][R]、利津[ɿ][z][ɿ]
A5: /n/ & /l/ & /z/: 汉滨瀛湖镇[ʰ][ɿ][z]
B1: /l/ & /z/: 北京[ɿ][z]、合肥[ɿ][z]、山丹[ɿ][z]、昆明[ɿ][z]

⁶ 汉语音节头的/l/包括[ln]和[nl], /l/包括[ɿ][ɿʰ][ʔ][ɿʰ][ɿ], /r/包括[ɿ][r][ʰ][ɿʰ], /z/包括[ɿ][sɿ][ʰz], /r/包括[ɿ][hr][ɿ][ɿ][ɿ][ɿ][r]。有二种以上的流音的类型中也包括关于声调构成互补分布的例子, 也包括自由变读的例子。

B2: /l/ & /r/: 杭州[l̥][ɿ]、繁昌[l̥][ɿ]、 青阳[l̥][ɿr]
 B3: /l/ & /r/: 青岛[l̥][ɿ]、毕节[l̥][ɿ]、
 B4: /z/ & /r/: 钟祥[z̥][ɿ]
 B5: /nl/ & /l/: 遂安[n̥l̥][ɿ]
 C1: /l/: 长治[l̥]、丹阳[l̥]、常德[l̥]、广州[l̥]
 C2: /z/: 兰州[z̥]、自贡[z̥]、芜湖[z̥]
 C3: /r/: 安庆[r̥]

图 6：汉语方言的音节末流音



6.2 汉语音节末流音的分类

A1: [-l] & [-r]: 都昌

- A2: [l] & [-r]: 南和县、巩县、孟县、孟津
 B1: [l] & [-lw]: 西宁
 B2: [l] & [-r]: 峰峰矿区
 B3: [-r] & [-l]: 安平、蓬溪
 B4: [-l] & [l]: 湖口武山、都昌土塘
 C1: [-r]: 北京、许昌、常州、重庆、贵阳
 C2: [-l]: 淳安
 C3: [-l]: 松江、新泰、宁波、荣县
 C4: [l]: 邯郸、郑州、原阳、毕节
 C5: [l]: 屯留、资阳、太平、常熟
 D: 无流音韵尾: 昆明、中卫、洞口、广州、梅县、

6.3 汉语的音节头/音节末流音的分布情况

音节头流音:有三种以上流音声母的方言的分布很零散,可是也有在山东西部、河南、安徽等中原东部地区比较集中的倾向。这些类型的分布领域与图 1 的 2a 类的分布领域比较相似,都支持这些地区的/r/类声母保存的强固性。全体上有两种流音声母的方言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南方地区的方言一般只有一种流音。只有一种流音的类型基本上是有声母 l 的方言。可是主要是由于声母 l 合并为 n 的原因,在长江中游域的一些方言只有一种/r/类声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言的分布地区正好是在两种流音的分布和一种流音的分布的境界地带。这种事实要在讨论声母 l 和 n 的合并时再想起。只有一种 l 的方言在山西、东北、山东等地区也有分布,像从南方地区向北扩大其分布领域。

音节末流音:音节末(韵尾)的流音基本上是以 er 音的 r/l 为主。但是如在第四章看,江苏、江西等地区有些方言有入声韵尾为 l 的方言。山西东南部周边和四川等地区也有[l][r]等自成音节的分布*。在南方地区,虽然有些方言也有流音韵尾,基本上无流音韵尾。总的说北方以有流音韵尾的方言为主,南方以无流音韵尾的方言为主。可是在北方也有无流音韵尾的方言。其分布比较零散,但是在西北部和西南部等的分布比较多。

6.4 非汉语词头流音的分类

- A1: [l] & [ɹ] & [r] & [z]: 阿依语
 A2: [l] & [ɹ] & [r] & [z]: 史兴语
 B1: [l] & [ɹ] & [z]: 怒苏语、羌、独龙
 B2: [l] & [r] & [z]: 纳木依语、塔塔尔、纳木依
 B3: [l] & [r] & [r]: 赛夏语、鲁凯、卑南
 B4: [l] & [r] & [z]: 阿依怒语

- C1: [ɿ] & [ɪ] : 独龙语、格曼、义都
 C2: [ɿ] & [r] : 克木语、崩如
 C3: [ɿ] & [ʌ] : 排湾语
 C4: [ɿ] & [z] : 东乡语、堂郎、阿昌、普米
 D1: [ɿ] : 图瓦语、傈僳、景颇、浪速、壮
 D2: [z] : 满语

图 7：非汉语的词头流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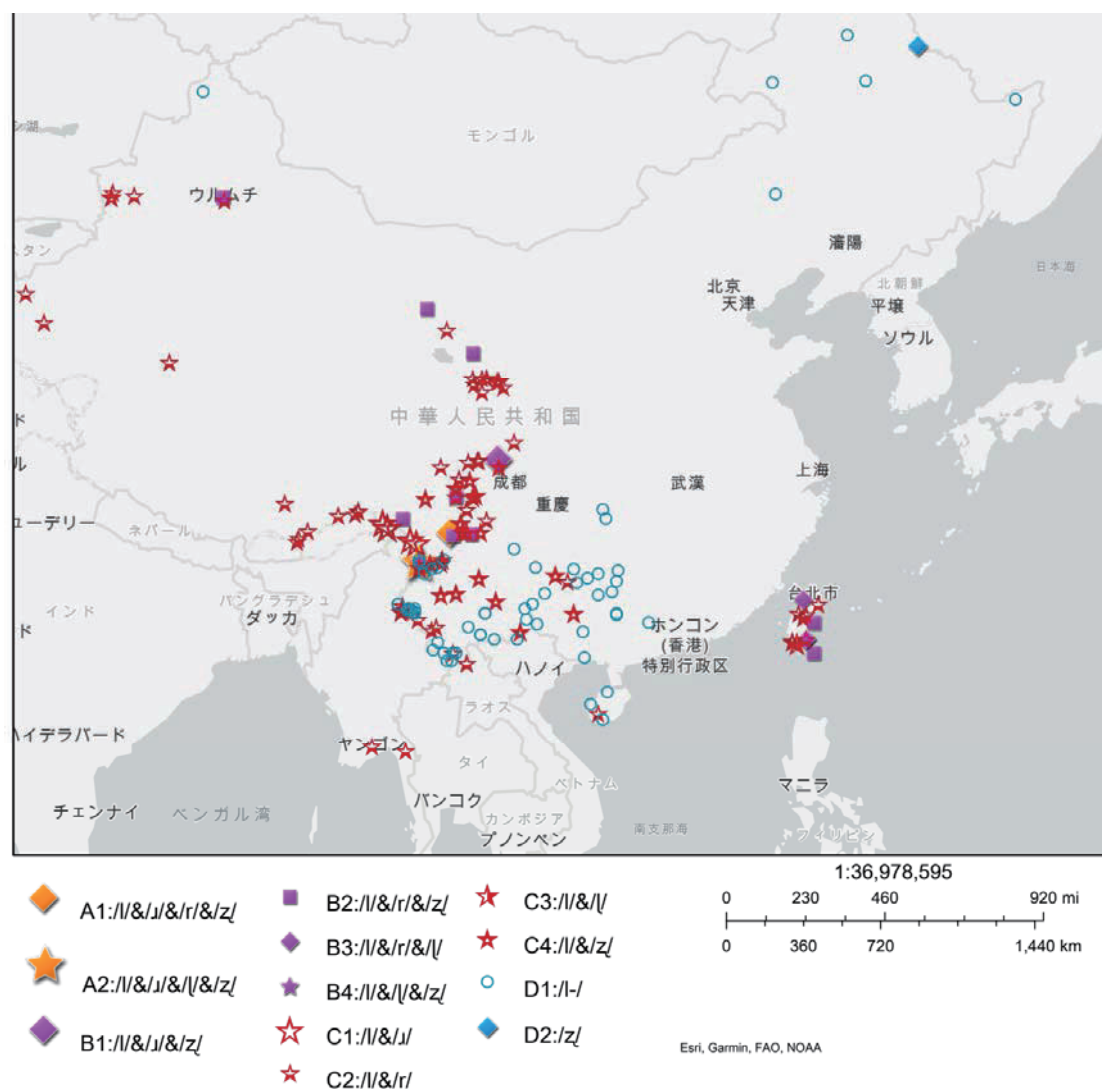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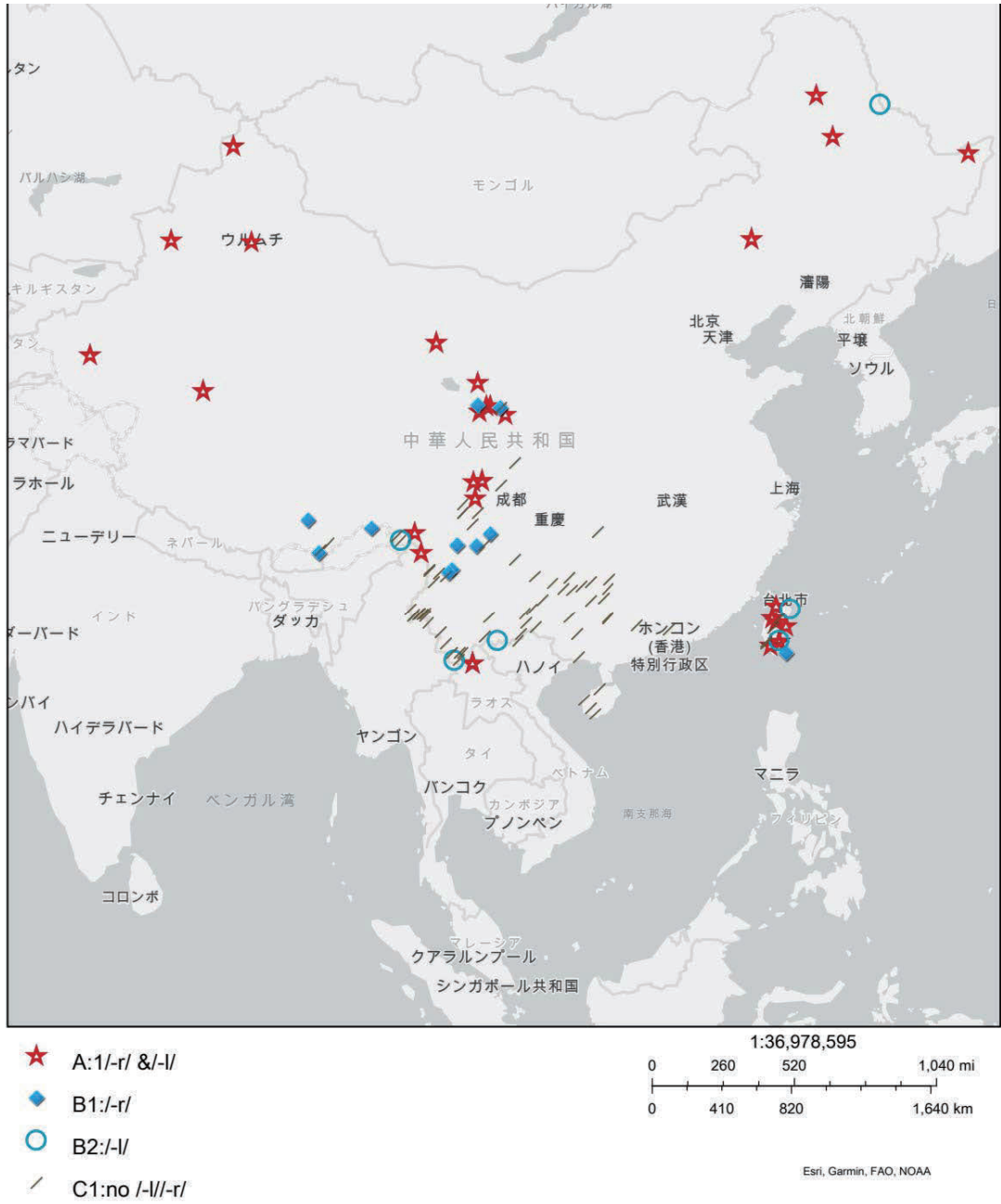


图 8：非汉语的词末流音



6.5 非汉语词末流音的分类

- A1: /-r/ & /-l/：西部裕固、土族、鄂伦春、扎
- B1: /-r/：门巴、怒苏、尔苏、东乡
- B2: /-l/：格曼、阿美、奔
- C1: 无/-r/-l/ 傈僳语、景颇语、勒期语、羌语、侗语、勉语

6.6 非汉语的流音分布情况

词头流音：除了朝鲜语、畲语、布农语、邹语等无词头流音的语言和只有一种词头流音[z]的满语以外，所有的语言几乎都有词头的[l]。看中国西部的分布情况，靠北分布的语言多有2种以上的流音的倾向，靠南分布的语言有只有一种流音的倾向（图7）。

词末流音：看中国西部的分布情况的话，还是靠北分布的语言有两种的词末流音，靠南分布的语言有无词末流音的倾向。只有一种词末流音的语言有分布在有2种词末流音语言的分布和无词末流音语言的分布的中间地带。

就中国西部的语言说，词头流音也是，词末流音也是，大局上有在北方流音种类多，在南方流音种类少、或无流音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超越语族，同一种语族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如此情况表示在流音分布的形成上语言接触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七、结语

本文绘制止摄日母开口诸字和日字的地图，还参照其他 er 音字的分布情况和异读的情况、中国境内的汉语和非汉语的音节（词）头和音节（词）末的流音的分布情况，对于 er 音的形成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音形的演变看汉语的 er 音，了解到历史上发生了音节头卷舌性的向音节后边移动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为回避音节头的卷舌性而发生，所以可以视为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音节末（或者韵母上）还保持卷舌性这一点是北方方言的特征。

从地理分布上看 er 音和其相关现象的分布，兼备最有利于发生 er 音的环境的地方像是长江中游地区（湖北等）。虽然 er 音的形成和发生地留下的问题很多，大局上这种音形可能是具备折衷南北两地的音节结构的性质。

当然对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讨论。今后要补充相关资料的同时，再要考察更详细的流音和日母字的出现情况。而且还要选择几个音形的代表点进行语音实验调查，详细比较各方言的 er 音的实体等等。

附记：本文得到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s JP20K13032、JP18H00670 资助。

参考文献

- 安徽省志方言志编纂委员会 编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曹志耘 1996 《开篇单刊 No.7 严州方言研究》 好文出版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 商务印书馆

-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文出版社
- 高本汉 1997 《汉文典 修订本》（汉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锡良 2010 《汉字古音手册》 商务印书馆
- 侯精一、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黄凡布 主编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柯西钢 2018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语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双庆 主编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思敬 1994 《汉语“儿”[ʅ]音史研究》（增订版） 商务印书馆
- 李小平 1991 《临县方言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林涛 2012 《宁夏方言概要》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卢继芳 2007 《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 都昌阳峰方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 平山久雄 2018 《敦煌毛詩音音韻研究》 好文出版
-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橋本萬太郎 1978 《言語類型地理論》 弘文堂
-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13 《四川省志方言志 1986-2005》 方志出版社
- 松本克己 1998 《流音のタイプとその地理的分布——日本語ラ行音子音の人類言語史的背景——》《一般言語学論叢》（筑波大学）1:1-48（松本 2006 再収）
- 松本克己 2006 『世界言語への視座』 三省堂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主编 2007 《中国的語言》 商务印书馆
- 孙占鳌 刘生平 2013 《酒泉方言研究》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唐虞 1932 《儿[ʅ]音的演变》（李思敬 1994 所收）
- 王建领主编 2019 《陝西方言集成渭南卷》 商务印书馆
- 王理嘉 林焘 1992 《语音学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 William H. Baxter、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岩田礼 2007 《長江流域における Sibilants 声母体系の一類型》《佐藤進教授還暦記念中国語学論集》303-313 好文出版
-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白帝社
- 遠藤光暁 1982 《北京語“er”の来歴》『日中学院創立三十周年記念論文集』（远藤 2001 所收）
- 遠藤光暁 2001 《汉语方言论稿》 好文出版
- 周一民 1998 《北京口語語法》 语文出版社

Distribution of “er”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Middle West Dialects

Yagi Kenji

Kokushik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 sound with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Chinese and discusses its inter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languages.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conside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儿而耳二” and “日,” mainly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t is assumed that *ŋei is the common linguistic ancestor of all data under investigation. “Non-nasal” and “non-r”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ŋei, which indicates a linguistic divide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China. However, many of the changes, including vowel simplification and self-syllabication, are prevalent in bot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ialects. Finally, an overview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iquid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contact with Chinese is provided. With regard to the onset liquids, two main types can be distingu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languages, namely, types that only have one liquid and types that have two liquids. Languages with one liquid tend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languages with two liquids tend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With regar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nal liquids, there is essentially only one type in Chinese, which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In the non-Chinese languages, languages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final /l/ and /r/ are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the languages without /l/ and /r/ are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the languages with only one final /r/ or /l/ are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rea.

闽南方言“肉”义词的分布与演变

曾智超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以广义闽南方言（莆仙、泉漳、大田、潮汕、雷州、琼文）的肉义词为研究对象，在地理分布的基础上，通过代际差异、语义及构词变异、早期移民方言和历史文献等考察其演变史。“脉”（如[baʔʔ]）“肉 h-”“肉 n-”分别是漳州、泉州、莆仙的早期共同形式，清代以来泉州方言发生了“脉”的扩张，潮汕方言则发生了“脉”的淘汰。大方言区有推平变异的趋势，如台湾、雷州和琼文；而部分小方言岛保持或增加了变异。还讨论了音节内混成形式的分布和产生过程。

一、背景

“肉”义词是闽南方言中少数有词汇差异的核心词之一。以泉漳小片为例，Swadesh（1971:283）100 核心词表，可能只有 5 项存在词汇变异，分别是 flesh、give（度、还、传、乞等，见吕晓玲 2016）、green（绿或青）、say（讲、说或坦）和 who（啥依、底依、谁等）。本文即以肉义词为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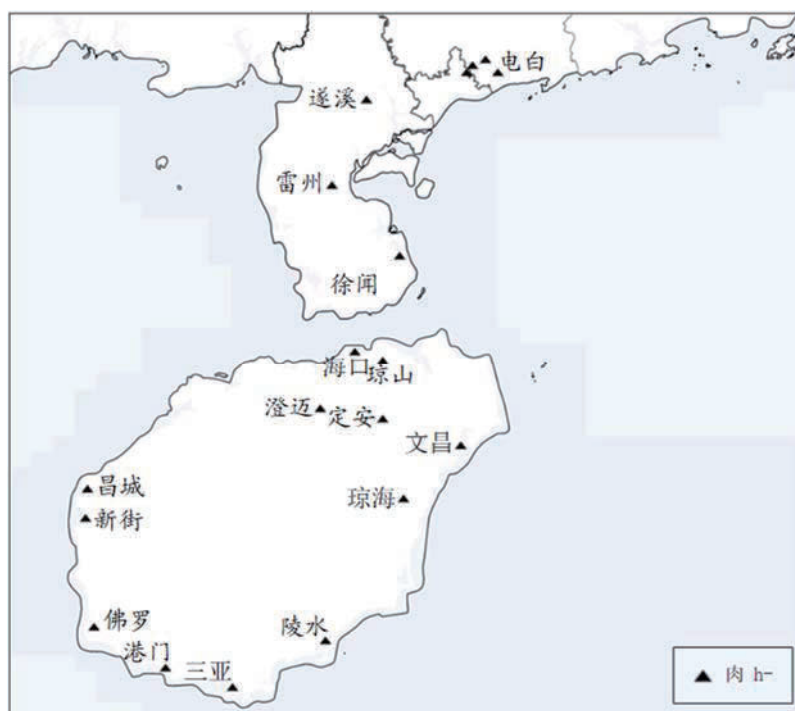
泉漳小片以及大田、尤溪、潮州、汕头、揭阳单点材料来自笔者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3 月的调查。其余来源为：海南（梁猷刚 1986；刘新中 2004；杜依倩 2007），台湾（张屏生 2017），莆田（李如龙等 2019），龙岩（张振兴 1984；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2；Branner 1999），尤溪（李如龙、张其兴 2015），诏安（张以文 2017），以上均包括省/市/县辖区内的多个点；以及，泉州（林连通 1993），安溪安美（曾南逸 2013），漳州（陈正统 2007），潮阳（张盛裕 1981），澄海（林伦伦 1996），南澳后宅、云澳（林伦伦、林春雨 2007），海丰（罗志海 2009），陆丰（陈筱琪 2008），汕尾（高洵 2010），茂名鳌头、袂花（刘媛媛 2017），电白（戴由武、戴汉辉 1994），云浮罗定、吴川兰石（陈云龙 2012），遂溪（Yue-Hashimoto 1985），雷州（林伦伦 2006），徐闻下洋（陈云龙、蔡蓝 2005），乐昌塔头坝、英德鱼咀、郁南连滩、平乐周塘（蔡玄晖 2009），苍南灵溪（温端政 1991），温州洞头（曾蓉蓉 2008），赣县安平（宋婕妤 2015），玉山紫湖（丁月香 2017），广丰铜山（胡松柏 1998）。其余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的来源随文注出。

二、“肉”义词的三类形式及地理分布

陈保亚、汪锋（2006）提出，核心语素应当满足“构词能力强、稳定程度高”等要求，因此即便一个方言在某义项上有词汇变异，也能根据上述标准择取一个词或语素作为代表形式，本文称这个最无标的形式为“第一形式”。各地肉义词的第一形式，如图 1

(a, b) 所示¹。

图 1 (a, b): 闽南方言“肉”义词第一形式的地理分布



¹ 图 1 说明：地名宋体表示市，楷体为县或乡镇。除闽南方言外，也绘制若干周边方言。

2.1 脈

闽南方言“肉”义词有两个词源，一个是“肉”字，另一个是 $baʔ^7$ 、 $māʔ^7$ 等，后者本字不明，本文记为“脈”。泉漳小片的厦门、漳州、龙岩地区、泉州内陆山区以及台湾都说“脈”，北部内陆的大田小片也说“脈”；西部龙岩市内的闽客混合方言，如万安，以及北部三明尤溪县境内多种具有闽东、闽南、闽中和闽北过渡性质的方言，也说“脈”。粤东闽语潮汕小片的主流说“肉”，但东边的南澳岛云澳镇及西侧的陆丰、汕尾说“脈”。粤西和海南闽语都不说“脈”。

(1)	厦门	漳州	龙岩	台北	陆丰
脈	$baʔ^7$	$baʔ^7$	ba^6	$baʔ^7$	$baʔ^7$

“脈”的词形如(1)所示。共同闽南语喉塞韵尾在龙岩脱落，原喉塞韵尾阴入调大部分派入阳去，故各地符合语音对应，早期形式为 $*baʔ^7$ 。该形式不合“肉”字的音变规律，一般认为是“肉”字的训读音（如，陈章太、李如龙 1991:137；《汉语方音字汇》2003:211）。黄典诚（1985）考其本字为“脉”，但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即麦、陌韵泉漳白读为 $eʔ \sim \varepsilonʔ$ ，仅有“拍”“百”（泉厦）读为 $aʔ$ ；语义上“脉”的本义是血管，文献也未见指肉的用例，可能不是本字。赵加（1991）考“脈”为古壮语底层词，但壮语南部方言的 $*ʔba:i^5$ 更早的语义是“祭祀用的肉块”甚或动词“割（肉）”（鄢卓 2021），恐难对应。邓晓华（1994）考其为古南岛语底层词，但所举各语言中的词本身是否同源尚且成疑。如水语 $man^2\{\text{油}\}^2$ 和黎语 $mam^2\{\text{肉}\}$ ，前者原始侗台语拟为 $*mən^2\{\text{荤油}\}$ ，黎语缺失该词（梁敏、张均如 1996:572），后者原始黎语拟为 $*rəmʔ$ （Norquest 2007:542），两词似不同源。故本文仍以未知其词源为前提。

2.2 肉 (h-)

另一个词源是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同源的“肉”字，可根据声母的不同划分为两类，一类为 h-声母，另一类为 n-声母。h-词形作为第一形式分布在彼此远隔的泉州沿海和粤西、海南。在泉州沿海地区主要分布于市区（鲤城区等）、晋江、石狮及北部边缘的泉港。在粤西闽语雷州片和海南的琼文闽语各片，则是集中大片分布，且没有另两种形式。

(2)	泉州	同安	雷州	海口	三亚
肉	$hiak^8$	hik^8	hip^8	$hiok^8$	$hiok^8$

(3) $[+consonantal, +nasal] > h / __ [-consonantal, +high]$

(4)	泉州	厦门	漳州	汕头	雷州	海口	莆田
鱼疑	huu^2	hi^2	hi^2	huu^2	hu^2	hu^2	hy^2
耳日	hi^4	hi^6	hi^6	hi^4	hi^2	hi^6	hi^6
箸日	$hioʔ^8$	$hioʔ^8$	$hioʔ^8$	$hioʔ^8$	$hiʔ^5$	hio^6	$niau^2$

“肉”的声母读 h-系中古鼻音声母字在高元音前去鼻化的音变所致（张光宇 1989），

² {}表示语义，下同。

可写为规则(3)。如(4)所示,“鱼”“耳”“箸{叶子}”等核心词在闽南各片均发生这个音变,这是早期的共同创新。³泉漳日母白读除h-外,另有/n-/ [n~l]的形式,如“若”泉na⁴、厦漳na⁶、“闰”lun⁶等,且无元音条件。我们认为h-和/n-/处在同一历史层次,h-是*n-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肉h-”和下文的“肉n-”实际上是同一词源、同一层次的形式,区别为是否发生(3)的扩散式音变。

琼文闽语还有读为零声母的形式,概由“肉h-”音变而来。在海口,泉漳的*t^h- (透母为主)擦化,与*h- (晓匣母及(4)所列字等)合流为h-; *k^h- (溪母为主)擦化为x-。在文昌,则是*t^h和*k^h擦化并合流为x-, *h-变为h- (辛世彪 2013:39ff),本文依梁猷刚(1986)将h-作/h-/。万宁(中嶋幹起 2002)的演变与文昌相同,但“肉”例外地读为[iok⁸],大概是零星地发生了h-的脱落。刘新中(2004:106)还记录了若干“肉”读零声母的方言点。包括万宁在内,这些点均未绘入图1b,但很可能都由“肉h-”演变而来。

2.3 肉(n-)

“肉n-”的声母未发生音变(3),声调阳入,如(5)所示。它作为第一形式分布在潮汕大部及整个莆仙方言,呈远隔分布。闽东、闽北方言肉的声母也都是n-,图1a画出了福州、尤溪洋中两个闽东方言的ny⁷⁸。

(5)	莆田	仙游	枫亭	汕头	潮阳
肉	nœ ⁷ ⁸	ny ⁷ ⁸	ni ⁷ ⁸	nek ⁸	nek ⁸

“肉h/n-”的韵母,方言间有层次差别。其中泉州、同安、雷州、潮汕的形式属于同一历史层次。通摄三等在泉腔韵书《汇音妙悟》(1800)中归卿韵,早期泉州可拟为*iəŋ/iək (曾南逸 2013);其入声韵主元音在鲤城等地低化为iak,阳声韵仍保持iəŋ。同安等地则是阳声韵、入声韵一道脱落主元音,或者说高化为iŋ/ik。漳州方言早期形式可依云霄话拟为*en/ek,这与今潮汕音值相同,芄城等地高化为iŋ/ik,但漳州不说“肉h/n-”。雷州hip⁷的韵尾特别,雷州有几个常用字发生了ik>ip的词汇扩散式音变,又如“竹”tip⁷、“叔”tsip⁷。

莆仙三个点的韵母不易判断层次。如(6)所示,“肉、熟、叔”三字福州⁴、原始宁德(秋谷裕幸 2018)和原始泉州(曾南逸 2013)都同韵,莆田也同韵,但仙游和枫亭“肉”与“熟、叔”不同韵,是音韵例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箸”字,莆仙的“箸”未同闽南一起发生擦音化,它的韵母在仙游和枫亭也是例外,与“席{草席}、尺”等字不符。

³ 音变(3)的语音条件清楚,但从现代方言看不是符合条件的词一概变。一方面它很可能以词汇扩散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晚期层次的叠置也会造成不规则,如“日”(漳州dzit⁸)就没有早期层次的读音。另一种观点是给这些词构拟一套清鼻音,如Kwok (2018:37)构拟共同闽南语“肉”为*nhuk⁸。

⁴ 福州话y和øy是以声调为条件的韵母变体。

(6)	莆田	仙游	枫亭	福州	宁德	泉州
肉	nœʔ ⁸	nyʔ ⁸	niʔ ⁸	nyʔ ⁸	*nyk ⁸	*hiək ⁸
熟	lœʔ ⁸	lyøʔ ⁸	lieʔ ⁸	syʔ ⁸	*θyk ⁸	*siək ⁸
叔	tsœʔ ⁷	tsyøʔ ⁷	tsieʔ ⁷	tsøyʔ ⁷	*tsyk ⁷	*tsiək ⁷
箸	niau ²	niu ²	niu ²	nuoʔ ⁸	*niɔʔ ⁸	*hiɔʔ ⁸
席	ts ^h iau ²	ts ^h ieu ²	ts ^h ieu ²	ts ^h uoʔ ⁸	*tʃ ^h ioʔ ⁸	*ts ^h ioʔ ⁸
尺	ts ^h iau ⁶	ts ^h ieu ⁶	ts ^h ieu ⁶	ts ^h uoʔ ⁷	*tʃ ^h ioʔ ⁷	*ts ^h ioʔ ⁷

考虑到核心词的保守性，这里暂且将莆仙与其他沿海闽语“肉”的韵母视为系统对应，这样沿海闽语“肉”的韵母即属此韵类：闽东⁵*yk：莆仙 œʔ~yʔ~iʔ：泉州*iək：(漳州*ek)：潮汕*ek。Norman (1981:66) 构拟该韵的原始闽语为*yk，词例“竹”。

海口、三亚等琼文闽语的韵母则是另一层次。通摄三等入声非唇音泉漳还有文读-iək。海口大部分字则失去了这套异读，不同字有不同的层次竞争结果：如“肉、竹”等字读为文读层的-iək；“绿、熟、浴”等字读为白读层的-iaək，同泉州；“叔”读-ip，同雷州。这样的层次竞争容易晚期各自发生⁶，所以我们不以韵母的层次来对变体做分类，而以特殊性更强的鼻音声母的擦化音变(3)来分类。

上述三类形式之外，尤溪西洋、中仙的第一形式为“肉”和“豚”的混成形式，见5.2。若干方言点存在代际词汇差异，最突出的是泉州沿海地区。下面即考察该地区的词汇替换情形，以推知其早期形式。

三、泉州沿海地区“肉 h-”和“豚”的竞争史

如果只关注图 1a 中泉漳小片的分布，并且考虑到泉州沿海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的地位，我们可能会认为“肉 h-”是以泉州市区为中心的创新，因为周边是大片的“豚”分布区。但放大视野，“肉 h-”保留在雷州和琼文闽语，并且其音韵形式相当古老，说是创新难以令人信服。柴田武(2018[1969]:34)提出“理解词”的地理分布对构建语言史的价值，因此，本文针对理解形式的等级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可以解释“肉”义词在泉漳小片特殊的地理分布，并证实泉州方言的“豚”基本是厦漳方言的接触所致。

3.1 调查和分析方法

首先在变异集中区摸底调查，发现这些地区的“肉 h-”“豚”没有形成 flesh/meat⁷、肥/瘦、生/熟等语义对立。猪肉是当地最常见的牲畜肉，肉义词除了泛指食用肉类，也可特指猪肉这一下位概念（当然，猪肉也有专门的词）。因此，第二次调查以一张猪肉

⁵ 以原始宁德代之，秋谷裕幸(2018:712)认为该文构拟的原始宁德方言与原始闽东方言相当接近。

⁶ 其他方言有平行演变的例子，如漳平菁城通摄三等入声非唇音多读为文读层-iək(陈筱琪 2019:346ff)。海丰的韵母也是文读层，见 5.1。

⁷ Leipzig-Jakarta 核心词表将 meat 和 flesh 合并为一个词项，依据是，在其统计的多数语言中，这两个概念用一个词表示(Tadmor 2009:68f)。闽南话的情况亦同。

的图片作为肉义词（单纯词）的诱导媒介，如果发音人看到猪肉图说出复合词，则再请其说出泛指各种肉的单纯词。还以图片调查了“猪肉”“肥肉”“瘦肉”“肉粽”“肉丸”“肉羹”“炸肉”8个复合词，以文字调查了“买肉”“吃肉”2个复合词。以下分析以单纯词“肉”为主。

黄河（2017）设计了一套精密的微观地理语言学调查方法，本文借鉴并据实际需要调整了调查方法。上述的第二次调查，具体步骤是：A. 展示图片/文字并提问→发音人回答一个或多个形式→B. 询问对其他形式的认可情况→C. 询问各理解形式的常用度、语义、用法等。之后根据表1对各形式进行分级。

表 1：发音人反应量表

级别	1	2	3	4	5	6
自报	+	+	+	-	-	-
快速	+	+	-	+	+	-
常用	+	-	-	+	-	-

表1中，“自报”为“+”指的是发音人能在A环节自行说出该形式。“快速”为“+”指的是发音人快速认可该形式，包括在A、B两环节中：A环节中发音人可能思考一阵又说出某形式，则该形式为“-”；B环节中，若发音人快速否定某个形式，则也是“-”。“常用”根据发音人在B、C环节中对各形式常用度的评价确定，有些评价是自报的，有些是经过询问回答的。我们默认不存在“-快速，+常用”的可能。对发音人的反应进行分类必然存在模糊的界限，但笔者采用统一的标准。例如，B环节，某个形式发音人犹豫后说“好像听过”或“是外地的说法吧”等，则记为6。以此级别为据，1是第一形式，2-4为第二形式，5为非使用理解形式，6即为不理解。

运用这套方法，在泉州、漳州布点，老年层存在变异的每个调查点，每个年龄层⁸最少调查两人。一个地点的某形式属于哪个级别的判定标准是：若在总人数中有50%以上的人是相同的反应，则为该类；若没有任何一类有50%以上的认可度，则记为“个人差别明显”。

3.2 理解等级的地理分布及“肉”“豚”的新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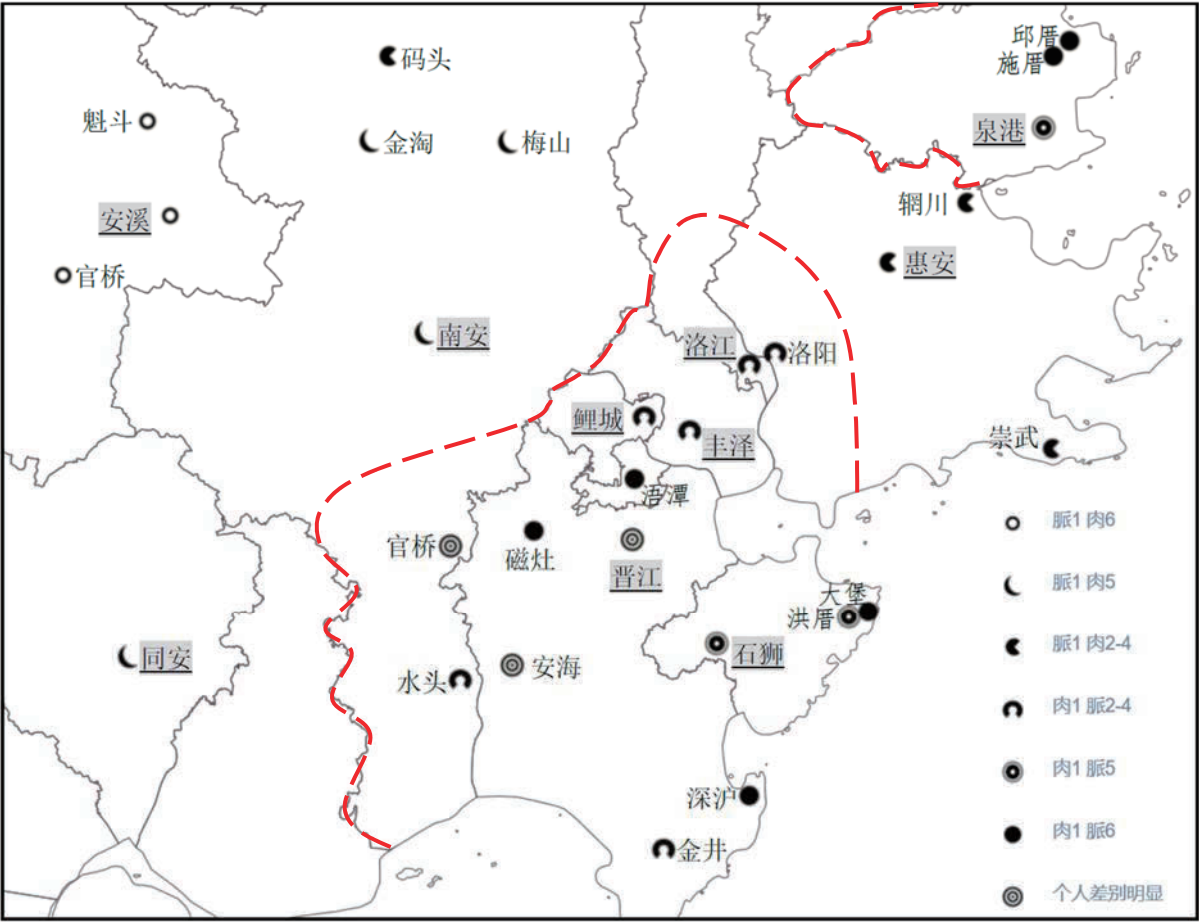
泉漳小片（不包括台湾）“肉”义词的使用和理解等级可总结如下：①泉漳小片不理解肉n-（故3.2、3.3以“肉”指“肉h-”）。②漳州、厦门、龙岩及三明的大田、尤溪方言，这些以“豚”为第一形式的地区；以及泉州的内陆三县，安溪、永春、德化⁹：都不理解“肉”。厦门同安则理解。即，“南安-同安”以西的广大闽南地区，“肉”基本对于各年龄层都不是理解形式。③总体来说，在大多数第一形式是“豚”的地点，“肉”不是理解形式，例外是泉州沿海说“豚”的南安和惠安能理解“肉”，有些还作为第二形式使用。与之相反，在第一形式是“肉”的地点，“豚”多是理解形式。“豚”不是理解形式的地点，由北到南仅有泉港邱厝、施厝村，晋江磁灶镇、池店镇浯潭村，石狮祥

⁸ 定12-29岁为青年，30-59岁为中年，60岁及以上为老年。

⁹ “肉h-”作为肉义词，大多数人理解，但安溪等地“肉h-”是语素，见4.1。

芝镇大堡村，晋江深沪镇。

图 2：泉州沿海地区老年层“肉”义词的使用及理解等级



所以，泉漳小片“肉”义词存在词汇变异的只有“南安-同安”一线以东的地区，可称为泉州沿海地区，其老年层的使用及理解形式分布见图 2¹⁰（同样存在变异的金門方言未做实地调查，没有作图）。红线内是估测的“肉 h-”作为第一形式的分布区，两个分布区也可能是相连的，但不影响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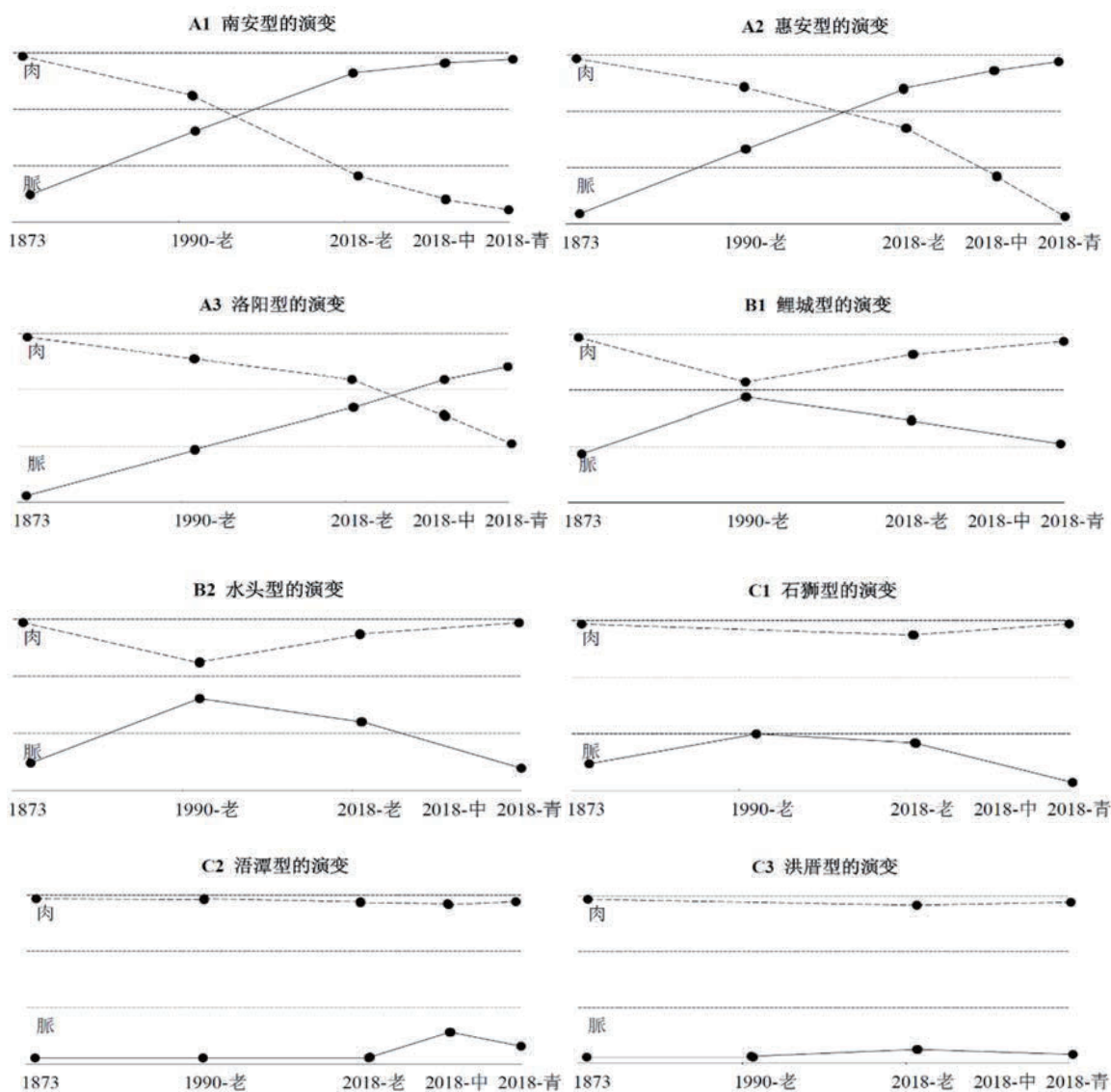
仅从老年层的分布已经可以推知“脉”是泉州沿海地区的新词，因为“脉”较弱势的地点多分布在地理上的边缘或是社会经济上的边缘（即乡村），例如，鲤城的老年层，“脉”是较常使用的第二形式，有些人还用它构成复合词：{瘦肉}“精脉”[tsiã¹ mã²?⁷]，{肥肉}“肥脉”[pui² mã²?⁷]（参林连通 1993:5,223）；晋江青阳街道的老年层中，有人对“脉”的反应是与“肉”并列的第一形式（1 人，9.0%），有人是第二形式（5 人，45.5%），有人是非使用理解形式（5 人，45.5%）；然而鲤城、晋江这两大城市之间的浯潭村，老年层一致不理解“脉”。再如，泉港邱厝、祥芝、深沪位于伸入海洋的半岛，这些地点“脉”都不是理解形式；石狮的两个相距不远的村落，稍近内陆的洪厝尚能理解“脉”，临海的大堡则不理解。这是典型的边缘分布，意味着“肉”是老词，“脉”是新词。

¹⁰ 图 2 说明：宋体阴影单下划线表示县（市/区），普通宋体表示乡镇，仿宋体表示村。厦门同安区古属泉州府，这里归入泉州沿海地区。图例：数字表示使用和理解的变异等级。

3.3 “豚”的扩张和衰退

19 世纪的《厦英大词典》(Douglas 1873:327) 指出 mā⁷ 在泉州 “非常少用” (said quite rarely), 可知 “豚” 在泉州沿海地区的扩散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以此为前提, 结合调查所得的年龄层变化, 下面分类描述各地从 19 世纪中叶至今新派的演变。A 类方言 “豚” 成为第一形式; B 类 “豚” 成为使用词, 但近来停滞或衰退, 未取代 “肉”; C 型 “豚” 的扩张更弱。图 3 为各类型的演变示意图¹¹。

图 3: 泉州沿海地区 “肉” “豚” 的竞争类型



3.3.1 A 型: “豚” 取代 “肉” 成为第一形式

A1. 南安型: 是 “豚” 扩散最早的类型。从老年到青年, “肉” 由非使用理解形式

¹¹ 图 3 说明: 由下往上三条带状区域分别表示非使用理解形式 (越接近横轴则越趋近不理解)、第二形式和第一形式。同一带状区域内性质基本一致, 但有量的区别。横轴并非真实时间, 表示的是演变趋势而非确切的时点。

降为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脈”不变。如南安城区、梅山镇、金淘镇，厦门同安区。

南安位于泉州内陆三县与沿海地区之间。李如龙（1999:2）描述 1990 年代时南安老年人说“肉”，年轻人说“脈”。笔者在老年层未调查到以“肉”为第一形式的发音人，李先生记录的似乎是更老派的情况¹²。类似的情形是，同安的发音人自述迟至 1980 年代还有一些中老年人说“肉”，回忆 1920 年代生人曾主要说“肉”。

金门方言也属于此类，据张屏生（2007:24），金门金沙一带发音人回忆儿时“买肉”说“拍肉”[p^ha⁷ hik⁸]，现已不用；且当地儿歌韵脚字出现“肉”：

(7) kə³ bo² sik⁸ gua³ bue³ hik⁸
 棵 无 熟， 我 买 肉。

说明“肉”曾是主要的形式。

A2. 惠安型：“脈”的扩散仅次于南安。从老年到青年，“肉”由第二形式降为非使用理解形式或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脈”不变。如惠安县城、辋川镇、崇武镇（西华村），南安码头镇。

以惠安县城（螺城镇）为例，“肉”仍是老年及部分中年人的使用形式。老年层中，有 1 人（男，80 岁以上）对“肉”的反应是第一形式，14 人是第二形式（其中：2 级 2 人，3 级 1 人，4 级 11 人）。中年层 1 人为第二形式（4 级），3 人为理解形式，1 人不理解。青年层 2 人为理解形式（4 级），5 人不理解。比例见表 2：

表 2：惠安各年龄层“肉”“脈”的理解等级比例

	第一形式	第二形式	非使用理解形式	不理解
老年	6.7%	93.3%	0	0
中年	0	20%	60%	20%
青年	0	0	28.6%	71.4%

由于处于“脈”不久前刚成为第一形式的阶段，因此惠安“肉”“脈”的变异十分明显。各年龄层“买肉”和“吃肉”两个词组的第一形式分别是¹³：

(8) 买肉 吃肉
老年 p^ha⁷ ba⁷ 拍脈 tsia⁷ hiək⁸ 食肉
中年 bue³ ba⁷ 买脈 tsia⁷ hiək⁸ 食肉
青年 bue³ ba⁷ 买脈 tsia⁷ ba⁷ 食脈

可见，虽然老年层“脈”已发生了对“肉”第一形式的取代，但“脈”仍然不能自由地在句法层面使用，而且同一年龄层的语言社团对某个动词搭配哪个词形有较为一致的倾向；直到青年层，“脈”才基本不受限制。

A3. 洛阳型：较惠安型更晚一步，从老年到青年“脈”取代“肉”成为第一形式。如惠安洛阳镇，洛江区（万安街道），晋江金井镇。

¹² 据公开资料，李先生是南安人，1936 年生。

¹³ “脈、拍、食”在螺城均有不带喉塞尾的变体。

3.3.2 B 型：“脈”的扩张中止

B1. 鲤城型：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派，“脈”的地位已经接近“肉”，但随后略有衰退或保持变异。泉州鲤城区、丰泽区，以及个体差异大的晋江（青阳）可归为此类。

鲤城区的老年人普遍反映：几十年前说“脈”比现在多，现在的年轻人“肉”用得更多。要解释一个外来的形式为何未能取代固有词，是相当困难的。这里提出一个设想，即这些地点较早发生由闽南话到普通话的局部语言转用，使得异地闽南方言的接触显著减弱。Weinreich (1953:107) 把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s) 分为局部的 (partial) 和完全的 (total)，后者指语言社团中的典型成员在某些领域和场所 (domains and locales) 发生语言转用。也许由于泉州市区、晋江市非闽南籍的外来人口较多，当然也由于大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程度更高，这些地区较早地、更多地、更广泛地在公共场合换用普通话，这使得与其他闽南方言变体的总交流度降低¹⁴；“脈”的扩散本就仰赖于各地闽南话的交流，一旦总交流度降低，它就失去了扩散的条件。

晋江各年龄层“肉”义词的个体差异都比较大。缺乏高交流度的说话者，会导致语言规范难以出现 (Fagyal et al. 2010)，晋江的人口流动较大，闽南话的内部交流较少，这可能是变异难以趋同的原因。

B2. 水头型：该类型与鲤城型类似，只是“脈”的扩散更弱一些。南安水头镇从老年到青年，“脈”由第二形式降为非使用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安海镇老年及官桥镇老年、中年的“脈”存在显著个体差异（类似晋江），在安海中年、青年及官桥青年则多数降至非使用理解形式。粗略地说，安海、官桥也可归入水头型。

安海和水头有两份重要的历史文献。17 世纪菲律宾华人的安海话只说 hiək⁸ 而不说 baʔ⁷ (Van der Loon 1967:134)¹⁵。1800 年《汇音妙悟》除“肉”外也记录了 baʔ⁷ (表 4)，据曾南逸 (2013:10) 考证，《汇音妙悟》的作者出生于南安梧坑村（今水头镇梧坑村）。水头“脈”至今未取代固有的“肉”，周边发生的取代也只是近几十年发生的。

3.3.3 C 型：“脈”只有微弱影响

C1. 石狮型：老年到青年“脈”由非使用理解形式降为不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如石狮城区，泉港区（山腰街道）。

C2. 浯潭型：老年到青年“脈”由不理解形式升为非使用理解形式，第一形式“肉”不变。如晋江浯潭村，石狮大堡村。

C3. 洪厝型：老年层有的能理解“脈”，但中年、青年“脈”没有扩展，或者进一步消退。如石狮洪厝村、泉港邱厝、施厝村，晋江深沪镇。

¹⁴ 十余年前，泉州市区普通话在公共场合的运用已压倒性地超过闽南话（林华东、徐贺君 2009）。晋江、石狮自 8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1988 年，全国各地到两地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就有 15 万多人（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101）。外来人口规模不妨以《泉州统计年鉴 2017》的 2016 年“常住人口”除以“户籍人口”估测，该值越大即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紧密相关）。有 4 个县（市、区）该值高于全市平均值：丰泽、石狮、晋江、鲤城。四地都是“脈”扩张中止或衰退的 B1、C1 型。

¹⁵ 根据一部记录菲律宾华人闽南话的西班牙语-闽南话词典手稿：Bocabulario de la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z de el A.B.C.（《生理话词汇以 ABC 编排》），页 13b。原书有两种转写方式 hiee, hee，这里拟为 hiək⁸。手稿年代 Klöter (2011:56) 估计为 17 世纪。

3.4 “豚”的语音变体

泉州方言“豚”有两个语音变体, $baʔ^7$ 分布在绝大多数方言点, 而 $māʔ^7$ 只分布在泉州市区及周边半径不到 20 千米的区域——本文调查到的只有鲤城、丰泽、晋江青阳、罗山、磁灶、浯潭。从这一地理分布可知它不是存古的形式, 很可能是 $baʔ^7$ 增生鼻化的零星音变所致。《厦英》所记泉州市区的“豚”读 $māʔ^7$, 说明 19 世纪下半叶已增生鼻化。而《汇音妙悟》的记载说明 1800 年南安梧坑村(距鲤城区约 30 千米)读为 $baʔ^7$, 与今水头镇的读音是相同的。

3.5 小结

泉州沿海地区早期的肉义词是“肉 h-”。虽然有的地点在两百多年前就有“豚”这一语素, 但它主要在近几十年开始取代固有的“肉”义词 $*hiək^8$ 。各点的演替速度不同, 同安、金门、南安北部、惠安进展最快。泉州市区、晋江、南安南部等地接受了“豚”作为使用形式但未能取代“肉”; 随着异地闽南话之间的交流频度降低, “豚”的扩张中止, 或有衰退趋势。石狮、泉港等地“豚”的影响则更微弱。语音方面, 泉州市区及周边“豚”读 $māʔ^7$ 是语音创新。

四、三类形式的早期分布

4.1 “肉 h-”是泉州方言共同词

现在已经知道泉州沿海地区说“豚”是一项创新, 早期的肉义词是“肉 h-”。如果要将“肉 h-”上推至整个泉州方言, 就绕不开泉州内陆三县安溪、永春、德化, 这片广大的区域今只说“豚”而不说“肉 h-”。从系属上看, 内陆三县确属泉州方言无疑, 以 Kwok (2018) 的共同闽南语为参照, 三县 $*uə > ə$, $*oi > ue$, $*ōi > uĩ$, $*uĩ > ŋ$ 等, 都是和泉州(如鲤城)的共同创新, 而与漳州演变方向不同。如果有证据表明三县过去曾说“肉 h-”, 就可以推论三县今天的“豚”是由北、西、南三面的大田、龙岩、漳州方言扩散而来的, 进而可以将“肉 h-”上推至整个泉州方言。这里举出两条证据。

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从这三县迁出的福建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肉”“豚”二者兼用, 如“肉店” $[hiək^8 tuĩ^5]$, “豚油” $[baʔ^7 iu^2]$ {猪油}(陈章太、李如龙 1991:421)。由于顺昌周边方言不说“肉 h-”“豚”, 这两个形式也就不可能是与周边方言接触获得, 只能是分化时具备, 因此两个词曾经都是三县的使用形式。

内部的证据来自残留的复合词。汉语单音节旧词被新词取代后, 可能成为构词语素延续使用(汪维辉 2006)。今安溪魁斗、德化等地游泳(或洗澡)说“洗肉” $[sue^3 hiək^8]$, 便是一例。梅祖麟(2007)认为“洗肉”的本字是“洗浴”, 第二音节的 h-是体现上古音的存古。由于厦漳潮汕等都有“洗浴”一词, 泉州这个词也源自“洗浴”是稳妥的推论。但是, 第二音节读 h-是创新而非存古。因为凡第二字说 h-的地点, 基本都在“肉 h-”的分布区, 如鲤城、晋江、石狮等; 厦漳潮汕等大片区域“浴”均为零声母的、合乎规则的读音。这一分布事实表明: {肉}说“肉 h-”很可能是造成“浴”读 h-这一例外的词汇条件。闽南话“肉、浴”同韵、同调, 其变化只在一个喉擦音 h-, 前字“洗”读

擦音 s-, 也有利于这一增生。所以, 该词是在“肉 h-”的类音牵引下, 第二音节增生了 h- 声母, 并发生了民俗词源的重新解释, 将内部形式由“洗浴”重新分析为“洗肉”。可以写成(韵母以 *iək 代):

(9) {游泳/洗澡} sue³ iək⁸ “洗浴” > sue³ hiək⁸ “洗肉” / {肉} hiək⁸

今安溪、德化该词第二字说 h-, 却不在“肉 h-”的分布区, 我们的解释就是“肉 h-”在(9)发生之后被“脈”所替换。另一种可能是, 内陆三县本并不说“肉 h-”, 只是借入了沿海地区第二字读 h- 的词形。该想法的弱点在于, 如果当地肉不说 h-, 则该词形的第二音节语义不透明, 借入这样的形式动机不足。(9)的 h- 增生确实可能是以泉州为中心向外扩散的, 但接受该创新的地区一般需要具备“肉”说 h- 的内在词汇条件。结合顺昌埔上方言岛的词汇变异, 可以确证三县“肉”义词曾经说“肉 h-”。

这三县在地理上紧邻漳州、龙岩、大田等“脈”的分布区, 与这些方言的长期接触使得“脈”取代了固有的“肉”。所以, 3.1.5 总结的“脈”的扩张进程可以加上一环, 即最早的更替发生在内陆三县, 之后才是南部的同安、金门, 等等。

最后, 虽然“肉”n- 变为 h- 是一个音韵创新, 但无须把早期泉州方言的形式拟为“肉 n-”。因为, 音变(3)是广义闽南方言区别于其他闽语的共同创新, 此音变波及到不同词的时间或有先后, 但在可追溯的历史内, 泉州方言的共同形式是已变的“肉 h-”。

4.2 “脈”是漳州、龙岩、大田等方言共同词

泉州和漳州是泉漳小片内的两支主要方言。龙岩(新罗)、漳平、菁城, 大田(前路话)等方言, 具备 *uo > ue, *oi > e/ie, *ōi > eĩ/ĩ/an 等与漳州的共同创新, 并跟漳州一样保留 *ō 和 *uĩ 的对立, 故可以认为它们系属漳州方言(郭必之 2016; 陈筱琪 2019)。地理上大田话、龙岩话距离漳州较远, 而且表现出存古特点, 如龙岩话没有发生漳州的阳去、阳上合并的音变, 且存有 -iua 这种“前漳州特征”(陈筱琪 2019:229-235)。这意味着龙岩话晚期与漳州的联系或接触较弱, 不易接收创新的扩散。因此这些方言的“脈”应当继承自共同漳州话, 而非晚近接受漳州话的影响。“脈”还进一步扩散到了西部的闽客过渡方言(万安)和北部的闽东过渡方言(尤溪), 这显示了它的时间深度。

“脈”在汉语中暂无法找到词源, 而新的核心词一般不会无缘地出现, 合理的推论是它是非汉语借词或底层词。这应当视为一个词汇创新。虽说如此, 我们并不主张把漳系方言的共同形式拟为“肉 h-”。理由是: 第一, 今漳州既没有能理解“肉 h-”的方言, 也未调查到“肉 h-”的词汇残余。第二, 文献和移民方言可证“脈”在漳州作为肉义词的历史至少有 400 多年, 但没有说“肉 h-”的证据: 16-17 世纪菲律宾的漳腔闽南话 Sangley 说“脈”, 不说“肉 h-”(Klötter 2011:133); 明清之际迁出的多个漳腔方言岛或说“脈”, 或借入周边方言词, 但没有说“肉 h-”的, 见(12)。第三, 目前漳州境内尚有分布的畲话{肉}说[p³]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611)¹⁶, 语音上看, 它和“脈”来源不同, 因此“脈”应当来源于更早与汉语接触的某种语言。第四, 粤西闽语今只说“肉

¹⁶ 此词可与汉语“胛”比较。《玉篇·肉部》“胛, 波美切, 肉也”。漳州“胛”文读为 pi³ (Schlegel 1890:797), 但口语不说。

h-”，但粤西吴川粤语（紧邻粤西闽语）、广西宜州阳山粤语（200 多年前由粤北阳山迁至宜州），以及吴川吉兆话（属侗台语，但闽粤方言对其影响很大）都有指“肉”的词 [mɛ]，且声调均为阴调类（李健 2014；张秀珍 2009；邵兰珠 2016），见（10）。宋代至明代闽人大量移民吴川、化州（李健 2014:7），[mɛ]和“脈”语音接近¹⁷，如果二者确实是关系词，那么[mɛ]或许是比今粤西闽语更早到达的闽语移民所用的词，这批移民今已转用粤语，但留下了“脈”。当然，由于粤北阳山话的后代也有此词，其背后或有更深的原因。

(10)	吴川粤语	吉兆话	宜州阳山粤语
肉	mɛ ¹	mɛ ³	mɛ ³

所以，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给漳州、龙岩、大田等方言拟“肉 h-（或 n-）”>“脈”的演变。由于泉州（南安）是闽南开发最早的地区（王育德 2002[1969]:562），不妨认为“脈”是闽南话从泉州南拓至漳州的初期与当地非汉语接触的产物。“脈”在可追溯的历史内是漳系的肉义共同词。

4.3 “肉 n-”是莆仙方言共同词

“肉 n-”与“肉 h-”是鼻音擦化音变（3）发生前后的形式。Swadesh 的 100 核心词中有 4 个词泉漳发生了 h-化，莆仙方言“鱼”“耳”两词已变，读 h-，“肉”“箸”两词则未变，读 n-，见（4）（6）。这反映了莆仙方言的接触历史。

莆仙话拥有闽南话的底层和闽东话的强烈影响（刘秀雪 2004:237）。莆仙地区原属泉州，于宋代分立并长期接受省城福州的影响（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1:2647）。其撮口呼等特点反映了“前泉州特征”，这和龙岩反映“前漳州特征”的情况类似，说明其分化很早。当然，语言或方言的分化时间未必等于政区的分化时间。

可以设想，当闽南的鼻音擦化音变以词汇扩散、地理扩散的形式推开时，莆仙由于与泉州联系较弱，只接受了一部分词的音变，“肉”“箸”没有擦化。另一种可能是，莆仙的“肉”“箸”在早期也读 h-，而后又受到闽东的影响，变回 n-，也就是说“肉”“箸”经历 *n->h->n- 的演变。这并非不可能，只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暂不必作如此迂回的设想。况且，潮汕的“肉 n-”与莆仙远隔分布，这显示了“肉 n-”的古老。因此，谨慎的结论是，在可追溯的时间深度内，“肉 n-”是莆仙方言的共同词。

与泉州北部毗邻的仙游借入了“脈”。有以下三个词：“脈”{猪肉}[ma³]，“拗脈”{病猪肉}[au³ ma³]，“脈丸”{肉丸}[ma³ uĩ²]；李如龙等（2019:74）指出[ma³]“源自闽南话 ba²”。其语音形式可对这一判断提供支持。对同源词而言，泉漳的 b-均在仙游进一步清化为 p-（Bodman 1985），“脈”读 m-与同源词不符。声调方面，泉漳的一部分-2在仙游脱落，原读阴入的字，仙游基本派入阳去[21]，如泉漳“拍”{打}[p^ha²7]，{眨}[nĩ²7]，仙游读[p^ha⁶] [ni⁶]。仙游“脈”读上声（阴上）[52]，不合上述规律。既明确其为借词，

¹⁷ “脈”的早期形式为 *ba²7；参照（14）中尤溪未发生系统性去鼻化音变的读音[ma⁷]，或可拟更早的形式为 **ma²7，也是阴调类。

再考察借源。泉州北部重镇惠安阴入读[43]¹⁸，阳入[23]，晚近兴起的泉港阴入读[5]，阳入[42]，仙游虽直接与泉港接壤，但泉港并不说“豚”，况且泉港的阴入与仙游上声调值并不接近，反而是阳入与其接近，所以泉港不是借源。惠安阴入[43]和仙游的舒声[52]接近，因此仙游的“豚”可能是从惠安借入，声母和调值均按照近似匹配。

仙游的“豚”似只用于猪肉、肉丸等词，贸易类是易借性强的义类(Franco et al. 2019)，食用肉常参与买卖，自然有更大机会成为借词。事实上，在第3章对泉州方言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肉粽”“炸肉”等词中，“豚”的扩散进程快于核心的肉义词。因此，仙游的“豚”为闽南话借词，且从语义、构词看且它尚不能算肉义词的第二形式。

4.4 潮汕方言 19 世纪“肉 n-”“豚”并用

潮汕方言（不含汕尾地区和云澳，详见 5.1）今一致说“肉 n-”，与莆仙相同，且没有词汇变异。本节用历史文献（表 3）、早期迁出的移民和残留的复合词三方面证据，说明潮汕早期也说“豚”。

表 3：潮汕方言历史文献的“肉”义词

文献及时间	音韵地位/页	音{义}	汉字
《击木知音》1915	文胶上入	baʔ ⁷	月
Dean 1841	22	{flesh} nek ⁸	肉
	39	{beef} gu ² baʔ ⁷	牛肉
	39	{pork} tu ¹ baʔ ⁷	猪肉
Duffus 1883	110	{flesh} nek ⁸ ; baʔ ⁷	—
	176	{meat} nek ⁸	—
	207	{pork} tu ¹ nek ⁸ ; tu ¹ baʔ ⁷	—
Fielde 1883	10	baʔ {flesh; meat}	月
	391	nek ⁸ {Flesh; meat; the edible part; corporeal}	肉
Lim 1886	63	nek ⁸ {Flesh}	肉
	87	gu ² baʔ ⁷ , gu ² nek ⁷ {beef}	牛肉
	87	iē ² baʔ ⁷ , iē ² nek ⁷ {mutton}	羊肉
	87	tu ¹ baʔ ⁷ , tu ¹ nek ⁷ {pork}	猪肉

潮汕韵书《击木知音》文母胶部上入收“月”字¹⁹，Fielde（1883）对[baʔ⁷]也只写“月”而不写“肉”，可见潮汕方言有此俗字习惯。今潮州老派“月（肉）字旁”一般读“肉字盼”²⁰ [nek⁸ zi⁶ pōi²]，也有人读“豚字盼” [baʔ⁷ zi⁶ pōi²]。

其他教材、词典中，Dean（1841）出版于泰国曼谷，flesh 说“肉 n-”，而猪肉、

¹⁸ 惠安的阴入一般记为[4]，实际略有下降，严式可记为[43]。

¹⁹ 《击木知音》在经韵（-eŋ/ek）没有收录“肉 n-”，可能的原因是，潮汕的鼻音和浊塞音已经音位化为两套声母，传统的声母“十五音”格局在“柳母经韵入声”的地位上已不能容纳 lek 和 nek 两个对立的音节，故该音韵地位只收录了读 lek 的字。

²⁰ 《集韵·删韵》：“盼，步还切，片也。”泉漳潮汕俗字“𠂔”。

牛肉都以“豚”为中心语素，没有记录“肉 n-”的变体。Duffus（1883）记录的是本土潮州府方言，其自序说：“（本书）从汕头地区多种方言中选择的，是潮州府使用的方言；没有故意收录任何一个在潮州府不流行的词或词组。根据这一原则，熟悉汕头方言的人最习见的许多表达被排除在外。”²¹书中 flesh 列出“肉 n-”和“豚”两个变体，可见“豚”在当时的潮州无疑是使用形式。Fielde（1883）指出“肉 n-”除了指肉，还指“可食用的部分”“肉体的”，Lim（1886）记有“刀肉”[to¹ nek⁸]{刀刃}，这都说明“肉 n-”的高能产性。而“豚”语义单一，只能构成几个复合词，如“猪豚”“无骨无豚”[bo² kut⁷ bo² ba²]{没骨头也没肉；除了气味什么都没有}“无肉无豚”[bo² nek⁷ bo² ba²]{没有肉}。Lim（1886）的作者是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翻译官，他记录猪肉、牛肉、羊肉的第一形式都是“肉 n-”，第二形式是“豚”。总之，19 世纪潮汕本土与东南亚潮汕方言都存在“肉 n-”“豚”的变异，“豚”是使用词，但“肉 n-”在多义性、搭配能产性上都高于“豚”。

对比潮汕和仙游的“豚”，语音上潮汕的“豚”和泉漳形成规则对应，无法据此认定为借词，而仙游明显为借词；语义和用法上，潮汕“豚”不限于猪肉及其制品，且可以构成“无肉无豚”这样的固定搭配，说明潮汕的“豚”比仙游的更深地融入词汇语义系统。

今天国内潮汕方言已不说“豚”，但海外潮汕话则多有保留。李永明（1959:190）便指“豚”为“南洋华侨的说法”。有一种观点是国内潮汕话一直只说“肉 n-”，东南亚潮汕话的“豚”是与东南亚泉漳话接触而来的（如陈晓锦 2014:969）。从历史文献看，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且本土潮汕话仍有复合词残留，除了上述的“月（肉）字旁”，还有：{胖}，有人说“豚豚”[ba² ba²]，闽语多有名词重叠作形容词的形态手段，这是早期“豚”作名词的证据；“惜豚”[sio⁷ ba²]{疼爱}，更多人说[sio⁷ nek⁸]，用于安抚受伤或难过的小孩；一种香蕉叫“豚蕉”[ba² tsio¹]（蔡俊明 1991:785）。邻近的漳州，说“豚蕉”，但不说“豚豚”“惜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潮汕的“豚”是晚近从漳州借入的。东南亚潮汕话“豚”的留存，可以有当地泉漳话的支持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因为移民在迁出时就带有变体“豚”。

19 世纪潮汕兼说“肉 n-”“豚”，此时肉义第一形式是“肉 n-”，“豚”是重要的第二形式。二者形成了一定的语境互补。此后，在语义、搭配上比较受限的“豚”被“肉 n-”取代，这是方言自身同义竞争的结果。

4.5 新生的接触方言厦门话只说“豚”

今厦门话和漳州方言相同，只说“豚”且不能理解“肉”。厦门话（思明区的方言）被公认为一种泉漳混合方言（王育德 2002[1969]:7-8；李如龙 1997:248），其形成时间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因《翻译英华夏腔语汇》（Doty 1953）编成时厦门话已经定型。混合方言是一种短时间内新生的方言，所以不能从厦门岛历史上隶属泉州府同安县来判定它

²¹ 原文：From many varieties of dialect found in the Swatow region that has been chosen which is spoken in the city of Ch'ao-chow-foo; and no words or phrases not current there have been knowingly admitted. By this rule many expressions are excluded which must be amongst the most familiar to persons acquainted with the general speech of the Swatow people.

和同安一样经历了“脈”对“肉 h-”的替换。从历史文献记录的词汇变异情况可知，新生的厦门话一直以“脈”作为肉义词。

表 4：泉厦漳历史文献的“肉”相关词

文献及时间	音韵地位/页	口语	音韵地位/页	书面语
《汇音妙悟》1800	喜卿下入 文嘉上入	hiək ⁸ 鱼～ baʔ ⁷ 土话	入香下入	dziək ⁸ 管～
《十五音》1818	门胶上入	baʔ ⁷ 皮～	入恭下入	dziək ⁸ 肌～
《渡江书》?	门嘉上入	baʔ ⁷ 皮～	入恭上入	dziək ⁸ 猪～
《八音定诀》1894	文佳上入 喜灯下入	baʔ ⁷ 羊～ ²² hik ⁸ 猪～	入香上入	dziək ⁸ 骨～
《语汇》1853	34, 51	baʔ ⁷		
《口才集》1869	30	baʔ ⁷		
《厦英》1873 所记的 厦门话	8-9 124	baʔ ⁷ hik ⁸	183	dziək ⁸ 骨～

表 4 区分口语和书面语，[dziək⁸]作为“肉”字的文读音，是闽南话书面语中肉义词的形式；民国以后闽南话正式语域逐渐萎缩，这个形式也随之逐步淘汰。论及核心词，仍应以口语为准。泉腔韵书《汇音妙悟》兼有两词，漳腔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仅有“脈”。厦腔韵书中，《渡江书》不收“肉 h-”，《八音定诀》则收录，不过《八音定诀》兼收同安等多种变体，并不能代表厦门话词汇的真实情况。较早的《语汇》和《英华口才集》（MacGowan 1869）都只收“脈”一个形式，大部头《厦英》则记录了“肉 h-”。《厦英》[baʔ⁷]有肉、猪肉、果肉、仁儿、（刀）锋、（镜）面、（扇）叶等语义，并举 43 个词或固定搭配（个别其实是词组），可见其构词能产性高，语义引申丰富；[hik⁸]义为 flesh，是不成词语素，是与书面语[dziək⁸]对应的口语形式，举 5 个词，见（11b）。这 5 个词现代厦门的一位母语者（女，调查时 72 岁）都不能理解。

(11)	a	b	c
身体	sin ¹ 身 k ^h u ¹ 躯 (434) ²³	hik ⁸ 肉 sin ¹ 身 (124)	dziək ⁸ 肉 sin ¹ 身 (183)
血亲 I	kut ⁷ 骨 baʔ ⁷ (9)	kut ⁷ 骨 hik ⁸ 肉 ²⁴	kut ⁷ 骨 dziək ⁸ 肉
血亲 II		ts ^h in ¹ 亲 kut ⁷ 骨 hik ⁸ 肉	ts ^h in ¹ 亲 kut ⁷ 骨 dziək ⁸ 肉
很瘦	san ³ 瘠 t ^h i ⁷ t ^h i ⁷ (409)	sia ⁷ 削 kut ⁷ 骨 lo ⁸ 落 hik ⁸ 肉	
一种贝肉		ɔ ¹ lam ² hik ⁸ 肉	

（11a）是口语词，（11c）则是书面语词，均取自《厦英》。身体、血亲 I、很瘦等 3 个词有近义的口语常用词。身体和血亲 I、II 又具有相应的文读形式，“削骨落肉”{很瘦}大概也基于书面语词的格式，即这 4 个词的构词模板是书面语既有的，只是使用

²² 此外，《渡江书》在文三上入[māʔ⁷]也收“肉，皮～”。但《渡江书》的鼻化韵收录了许多应为口元音韵的字，故此音存疑。

²³ 括号内为原书页码，同上一行的不标。

²⁴ 原为俗谚：hiā¹-ti⁶ nā³ kut⁷-hik⁸（兄弟若骨肉），这里取“骨肉”一词。

了语素 hik⁸。可以推测这 4 个词当时是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较文雅的说法²⁵。被替换的单音词可以残留若干由其组成的复合词或派生词，上文已有诸多例证，如安溪魁斗{洗澡}说“洗肉”，潮汕{胖}说“豚豚”，但它们都不具有文雅色彩²⁶。这与（11b）具有文雅色彩截然不同。因此，相比底层残留，（11b）更像是补充型借词（luxury loanword/addition）。或者说，hik⁸是母语者可感知的跟 dziok⁸同源的词，这使得它在形式上具有吸引力，一些文化人便可能借入 hik⁸，用以构成介于俚俗和正式之间的文雅词，以丰富词汇系统。hik⁸并非厦门话被替换的核心词，而是借用的语素，借源自然是泉州方言。泉州方言老派仍有相对文雅的[hik⁸ sin¹]和[ts^hin¹ (sĩ¹生) kut⁷ hik⁸]。

事实上，厦门话虽然在韵母方面更多地与泉州相似，但复杂的连读变调系统则与漳州接近，在 5 个泉漳有差异的核心词上，其早期的第一形式都与漳州相同。这使我们认为厦门话的底层是漳州话，“豚”是显示其底层的核心词，而早期厦门话语素“肉 h-”的文雅色彩，恰好反映了泉州方言作为上层方言的存在。

五、“肉”义词分布与演变揭示的方言接触现象

张梦翰等（2016）以音系为材料，通过计算和模拟，印证了闽南方言从东北向西南传播的移民史和语言史，不过未将莆仙纳入研究。在肉义词变项上，闽地的三支重要移民来源方言——莆仙、泉州、漳州，恰好各自具有一类早期形式，不妨借此管窥移民方言与三支方言的历史关系：

- （12）莆仙“肉 n-”： 潮汕
 泉州“肉 h-”： 雷州、琼文
 漳州“豚”： 台湾、潮汕

这一核心词历史指向，有些与音韵所显示的亲缘关系不一致，如琼文闽语常被视为漳系而非泉系（如何大安 1981）。当然，不能凭一个词的演变确定历史关系。况且，核心词反映的历史关系究竟是谱系继承关系还是接触关系，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佐证，因为核心词可以发生接触替代，近代泉州方言即为一例。或许更有意义的讨论是从肉义词的演变考察方言接触的规律。

5.1 大片移民方言区与小规模移民方言岛的不同演变趋势

首先看几个大片移民方言区的演变，这里暂不考虑哪个形式取胜，而考虑是否涌现出一个共同形式。台湾闽南话基本是清中叶前的泉漳移民带去的（李如龙 1997:103）。今台湾闽南话，音韵等方面的差异仍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言的泉、漳谱系来源，但肉义词变项已经发生推平（leveling）——无论偏漳腔、通行腔还是偏泉腔都一致说“豚”，就连边远的琉球屿、绿岛偏泉腔都是如此。雷州和琼文方言大抵是宋元明的福建移民带

²⁵ 第 5 个词暂且搁置。从构词规律看，ɔ¹ lam²似指一种贝类，但《厦英》不著该词。《厦英》另收同安的同义词 ɔ¹ kui³ hik⁸。

²⁶ 汉语史上核心词替换后被降格保存，不少具有文雅色彩（汪维辉 2018）。这与本文描述的语言演变场景不同，前者通常留下大量经典文本赋予老语素以文雅色彩，而后者并没有这个条件。

至（李新魁 1994:423；陈波 2008:21），它们的移民来源地也不单纯。合理的设想是它们在肉义词变项上曾存在初始变异，但现状是，在我们考察到的方言中无一例外地涌现出了共同形式“肉 h-”（或 h-、零声母变体）。类似的情形是，东南亚的泉漳潮汕方言第一形式多为“脈”（陈晓锦 2014:669,969）。可见至少在已调查的东南亚闽南话里，也相当程度地发生了肉义词的共同化。

粤东的汕尾地区和南澳岛东的云澳是小规模的漳州方言岛。云澳继承了漳州的形式，说“脈”[baʔ⁷]。汕尾地区（常称“海陆丰”）的闽南话也属于漳州方言（郑至君、郭必之 2017），其人口主要是明初至清初从漳州迁入的，与更早从闽地分化的潮汕方言不同。今汕尾、陆丰仍以“脈”为第一形式，海丰的第一形式则替换为[niok⁸]，“脈”退居第二形式。[niok⁸]是混成形式，其声母借自潮汕的[nek⁸]，韵母则取自本有的文读形式-iok⁸（漳州[dziok⁸]）。但这一演变不能视为只是替换了文读音的声母，因为文读语素本非口语核心词，需要将这一文读语素的语义、语法进行改造。所以，最好将其分析为借用潮汕的[nek⁸]，并在语音上作了整合（integration），以文读韵母代之。

明清之际迁往粤桂赣三省的多个漳腔方言岛，今肉义词的说法见（13）。由于漳州一直只说“脈”，可推定这些方言迁出时肉义词没有初始变异。其结果有两类：多数方言继承了“脈”，如（13a），其语音的差别都由音变造成。少数方言从周边借入新词，如（13b）的乐昌塔头坝第一形式是从粤语借入的[ŋau²]，[mãʔ⁷]是第二形式；海丰话第一形式是从潮汕话借入的[niok⁸]，[baʔ⁷]是第二形式。

(13)	a.	云浮罗定	英德鱼咀	郁南连滩	平乐周塘	赣县安平
		ba ³	va ⁵	ba ³	pa ⁵	ma ⁸
	b.	乐昌塔头坝	海丰			
		ŋau ² ; mãʔ ⁷	niok ⁸ ; baʔ ⁷			
(14)		顺昌埔上	苍南灵溪	温州洞头	玉山紫湖	广丰铜山
		hik ⁸ ; baʔ ⁷	hieʔ ⁸	hiək ⁸ ; ba ³	heʔ ⁸	hieʔ ⁸

泉腔方言岛例见（14）。虽然早期泉州方言只说“肉 h-”，但清代已有部分方言使用“脈”，所以不便于判断上述方言迁出时是否具有初始变异。顺昌埔上和温州洞头至今还保留“肉 h-”“脈”两个形式，则可断定二者具有初始变异。埔上主要是清代的泉州内陆三县移民，洞头主要是清代的同安移民。

表 5 比较了大方言区和小方言岛的肉义词演变，可以归纳出两个现象：第一，当存在初始变异时，大方言区基本上推平变异，小方言岛则有保留变异的例子，如埔上和洞头；第二，大方言区没有借入新词的例子，小方言岛则有，如塔头坝和海丰。

²⁷ 汉语较大的方言片似只有四邑粤语肉说“肴”（汪维辉 2018:1077ff），如台山[⁹gau²]（詹伯慧、张日昇 1987:137）。根据蔡玄晖的调查，塔头坝方言没有在三邑粤语区逗留的历史，而是曾在粤西的郁南连滩长期停留。同处粤西的怀集下坊话猪肉说[ŋau⁶]（杨璧菡 2012），“肴”可能有更大的分布范围。中山闽语肉也说“肴”，陈小枫（1996）认为是从粤语借入。

表 5：大方言区与小方言岛的“肉”义词演变比较

情景 演变	大片移民方言区	小规模移民方言岛	
	有初始变异	有初始变异	无初始变异
变异推平	台湾、雷州、琼文、（东南亚）	？	—
变异保留	无	埔上、洞头	—
借入新词	无	？	塔头坝、海丰

如果将核心词的词汇变异视为词汇语义系统高复杂度的表现，则两个现象可以概括为：大方言区倾向于降低复杂度，小方言岛则倾向于保持和增加复杂度。这基本与 Trudgill (2011) 对于人口结构与语言复杂度关系的观察一致。本文的个案显示了小方言岛保持和增加复杂度的两条途径，一是保持内部的变异，即保持语义对立的精细（overspecification）或冗余（redundancy），二是由于小方言岛势力弱，更可能伴随双方言现象，所以容易借入周边强势方言的核心词，进而增加词汇语义系统的复杂度。

如果将泉漳小片看成一个方言区域，那么清代以来泉州方言“脉”的扩张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化、推平、趋同的过程（Winford 2003:82f, 99），这跟表 5 所述大片移民方言区经历的演变本质上一致。“脉”在泉州沿海地区的扩张尤其集中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跟 19 世纪中叶以后厦门话成为区域通语的时间吻合，与厦门邻近的同安、金门的肉义词快速更替也可证实厦门话的影响。内陆三县与漳系方言的接触则更早一些，它们在接受了漳系形式后，转而向东影响了南安等地，在这一推平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可以看到清代尤其是厦门开埠后，直至大约 1990 年闽南话异地接触开始衰弱时，泉漳区域趋同的力量是较大的。由此可见，大片方言区的推平依赖于内部的高交流度，而区域通语的存在会加快这一过程。潮汕亦经历了变异的推平，但其机制是词汇语义系统内部的简化。台湾、雷琼、东南亚闽南话早期的推平机制，可从二者中得到启发。

当然，每一种方言在某个变项上的演变机制及最终结果是一个优选的过程，牵涉到该变项的显性程度（Zeng 2018）、变体本身的吸引力（Johanson 2002）、语言权势等诸多因素，不是仅凭人口结构就能决定的。所以对于各移民方言为什么选择了某形式而非另一个，本文不作过多的解释。

5.2 混合方言与混成形式

尤溪西洋、中仙具有混成形式²⁸。从图 1a 可见，它们分布在地理的边缘，是混合方言或过渡方言。

尤溪境内 7 种方言的肉义词如（15）所示。鸭、{躲}（“覷”）都是共同闽南语喉塞尾阴入调（如厦门），且“鸭”韵母同“脉”，“覷”声母同“脉”，故一比较。尤溪（城关）、新桥、街面、汤川的“脉”与另两词对应整齐，“脉”是符合规则的读音；其中新桥阴入并入阴去，汤川部分阴入归阴去。西洋的第一形式是[na⁷]，声母 n-，声调入声（不分阴阳），来源于闽东的“肉”，而韵母-a 来自“脉”；还有读为阴去的语音变体，是受

²⁸ 岩田礼（2007）称“混淆形式”。吕晓玲（2016）指出泉州方言的给予义动词也有音节内混成现象，称“语音感染”。

第二形式“脈”[ma⁵]牵引产生的。[ma⁵]是“脈”的规则读音。中仙部分浊入归阴平，部分清入归阴去，[ma¹]声母韵母都源自“脈”，但声调例外地同部分浊入一道归阴平，正符合“肉”的调类，我们也将其视为混成形式。洋中属闽东方言，肉义词是闽东的形式。

(15)	尤溪	新桥	街面	汤川	西洋	中仙	洋中	厦门
肉	ma ⁷	ma ⁵	ba ⁷	ma ⁵	na ⁷ /na ⁵ /ma ⁵	ma ¹	(ny ⁷) ⁸	ba ⁷
鸭	a ⁷	a ⁵	a ⁷	a ⁵	a ⁵	a ⁵	a ⁷	a ⁷
躲	mī ⁷	(tu ²)	be ⁷	me ⁵	me ⁵	me ⁵	(miŋ ¹)	bi ⁷

最后讨论“闽客混合方言”万安话的肉义词[mo⁶]。如(16)，万安、梧宅、松洋“脈”的声母（万安 m： 泉漳 b）、韵母、声调（阴入与阳去合并）都是规则对应，不是混成形式。但是，万安、梧宅的韵母成为-o 并非自然音变。与相邻的连城县城关的客家话（何纯惠 2014）及漳州闽南话作比较，显然万安等方言的韵类划分与连城一致，且万安、梧宅和连城都读-o(?)；漳州则分为两个韵类（不计舒促），咸摄一二等为-a⁷，假、梗摄二等多为-ε(?)。如果我们赞成 Branner (1999:98) 的分析，即万安等方言本质上是闽语，并受到客家话的强烈影响，那么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接触音变的解释：万安的闽南祖语的两个韵类在客家话的影响下合并，且音移成和连城同音的-o。该韵类有闽南不说的词，如“拿”；也有客家不说的词，如“脈”。从结果看，“脈”形成规则对应；但从动因看，*a⁷>o 离不开与客家话的接触，即便客家本身并不说“脈”。

(16)	万安	梧宅	松洋	梨岭	下村	连城	漳州
肉	mo ⁶	mo ⁶	ma ⁶	(ɲiəʔ ⁸)	(ɲiɔʔ ⁸)	(niə ⁶)	ba ⁷
蜡咸开一盞	lo ⁷ ⁸	lo ⁷ ⁸	la ⁷ ⁸	lɔə ⁷ ⁸	lɔ ⁷ ⁸	lo ⁵	la ⁷ ⁸
鸭咸开二狎	o ⁶	o ⁶	a ⁶	ɔə ⁷	ɔ ⁶	o ⁶	a ⁷
茶假开二麻	tso ²	tso ²	tsa ²	tsʰɔə ²	tsɔ ²	tsʰo ²	tɛ ²
拿假开二麻	—	no ¹	na ¹	noʊ ¹	no ¹	no ¹	(tʰe ⁷) ⁸
客梗开二陌	kʰo ⁶	kʰo ⁶	kʰa ⁶	kʰɔə ⁷	kʰɔ ⁶	kʰo ⁶	kʰɛ ⁷

值得一提的是，梨岭的肉义词是“肉”，和下村、连城相同，但有“脈”[mɔəʔ⁷]用于指“月（肉）字旁”（Branner 1999:297）。这和远隔的潮汕呈现惊人的平行。梨岭可能和潮汕一样，“脈”在肉义位上被淘汰，但保存了语素并获得了语义分工。此外，崔荣昌（2002）调查了重庆大足区天山乡徐姓方言点，他们在乾隆 17 年（1752）从漳州府万安里（今万安）迁至大足，今已转用西南官话，“仅在部分常用语词中保留着闽语的特色”。在所列的约一百个具有闽语特色的词中，就有肉义词[ma⁵³ ma⁵³]（调类不明）。一种可能是，徐姓的祖籍地恰在离漳州较近的地方，如松洋；另一种可能是，早期万安一带方言“脈”（及所在韵类）读-a(?)的地理范围比今天更大。

总之，混成形式的成因各异。西洋涉及“肉”和“脈”语音的相互牵引。中仙涉及声调的类推。5.1 讨论的海丰话，它借入潮汕的 nek⁸ 时将其韵母改换成本有的文读音韵母-iok⁸。万安话“脈”的韵母受邻近客家话影响从*-a⁷变成-o，在词汇层面不造成例外

的混成形式，但在音系层面显示出接触的性质。

六、结论

在历史文献之外，地理分布、早期分化的方言，共时的代际差异（如泉州沿海地区）、构词变异（如潮汕话复合词残余）、语义变异（如早期厦门话“肉 h-”的文雅色彩）都是颇具效力的词汇演变证据。本文是对这套方法的综合运用。

广义闽南方言肉义词可归纳为三类形式：“脉”“肉 h-”“肉 n-”。h-是 n-发生擦化音变的结果，二者处在同一历史层次，“脉”可能是非汉语底层词或借词。其分布和演变特点包括：（1）泉州方言早期不说“脉”，大约清代以来“脉”从西、南两个方向逐步扩散，在部分方言取代“肉 n-”，部分方言由于闽南话的异地交流度降低而中止扩散。

（2）潮汕方言 19 世纪以“肉 n-”为第一形式，以“脉”为第二形式，而后有标的“脉”被淘汰。（3）厦门话的肉义词一直是“脉”。（4）闽南迁出的大方言区，台湾和雷琼都推平初始变异，涌现出区域共同的肉义词；而小方言岛，在有初始变异时可能保存变异，并可能从周边借入新的肉义词。泉州接受“脉”的扩散也可视为泉漳方言的区域推平。

（5）混成形式多出现在过渡或混合方言中。

肉义词的分布暗示了莆仙和潮汕，泉州和雷琼，漳州和台湾、潮汕的历史关系，有待于其他语言证据的检视。

附记：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 AutoNavi-GS(2019)6379 号）。本文第 3 章由笔者在曾师晓渝教授指导下的本科毕业论文改写而成，相关部分曾在“语言变异与演变”青年学者工作坊（2018，上海）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写作过程中承蒙远藤光晓教授、黄河博士、刘巍、鄢卓、刘欣、刘京杰、林旭娜、贺家豪提供帮助；曾晓渝教授、雷力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张泓玮与笔者讨论了注 21 的翻译问题。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3《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
蔡俊明 1991《潮州方言词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蔡玄晖 2009《珠江流域五个漳腔闽南方言岛调查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柴田武 2018《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保亚、汪锋 2006《论核心语素表的确立——以上古汉语为例》，《语言学论丛》第 33 辑。
陈波 2008《海南方言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
陈晓锦 2014《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
陈筱琪 2008《广东陆丰闽南方言音韵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陈筱琪 2019《闽南西片方言音韵研究》，上海：中西书局。
陈云龙 2012《粤西闽语音变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云龙、蔡蓝 2005《徐闻(下洋)闽语的声韵调》，《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

- 陈小枫 1996《略论粤方言对中山闽语词汇系统的影响》，《语文研究》第4期。
-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正统 2007《闽南话漳腔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崔荣昌 2002《四川境内的闽方言》，见李如龙主编《汉语方言研究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戴由武、戴汉辉 1994《电白方言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邓晓华 1994《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第3期。
- 丁度 [宋]《集韵》，钦定四库全书本。
- 丁月香 2017《江西玉山县紫湖闽南话语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杜依倩 2007《海口方言(老派)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
-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8《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高润 2010《汕尾城区渔民新村方言词汇调查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顾野王 [梁]《大广益会玉篇》，张氏泽存堂刊宋本玉篇本。
- 郭必之 2016《大田前路话在闽语中的位置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见郑伟主编《边界方言语音与音系演变论集》，上海：中西书局。
- 何纯惠 2014《闽西中片客家话与混合方言音韵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何大安 1981《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
- 胡松柏 1998《赣东北闽南方言略说》，《方言》第2期。
- 黄典诚 1985《闽南方言中的上古汉语单词残余》，《厦门大学学报》增刊。
- 黄河 2017《社会地理语言学视野下的微观方言研究——以宜兴方言为个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黄谦 1800《汇音妙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影印上海萃英·大一统书局 1905年影印本。
- 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江市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李健 2014《吴化粤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如龙 1997《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龙 1999《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龙、刘福铸、吴华英、黄国城 2019《莆仙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其兴 2015《尤溪县方言志》，福州：海峡书局。
- 李新魁 1994《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永明 1959《潮州方言》，北京：中华书局。
- 梁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梁猷刚 1986《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方言》第2期。
- 林华东、徐贺君 2009《闽南地区双言现象与语言生活和谐问题——以泉州市区市民语言使用状况为例》，《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林连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伦伦 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 林伦伦 2006《粤西闽语雷州话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林伦伦、林春雨 2007《广东南澳岛方言语音词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刘新中 2004《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秀雪 2004《语言演变与历史地理因素——莆仙方言:闽东与闽南的汇集》，国立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媛媛 2017《茂名鳌头、袂花闽语语音研究》，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2《龙岩地区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志海 2009《海丰方言辞典》，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 吕晓玲 2016《近代泉州、厦门方言给予义动词读音的演变——兼谈漳州方言的给予义动词“互”》，《中国语文》第5期。

- 梅祖麟 2007《闽语“舆”、“浴”两字阳调 h-声母的来源——比较方言中所见的*gl-复辅音》，《方言》第4期。
- 秋谷裕幸 2018《闽东区宁德方言音韵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 泉州市统计局编《泉州统计年鉴 2017》。
http://tjj.quanzhou.gov.cn/tjzl/tjsj/ndsj/201709/t20170925_541618.htm
- 邵兰珠 2016《广东吉兆话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宋婕妤 2015《赣南闽南方言安平话语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汪维辉 2018《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汪维辉 2006《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第2期。
- 王育德 2002《闽音系研究》，台北：前卫出版社。
- 温端政 1991《苍南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谢秀岚 1818《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影印文林堂本。
- 辛世彪 2013《海南闽语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鄢卓 2021《壮语核心名词的语言地图及解释》，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岩田礼 2007《方言接触及混淆形式的产生——论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历史演变》，*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117-146.
- 佚名 1894《八音定诀》，厦门汇文书局 1924 年石印本。
- 佚名 1915《击木知音》，瑞成书局本。
- 佚名 [年代不详]《渡江书十五音》，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影印抄本。
- 曾南逸 2013《泉厦方言音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曾蓉蓉 2008《浙南洞头闽南方言语音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 张光宇 1989《闽方言古次浊声母的白读 h-和 s-》，《中国语文》第4期。
- 张梦翰、金健、潘悟云 2016《闽南方言传播模式的计量分析》，《语言科学》第5期。
- 张屏生 2007《台湾地区汉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台南：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
- 张盛裕 1981《潮阳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第1期。
- 张秀珍 2009《宜州阳山话同音字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
- 张以文 2017《福建诏安闽南方言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振兴 1984《福建省龙岩市境内闽南话与客家话的分界》，《方言》第3期。
- 赵加 1991《试探闽方言中的壮侗语底层——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
- 郑至君、郭必之 2017《粤东闽南语的分群》，《语言学论丛》第56辑。
- 中嶋幹起 2002《海南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Bodman, N. C. 1985. 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ua. *Oceanic Linguistics Special Publications* 20, 2-20.
- Branner, D. P. 1999.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 and Hakka*.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Dean, W.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Bangkok: —.
- Doty, E. 1853.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Canton: S. Wells Williams.
- Douglas, C.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Duffus, W.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agyal, Z., S. Swarup, A. M. Escobar, L. Gasser & K. Lakkaraju. 2010.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twork roles in language change. *Lingua* 120(8), 2061-2079.
- Fielde, A.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Franco, K., D. Geeraerts, D. Speelman & R. van Hout. 2019. Maps, meanings and loanwords: The interaction of geography and semantics in lexical borrowing. *Journal of Linguistic Geography* 7(1), 14-32.
- Johanson, L. 2002. Contact-induced change in a code-copying framework. In M. C. Jones, E. Esch(eds.) *Language Change*.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85-313.
- Klöter, H. 2011. *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 Lim, H. S.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 MacGowan, J. 1869. *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HongKong: De Souza & Co.
- Norman, J.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quest, P. 2007. *A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Hl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Schlegel, G. 1890.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Deel IV)*. Leiden: Brill.
- Swadesh, M. 1971.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Tadmor, U. 2009.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Findings and results. In M. Haspelmath, U. Tadmor(eds.) *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55-75.
- Trudgill, P. 2011.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Loon, P.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Part 2). *Asia Major* 13, 95-186.
- Weinreich, U.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Winford, 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 Yue-Hashimoto, A. 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Hong Kong: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Zeng, X. 2018. A case study of dialect contact of early Mandarin. *Lingua* 208, 31-43.

Southern Min Words for “Flesh”: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ZENG Zhic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words for “flesh” in Southern Min (embracing Puxian, Quanzhang, Datian, Chaoshan, Leizhou, and Qiongwen in a broader sense) is displayed, and changes are implicit by examin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semantic and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early separated dialect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脈” (e.g., [baʔ⁷]), “肉 h-”, and “肉 n-” are original forms in Zhangzhou, Quanzhou, and Puxian, respectivel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Quanzhou has undergone the geographical diffusion of “脈”, and Chaoshan has lost “脈” in favor of “肉 n-”. Major dialects, such as Taiwanese, Leizhou, and Qiongwen, generally underwent leveling, whereas some minor dialects retained the inherited variants or gained variants through borrowing. Furthermore, the cases and processes of intra-syllabic contamination are covered.

汉语方言中的反义形容词比较研究——以“高/矮”为例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汉语方言的反义形容词“〈个子〉高”和“〈个子〉矮”。表〈个子高〉义的词语经历了从“长”到“高”的替换，这一变化也意味着从“〈长 long〉义词兼指〈个子高〉义”到“〈高 high〉义词兼指〈个子高〉义”的系统变化。表〈个子矮〉义的词语经历了从“短”到“矮”的替换，也就是从“〈短 short〉义词兼指〈个子矮〉义”到“指称〈个子矮〉义的专用词”的系统变化。“矮”一词还从〈个子矮〉义逆流到上位概念〈短〉义或〈低〉义，导致了另一个系统变化。

一、前言

“高一低/矮”和“长一短”是现代汉语的基本反义形容词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释义如下：

高：①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跟“低”相对）。②高度：身高。

低：①从下向上距离小；离地面近（跟“高”相对）。

矮：①身材短。②高度小。

长：①两端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

短：①两端之间的距离小（跟“长”相对）。

值得注意的是：（一）“高一低”和“长一短”的释义是配对的，但是就人的身高而言，“高”兼指〈个子高〉，〈个子矮〉则使用专用的词语“矮”，从词汇系统的角度来说存在着不对称性²；（二）“高/低”和“长/短”虽然视角不同，但都表示距离的大小，有互补的关系；着眼于方言差异，两者有交叉，尤其是在“人的身高”这一语义上。至于第二点，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下文简称《地图集》）中收录了与“高/矮”有关的三幅方言地图：164图“高指身高”、165图“矮指身高”以及166图“‘长’的词义”（曹志耘2008）。从中不难发现〈个子高〉和〈长〉有一定的关联，但遗憾的是《地图集》没有收入〈高/低〉和〈长/短〉的信息。因此，本文将绘制表〈高 high〉、〈低 low〉、〈长 long〉、〈短 short〉义的词形分布地图，对《地图集》所收录的三幅方言地图加以地理语言学分析，进而初步梳理出〈个子高/矮〉义词的类型以及方言差异。其主要目的在于阐明有关〈个子高〉和〈个子矮〉义词语的系统变化。

¹ “ ” 内表示词语形式，〈 〉内表示词义。

² 汉语学界早就注意到单音反义词在词义、句法、搭配等诸多方面的不对称性。因为材料有限，本文着重分析词汇的系统性，不涉及句法、搭配等层面。

二、方言地图及其词形分类

2.1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及其问题

除《地图集》所收录的地图以外，本文还使用 5 幅方言地图：地图 1〈高 high〉的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2〈长 long〉的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3〈低 low〉的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4〈短 short〉的词形分布地图；地图 5〈个子高/矮〉义词的类型。此 5 幅地图都是利用 ArcGIS 系统绘制而成的，地图 1—4 的方言材料来自于已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地图 5 是根据《地图集》164 图、165 图绘制的概括性地图。

由于单音形容词方言差异不大，调查报告往往失收有关单音形容词的信息，并且很少对单音形容词标明词义或用例，在不少情况下没能确定该词形是否是我们所要的信息。因此，地图 1—4 的密度并不足够。本文将基本根据《地图集》所收录的地图进行分析，其它地图只作参考信息。

2.2 词形分类与地图符号

关于地图 1—4，为了对比的方便，尽量采用与《地图集》同样的分类法和符号。符号的颜色表示大类，形状表示小类。至于分布地点少的“其它”词形，用黑色的不同形状标出。

符号	〈高〉〈长〉	〈低〉〈短〉	符号	〈高〉〈长〉	〈低〉〈短〉
黑圈	高	矮	浅蓝色	悬	低
红色	长	短	绿色	髡	矮
茶色	猛	下	黑色	其它	其它

表〈个子高/矮〉义的词形可以归纳出以下 3 种主要来源：（一）来自〈高/低〉义词形；（二）来自〈长/短〉义词形；（三）专用的词语形式。还有少数方言点使用来自〈大/小〉义的词形。下面本文将就来源的不同进行分析。

关于地图 5，根据上述的来源梳理出〈个子高/矮〉义词的类型。我们先按照〈个子高〉义词的来源分为 4 大类，之后根据〈个子矮〉义词的来源进行分类。符号的颜色表示〈个子高〉义词的信息，形状表示〈个子矮〉义词的信息。如果并用两种词形，本文将它看成两种体系的并存，在同一个地点标出两种符号。例如，“高/长—矮”（即〈个子高〉并用“高”和“长”，〈个子矮〉只用“矮”）标出“高一矮”和“长一矮”两种类型的符号。

三、方言地图的分析

3.1 〈个子高〉的分析（《地图集》164 图、166 图）

根据《地图集》164 图（“高指身高”），大部分的方言点都采用“高”。福建东部、台湾、海南岛以及雷州半岛分布着“悬”，呈现出远隔分布。“悬”的分布区域基本与闽语区一致，

此远隔分布很可能是移民所致。“高”和“悬”都来自表〈高〉义的词形，其分布区域大致与〈高〉义词的“高”和“悬”重复（参看地图 1）。



地图 1 〈高 high〉的词形分布地图



地图 2 〈长 long〉的词形分布地图

表〈个子高〉义的“长”集中分布在江苏南部至浙江，如果把并用“长”和其它词形（“高”或“猛”）的方言点包括进去的话，其分布区域从江浙地区连续到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还零散分布于四川。此分布倾向也可以从《地图集》166 图（“长”的

词义”)〈高指身高〉和〈①长②高指身高〉的分布区域看出。加之,分布在江西的“猛”也来自于〈长〉义词形(参看地图2),说明〈长〉义的词形兼指〈个子高〉义,这一系统曾在这一带相当普遍。

从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看,“高”和“长”似乎呈现出ABA分布,即“高”是A,“长”则是B。“长”的分布情况也类似“长江型”³。ABA分布或长江型分布都暗示着“长”是新兴的词形,“高”比“长”古老。可是,“长”的分布区域附近还有若干方言点不说“长”而说“高”,但还用由“长”构成的复音词。

湖南长沙:高跟“低”或“矮”相对 长子=高子高个儿的人(鲍厚星等1993:151、237)

江苏启东:身材高矮的“高”,也可说“长”,但“长”只能作定语,不能作谓语,“个子高”一般不说“个子长”。(卢今元2007:412)

这些方言点的“长”不能单用,只出现在“长子”等固定的词语中,此现象可以看成是“长”的痕迹。据此可以推测,表〈个子高〉义的“长”的分布区域曾经更为广泛,也可以说“长”至少在这一带是古老的形式,后来被“高”所取代。

根据汪维辉教授的历史文献研究,上古汉语指人的身高说“长”,直到元曲中只见“身长”,在明代的《封神演义》中“身高”才较为多见。反义复合词“高矮”在清代还没见到,要到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才有用例。“高”在北方地区取代“长”应该是清代以后的事(汪维辉2010/2018:326-327)。

福建还有若干方言点采用“𡗗”,是指〈个子高〉义的专用词语。《集韵·号韵》郎到切:“𡗗𡗗,身长”。但是分布区域只限于福建,与〈个子矮〉义的专用词“矮”和“矬”相比,存在着不平衡性。

3.2 〈个子矮〉的分析(《地图集》165图)

根据《地图集》165图(“矮指身高”),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矮”,还有许多方言点并用“矮”和其它词形。“矬”分布于北京、河北、辽宁等北方地区,还分布于宁夏和甘肃。

“低”分布于山西、陕西至河南,还分布于广西、海南岛等南方地区。“低”是表〈低〉义的主导词(参看地图3)。根据地图5,〈个子矮〉义的“低”是与“高”配对的(B-1-1“高一低”),没有例外⁴。笔者认为,“低”进入到〈个子矮〉义词的动因可能是〈个子高〉义词“高”的发生所至。

表〈个子矮〉义的“短”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还零散分布于安徽、江西、湖北、甘肃。“短”来自表〈短〉义的词形(参看地图4),与“长”相对。根据地图5,A-1-1“长—短”集中分布于浙江,只有56个方言点;〈个子高〉义的“长”除A-1-1“长—短”以外,还有110个方言点的A-2-1“长—矮”。可见〈个子矮〉义词“短”的分布区域与〈个

³ 至于长江型的含义,参看岩田(2009)。

⁴ C-2-1“大一低”分布于青海门源、同仁,但这两个方言点都是C-2-1、B-1-1“高一低”和B-5-1“高一矮”重复的,实际使用情况是:〈个子高〉高/大;〈个子矮〉低/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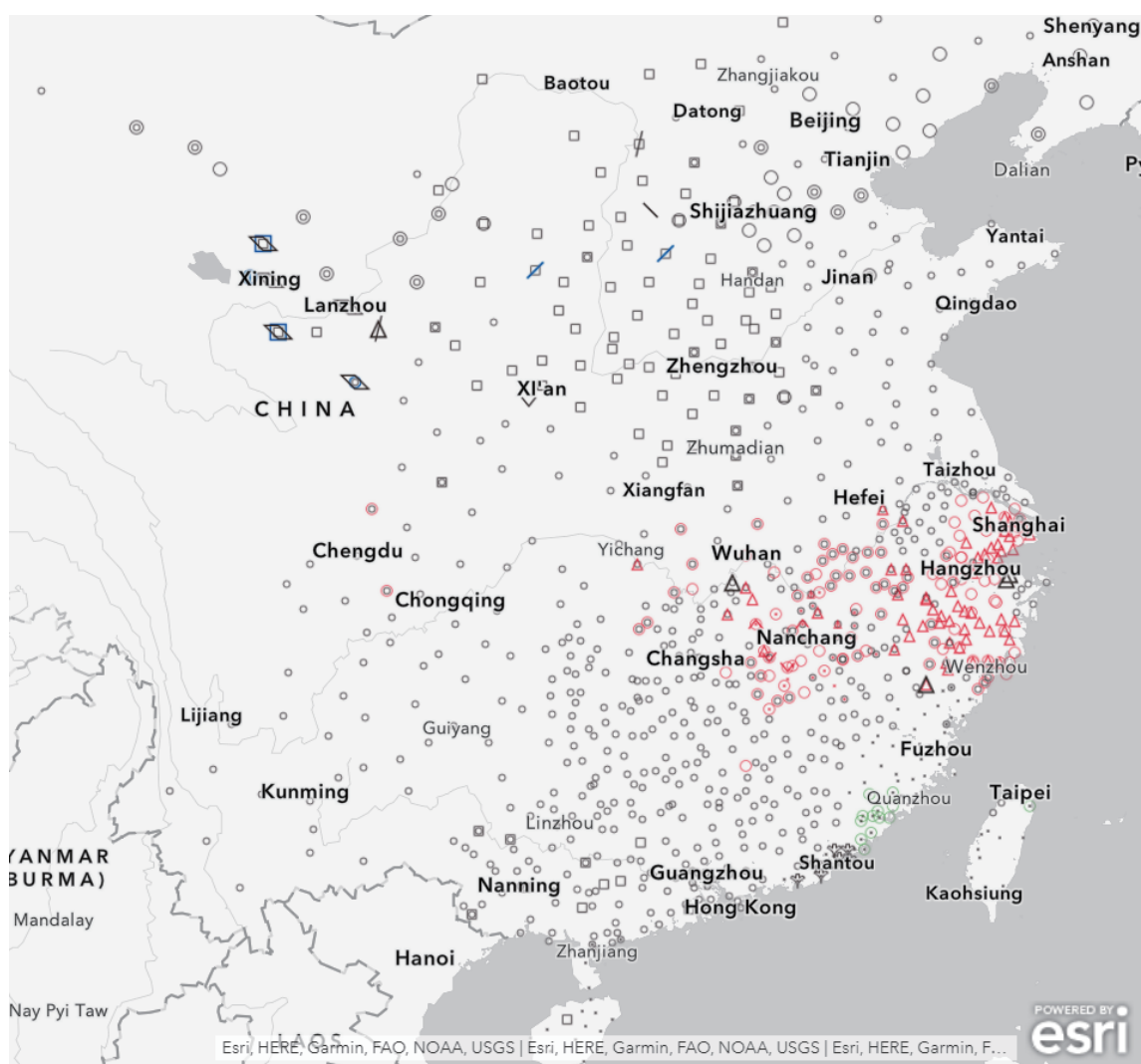
地图3 〈低 low〉的词形分布地图



地图4 〈短 short〉的词形分布地图

子高〉义的“长”相比大为缩小。

根据历史文献研究，上古汉语用“短”表示〈个子矮〉。“矮”是指〈个子矮〉义的专用词，至晚在三国时期出现，只是书写形式不作“矮”，而写成“矮”（真大成 2018: 617）。“矮”也是〈个子矮〉义的专用词，早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元代以前例子并不多，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北方方言词。“矮”至迟到南宋在通语中大概已经取代了“短”（汪维辉



地图 5 〈个子高/矮〉义词的类型

A 〈长〉系

A-1 〈长〉—〈短〉

△ A-1-1 长—短

▲ A-1-2 猛—短

A-2 〈长〉—专用词

○ A-2-1 长—矮

· A-2-2 猛—矮

A-3 〈长〉—其它

✓ A-3-1 长—囊

△ A-3-2 猛—囊

B 〈高〉系

B-1 〈高〉—〈低〉

□ B-1-1 高一低

✦ B-1-2 悬—下

B-2 〈高〉—〈短〉

△ B-2-1 高一短

B-3 〈高〉—专用词

○ B-3-1 高一矮

○ B-3-2 高一矮

· B-3-3 悬—矮

B-4 〈高〉—〈小〉

/ B-4-1 高一小

B-5 〈高〉—其它

◇ B-5-1 高一朵

\\ B-5-2 高一猴

✓ B-5-3 高一囊

C 〈大〉系

C-1 〈大〉—〈小〉

/ C-1-1 大一小

C-2 〈大〉—〈低〉

□ C-2-1 大一低

C-3 〈大〉—专用词

○ C-3-1 大一矮

① C-3-2 大一矮

D 专用词

D-1 专用词—专用词

○ D-1-1 膀—矮

2010/2018: 328—330)。如上文所述,〈个子高〉义词从“长”到“高”的替换是清代以后才发生的,从“短”到“矮”的替换较之早得多。替换的时代不同可能反映在现代方言的分布格局里。

在〈个子矮〉义的词语中,专用词“矮”和“矬”占多数,〈个子高〉义的专用词语相对来说并不发达,现在只用“髡”一词。不平衡的原因有可能在于〈个子矮〉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从河北到东北有不少方言点并用“矮”和“矬”,其中“矬”有时候用作贬义词。据此可以推测,〈个子矮〉义的专用词有可能从贬义词或骂人的话发展成中性词。

值得注意的是,指〈个子矮〉义的通用词“矮”还进入到〈低〉义或〈短〉义词。根据地图 3,中国东南地区有不少方言点用“矮”表示〈低〉义;根据地图 4,江西北部有若干方言点以“矮”表〈短〉义。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从下位概念〈个子矮〉到上位概念〈低〉或〈短〉的逆流现象。

四、结语

本文通过地理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汉语方言的反义形容词“(个子)高”和“(个子)矮”。表〈个子高〉义的词语经历了从“长”到“高”的替换,这一变化也意味着从“〈长〉义词兼指〈个子高〉义”到“〈高〉义词兼指〈个子高〉义”的系统变化。表〈个子矮〉义的词语经历了从“短”到“矮”的替换,也就是从“〈短〉义词兼指〈个子矮〉义”到“〈个子矮〉义专用词”的系统变化。“矮”还从〈个子矮〉义逆流到〈短〉义或〈低〉义,导致了另一个系统变化。

由于材料有限,本文没能充分分析〈高/低〉、〈长/短〉义的词形分布地图。如果对这一系列词语加以分析,就能够弄清更为全面的系统变化。这方面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附记: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中国语言地理比较研究论坛”(2020 年 12 月 6 日,online)上进行过口头报告,承蒙远藤光晓教授、邢向东教授、岩田礼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概由笔者本人负责。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JSPS Grants-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KAKENHI) 18H00670、19K13187 的资助。

参考文献

-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1993《长沙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编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商务印书馆
卢今元 2007《吕四方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汪维辉 2010/2018《汉语中的十组表量形容词》,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商务印书馆;《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浙江大学出版社:314-345
岩田礼主编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真大成 2018 《谈当前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四个问题》，《中国语文》2018（5）：606-620

Comparative Study on Antonymous Adjectives in Sinitic: The Case of “Tall/Short”

Suzuki, Fumiki

Nanz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antonymous adjectives denoting “tall” and “short” in Sinitic. The word form for “tall” in Ancient Chinese was *chang* 长, which denoted both “long” and “tall.” *Chang* was replaced by *gao* 高, which denoted both “high” and “tall.” This lexical change from *chang* to *gao* also implies a systematical change in antonymous adjectives. The word form for “short” experienced a lexical change from *duan* 短 to *ai* 矮. *Duan* denoted both “short in length” and “short in height,” and *ai* is an exclusive word form denoting “short in height.” *Ai* 矮 in some dialects further meant “short in length” or “low,” illustrating another systematical change.

徐州方言母语者所使用的亲属称谓“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由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而产生的词汇变异¹⁾

日高知惠实

金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将根据以徐州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的资料，对亲属称谓“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的词汇变异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观点来考察语言演变的过程：（一）徐州城区的年龄差异；（二）周边乡镇的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三）城乡的比较。发音人为1930年代至2000年代出生的345人。为了将这些资料可视化，本文还绘制了“3D语言地图”。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有新词形的产生，也观察到了因为回避同音冲突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互补分布情况。

一、前言

《徐州方言词典》所记录的方言，以徐州市区老派说法为标准（苏晓青·吕永卫1996）。说起徐州方言中对“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称谓，在该词典里被记录为“爷爷” $[\text{i}\text{ə}^{55} \cdot \text{i}\text{ə}]$ ²⁾、“奶奶” $[\text{n}\text{ã}^{35} \cdot \text{n}\text{ã}] < [\text{n}\text{e}^{35} \cdot \text{n}\text{e}]$ 、“外爷爷” $[\text{u}\text{e}^{51} \text{i}\text{ə}^{55} \cdot \text{i}\text{ə}] =$ “外老爷” $[\text{u}\text{e}^{51} \text{l}\text{o}^{35} \cdot \text{i}\text{ə}]$ 、“外奶奶” $[\text{u}\text{e}^{51} \text{n}\text{e}^{35} \cdot \text{n}\text{e}]$ 。但要是将青年人所说的方言与周边乡镇的方言也纳入到视野当中，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变异。

因此本文将根据徐州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的资料，对亲属称谓“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面称形式的词汇变异来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观点来考察语言演变的过程。（一）徐州城区的年龄差异；（二）周边乡镇的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三）城乡的比较。岩田2012中曾探讨过关于全国性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地理分布，还收录了广域语言地图，我们也将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随时参照此文。

话说回来，笔者之所以将本文题目命名为“徐州方言母语者所使用的亲属称谓”，而不为“徐州方言的亲属称谓”，是因为有些发音人虽然生长在徐州市区，平时也常使用徐州方言，但是所使用的词语是吸收了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后转换为适用于徐州方言声韵调系统的借用词，这严格来说不是徐州方言词汇。可是如果故意排除这些“异物”，将分析对象只限定于“纯粹”的徐州方言词语，这并不切合现状。本文要探讨的是近年来徐州方言母语者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况。

¹⁾ 本文在“日本地理言语学会第一届大会”（2019年10月6日，东京：青山学院大学）上宣读过的内容的基础之上，另外又补充了一些关于徐州城区语言状况的分析。

²⁾ 严格来说，《徐州方言词典》没有设定独立的“祖父”这一条目，相关内容在第143页有如下记载：【爷爷奶奶】 $[\text{i}\text{ə}^{55} \cdot \text{i}\text{ə} \text{n}\text{ã}^{35} \cdot \text{n}\text{ã}]$ 儿媳妇比照自己小孩儿的口吻称“公公”、“婆婆”。

二、语言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资料是 2015 年 8 月 9 月、2016 年 3 月及 2019 年 3 月，共三次在徐州进行实地调查时收集的。发音人 345 人均生长在徐州市区³⁾，其中 163 人为城区人（即旧徐州市区），182 人为乡镇人（即旧铜山县）。如图 1 所示，环绕旧市区周围的都是旧铜山县。两地的界线以《徐州市行政区划》所显示的 1988 年 12 月的行政区为准。离市中心东北方向约四十公里的旧贾汪区从行政上来说属于旧徐州市区的一个管辖区，但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旧铜山县大泉乡境内。因此笔者破例将旧贾汪区的资料也列入为乡镇的资料。发音人的出生年代为 1930 年代至 2000 年代。关于发音人的城乡分类与年龄分类人数，请参照表 1。

表 1 发音人的城乡分类与年龄分类人数

出生年代	30 年代	40 年代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年代	总数
城区（旧徐州市区）	3	14	26	36	19	33	32	0	163
乡镇（旧铜山县）	13	16	21	31	17	21	61	2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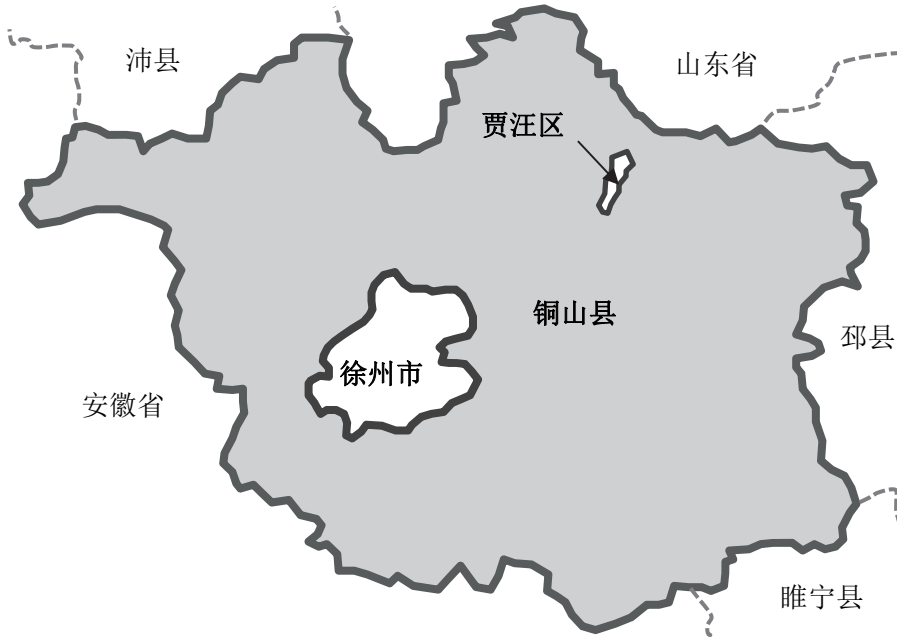


图 1 80 年代的徐州市区和铜山县及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图

³⁾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上世纪 80 年代徐州市区面积只有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2010 年原铜山县撤县并区之后，新划分下来的徐州市区的总面积增加到原来的约十六倍。

三、城区语言使用状况分析

城区面积不大，所以我们不考虑地理差异，仅分析年龄差异。图2至图5表示生长在城区的163位发音人的调查结果。这些折线图的横轴为发音人的出生年代。我们将发音人按照他们的出生年代（1930年代至1990年代）分为7组。纵轴为每个词形在各组中所占的百分比。折线图里使用的各种颜色与第四节呈现的“3D语言地图”中使用的颜色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城区人所回答的“外祖父”“外祖母”词形较多。为了观察大致趋势，这次在各个折线图中只反映主要的4个词形。其他少数回答在解释部分补充说明。

有一些发音人说，由于称呼的对象已不在世或住在远方而没见过面等原因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回答，所以不计算在统计数据里。无回答的人数是“祖父”2人、“祖母”1人、“外祖父”1人、“外祖母”1人。相反，在同一个发音人回答出多个词形时，我们分别计算出了每个词形所占的百分比。

因为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词汇变异，所以除了一些例外，每个词形的语音只表示最典型的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每个词形都存在着多数语音变异，例如说“爷”的发音老派为[iə]，但新派为[ie]。

3.1 祖父

“祖父”称谓没有出现年龄差异，大部分的发音人说“爷爷”（图2）。

还有其他占少数的回答，1位说“老爹”[lɔ³⁵ tie²¹³]，还有1位说“公公”[kuŋ²¹³⁻²¹ kuŋ]，这都不是徐州方言的词汇。我们参照发音人祖父的出生地就会发现，前一位的祖父是江苏宿迁人，后一位的祖父是江苏南通人。宿迁方言将“祖父”叫作“老爹”[lɔ²⁴ tie²¹³]，南通方言叫作“公公”[koŋ⁵³ koŋ⁵³]（《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2015a,b）。这恰恰说明他们吸收了祖父出生地的词形后转换为适用于徐州方言声韵调系统。

3.2 外祖父

“外祖父”称谓出现年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发音人年龄越小，旧形式的“外爷爷”[ue⁵¹ iə⁵⁵ · iə]也随之而减少，新形式的“老爷”[lɔ³⁵ · iə]、“外公”[ue⁵¹ kuŋ²¹³]、“爷爷”[iə⁵⁵ · iə]却随之而增加（图3）。“爷爷奶奶”本来仅指父系祖父母。不过有一些青年人将“祖父母”叫作“爷爷奶奶”，同样也将“外祖父母”叫作“爷爷奶奶”，换句话说，就是不分内外。

另外，还有6位发音人说“外老（爷）”[ue⁵¹ lɔ³⁵ · iə]，这可能跟发音人的外祖父出生地在徐州东部乡镇有关（参照4.2），或者发音人本人特意加上“外”字。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加上表示外亲的成分呢？我们可以推测有以下三个可能性：第一，强调外亲的属性；第二，受到了在中老年层占多数的“外爷爷”称谓的影响；第三，6位当中有3位将“外祖母”叫作“外奶奶”。所以可能是为了保持配对，“外祖父”的词形也被加上了“外”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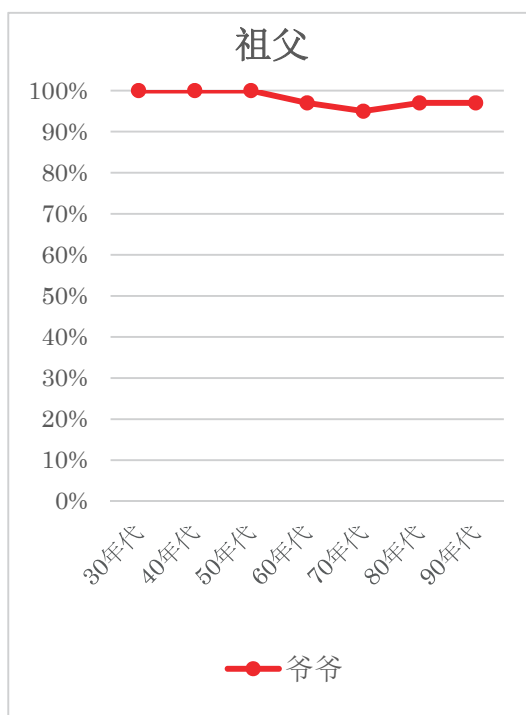


图2 城区“祖父”称谓的年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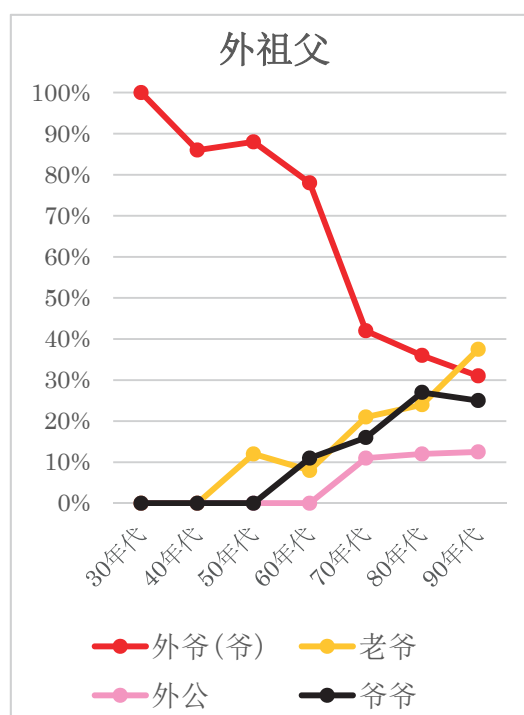


图3 城区“外祖父”称谓的年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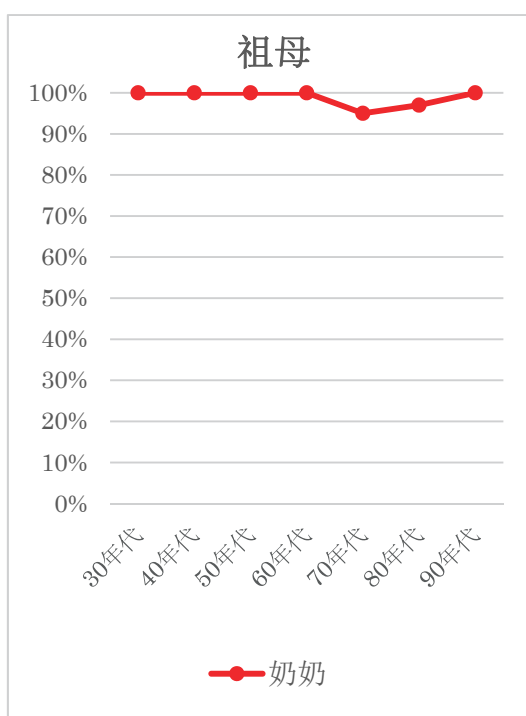


图4 城区“祖母”称谓的年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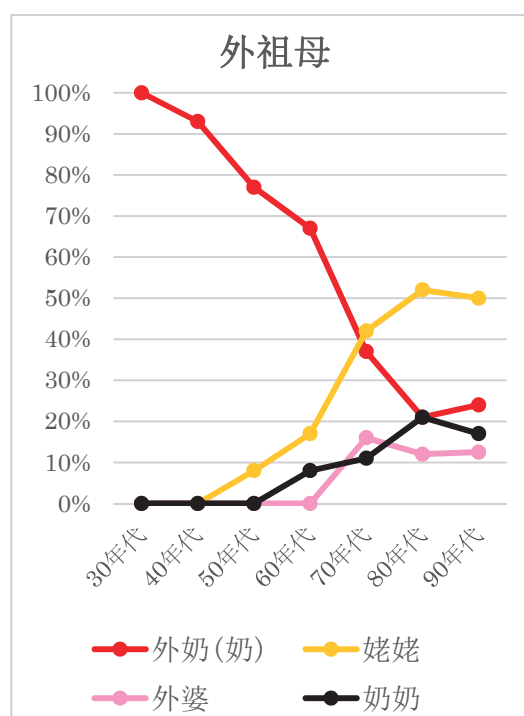


图5 城区“外祖母”称谓的年龄差异

3.3 祖母

“祖母”称谓跟“祖父”称谓一样没有出现年龄差异，大部分的发音人说“奶奶”[nɛ³⁵·

nɛ] (图4)。另外, 还有1位发音人说“婆阿”[pu⁵⁵ a⁵⁵]。这位发音人祖母的出生地是江苏南通, 而南通方言就是将“祖母”叫作“婆阿”[bu²⁴ a²¹]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a)。这个例子也同样可以说明, 亲属称谓果然跟称呼对象的出生地有直接关系。

3.4 外祖母

“外祖母”称谓的每个词形出现频率基本上与“外祖父”很相似, 也就是说, 随着旧形式“外奶奶”[ue⁵¹ ne³⁵ · nɛ]的减少, 新形式的“姥姥”[lɔ³⁵ · lɔ]、“外婆”[ue⁵¹ p^huə⁵⁵]、“奶奶”[ne³⁵ · nɛ]却呈越来越多的趋势(图5)。如前文所述, 将“外祖母”叫作“奶奶”, 也同样是分内外。

另外, 2位发音人说“老娘”[lɔ³⁵ · niaŋ]、4位发音人说“朗娘”[laŋ³⁵ · niaŋ]。“朗娘”的“朗”[laŋ]是由“老娘”的第二音节的声母[n]造成的, 就是所谓的语音同化现象, 也可以说“叠韵化”。调查结果显示, “老娘”、“朗娘”是通常在徐州东部乡镇被使用的词形(参照4.4), 而不是城区的说法。笔者已确认过回答这些词形的发音人均有出生在乡镇的外祖母, 这恰恰又可以说明发音人采用了外祖母出生地的词形。

还有2位说“外朗娘”[ue⁵¹ laŋ³⁵ · niŋ]、1位说“外姥姥”[ue⁵¹ lɔ³⁵ · lɔ]。“朗娘”和“姥姥”已有“外祖母”的意思。另外又加上“外”字的原因, 我们已在“外祖父”词形时考察过。

四、乡镇语言使用状况分析

接着, 我们分析生长在乡镇的182位发音人的调查资料。在每个条目中显示词形的分类(图例)和基于这分类绘制的“3D语言地图”(图6、图8、图10、图11)⁴⁾。图例中出示的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回答该词形的发音人数。

本文所提到的“3D语言地图”是指, 在XY平面上加上Z轴(时间轴), 从而将语言资料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 可以同时展示地理分布和年龄差异。下文中介绍的“3D语言地图”有7个层, 分别表示从30年代出生组到90年代出生组的7个年龄组, 最上层是年龄最大的30年代出生组, 最底层是年龄最小的90年代出生组。不过, 90年代出生组破例还包括了正好2000年出生的2位(参照表1)。

如前文所述, 有一些发音人说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这种情况在地图中用“×”表示。无回答的人数是“祖父”6人、“祖母”5人、“外祖父”7人、“外祖母”8人。有一些发音人说“俺爷”[æ³⁵ ie⁵⁵]等前面加上“俺”字的词形。“俺”是表示“我”的修饰成分。笔者在调查时已向发音人确认过, 这种形式在当面称呼对方时也会使用。

⁴⁾ 日高 2019 已报告过使用“3D 语言地图”的研究成果。并且, 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使“3D 语言地图”360 度转动的动画。今后, 还打算制作专用网页、公开这些动画等资料。

4.1 祖父

“祖父”的词形可以分为3个类型(图6)。A类(●)是“爷”的单音节和重叠形式。B类(▲)是“爷”为词根再加上修饰成分“老”的词形。C类(▼)是“老”的单音节和重叠形式。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A类分布在西部、B·C类分布在东部,呈明显的“东西对立”分布格局(图7)。在同一个东部地区的老年层和中年层(3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组)中出现B类、青年层(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组)中出现C类,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是由“老爷”演变成了“老”。也就是说由于“老爷”的第二音节读为轻声而被弱化引起了词根的脱落,剩下来的“老”成为了词根。“老老”是“老”的重叠形式。根据调查资料,回答“老老”的2位发音人都是90年代出生的。因此“祖父”义的“老老”可以说是在徐州东部乡镇产生的新形式。

A类“爷(爷)”主要分布在西部,不过也渗透到东部的青年层。这就意味着A类在扩散到徐州这一带地区。

4.2 外祖父

“外祖父”的词形可以分为6个类型(图8)。该条目的A类(●)、B类(▲)及C类(▼)就是“祖父”A类、B类及C类的词形之前加上表外亲成分“外”字的形式,分布格局也与“祖父”很相似,但是不完全相同。

因此,为了分析同一个发音人回答的“祖父”和“外祖父”词形搭配是否有“X”和“外X”这一关系,重新绘制了图9。图9的红圈(●)表示“有对应关系”;蓝圈(●)表示“没有对应关系”;绿星(★)表示“不区分‘祖父’和‘外祖父’称谓”,具体来说两边都叫作“爷爷”或“老”。由此可见,“没有对应关系”的分布格局有两个特征。第一,出现在东西对立的分界地区。这应该是由A类与B·C类两个势力的接触,从而失去了词汇系统的平衡性。第二,集中在青年层。这与D类的分布状况有直接关系。

D类“老爷”(◆)主要出现在西南部的青年层。如果我们仅看“老爷”这一词形,很容易想到这是由于B类“外老爷”的“外”字脱落而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在东部零散分布的“老爷”有可能经历过这种演变过程。但是西南部的老年层和中年层主要使用的是“外爷爷”,从词形来看,青年层的“老爷”不可能直接从“外爷爷”演变而产生。我们观察岩田2012所收录的关于“外祖父”的广域语言地图就会发现,与徐州铜山县西南部邻接的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地区将“外祖父”叫作“老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南部青年层的“老爷”是从周边地区传播过来或者受到普通话影响而流入的。

另外,还有少数回答。E类的“老”(◆)应该是C类“外老”的第一音节脱掉或者D类“老爷”的第二音节脱掉后的词形,“老老”是“老”的重叠形式。F类(★)是将“祖父”“外祖父”都叫作“爷爷”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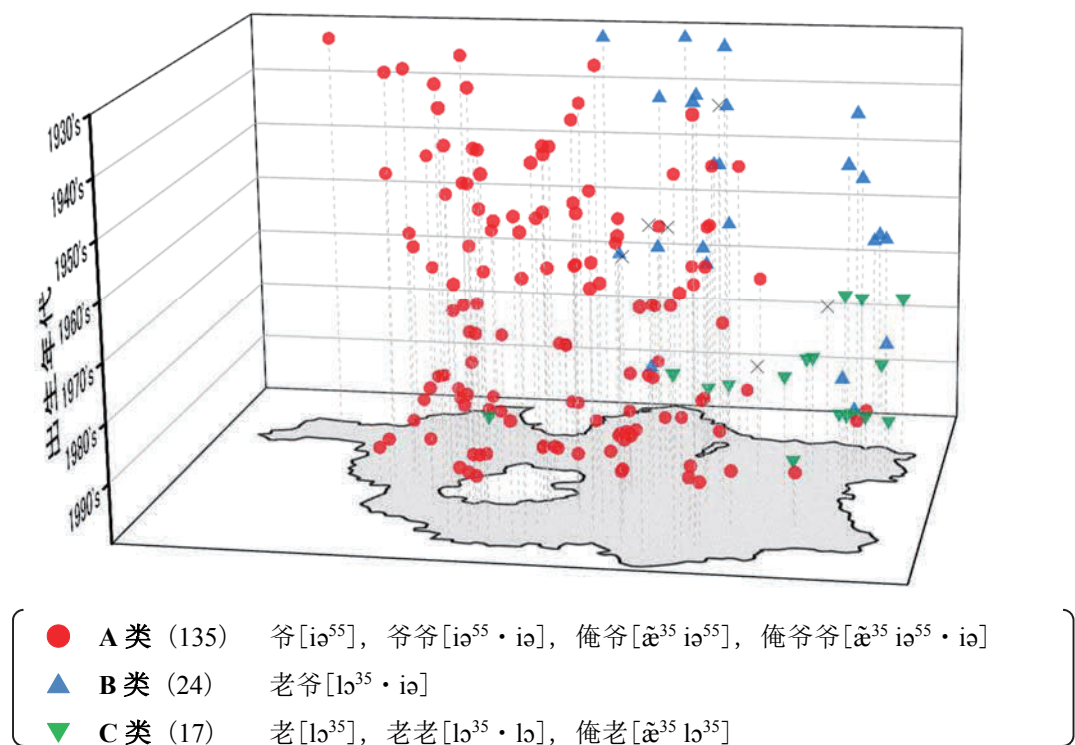


图6 乡镇“祖父”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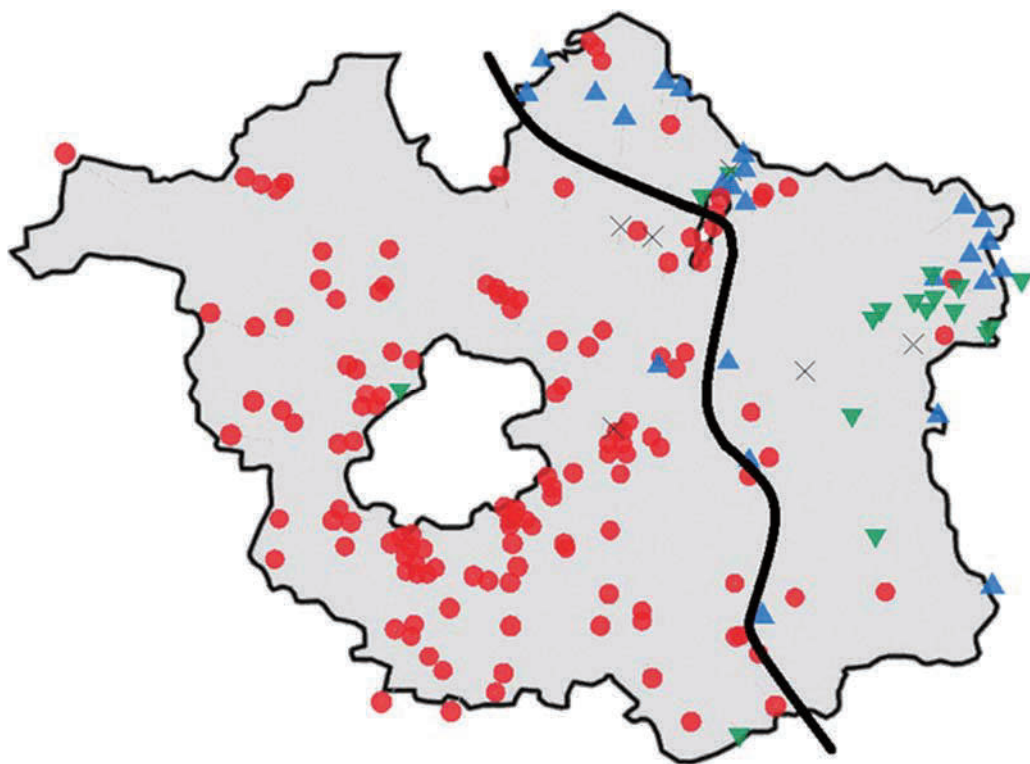


图7 乡镇“祖父”称谓词形的地理分布：“东西对立”及同言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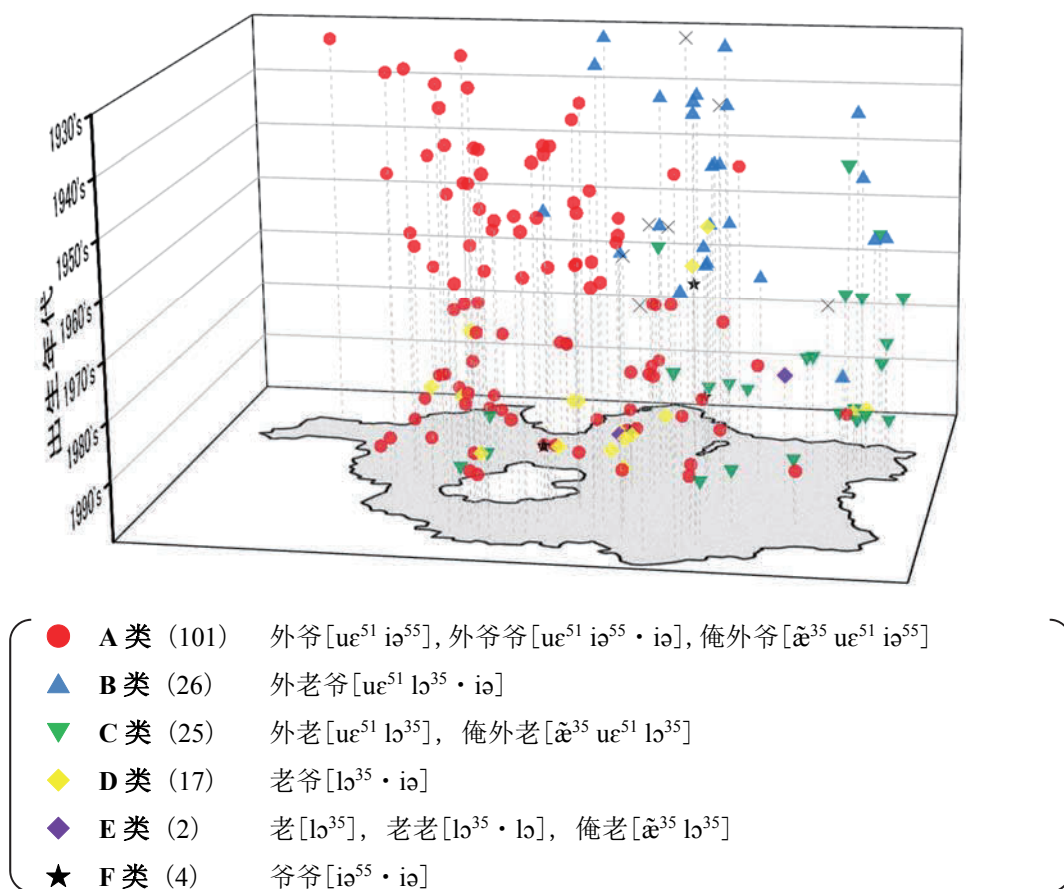


图8 乡镇“外祖父”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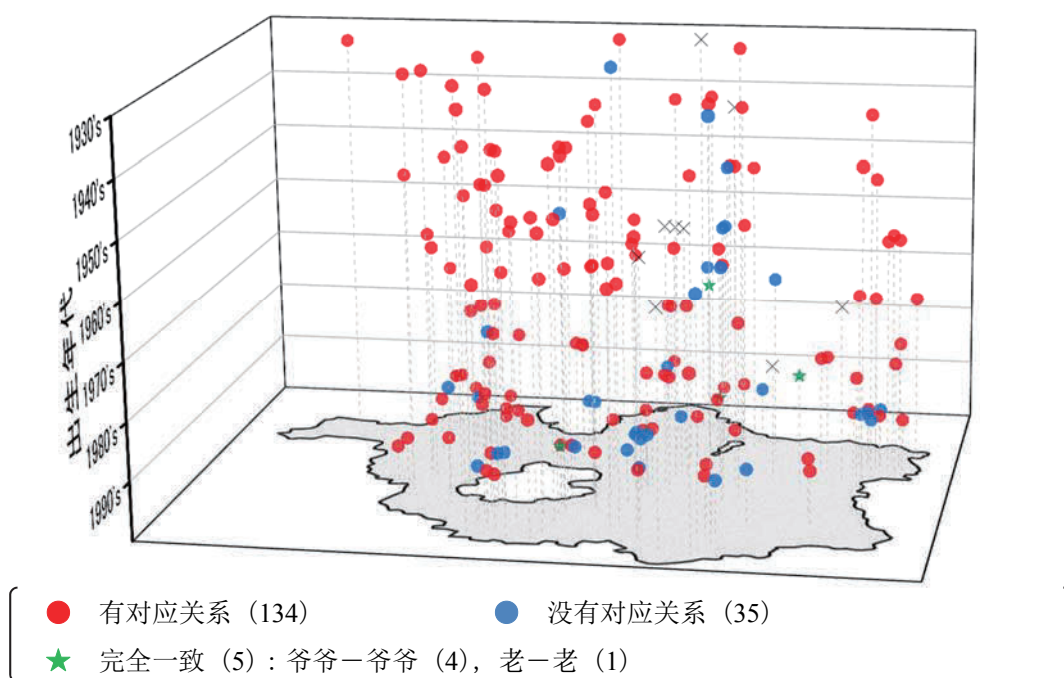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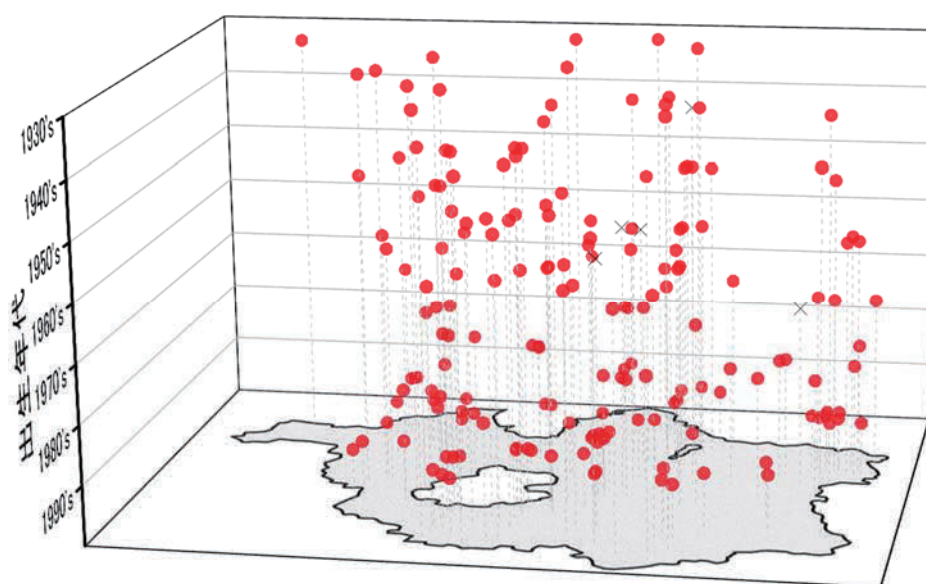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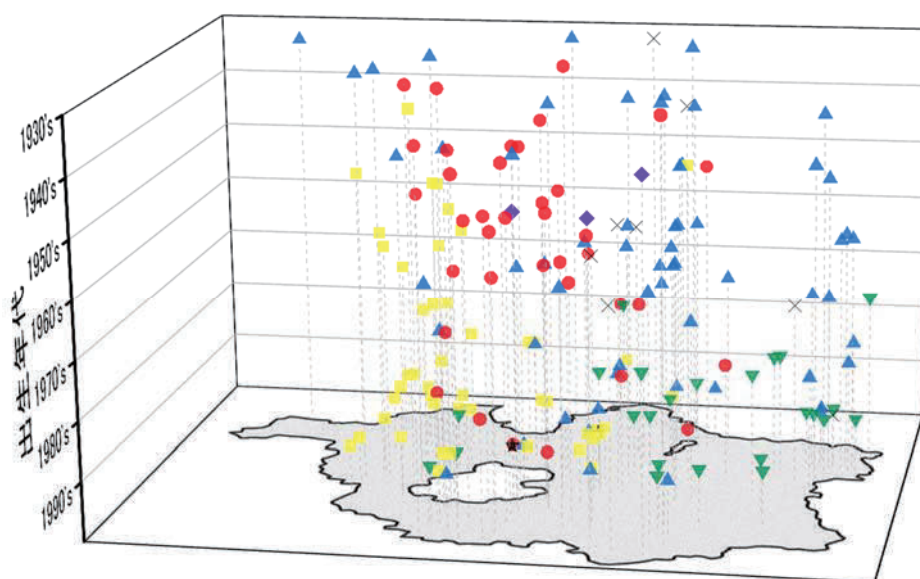


图9 同一个发音人所使用的“祖父”“外祖父”称谓词形的对应关系



● A 类 (177) 奶[nɛ³⁵], 奶奶[nɛ³⁵ · nɛ], 俺奶[ǎ³⁵ nɛ³⁵], 俺奶奶[ǎ³⁵ nɛ³⁵ · nɛ]

图 10 乡镇“祖母”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 A 类 (37) 外奶[ue⁵¹ nɛ³⁵], 外奶奶[ue⁵¹ nɛ³⁵ · nɛ]
 ▲ B 类 (60) 姥娘[lɔ³⁵ · nian/ niŋ], 朗娘[lan³⁵ · nian/ niŋ]
 ▼ C 类 (24) 朗[lan³⁵], 朗朗[lan³⁵ · lan], 俺朗[ǎ³⁵ · lan]
 ◆ D 类 (3) 外朗娘[ue⁵¹ lan³⁵ · niŋ]
 ■ E 类 (48) 姥[lɔ³⁵], 姥姥[lɔ³⁵ · lɔ], 俺姥[ǎ³⁵ lɔ³⁵]
 ★ F 类 (2) 奶奶[nɛ³⁵]

图 11 乡镇“外祖母”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4.3 祖母

对“祖母”的称谓而言，完全不存在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参看图 10 就能一目了然。

4.4 外祖母

另一方面，“外祖母”的词形较多，分为 6 个类型（图 11）。虽然该条目的 A 类（●）、B 类（▲）及 C 类（▼）的分布格局与“祖父”“外祖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形成了“东西对立”这一点上还是有类似的分布趋势。

B 类将“姥娘”和“朗娘”合并成一个类型是因为，如在 3.4 所述，“朗娘”是由于“姥娘”的“姥”受到语音同化而产生的词形，所以这两种词形都在语音变异的范围内。我们通过年龄差异也可以得以确认“姥娘”是比“朗娘”更古老的形式。再者说，“娘”有[niaŋ]和[niŋ]的语音变异，从年龄差异上判断，是[niaŋ]变成了[niŋ]。音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二音节的“娘”读为轻声而引起的弱化。

从分布特征和年龄差异来看，C 类的“朗”可以说是 B 类“朗娘”的“娘”脱落后的形式，另外还有由于单音节的“朗”重叠而形成的新词形“朗朗”。

回答 D 类“外朗娘”（◆）的发音人只有 3 位。“朗娘”前面加上“外”字的原因我们在 3.2 已做探讨。

E 类“姥”类（■）主要出现在西部的中年层和青年层。虽然 B 类主要分布在东部，但西部的老年层也还保留着这一词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推测在西部发生了“姥娘”>“姥”>“姥姥”这种形式的变化。

回答 F 类（★）的发音人只有 2 位，是将“祖母”“外祖母”都叫作“奶奶”的类型。

4.5 从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来看的语言演变过程

根据以上的解释，徐州乡镇的“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称谓词形的演变过程可以归纳出如下模式图（图 12）。

本文论述至此，还要补充如下三点。

（一）“东西对立”和“同言线束”

如前文所述，“祖父”“外祖父”“外祖母”称谓词形成了“东西对立”的分布局面，图 7 还显示了关于“祖父”的同言线。其实，日高 2019 所报告的徐州方言“蟬”的语音变异[tɕiə³⁵·lou]和[tɕiə³⁵·lou]也同样形成了“东西对立”和同言线。另外，苏晓青等 2019 根据徐州地区 18 个语音、词汇、语法、民俗条目的特征分布绘制出多条同言线并叠加在一起，从而归纳出了“西北部同言线束”和“中部同言线束”。本文所提到的这三个称谓词的分布局面和同言线也与这条“中部同言线束”⁵⁾相一致。苏晓青等 2019 还做出了如下解释：“中部同言线束与明代徐州、淮安府的界限一致，这种一致性说明，行政区划界限

⁵⁾ 狭义上的徐州指徐州市的五个直辖区（云龙区、鼓楼区、贾汪区、泉山区、铜山区），而广义上的徐州还包括两个县级市（新沂市、邳州市）及三个县（丰县、沛县、睢宁县）全域。这里所说的“中部”指的是广义上的徐州中部。

往往与方言民俗的分界线是一致的，行政区划对方言民俗分区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二) 互补分布

“祖父”义的“老爷”[lɔ³⁵·iə]主要分布在东部，“外祖父”义的“老爷”[lɔ³⁵·iə]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两者的语音形式完全一样。另外，“祖父”义的“老”[lɔ³⁵]类主要分布在东部，“外祖母”义的“老”[lɔ³⁵]类主要分布在西部，两者的语音形式也完全相同。

如上所述，“祖父”“外祖父”“外祖母”称谓词形的分布局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其他条目也有显示同样的分布局面。然而，就“老爷”和“老”这些同音词而言，我们还能够解释为为了回避同音词冲突形成了互补分布，从而保留着现在的分布局面。岩田 2009 中有关于同音冲突更详细的说明。

(三) 音节的脱落和单音节的重叠化

“祖父”的“老爷”演变为“老”、“外祖父”的“外老爷”演变为“外老”、“外祖母”的“朗娘”演变为“朗”，这三种变化的共同点是音节的脱落。另外，虽然在语言地图中无法完全表示出来，但实际上还存在音节脱落的其他例子，如“祖父”的“爷爷”演变为“爷”、“外祖父”的“外爷爷”演变为“外爷”、“祖母”的“奶奶”演变为“奶”、“外祖母”的“外奶奶”演变为“外奶”及“姥姥”演变为“姥”。这些例子都可以用年龄差异来说明。所以我们推测，近年来在徐州的老年层至青年层中正在发生亲属称谓词音节脱落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由于发生了单音节的重叠化而产生的新词形，如“祖父”的“老老”、“外祖母”的“朗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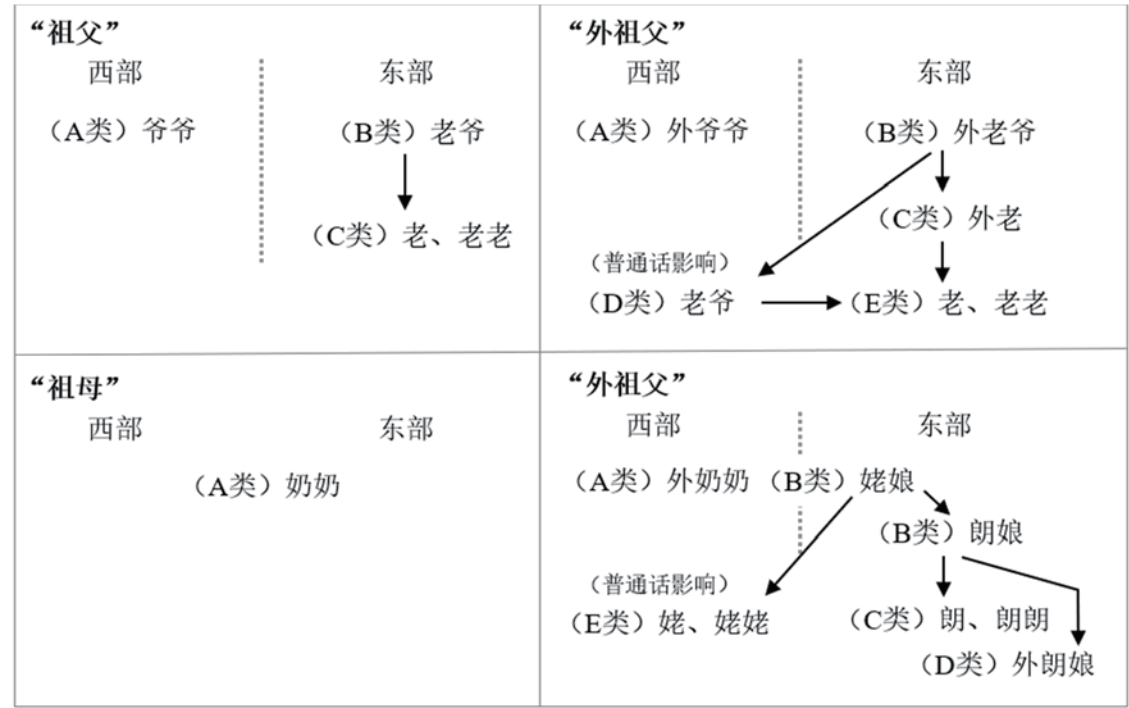


图 12 各个词形的演变过程

五、城区和乡镇的语言使用状况对比

最后,我们通过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对比来探讨徐州城区人和乡镇人称谓词使用状况的异同。从地理上看,城区处在“东西对立”的西部地区范围内(图7)。因此,分布在城区的词形及大致的年龄差异与西部乡镇相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有以下三个不同之处。

(一) 仅城区年轻人使用的词形“外公”和“外婆”

岩田 2009 指出,方言词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徒步式”;二是“空运式”。前者是“方言词由某一个村经过村民的交际传播到与之毗邻的另一个村”的方式,后者是以移民为媒体的传播方式。

根据本文考察的结果,“外公”和“外婆”仅出现在城区的青年层中。岩田 2012 所收录的广域语言地图显示,“外公”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外婆”主要出现在淮河以南及西北地区。不过,回答“外公”“外婆”的除了 1 位发音人⁶⁾以外,其他人的外祖父母都并非来自这些地区,而是来自徐州本地或者徐州周边的山东安徽等地区。考虑到城区周围的乡镇完全没有出现这些词形,所以可以排除掉以“徒步式”传播的可能性。并且,回答“外公”“外婆”的发音人大部分都是生长在徐州的青年层,所以也不符合“空运式”。

那么,还会有什么其他传播手段呢?关于语言变化的方式,井上 1998 曾提出过“雨伞模型”(雨伞モデル),并指出东京新方言词的传播方式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乡镇之间的互相传播;第二,流入到东京;第三,从东京传播到日本各地⁷⁾。如果运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推测,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外公”“外婆”是先流入到中央之后,再扩散到各地的青年层。

(二) “俺”字的添加

根据笔者所调查的资料,回答加上“俺”字词形的都是乡镇人。城区人之所以不使用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会觉得有点“土气”,反过来说,乡镇的一些发音人使用这类词形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保持淳朴的乡村味儿。然而,我们还要考虑到音节数的影响。岩田 1995 推测,江苏赣榆方言“伯母”的称谓经历过如下演变过程:ta nian> ta nie> tan> tan tan,其中单音节重叠化的原因为:“作为称谓词,单音节形式往往显得不稳定,于是形成了重叠的[tan tan]”。话说回来,在发音人的回答中加上“俺”字的词形当中,占多数的是单音词的前面加上“俺”,反而双音词的前面加上“俺”的并不太多。具体而言,“俺”加单音词(如“俺爷”、“俺奶”、“俺老”、“俺朗”、“俺姥”)共有 35 例,“俺”加双音词(如“俺爷爷”、“俺外爷”、“俺外老”、“俺奶奶”)共有 8 例。如此看来,“俺”字的添加也有可能为了变成双音节而保持稳定性的一种处理方法。

(三) 不区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现象

调查显示,不区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现象在城区和乡镇的青年层中都

⁶⁾ 这位发音人的外祖父来自江苏常州、外祖母来自上海。调查时,她还跟笔者解释说:“他们叫我说啥我就说啥”。所以对她而言,应该有外祖父母出生地的影响。

⁷⁾ 原文为 1.田舎での相互の伝播、2.東京への流入、3.東京から日本の他地域への伝播

有出现，然而出现频率各有不同，以城区更为明显。具体来说，从 80 年代到 00 年代出生的发音人中，“外祖父”也叫作“爷爷”的比例在城区高达 26.2%（65 位发音人中 17 位），而乡镇只有 3.6%（84 位发音人中 3 位）。

我们可以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和家庭形态的变化。现在在城市里像以前那样三四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反而核心家庭却越来越多，亲属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亲属称谓的改变。笔者在调查中还遇到过某位发音人提出了“有什么外不外的”这种想法。这可能意味着青年人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产生了意识上的变化。如此看来，城区青年层一方面在开始使用从外地流入过来的“外公”“外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外”这个概念逐渐产生了心理抵触。

附记：本文承蒙 JSPS 科研费 JP19K20786（研究活動スタート支援「3D 言語地図による漢語徐州方言の地域差・世代差に関する社会言語地理学的研究」）的鼎力支持，谨此鸣谢。感谢在调查过程中，江苏师范大学的苏晓青教授、苏教授的各位研究生（卢文秀、许以撒、赵文文）以及其他多方相关人士对我的协助和支持。感谢众多发音人给我抽出时间并给予了宝贵的语言资源。在绘制“3D 语言地图”方面，感谢 Light Stone 公司的榎本純二先生多次传授给我绘图软件“Origin”的操作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及感谢金萍女士在中文校对方面的帮助。特此衷心地向各位表示感谢。最后，向这次给予我投稿机会的远藤光晓教授、向在校对及编辑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的铃木博之先生深表谢意。不当之处，望各位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编 2015a.《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第六册南通卷》
凤凰出版社
- 《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编 2015b.《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第十三册宿迁卷》
凤凰出版社
- 井上史雄 1998.『日本語ウォッチング』岩波新書
- 日高知惠实 2019. “3D 语言地图”的绘制——以徐州方言的“蝉”和“蝉的幼虫”为例，
Studies in Asian Geo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6_eastern_asian_2019.pdf
- 苏晓青、吕永卫 1996.《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苏晓青、徐井岗、张春秀 2019. 徐州方言民俗的特征分布和内部分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34 卷第 5 期
- 徐州市民政局、徐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1991.《徐州市行政区划》
- 岩田礼 1995. 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
研究上的作用，《中国語文》1995 年第 3 期，pp.203-210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白帝社
岩田礼编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 好文出版

**Terms of Address for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Used by Xuzhou Dialect
Speakers: Lexical Variation by Area and Age**

HIDAKA Chiemi
Kanaza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xical variation of the terms of address for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age of speakers of the Xuzhou dialect in Jiangsu province. We will consider the processes of linguistic change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age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area of Xuzhou, location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rural villages located in the surrounding urban area,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rban area and rural villages. The informants consisted of 345 people born between 1930s and 2000s.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dialect survey data will be illustrated by 3D linguistic maps. While analyzing, we also identify unique cases in this area, such as transformations into new word form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geographically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to avoid homonymic clash.

Contributors

Ziqun LUO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efu SHI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Xiaoxiao YA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iroyuki SUZUKI	Fudan University
Tshering Yangdr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Zhuo YA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un GA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oxia YANG	Dali University
Xiaoyu ZENG	Nankai University
Haifeng Q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n LIU	Nankai University
Jinghan LIU	Nankai University
He HUANG	Fudan University
Kenji YAGI	Kokushikan University
Zhichao ZENG	Nankai University
Fumiki SUZUKI	Nanzan University
Chiemi HIDAKA	Kanazawa University

作者介绍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八木坚二	国士馆大学
石德富	中央民族大学	曾智超	南开大学
杨潇潇	中央民族大学	铃木史己	南山大学
铃木博之	复旦大学	日高知惠实	金泽大学
次林央珍	中央民族大学		
鄢卓	南开大学		
高天俊	华中科技大学		
杨晓霞	大理大学		
曾晓渝	南开大学		
亓海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欣	南开大学		
刘婧涵	南开大学		
黄河	复旦大学		